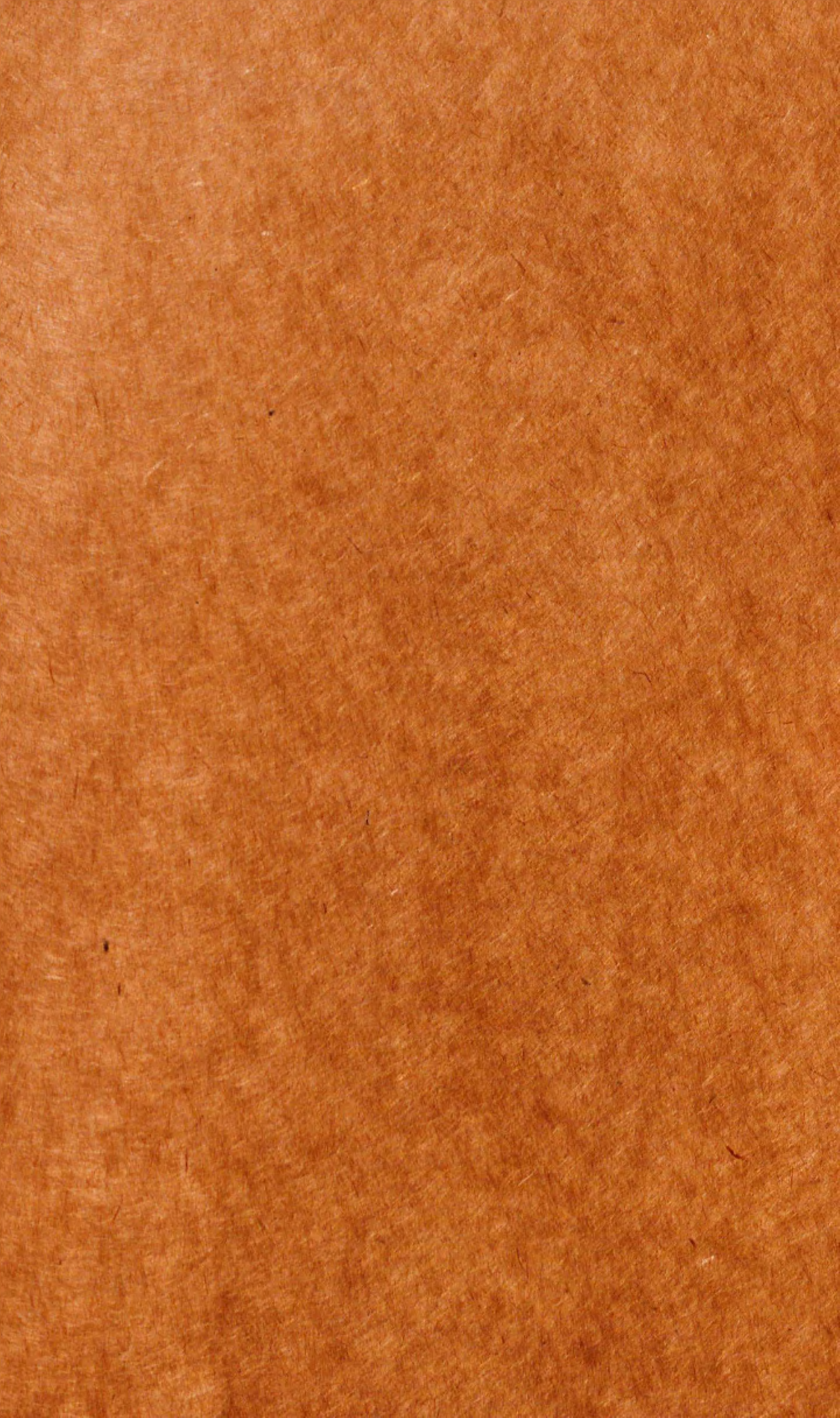


赤道線的
南洋密碼
台灣@馬來半島的跨域文化田野踏查誌
白偉權 著
第一本以「跨域」的角度，結合地理學田野誌的踏察方式，多元的輻射視角，回望過去、專注現在、眺望未來，
台灣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高嘉謙 主編
宋鎮照
阿潑
房慧真
張正
陳國川
康培德
張貴興
張錦忠
黃錦樹
廖雲章
各界好評推薦
從台灣望向南洋，在南洋尋找台灣
Rye Field Publications





赤道線的南洋密碼

白偉權 著

「台灣@南洋」書系前言

高嘉謙　台灣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台灣@南洋」書系，是透過台灣的知識平台建立一個望向南海，探索島嶼、半島、海峽等海洋視野的人文視窗，連結南洋的歷史文化與政經線索，締造一個帶有田野現場，結合廣大歷史視角的跨域視野。台灣從遠古南島民族的跨洋遷徙，大航海時代荷蘭、西班牙的占據，明鄭政權的南海貿易，締造了十七世紀以降台灣在海洋世界跟南洋的連結。爾後金門人落番南洋，日治台灣曾作為日本帝國的南進基地，作戰、受俘於南洋的台籍日本兵和戰犯台灣人，冷戰時代台灣作為第一島鏈往南延伸的反共陣線，台灣僑教政策為東南亞學子創造的華文高教之路，這林林總總跟大時代脈動相連的遷徙和移動，使得跨境

南方，既是地緣政治議題，也是歷史敘述、地域文化的線索。換言之，台灣其實早已擁有自己的南洋故事。那個帶有家國歷史想像，但也不乏人類學、地理學意義的族群遷徙和文化傳播，帶我們回到了一個又一個的歷史現場。

跨足田野，回到歷史線索裡的小故事，我們呈現台灣跟南方的文化交織，擴建一個知識生產的園地。書系的精神標舉「從台灣望向南洋，在南洋尋找台灣」，在兩個地域傳遞聲音，透過文學故事、歷史田野、文化踏查的接引，重新捕捉失落的歷史細節，時代變遷裡形塑的文化元素，人文地理的地方風土。「台灣@南洋」書系，藉此為讀者指引路徑，展開南方旅程，在大歷史與小故事裡建立我們的軌跡，識別自我與他者，讓讀者獲得橫向跨界的知識洞見和發光。

目次

貳、跨域的社會菁英

叁、橫向跨界的歷史

主編序：赤道線上的大歷史與小故事

高嘉謙　台灣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白偉權教授的新書《赤道線的南洋密碼》是一本為台灣讀者撰寫，認識南洋，進而聚焦馬來半島的區域研究專著。書名乍看帶有推理、探險趣味，實際是作者長年田野踏查經驗，為讀者勾勒一條進入與探索馬來半島世界的有效路徑。然而，此書又非史地概論或行旅導覽，而是帶著跨域詮釋和理解的意圖，深度引導我們掌握台灣與馬來半島，及其周邊的時代故事。作者出生於新加坡，成長於馬來半島，在台灣接受系統的地理學訓練，取得地理學博士。透過書名的副標：「台灣@馬來半島的跨域文化田野踏查誌」，作者以自身的跨界經驗、地理學的敏銳視野，試圖告訴我們從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東

亞、東南亞所發生的鉅變裡，其中的人事與物事有著千絲萬縷的勾連，產生不可忽視的效應和結果。這也是構成此書跨域、跨界思考的重要組成。

近年台灣關於東南亞主題的出版品，除了國別史或區域經濟、地緣政治為主題的翻譯書籍外，另有關於產業合作、食物與植物的連結、外籍移工的文學寫作、台灣新住民的舌尖家鄉味，各式開啟的知識窗口，引導出精采多元的東南亞認識渠道。《赤道線的南洋密碼》置於其中，顯然另有一個特殊的閱讀位置。作者藉由田野踏查，輔以專業知識，敘寫歷史人物事蹟掌故，勾連經貿、政治、物產、文教、風土的交織平台，梳理箇中清晰的歷史、地理脈絡，既有宏觀視野，又不乏微觀細究。作者的知識引導像是說書人娓娓道來，為讀者建立大歷史視野下的小故事，兼顧趣味之餘，也不忘建立讀者的知識門檻。作者嘗試提醒我們，文章內的人物與事件，背後彰顯的局部視點都有其不可略過的勾連脈絡。這是由點及面的一種寫作嘗試，引入台灣接軌南洋的知識線索，試圖告訴讀者，從台灣認識東南亞，或從東南亞想像台灣的必要。

全書由三個核心單元組成，分為「歷史的基因圖譜」、「跨域的社會菁英」

和「橫向跨界的歷史」。作者為全書規畫的寫作與安排，確實各有網絡牽連，在不同單元裡，彼此交際往返的人事線索，可以看出一個更縝密的台灣與南洋的交際系譜。這是此書最初寫作的用心，意在提醒人與經濟、政治、文化、環境的歷史互動裡，不完全是孤立與偶然事件。這是作者從地理學出發的「觀看之道」，赤道線上的接觸和相遇，有著值得探究的地景意義上的張力。

從歷史基因圖譜出發，此書先為我們勾勒馬來半島、新加坡，箇中涉及族群、信仰、經濟活動等開埠拓荒的地方脈絡。柔佛是偉權學術研究的起點，他的第一本專著《柔佛新山華人社會的變遷與整合：一八五五—一九四二》（二○一五）就是由碩士論文改寫而成，開啟他的區域地理學視點，從走訪義山、踏查墓碑，運用地理資訊系統（GIS），奠定了他對自然與人文地景的形塑與探究，展開區域研究的關懷與思考。因而此書開篇第一章從柔佛甘蜜、港腳的議題出發，深入淺出敘寫地方的墾殖史與華人移民、蘇丹王國及殖民者的複雜關係。箇中最有趣的部分，當屬如何透地理線索，為我們追蹤與鋪展今昔對照下的甘蜜與港腳往事。這類著眼地理關懷的歷史脈絡，其實深化了作者最想讓讀

者探究的主題：我們如何透過地方的歷史與地理線索，勾勒其原初的人與環境的聯繫和關係。從甘蜜到港腳，前者是經濟作物，後者是貿易集散的地理概念，二者勾連的新加坡與柔佛關係，打開了一個重新建立在地方脈絡關係的地方史。

而人物是貫穿地方故事的核心角色，無論是「跨域的社會菁英」和「橫向跨界的歷史」單元，作者透過立體的人物事蹟，觀察在中國南方、港台與新馬、印尼之間，早在十九世紀末就存在的人物與地方的微妙聯繫和互動。無論是畢麒麟從屏東半島的洋行通事，搖身變為掌管新馬的華民護衛司，作為華人通的歐洲殖民者角色躍然紙上；清末保皇黨領袖康有為流亡在馬來半島的海灣岬角，曾標記在鄭和航海圖和歐洲海上強權為香料貿易東渡的海圖，以及荷葡海戰。這裡啟動的地理連結和想像，拉開了演繹歷史的序幕。台灣總督府扶植的紅頂商人愛久澤直哉，執行明治政府的華南政策與南進政策，帶著國營企業背景的三五公司投資了馬來半島的橡膠種植，以及廣東潮汕鐵路建設。這同時連結上了棉蘭發跡的華商兼僑領張煜南和張鴻南兄弟，以及檳城副領事張弼士。

而板橋林家跨足潮汕鐵路，以及家族第四代林景仁跟棉蘭張鴻南女兒張福英的跨國聯姻，間接帶出了台灣漢詩人的異國漢詩寫作和破碎婚姻。這些以台灣為基地的資本，凸顯了二十世紀初的跨國經貿脈絡裡，中國、日本、台灣與南洋連結的政商、文化網絡。箇中的人物故事，發跡和移動的線索，除了現今留存的宅第、詩集見證昔日光景，那些進駐南洋投資經商的日人留下的墓地、地名等種種地理意義的遺跡，也成了我們認識一處地景的方式。

偉權選擇這些個案的寫作策略和巧思，不僅止於人際脈絡的勾連，自然也不忘他的地理學老本行。這些人物遊走東亞與南洋的移動路線，確實有著清晰的地理脈絡支持彼此的連結。其中地緣社群，宗族祖籍發揮的功能，構成了我們認識近百餘年來華人網絡的重要因素。諸如避居香港的前清遺老賴際熙跟馬來半島會黨領袖鄭景貴的增城祖籍淵源和社群聯繫，進而有了跨境的接觸。這是一種士商網絡的交遊，當然也不乏現實的利益關係。鄭景貴是開採錫礦起家的僑領，拿律械鬥時雄霸一方的海山私會黨領袖，這凸顯了方言群華人在馬來半島拓荒墾殖的會黨背景，那接軌天地會、洪門的「反清復明」義士情結，

隱然揭示了他們在社會位階和地理意義的邊緣性，無論是對應海禁政策下的華人移民背景，或是殖民統治下的勞力拓殖。這些遊走黑白兩道的早期華人移民生活史，包括開展跨國鴉片生意的陸佑。另外，值得關注的華人宗親地緣散居網絡，有新江邱氏家族離散至台南篤加，以及遷居在馬來亞檳城成為洋行買辦；當然還有締造東南亞藥油和報業王國的胡文虎，背後的客家網絡，都一再提示我們關注方言群遷徙流動的軌跡。

本書裡處理的人物與事蹟，還包括我們熟悉的華僑參與中華民國締造的歷史，以及早期以民族思潮與黨國意識為主導的馬來西亞華文教育。作者著眼的焦點，反而是革命思潮和民族精神的遺緒在新馬華人社會的扎根與生成，這是另一層「民國」在人文地理意義的反思與觀照。綜觀這些先後在地方產業、跨國企業、教育文化領域發揮關鍵性意義的時代要角，從人文地理的視角鋪展，背後隱然可見的商業、政治、教育、文化網絡，尤其地方與殖民勢力的平衡與妥協，締造了東亞與東南亞世界別具意義的接觸和聯繫。

由此看來，《赤道線的南洋密碼》強調的是地理意義的「發現」，因此帶有

一個值得思考的視角：人物與地方的關聯，如何置於大歷史的體系裡觀照？這些跨域的地方菁英，在地方的影響力與效應，其背後的交遊、交際網絡，觸及了一個跳脫單一地方脈絡的歷史語境。換言之，歷史瑣細、片段的細節與線索，往往重構了地理意義上的一個歷史視角。地方因為特定人物事蹟與歷史事件發生了骨牌效應。除此，本書同時觀照族群文化與地方風土。拿督公的民間信仰投映了華人與巫來由（馬來人）交織的風土。華人方言群的分布，在拿督公按照方言讀音而產生不同的音譯漢字，就能看出地理意義上的文化現象。所謂華夷交融，即是產生自我與他者的識別消長和想像的過程。殖民歷史裡葡萄牙、荷蘭、英國海上勢力的槍砲傳奇，轉化為那以神來膜拜的大砲，這遍及北馬、中馬深入各族群的民間信仰，跟馬來蘇丹王國的連結，體現了作者觀照歷史的視角，遍布在地理軸線上人與環境的脈絡。這帶有人文地理學的思考，活絡了馬來半島的認識框架，那結合地區與空間關係的人物、事件探索，近似田野踏查的路徑，為認識南洋開啟新的可能。

最後，本書作為「台灣@南洋」書系的第一本著作，始於新冠疫情初期，

我向白偉權教授的邀稿。偉權是馬來西亞極有活力和創造力的新生代學人，我們的認識與合作，也有著多重網絡。在台北的講座、檳城的研習營和田野，以及線上課程，知識的連結與啟動因此變得可能。當疫情改變了我們對世界的認知與交際，感謝偉權教授努力完稿與成全，讓書系得以出版。田野的意義在於對地景的認識與踏查，在於那內蘊的張力。此書透過人物故事、經貿脈絡、地理線索、風土方物、文化生態，構成了歷史與地理交織的地景張力。馬來半島的重新被認識與理解就是本書為我們帶來的田野目光。

本書的出版，獲得科技部「南向華語與文化傳釋」計畫的贊助，謹此致謝。

導論：歷史時空中的馬來半島

在過去中學求學階段，歷史課中最讓人覺得無趣的就是馬來西亞史！裡面充滿了陌生的人物，本地歷史人物都有著很長且難以背誦的名字，而當中所出現的華人，往往也是一些對中國大歷史而言，名不見經傳的人物，因此當時候也只是應付應付，沒什麼興趣可言。到了大學時期來到台灣之後，發現台灣人很珍惜自己的歷史，同學們至少都能對自己的土地講出個所以然，但自己被同學問到馬來西亞的點滴時，卻啞口無言，所知甚少。此外，記得在大學無論是上課還是在課後與老師們的閒聊，也經常聽到老師說台灣是個資源豐富、族群多元的地方，且位置位在國際貿易路線上，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一個面積僅相當於馬來西亞彭亨州的島嶼，就能被大家談出很多很精彩的故事。筆者這

才回過頭反思對馬來西亞留學生而言，台灣很小，族群也相對單一，但其實仔細發覺的話，其實還是很精彩多樣。

馬來西亞呢？他自古就位在交通要道上，這個交通要道叫做南中國海和馬六甲海峽，論重要性，這樣的地理位置相比台灣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若論環境資源，只要是經濟作物，基本上都能夠在這片土地上種出來，曾幾何時這裡無論是錫礦、胡椒、甘蜜、橡膠等的土產，其產量都是世界第一。在族群方面，這裡的種族大類及其內部的次群體（如方言群）也較台灣來得多。這裡的歷史更是複雜，單是一個馬來半島，就可以有多個馬來蘇丹王國，進入英殖民時期後，馬來半島也被劃分為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馬來聯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和馬來屬邦（Unfederated Malay States）三個不同的治理體系。正因為這個歷史緣由，現今馬來西亞各州的制度也有所不同，這點也展現在各州公共假期、對於語言招牌的使用、族群文化等面向。因此，馬來西亞的歷史必然是精彩的，十分值得我們去了解。

然而，歷史是精彩的也是枯燥的，要進入它，其實需要跨越一定的門檻，首先必然需要掌握好人名和時間，甚至地名，就像學英文和數學一樣，只有學會了這些字母和數字公式，才能打開奇幻旅程的大門，因此在入門時，總免不了死記硬背的過程。不過我們也不要忘記一點，歷史、文化與社會並不是教科書上憑空撰寫出來給予學生背誦的知識，哪怕是理論，也是來自現實世界的歸納。換句話說，大歷史就在我們生活周遭，像是馬來西亞許多「中華」字輩的華校，以及其校歌歌詞，不就是一部二十世紀初華僑救國救亡的大歷史嗎？也因為大家比較強調書本上的大歷史，反而日常周遭每天都在經歷的這些，卻比較少為人提及，因此成為視而不見的東西，最終無法體現它的價值，最終走向流失。因此從田野當中來閱讀大歷史，它就會變得比較有趣，而且容易與自我產生情感連結，從而變得比較有溫度和更加有親和力。筆者自小生活在馬來半島，因此在本書的撰寫上，主要將視野聚焦在馬來半島的文史，並且以田野地景敘事的方式將馬來西亞人生活周遭的文化地景（cultural landscape）與他背後的大歷史扣連起來，以期讓這些平時被人忽略的文化資產被人「看見」。

對於台灣的讀者而言，馬來半島其實入門不難，因為馬來半島與台灣島無論在自然或是人文環境上，都有著諸多的相似之處。疆域輪廓上，半島和寶島都呈現了蕃薯（地瓜）的形狀，並且在地形上同樣有著貫穿此蕃薯的中央山脈，因而將整個區域分為東部和西部，此東、西部在區域發展上也呈現著西部發達東部遲緩的型態。在馬來半島西部地區，同樣也被劃分成北、中、南三大部分，各區域皆呈現著截然不同的人文景觀。在人文環境上，台、馬兩地的華人都是以移民拓殖為歷史基底的社會，而來此的華人皆源自閩粵地區，因此無論是在語言、族群文化以及信仰上，都有極大的相似性。此外華人往往需要跟當地土著進行互動，這裡的土著，也同為南島民族。唯所不同的是，馬來半島華人在人口上始終為小眾，中國政權也未曾在這裡行使主權。當然，兩地的異同比較無法在此一一贅述，不過可以確定的是，這是一本台灣讀者也能閱讀的馬來半島文史書籍，並且讀了之後，會有種似曾相識，時空及人物錯置的奇妙感覺。為了能讓台灣的讀者更加容易進入馬來半島的田野現場，本書各篇章盡可能以台灣的視角進行書寫，同時適時嵌入「歷史小辭典」，對於一

些馬來亞的歷史名詞進行解釋，方便台灣讀者掌握本書內容的重要背景知識。

在這部從田野文化地景講述馬來半島歷史的書當中，一共由十六個篇章所組成，為了讓整體的主題更加聚焦同時更加層次分明，筆者將這十六篇文章分作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名為「歷史的基因圖譜」，第二部分為「跨域的地方菁英」，第三部分為「橫向跨界的歷史」，這三大部分其實有它的鋪排邏輯。

歷史的基因圖譜

談起馬來亞，很多的人腦海裡都會不約而同地浮現出熱帶、族群多元豐富、文化交融的意象。確實沒錯，馬來半島的過去從來就是一部講述季風、貿易與移民的歷史。來自東亞、南亞、歐洲等不同文明圈的移民、航海者、貿易商因為季風的關係，經常會來到這塊熱帶土地進行停留、交易。而對其他地區的人而言，這裡是物產豐富的，前來這裡的人都能找到各種農、礦及山林資

源。這種得天獨厚的環境條件讓這個地方具備無限的魅力，吸引更多人前來。因此，資源、經濟、移民三個影響因素不斷交互作用，最終在這個歷史長河中形塑出屬於馬來半島多元社會獨一無二的「基因圖譜」。因此以「歷史的基因圖譜」作為開篇，從這片土地上的經濟活動、族群（華人、馬來人、印度人）以及他們所交織出的信仰文化、傳說來讓讀者對馬來半島的歷史架構有個基本的認識。

在第一部分當中，首三章以族群經濟活動為主題，若我們今天將馬來半島做二元劃分，熱帶栽培業和礦業可說是馬來半島近百年來經濟活動的主旋律。在空間分布上，則呈現著農業南馬、礦業北馬的分布特色。〈甘蜜、港腳與百年新柔關係史〉講述的是南馬地區（這裡指的是新加坡、柔佛、馬六甲甚至廖內一帶的區域）的田野故事。十九世紀是它的大開發時期，許多的華人以新加坡為基地，大舉向北部的柔佛移入，在當地開發以胡椒、甘蜜為主體的熱帶栽培園——港腳，此舉也推動了新柔佛王國（今馬來西亞柔佛州）的崛起，也一度使柔佛成為全世界最大的胡椒、甘蜜生產國，柔佛的榮景也為當時新加坡

的GDP貢獻不少。在此「大江大海」的歷史之下，柔佛有了特殊的港腳聚落，同時造就出獨特的信仰和地方文化，使得今天的新加坡和柔佛雖然分屬於不同的國家，但只要往返兩地便不難發現，柔佛與新加坡的社會聯結密不可分。相對於吉隆坡，柔佛（特別是首府新山）整個生活節奏和調調更趨近於新加坡。

就在十九世紀中葉華人大舉在柔佛開發港腳的同時，馬來半島北部則呈現出不一樣的風景。北馬以採礦為主，由於錫礦是勞力密集型的產業，因此到北馬開發的華人，遠比柔佛來得多。也因為錫礦屬於不可更新且不確定性高的資源，人口與資源的關係往往難以維持平衡，因此不難發現馬來半島的礦區往往都呈現著社會關係緊張的狀態。馬來半島上幾個主要礦區，像是馬六甲內陸、雙溪烏絨（Sungai Ujong）、雪蘭莪（Selangor）一直到北部的拿律（Larut）都相繼發生了嚴重的械鬥。在本地眾多華人械鬥當中，又以拿律戰爭最為嚴重，它可說是馬來西亞華人史上歷時最長、死傷最慘重的一場械鬥。這場結合華人和馬來統治者的戰爭，也徹底改變了馬來亞歷史的命運，開啟了馬來亞英治時代的新篇章。

在拿律戰爭的後期，從福爾摩沙台灣南來的畢麒麟（William Alexander Pickering），也因為參與了這場戰爭的調停和善後，最終獲得賞識而在馬新地區嶄露頭角。拿律戰爭雖然重要，但是衝突兩造為何以及如何發生衝突，仍有許多待解的疑團，因此〈尋找消失的拿律舊礦區〉便從田野的角度，結合歷史文獻、碑銘材料等線索來一步一步還原當時舊礦區的位置，以期更進一步了解這段歷史的原貌。

作為一個族群多元的國度，華人當然不是這裡唯一的移民社群，來自南亞的印度人也占據了其中一個重要的板塊。印度人大約是到了二十世紀初才大規模南來，時間較晚，他們南來的原因也與熱帶栽培業有關，唯所不同的是，他們多是因為歐資在馬來半島內陸的橡膠園開發而移民至此。為了有效開發馬來半島的資源，英國人也在馬來半島內陸鋪設了馬來亞鐵路，交通的開發也帶動了沿線的園丘發展，使得內陸地區成為印度人安身立命之所。然而，移民的先後次序、在馬來亞的經濟生活模式，以及他們所集中的地區卻也影響了馬來西亞現今的空間以及階級化的族群地景，〈大園丘、印度人與南北大道上的牛

隻告示牌〉一文便是以馬來半島南北大道上的牛隻告示牌作為楔子，梳理印度人與歐資種植園、英殖民者之間的共生關係，同時也深入大園丘內的印度勞工村以及探討在馬來西亞經濟轉型之後，印度社群的悲歌。

談了華人、印度人，當然也少不了在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較早的馬來人。「誰是馬來西亞的先住民？誰是外來者？」這個課題在當代馬來西亞政治的語境裡一直是一個敏感的禁區，也經常成為大家爭論不休的命題。當然，站在馬來西亞公民的角度，沒有人是外來者，但論及先來後到，華人往往會熱衷於列舉鄭和時期的馬六甲已經有華人，也會藉由古籍的記載來證明這裡在秦漢時期便有華人活動。但客觀而言，零星尋找到華人的蹤跡是否能作為「先來者」的判定依據？仍有待商榷，但客觀的事實是馬來民族在本地很早以前便已經建立了屬於自己的蘇丹王國，在大航海時代裡，他們也是這段歷史的主角。大航海時代中，本區蘇丹王國林立，國與國之間往往處於一種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加上葡萄牙、荷蘭、英國等大國的介入之下，其歷史的精彩程度一點都不亞於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大歷史下的古砲故事〉就以馬來半島現存的三尊古砲

為主角，藉由民間社會對於古砲的對待及理解，呈現古砲在馬來社會中的神聖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社會是相互交流並吸收彼此文化精髓的，有的古砲也出現了不同族群版本的傳說，充分體現了民間文化的活力與包容性。

除了古砲故事之外，談及馬來半島豐富的多元文化，這裡特有的「拿督公」信仰可說是展現馬來半島多元文化交融DNA的最佳成績單。「拿督公」是有著華人和馬來人等族群各自表述的傳統信仰，〈華夷交融的拿督公信仰〉這篇著重於談華人如何將自己原鄉的土地公概念搬到馬來半島來，並結合馬來文化中的「拿督」意義，最終創造了本地的拿督公。在華人內部，拿督公也有不同的表現方式，從而衍生出不同性質與類型的拿督公，不同的祭祀方式，以及各種禁忌，反映了馬來亞華人對於異文化的吸收與想像情形。

在「歷史的基因圖譜」這部分當中對馬來半島的歷史紋理有基本認識之後，下一篇則是著重於談這個歷史舞台上的人物了。人是塑造歷史的能動者，也是社會構成的基本單元，而人本身的流動性往往也造就了區域之間的關連。在馬來半島的歷史中，同樣出現許多創造一個時代的歷史人物。值得注意的是，

每當我們在閱讀歷史教科書的時候，這些歷史人物都是被放置於特定的國家和地區，以致我們對於歷史人物的理解經常也附帶了特定的空間標記，像是康有為就一定是中國的康有為，而不會與南洋或東南亞沾上邊。此外，不同國家在解讀同一個人物時，往往會著重於他們在本國的事蹟，而導致了不同地區的人們對同一個歷史人物，猶如平行時空般，有著不同的詮釋和表述。像是畢麒麟，便有台灣版本的畢麒麟，以及南洋版本的畢麒麟一樣，兩地人互不知道他在台灣或馬來半島的事蹟。因此，本書第二部分以「跨域的地方菁英」為題，藉由他們的跨域史蹟，來勾勒出更完整的歷史面貌。

跨域的地方菁英

在「跨域的地方菁英」當中，筆者選擇了十九世紀那些締造近代馬新歷史的人物作為這部分的主角。他們之中，對馬新華人社會最有影響力的人，當屬

畢麒麟，這位在台灣史詩劇《斯卡羅》中與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到處趴趴走的歷史人物。長久以來，會黨是早期南洋華人重要的生活方式，在遠離中華帝國的南洋，會黨是華人社會的治理體系。然而這種治理體系與英殖民勢力的深入卻是相互矛盾的，兩者力量長期都處於彼此消長的狀態，也造成衝突不斷。就在一八七〇年代，一位名叫畢麒麟的英國人來到馬來亞，夾帶著過去在福州和台灣所累積的經驗，成為殖民政府中的「知華派」，因而被委任為英國治理華人社會的最高長官——華民護衛司，他對於華人會黨有深入的研究，不僅參與觀察會黨成員的入會儀式，他自己甚至也成為會黨的一員。也因為他這種對於會黨採取「人類學」式的觀察和了解，故也提出了華人會黨與殖民政府共存的治理模式。此外，他在任內進行了多項改革，保障了華工的權益，深受華人敬重。〈畢麒麟：從台灣實習生到南洋大佬〉便是以畢麒麟為主角，講述了他在台灣的歷程，接下來呈現他在累積了台灣經驗之後，到了南洋，如何逐步成為深獲各路人馬敬重的南洋大佬，同時也整理出本地區現存與畢麒麟有關的地景地物。

與畢麒麟一樣具有顯著的跨域性的社會菁英是康有為，這是一位中國晚清時期響噹噹的人物，他是公車上書的主角，也是維新派、保皇派的代表人物，人們對他的認知往往是與中國史連在一起的。然而在他維新失敗之後，他的流亡經驗卻使他由中國的康有為轉變成世界史中的康有為，香港、日本、東南亞、美國、歐洲都有他的足跡，其中，馬來亞便是他重要的據點。當時馬來亞及新加坡華社同情和支持康有為的人很多，資金雄厚的邱菽園便是其中之一，他深受康有為的理念影響，進而在新加坡創設《天南新報》。康有為與馬來亞的關係，便是由邱菽園而起。一九〇〇年，康有為受邱菽園的邀請，來到新加坡避難，之後他又前往檳城，而在這期間，他也到了一個名為「丹絨端」的岬角停留。〈丹絨端：東南亞海洋及晚清歷史舞台中的「絕島」〉一文便講述了兩個重點，首先是他所停留的這個岬角的歷史，再者是康有為在當地的避難生活。丹絨端是個相當具有歷史厚度但又經常被人遺忘的地方。他是大航海時代東西方航海者手上海圖中必定會出現的地標，也是十七世紀荷蘭葡萄牙大海戰的案發現場。後來在政治的介入下，地處森美蘭海岸的丹絨端卻又是馬六甲的轄境，

形成罕見的飛地（enclave）。丹絨端岬角上面也有燈塔，這是康有為在當地停留期間的住處，由此，中國史和大航海時代東南亞史便因康有為而產生時空交錯。另一個重點則是敘述康有為在這個島上的十四天生活，他在當地寫下了幾首詩，在他的詩中，丹絨端也有了「丹將敦」、「絕島」的名字。在丹絨端短暫的停留之後，康有為便在海峽殖民地總督瑞天咸（Sir Frank A. Swettenham）的護送下，繼續前往半島北部的檳城。

十九世紀的檳城是當時的東方之珠，這座城市在一七八六年開埠之後，便是英國在東南亞最重要的殖民據點，它也曾經是海峽殖民地的首府（轄區為馬六甲和新加坡）。作為馬來半島北部的區域核心，這裡聚集了來自周邊地區的商賈，他們到此設立據點，以此為家。像是英國人剛登陸檳島時，據說與鹿港辜家同宗的吉打商人辜禮歡，便從吉打渡海來檳島與英人萊特打交道，最終成為當地第一代居民。除了聚集了來自周邊的菁英人物之外，檳城菁英也往周邊地區投資，成為這些地區的開發先鋒。也因為如此，每當我們走訪檳城周邊區域像是霹靂、吉打、泰南、蘇門答臘北部各個城市，多少都能感受到一絲檳

城的調調。

〈棉蘭—檳城—板橋：蘇門答臘客家張氏兄弟在檳城〉當中的主人翁張煜南、張鴻南兄弟，便是前述人口流動模式的典型例子，張氏兄弟從中國南來，藉由檳城進入蘇門答臘的棉蘭，最終成為當地的開發先驅。在棉蘭發跡之後，張氏兄弟便前往檳城發展，在檳城推展自身的商業及社會網絡，今天檳城還有許多他們的遺跡，著名的極樂寺便是其中之一，因此張氏兄弟也是促成檳城及其周邊地區區域化（regionalization）的典型例子。張氏兄弟這種地方菁英也以檳城為跳板，將其事業拓展到中國潮汕，承建潮汕鐵路。就在此跨域流動中，他們結識了台灣板橋林家，張、林兩家最終也聯姻結為親家，傳為佳話。林家大公子、張家女婿，也是當時的台灣漢詩人林景仁也曾經有一段時間定居於棉蘭，他的詩集《林小眉三草》其中兩部便是以他在南洋的生活為題材進行創作的。

談到檳城的聞人，比張氏兄弟更加「大尾」的社會名流大有人在，甲必丹（Kapitan）鄭景貴便是其中的代表。鄭景貴是十九世紀檳城最富裕的人之

一，他早年開發霹靂的拿律，是當地主要採礦集團「海山公司」的大哥。當時，他所領導的海山公司曾與敵對陣營義興公司爆發長達十年的拿律戰爭。他後來打敗義興，成為該地區最大的礦家，財富也更上一層樓。鄭景貴基本上可說是富可敵國，他不只捐購官銜，甚至在中法戰爭中捐獻一艘戰艦予清廷。鄭景貴常居檳城，也是當地的華人社會領袖，張氏兄弟來檳城時，也會拜訪鄭景貴。〈海山大哥與港大系主任：賴際熙與馬來亞的聯繫〉便是講述前清翰林、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主任賴際熙（一八六五—一九三七）與鄭景貴之間的關係。鄭景貴與賴際熙同屬祖籍廣東增城，鄭、賴兩家也有聯姻關係，從田野觀察中也不難發現兩人關係密切。走入北馬的一些增龍會館，都能夠見到當中懸掛賴際熙和鄭景貴的照片，有些會館的門上還會掛著賴際熙高中翰林，以及鄭景貴封官的匾額。賴際熙在清朝時便與鄭景貴往來甚密，並且也不時南來檳城。清朝覆滅後，他定居香港，之後被港督也是香港大學校督的金文泰（Sir Cecil Clementi）委託設立港大中文學院，他也因此奔走南洋為學院籌集經費，這也使得許多南洋富商與港大沾上邊，像是蘇門答臘張氏兄弟便因為捐款而獲

得港大頒發的榮譽法學博士，而另一位對香港大學有著極大貢獻的便是陸佑了。

陸佑是馬來亞著名的礦家，他與鄭景貴同樣發跡於霹靂的拿律，但輩分較鄭景貴來得小。他從拿律發跡之後，便隨著英治時期政治界線的開放，而由霹靂擴展到雪蘭莪、彭亨等地，成為全馬來亞級的礦家。至今，在霹靂、吉隆坡、彭亨甚至新加坡都能夠找到以他為命名的「陸佑路」。在馬來半島以礦業為基底的城市，當地老廟中的捐款碑也經常能夠找到陸佑的名字。〈港大的陸佑銅像：尋訪香港與馬來亞的歷史聯繫〉一文裡便講述了陸佑如何在拿律發跡，以及在馬來亞各地的發展，最後提及這位馬來亞商人如何藉由英殖民體系之便，而往北投資香港的鴉片餉碼，最後也在香港大學籌建時，捐獻巨資，成為當中的主要出資者，香港大學主樓內古典雅致的禮堂，便以他為名，作「陸佑堂」。陸佑的銅像也被擺放在港大的主樓當中，相信現在一般的港大學生已經難以想像這座銅像其實是一位來自馬來亞的礦家。

談完拿律的鄭景貴和陸佑兩位礦家之後，我們再把視線拉回來與鄭景貴

交好的賴際熙。賴際熙除了因為是前清翰林，加上鄭景貴的關係而在南洋華社走紅之外，他在海外華人圈另一有著巨大影響的，就是海外的客家運動。有鑑於當時中國坊間流傳「客民非漢」的說法，身為客籍人士的賴際熙於是號召各地客家人成立香港崇正總會，掀起最早的客家運動。後來，一位南洋富商繼承了賴際熙客家運動的衣缽，不僅將香港崇正總會發揚光大，也在新加坡發起成立「南洋客屬總會」，深刻影響了馬、新乃至東南亞各地客籍人士的客家認同意識，馬來半島各地的「客屬公會」也如雨後春筍般在一九三〇年代冒起。這位南洋富商就是知名品牌「虎標萬金油」的創辦人胡文虎，他在南洋的影響力與它所創設的商業版圖有著密切的關係。

《《南街殷賑》裡的南洋猛虎——永安堂》便講述了胡文虎如何在緬甸仰光（Ranggon）發跡，並逐漸將其虎標事業拓展到曼谷、新加坡、檳城、荷屬東印度群島、香港、中國甚至台灣等地，展現出南洋華商典型的跨域特色。胡文虎不僅在這些地方營商，更在這些地方積極參與社會事務，推廣慈善事業，因此無論是在新加坡、檳城、香港，都留有許多胡文虎的史蹟，新加坡、香港以及

福建永定的虎豹別墅，馬、新地區的《星洲日報》，香港的星系報業都是胡文虎所創設的。虎標萬金油這個深具南洋、海外華僑意象的品牌也在一九三五年來到日本帝國治下的台灣展店，甚至還參加了該年年底的台灣博覽會。在日治台灣畫家郭雪湖的名作，描繪大稻埕繁華景象的《南街殷賑》當中，也在某個角落中把胡文虎的虎標萬金油畫了進去。胡文虎與他在南洋的路數一樣，對於台灣的慈善公益事業也有所付出，艋舺的愛愛寮便是其中之一。

總體而言無論是畢麒麟、康有為、張氏兄弟、鄭景貴、賴際熙、陸佑還是胡文虎，他們雖然看似局限在某地，是具有濃厚地方標籤的歷史人物，但他們相互之間也有某種程度的社會關聯，就如同「六度分隔理論」(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所提出的「地球上任何兩個不相干的人，只要透過六點六個人就會產生關連！」一樣，而上述幾位人物之間可能少於三個人就能產生關聯。調停拿律戰爭及掌管馬來半島殖民地華人社會事務的畢麒麟，與拿律的鄭景貴和陸佑有著直接的往來關係，而與畢麒麟共同調停拿律戰爭的同僚瑞天咸，在升官擔任海峽殖民地總督後，便是由他保護康有為在馬來半島活動的。而康有為離

開「絕島」丹絨端到了檳城之後，也在檳城張氏兄弟所創建的極樂寺留下了「勿忘故國」四個石刻大字。剩下的賴際熙和胡文虎，他們在客家事務上有直接的承繼關係，透過與鄭景貴交好的賴際熙，胡文虎也能與上述幾個人物產生聯結。若站在商業和社會網絡連結的角度來看，藉由他們之間的社會互動，也使得看似各自獨立的地區因為他們而相互關聯，並且被納入同一個大歷史的體系當中。

橫向跨界的歷史

上述畢麒麟等人串起不同歷史時空的故事並非特意挑選的特殊案例，中國以外華人所抵達的各個移居地，無論是原鄉和移居地之間，或是移居地和移居地之間，都會有著常態性的橫向及縱向的社會連結。它的價值並不僅止於空間和社會的互動，而是在於地與地之間的相互影響。本書的第三部分「橫

向跨界的歷史」便是聚焦於一些地方之間因為人與人的互動而造就出特定的歷史結果或現狀，這種影響是雙向的，因而導致我們在閱讀不同地方時，往往會發現似曾相識、熟悉，但又有所不同的歷史風景。

本篇以〈在新山遇見天地會以及它的大佬們〉為開端，明清之際，因為清廷的步步進逼，造就了一波波大規模的海外移民潮。這些人雖然散居南洋以及台灣各處，但都有著一個共同的理念特質，那就是「反清復明」。這群反清志士往往是現今各地書寫移民史時的開端。台灣作為其中一個移民的目的地，這裡也是天地會的大本營，今天各地天地會有名的人物，例如享有祭祀的陳永華（陳近南）便是在台灣活動的，台南現今還有一座以他為名的寺廟——「永華宮」。清代台灣的朱一貴事件、林爽文事件、戴潮春事件甚至日治時期的噍吧哖事件，即使不是直接與天地會有關，就是隱約含有天地會的表現手法。但長久以來各地天地會大多都是非法的組織，好一點的則是被放任處置（如英屬緬甸）。然而在十九世紀馬來半島的柔佛王國，天地會組織義興公司卻是合法的存在，甚至被馬來統治者宣布確立其官方地位。後來柔佛進入英殖民

時期以及馬來西亞成立以後，歷任一直到今天的蘇丹，對於義興公司的態度都是十分正面的。正因為如此，今天的柔佛保有了許多天地會相關的遺跡，本篇便是談天地會組織義興公司在柔佛的發展、重要人物以及今天所能見到他們在柔佛首府新山的史蹟。

對於不同區域享有相同或相似的歷史經驗而言，天地會當然是屬於較為宏觀的事例，在本篇的第二部分〈派衍海國：大航海時代中的新江邱氏族人〉，則以較為微觀的角度聚焦於福建漳州海澄的邱氏家族，講述他們在海外發展的故事。邱氏族人出洋的歷史久遠，自十八世紀甚至更早的年代，他們便已經在海外開枝散葉。作為移民目的地之一的台灣，這裡也有邱氏族人的足跡，他們在台灣的大本營是台南七股的篤加。篤家社區是現今台灣最大的單姓村，當地的篤加國小也曾一度收了清一色都是邱姓的學童。然而，若以橫向的視野來看的話，檳城更是邱氏在海外開枝散葉後所長成的大樹。這裡有著富麗堂皇的龍山堂邱公司，十九世紀的邱氏族人不乏地方甲必丹、會黨首領、貿易商、苦力販運商、餉碼商等等。檳城邱氏在海外的發跡，有賴於檳城這個

具備自由貿易機能的殖民港市，透過商業貿易，使得邱氏在此茁壯成長。然諷刺的是，自由貿易在他們的原鄉卻是被打壓的，商人在傳統中國社會制度裡頭，是處於最低的層級。另一方面，除了邱氏族人仰賴檳城這座城市而得以發展之外，檳城作為區域核心的地位，也有賴於像邱氏族人這批華人的經營，因此兩者相輔相成。當然，作為區域首屈一指的貿易家族，他們也隨著投資、通婚、會黨網絡等媒介由檳城擴散至周邊的地區，像是暹羅、蘇門答臘、緬甸等地。同樣地，邱家也並非孤立於歷史的櫥窗當中，他們也與本書其他篇章的主人翁有所連結，像是鄭景貴在拿律的錫礦開發，也有賴於與邱家的資金合作，而前一篇所提及的，與板橋林家聯姻的張氏兄弟，也是邱家在蘇門答臘的商業夥伴。既然邱氏族人曾經是一個時代的締造者，那麼他們在馬來半島也留下了許多看得見的史蹟，本篇也將帶領讀者進行古跡巡禮，看看邱氏族人在本地的史蹟。

除了原鄉和移居地之間的互動外，移居地之間也是可以相互影響的，而且他們當中的能動者也並不只是限縮於華人的圈子，除了華人、歐洲人、土

著之外，日本人也可以是其中的要角。在南馬的農業大州——柔佛，當地在十九世紀末甘蜜產業逐漸沒落之後，橡膠開始於二十世紀初走進柔佛的歷史舞台，當地除了主流的歐資橡膠園之外，還有為數眾多的日資膠園。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也與許多其他的歐洲國家一樣，以現代化國家的姿態，投資東南亞各國，以獲取資源。打開日本人所繪製的馬來亞邦人產業地圖便可以發現，柔佛是馬來半島當中，最多日資膠園的馬來王國，這件事情並非經過精心安排，更多的是來自歷史的偶然。〈日資會社、台灣總督府與消失的柔佛日資橡膠園〉一文便講述了日本人進入柔佛開放橡膠園的過程，而間接促成日本人在柔佛大舉發展的，竟然是台灣總督府背後扶持的國策會社——三五公司。三五公司原先是以私人商業組織的身分在華南一帶執行總督府的南支政策，公司主人愛久澤直哉便與台籍商人林麗生、港商吳理卿以及蘇門答臘的張氏兄弟合作建設潮汕鐵路，此舉也間接促成了板橋林家和張氏兄弟的聯姻。但隨著愛久澤直哉在華南的各種計畫逐漸受阻之後，他開始將觸角轉向馬來半島南部的新加坡，並且以新加坡為基地，就近進入北部的柔佛，開發了第一

座日資膠園。此後，愈來愈多的日籍資本也隨三五公司的腳步進入柔佛，這些日資當中，也不乏台灣人熟悉的資本，例如台灣拓殖株式會社、三井財閥、大倉財閥、明治製糖等。此外，為了鼓勵更多日人投資南洋，台灣總督府也在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派出旗下機構前往南洋調查及撰寫報告，台灣銀行、華南銀行也是為日資提供融資的金融機構。不僅如此，許多台灣籍民也因為日資的關係而來到柔佛，協助日本人打理膠園。在這些日資的進駐下，台灣、日本和馬來半島有了共同的歷史交集，可以見到一些管理經驗、人員開始在這幾個空間中相互流通。像是柔佛邊佳蘭（Pengerang）老一輩居民與彰化源成農場、高雄南隆農場的老居民一樣，必然對愛久澤直哉所經營的三五公司不會陌生，然而因為地區和產業形態終究有所不同，因此同樣的三五公司，必然在大家心目中浮現出不一樣的面貌。

像三五公司這種歷史意象各有版本的事例還有很多，其中比三五公司更為人所知的，應該就是孫中山創建民國這件事了，對於台灣和其他東南亞國家而言更是如此。打從一八九五年台灣進入日治時代之後，台灣在後續中國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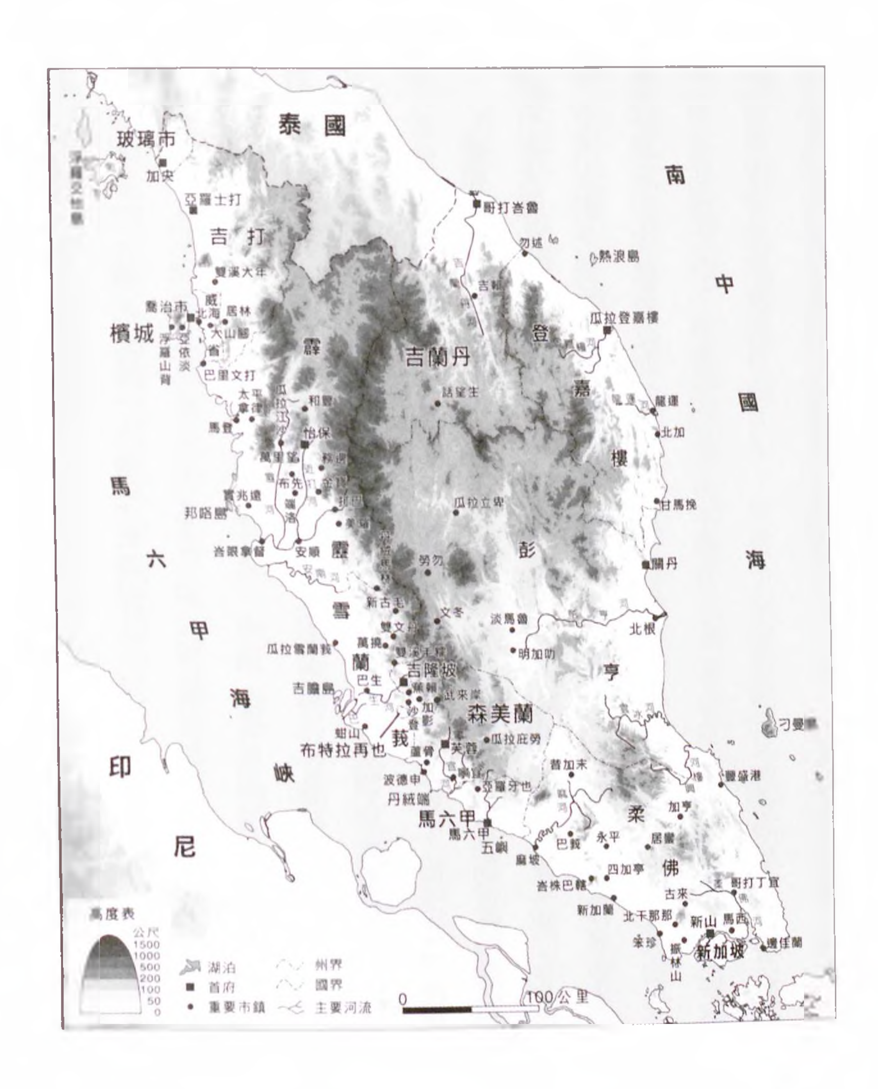
的大變局當中，其參與度便減弱了許多，到了後期（二戰時）甚至站在了較為尷尬的位置。台灣雖然在戰後繼承了中華民國的法統，也是現今中華民國能有效行使主權的地區，然而在民國的創建上，台灣人卻因為歷史的因素而限縮了其參與的空間，也使得台灣人意識中的「民國」，與馬來亞華人腦海中的「民國」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落差。建立民國這件很中國的事情，其實也有賴於龐大海外「外部勢力」的參與才得以成功，馬來半島作為當時本區域最富裕且發達的地區，本區也不乏中華民國的開國元勋。〈與國父共建民國的馬來亞華僑們〉一文便講述了與孫中山一同建立民國的革命志士、他們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馬來亞所留下的史蹟。因此在馬來亞可以見到孫中山的老師——杜南、孫中山的接應人以及革命報《圖南日報》的創辦人、同盟會新加坡分會領袖張永福和陳楚楠，以及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監察委員、中央銀行董事、民國財政部長鄧澤如。此外，廣州黃花崗起義的策畫點也在馬來半島，如今這些地方仍然健在，有的還保存完好，像是新加坡的「晚晴園—孫中山南洋紀念館」、檳城的「孫中山革命基地紀念館」、「檳城孫中山紀念館」，以及孫中山在吉隆坡大宣講所

在的大中華映戲院，該戲院目前已經成為主打文創產業和藝文活動的文青聖地——麗士雜錦 REX K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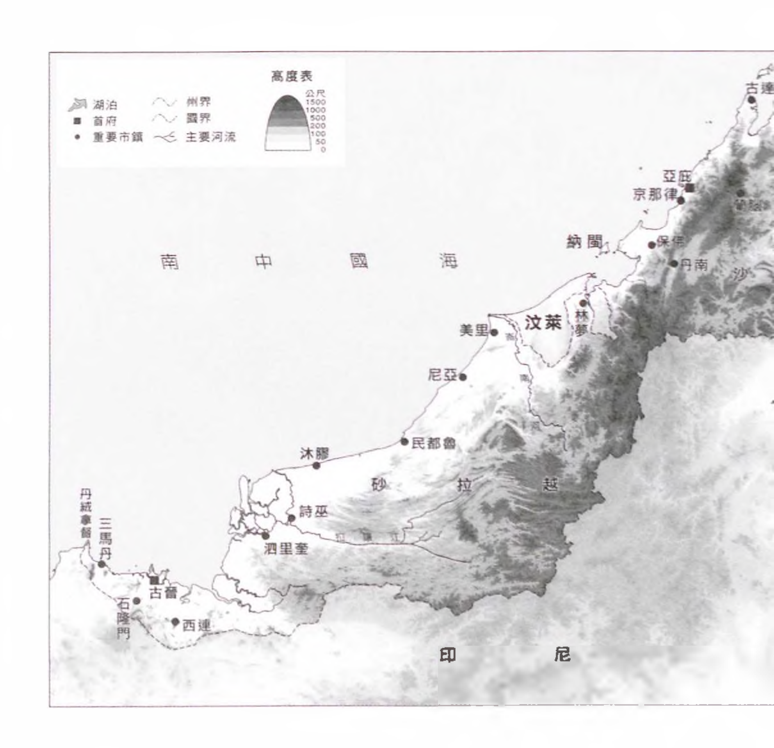
在馬來亞華人成功見到民國誕生之後，並不意味著中國的命運就可以像童話故事般，王子和公主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反而仍然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對此，心繫祖國的馬來亞華人認為，教育是強國之本，因此在民國建立之初，本地社會開啟了興學辦校的浪潮。每一個小市鎮，只要資金允許，人們都會建立新式學校供僑居大馬的華人子弟就讀，〈走在台灣民國以前的大馬華教〉所講述的便是這段馬來亞華人興學辦校的故事。由於當時的建校者們都是民國人，因此他們所實踐出來的教育地景與今天台灣人在學校所見到的有幾分相似，有時甚至更加的「民國」。我們可以見到當時的校名多帶有中華國族意識的色彩，例如中華、光華、三民、興中、中正等的校名。當時的學校也都掛有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教室及禮堂牆上也高掛著國父遺像，現今台灣學校能夠見到的「禮義廉恥」的匾額，也常見於馬來西亞的華校，一些地方的學校甚至也有名叫「中正紀念堂」的建築，且建成的時間點比台北的「大

廟」來得早。在當時學校的年度行事曆裡頭，也可以見到「孫中山紀念」、「黃花崗紀念」、「國恥紀念」、「雲南起義紀念」等的假日。上述所列舉的，都是在台灣進入民國時代以前，馬來半島華校所能見到的地景。也因為這個歷史過程，加上後續馬來西亞沒有像印尼、泰國、緬甸那種程度的排華浪潮，使得馬來西亞至今保留了相對完整的華文教育體系。雖然今天已經斗轉星移，但大馬各地華校仍然能夠見到民國時期以來，這些國族教育精神的餘韻與再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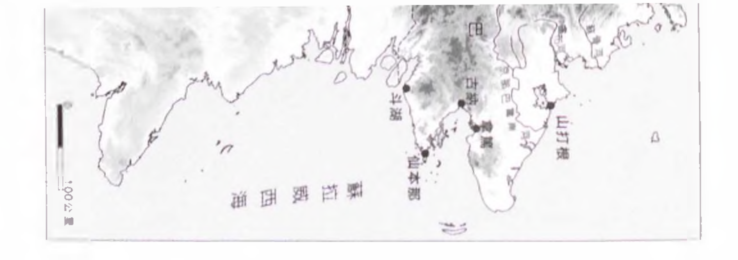
總體而言，馬來半島有著得天獨厚的氣候、環境資源以及地理位置，這樣的先天條件使得它自古以來就成為多族群、文化雜處教會之地，也勾通了世界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在此環境基礎上，資源、經濟、移民等元素使成為構成這片土地歷史紋理的基因圖譜。在這樣多元交雜的下所形成的歷史必然是豐富而精彩的，筆者期待藉由本書這三大部分當中十六篇相互關聯的故事，透過田野誌或地景敘事的方式，具象化地帶領讀者認識馬來半島豐富的歷史，讓這些歷史及其史蹟能被大家「看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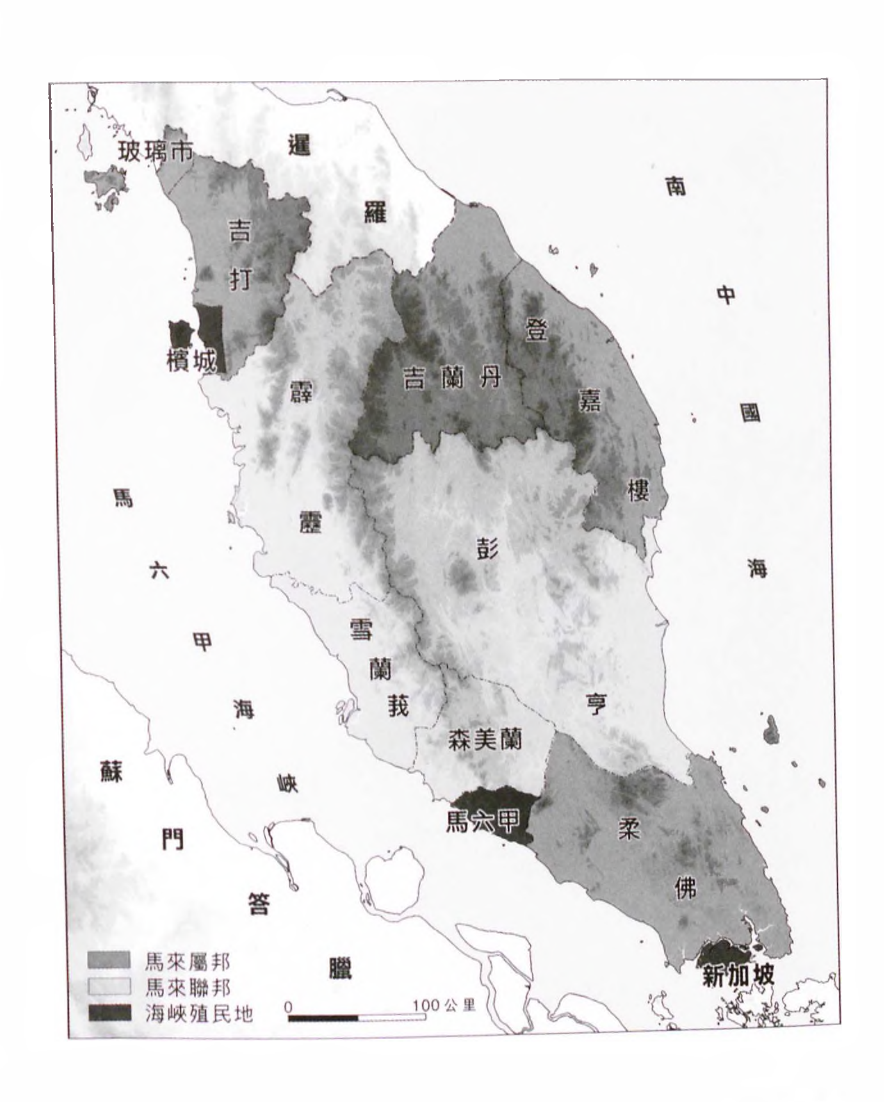
馬來半島地圖。
資料來源：白偉權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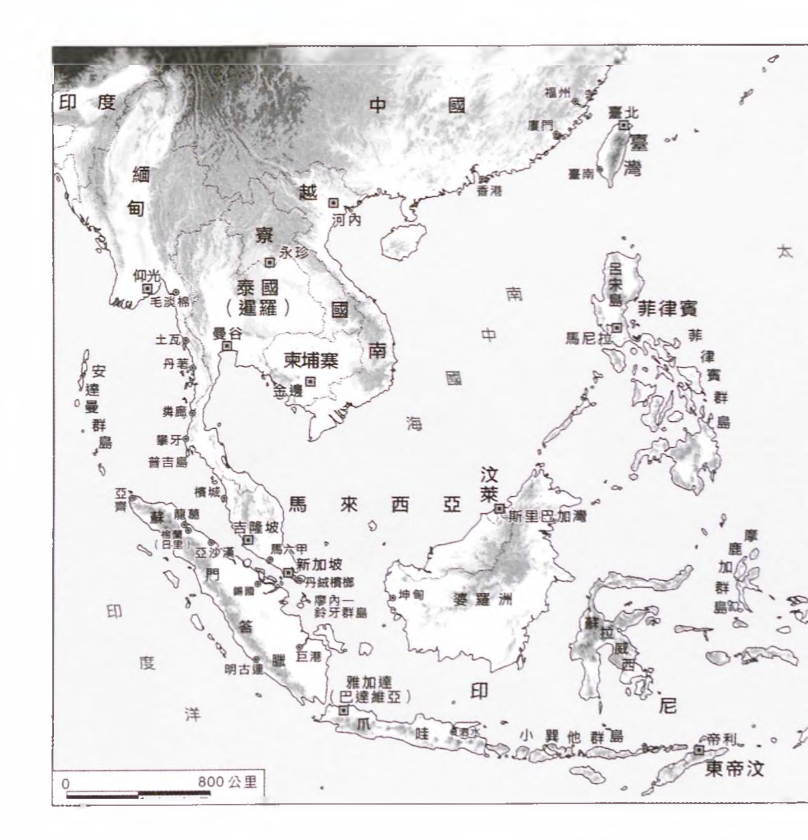
高度表
公尺
1500
1000
500
200
100
50
0
湖泊
首府
重要市鎮
州界
國界
主要河流
南中國海
古達
亞庇
京那律
納閩
保佛
丹南
汶萊
林夢
美里
尼亞
民都魯
沐膠
砂拉越
詩巫
泗里奎
拉讓江
丹絨拿督
三馬丹
古晉
石隆門
西連
印尼



婆羅洲東馬地圖。
資料來源：白偉權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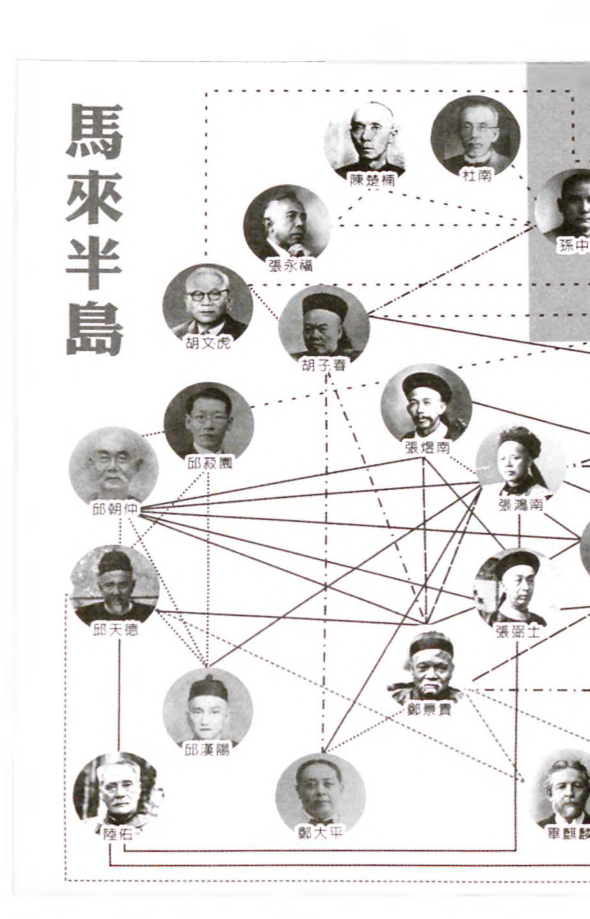
英屬馬來亞地圖
資料來源：白偉權繪



印度
中國
福州
臺北
廈門
臺灣
臺南
香港
緬甸
越
河內
寮
永珍
仰光
毛淡棉
泰國
（暹羅）
國
南
太
呂宋島
菲律賓
馬尼拉
菲律賓群島
中
國
海
曼谷
土瓦
丹荖
柬埔寨
金邊
安達曼群島
普吉島
檳城
亞齊
蘇
棉蘭
（日里）
亞沙漢
門
答
臘
吉隆坡
馬六甲
新加坡
丹絨檳榔
廖內－鈴牙群島
巨港
明古連
馬來西亞
汶萊
斯里巴加灣
坤甸
婆羅洲
摩鹿加群島
蘇拉威西
印
度
洋
印
尼
雅加達
（巴達維亞）
爪哇
小巽他群島
帝利
東帝汶
0
800公里



東南亞區域圖。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馬來半島
陳楚楠
杜南
張永福
胡文虎
胡子春
張煜南
邱菽園
邱朝仲
張鴻南
邱天德
張弼士
鄭景貴
邱漢陽
陸佑
鄭大平



馬來半島田野誌主要人物關係簡圖。
資料來源：[illegible]

壹、歷史的基因圖譜

甘蜜、港腳與百年新柔關係史

走在藥妝店當中，貨架上的資生堂保養品和藥品區上的正露丸都是我們所熟悉的品牌。將產品拿起來看看後面的成分表，會發現一行化學名詞——「Uncaria gambir extract」，它的中文名稱是「甘蜜萃取物」。這種植物萃取物富含類黃酮成分，可為肌膚保濕，使肌膚富有彈性，是許多護膚保養品的重要配方。

另一個我們熟悉的產品正露丸，它的歷史久遠，是二十世紀初日本征討俄國（露西亞）時，為解

SHISEIDO
GINZA TOKYO
資生堂

2 | 1

圖1 知名保養品資生堂。
資料來源：白偉權繪。
圖2 百年老藥——正露丸。
資料來源：白偉權提供，出自正露丸官網，
https://www.seirogan.co.jp/tc/research_dev/truth/global.html.

決士兵腸胃及腹瀉問題而研製的藥品，故當時又稱「征露丸」。翻開後面的成份表，我們可以見到一個叫做「阿仙粉」的名字，與其對應的英文名詞就是「Powdered gambir」。沒錯，這個成分就是與資生堂保養品系出同源的原料——甘蜜。那麼，究竟甘蜜是什麼？

甘蜜原來是生長於島嶼東南亞地區的一種熱帶植物，由於它的用途範圍逐漸縮小，現在已經少有人在生產。到了今天，甘蜜其實已經是鮮為人知的植物了，甘蜜也幾乎消失於本地區的叢林之中，若要尋找甘蜜的蹤跡，也絕非易事。

雖然如此，甘蜜曾經是本區極為重要的作物，早在十九世紀，甘蜜經濟造就了新加坡在開埠之初的經濟發展。對柔佛而言，甘蜜這項作物更鞏固了

大幸正露丸

Seirogan

［適應症］

腹瀉，消化不良

［用法用量］

年齡	一次量	一日服用次數
15歲以上	3粒	3次，餐後服用
11歲以上15歲未滿	2粒	
8歲以上11歲未滿	1.5粒	
5歲以上8歲未滿	1粒	

［成份含量］

本藥丸粒中含有以下的成份用量

日本藥典 木餾油 400mg
日本藥典 黃柏末 300mg
陳皮末 300mg
日本藥典 阿仙藥末 200mg
日本藥典 甘草末 150mg



柔佛統治者天猛公（Temenggong）的政治經濟地位，促成新柔佛的崛起。在柔佛的境內，它不僅改變了柔佛的原始面貌，也決定了柔佛往後社會及聚落空間發展的模式。

究竟甘蜜為何重要？影響了哪些方面？又是因為什麼因素而使它逐漸消失於本地區的叢林中，最終被人所遺忘？

甘蜜之用

先談談甘蜜這項植物，它是東南亞雨林中的一種茜草科（Rubiaceae）灌木。甘蜜不能作為糧食，它之所以重要，完全是因為它的實用價值。在馬來群島，甘蜜長久以來就是一種藥用植物，人們用它來製藥。此外，當地原住民在日常生活中普遍有嚼食檳榔的習慣，而甘蜜通常會作為檳榔的配料，因此又被稱為「檳榔膏」。由於需求量大，因而發展成為馬來群島間重要的貿易商品。

除了藥用和檳榔配料之外，到了十八世紀，甘蜜的用途進一步增加，人們發現它可作為皮革的鞣革劑以及布料和絲綢的染料，市場需求因此大增，甘蜜的銷售市場從原有的馬來群島進一步擴散至暹羅（Siam，今泰國）與中國。

甘蜜在成為商品之前，需要進行加工，而它最具價值的地方在於葉子的部分。生產者會將甘蜜葉採下，再將之放入大鼎中熬煮，待煮成糊狀時再將之倒入容器中讓它凝固，然後將它切塊，最後放到戶外曝曬之後再放進煙房燻乾，製成後的甘蜜成品最終是呈現塊狀的面貌。

由於需求量大，甘蜜種植已經不是南島民族的專利，至少在十八世紀開始，新加坡南邊的廖內群島也開始出現華人種植甘蜜的記錄。華人在種植甘蜜的同時，也兼種具有經濟價值的胡椒，利用熬煮甘蜜剩餘的渣滓來作為胡椒的肥料。在生產過程中，華人已經發展出一套完善的生產與銷售方式，華人甚至成為本區域甘蜜生產的主流群體。在一七八八年吧城（雅加達）華人的第一冊《公案簿》中，便已經有「甘蜜」的漢字記載，當中提及甘蜜的買賣記錄。❶

根據卡爾．A．特羅基（Carl A. Trocki）的研究，十八世紀的廖內丹絨檳

❶ 聶德寧、吳鳳斌校註，《公案簿》第一輯，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四，頁五〇。

榔（Tanjung Pinang）是甘蜜的種植與貿易中心。但好景不常，到了十九世紀初，廖內因為政治紛擾，加上稅務繁重，促使種植核心往北轉移至新加坡。❷當時也正是英國人剛把大英帝國米字旗插在新加坡土地上的前後幾年。



圖3 甘蜜樹。

說明：近年來，地方人士開始積極在柔佛各地復育甘蜜樹，讓人們重新認識這個對於柔佛歷史有著重要影響的植物。右圖為仍處於長成階段的小甘蜜樹；左圖為16世紀《安汶植物誌》中的甘蜜圖繪。

資料來源：

1. 白偉權翻拍自 Rumphius, G.E.（1747）. *Herbarium amboinense*, vol. 5: p. 65, t. 34, fig. 3.
2. 白偉權2017年8月9日攝於新山士姑來輔士華文小學。

❷ Trocki, C. A.（1976）. "The origins of the Kangchu System 1740-1860."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49（2）: 132-155.





4
5

圖4 可供出口的甘蜜塊。
資料來源：新山華族歷史文物館提供，2014年4月27日攝於印尼廖內。

圖5 1836年的新加坡市區與內陸甘蜜園。
資料來源：白偉權繪，底圖取自 Tassin, J. B.（1836）, *Map of The Town and Environs of Singapore*. Calcutta: J. B. Tassin's lith' Press.

甘蜜與早年的新加坡

一八一九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駐明古連的總督萊佛士登陸新加坡，掀開了英國殖民新加坡的序幕。在萊佛士登陸新加坡時，島上已經有多處的甘蜜園。若翻開新加坡較早期的市區地圖，便可以見到離開市區不遠的內陸，已是甘蜜園處處的風景了。

當時新加坡的核心在新加坡河口，當地聚集了許多的貿易商，而新加坡周邊地區所產的甘蜜、胡椒等土產，都會運到這裡進行交易，然後外銷至世界市場。十九世紀末清朝官員李鍾珏的《新嘉坡風土記》也提到：「叻❸地商務以胡椒、甘蜜為大宗，歲必售銷數千萬元，然皆出自他島，叻蓋聚貨不產貨也……叻中富豪設號各港，以收椒蜜。」

當然，若說新加坡完全不產貨，或許絕對了一些，但從李鍾珏的觀察，至少可以確定轉口貿易，特別是其中的甘蜜，打從新加坡開埠以來，就已經是新加坡經濟的火車頭了。現今，新加坡河口的繁忙景象依舊，這裡由始至今都

❸「叻」是當時新加坡的簡稱，由馬來文Selat音譯而來，全稱譯為「石叻」。

還是新加坡乃至本區域的經濟中心，差別只是交易內容不一樣而已。



圖6　新加坡河畔右岸的傳統街屋是早期貿易商的總部所在。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17年7月16日。

從新加坡到柔佛

甘蜜產業在現在的分類上屬於熱帶栽培業的範疇，在中學地理課本當中都會讀到，熱帶栽培業的發展需要廣大的土地資源。再者，由於甘蜜種植十分耗費土地肥力，因此在耕種二十年後，便需要另覓耕地。新加坡雖然勝在政治比較穩定，沒有發生像廖內的政治鬥爭，但土地面積的限制永遠是新加坡無法突破的罩門。一八三五年之後，由於歐洲工業革命促使市場對於甘蜜需求大增，使更多人加入甘蜜園開發的行列，加劇了新加坡土地不足的問題，最後也免不了造成社會的動蕩和紛爭。

土地這一先天不足的問題雖然無奈，但也為甘蜜產業開啟了另一扇門，與新加坡一海之隔的柔佛統治者天猛公坐擁大片土地，柔佛的土地至少是新加坡的二十六倍，他於是向這些華人種植者伸出橄欖枝，施行港主制度（Kangchu System），招納華人投資柔佛。

❖ 歷史小辭典

港主制度

十九世紀柔佛的一種開墾制度，指的是馬來統治者透過發放港契(Surat Sungai)於有勢力的華人領袖，由他們在柔佛特定許可地區內進行土地開發，從事甘蜜、胡椒的生產。港主制度下，特許區內的治安、稅收、行政等管轄權全權交由華人管理，而華人則須定期向統治者納稅，這些獲得特許權的華人領袖稱作「港主」。港主也享有區內的賭博、鴉片、酒、豬肉等經濟活動的專營權。

港主制度在十八世紀舊柔佛王國時期的廖內便已出現，當時的統治者同樣透過委任華人的頭人擔任甲必丹，管理底層華人，以從事甘蜜、胡椒的生產。因此柔佛的港主制度實際上是源自印尼廖內。現今在廖內地區也能找到「港」或「厝港」的地名。

一八四四年，在天猛公的優惠政策下，大批新加坡的資金和勞力開始於進入柔佛，改變了柔佛的原始地景，也開啟了新柔之間的百年關係，有當時的歐洲人也指出，柔佛園丘經濟的發展很大程度上也決定了新加坡的繁榮。柔佛也因為胡椒和甘蜜這兩種作物，從此被納入世界體系之中。

柔佛的地景變遷

甘蜜、胡椒的種植對柔佛環境改變最大的要屬沿河的地區。這主要是因為甘蜜的種植雖然轉移至柔佛，但是它的終端市場還是在新加坡，柔佛與新加坡雖然屬於兩個不同的空間甚至政體，但是就貿易與社會關係而言，兩地卻是密不可分的，與現在我們看到的國際化整合相當類似。

為了進出口的方便，河運和水運是設立種植基地的首要考量，因此種植者會選擇在河流旁建立聚落，作為往內陸森林發展的基地。由於整個聚落和

種植園都是以河流為中心，在潮州話和福建語系當中，河流也稱作「港」（白話字：*kāng*），因此整個地區又被稱為「港腳」（白話字：*kāng-kha*），在馬來文及英文文獻當中，則音譯寫作「*kangkar*」，成為閩南語系影響下的外文名詞。

一般上，港腳可以指涉港區內的核心聚落，也泛指它的種植園。當現有的種植園土地肥力耗盡之後，人們便會往內陸擴張，另闢種植園，因此港腳範圍會不斷擴大，新開發的港腳也被稱作「新港」，舊的則稱「老港」。

由於地理位置的關係，鄰近新加坡的柔佛南部最先成為種植者們在南國築夢的樂園，根據查爾斯．伯頓．伯克利（Charles Burton Buckley）的報導，一八四五年，也就是天猛公開始招納華人進入柔佛開發的隔年，柔佛已有五十二個種植園，❹士姑來河（Sg. Skudai）二十個；巫來由河（Sg. Melayu）十二個；Danga 河十五個；地不佬河（Sg. Tebrau）五個。港主制度的推行使柔佛得以在短時間內完成大面積的開發，港腳聚落儼然成為本區華人的一種嶄新且重要的聚落形式。

❹ 此數目與柔佛檔案有所出入，每個港腳一般擁有一個以上的種植區，因而並不代表港腳數，故使用「種植園」（plantation）一詞。見 Buckley, C. B. (1902). *An anecdotal history of old times in Singapore*. Singapore: Fraser & Neave. p.431.

7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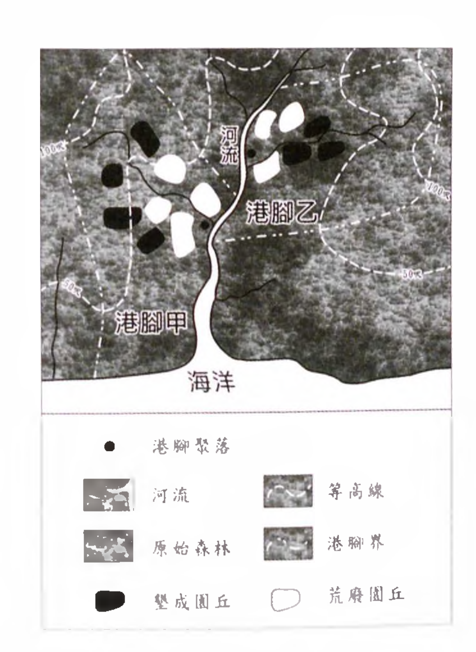


圖7 港腳的模式圖。
資料來源：白偉權繪。

圖8 柔佛開發十年間的港腳分佈（1844年—1855年）。
資料來源：白偉權繪。

新加坡

新加坡市區

港腳

河流

0 20公里

河流名稱

1.Skudai
2.Tebrau
3.Tiram
4.Melayu
5.Tiram Duku
6.Chat
7.Lunchu
8.Paksi
9.Buloh Besar
10.Pendas
11.Skudai
12.Danga
13.Papan
14.Tiram Duku
15.Tajun Galang Patah
16.Choh
17.Chemarang
18.Lebam
19.Redan
20.Ayer Puteh
21.Pontian Besar
22.Pontian Kecil
23.Santi
24.Pulai Ulu
25.Bukit Berangan
26.Panti
27.Bukit Berangan

在一八四四年之後的近五十年間，柔佛港腳的數量不斷增長，從柔佛南部各主要河流擴張到東海岸和西海岸的河川。在一些港腳眾多的大河流域，其下遊處也因為貨物的集散，而形成大型的華人市鎮，柔佛西海岸的麻坡（Muar）和峇株巴轄（Batu Pahat）便是如此。從一八九三年的柔佛地圖當中，便可以發現港腳已成為柔佛華人聚落的代名詞。

換位思考，這樣的模式也與台灣茶、糖、樟腦的年代相類似，可以看到曾經種植樟腦和甘蔗的地方，至今多會保有「份」、「廍」、「灶」的地名。同樣地，這些內山地區的作物也決定了台灣不同區域的發展路徑和社會面貌。❺

❺ 參見林滿紅，《茶、糖、樟腦與台灣之社會經濟變遷（一八六〇–一八九五）》，台北：聯經，一九九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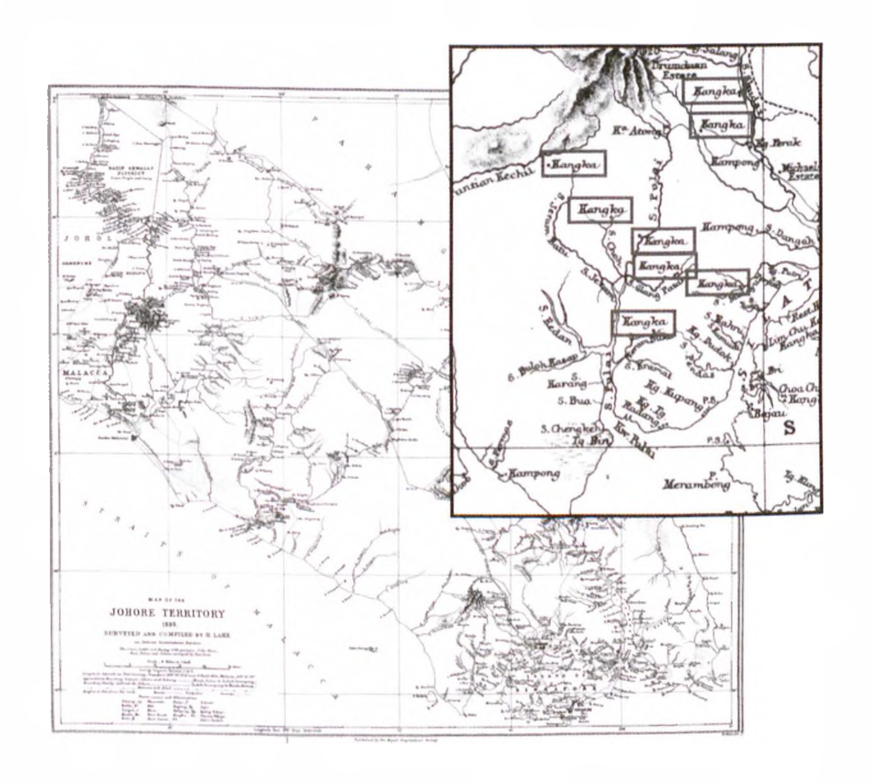


圖9 1893年的柔佛

資料來源：白偉權繪，底圖取自 Lake, H.（1894）. "Johore."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3（4）: 281-297.

港腳聚落的內涵

地圖上的「港腳」或「Kangkar」，並不只是我們所見到的地名圓點，事實上，每一個點的本身內部更蘊含著社會、文化和經濟的運作體系，值得一看。在一個港腳中，最高負責人是港主，是被馬來統治者所承認的地方頭人。他擁有港區內的司法，經濟等各種權力。港主的身分很大程度也決定了港腳的名稱以及內部的社會組成。像是許多的港腳聚落都會以港主姓氏命名，因此可以見到陳氏家族所開發的，會叫做陳厝港，依此類推我們可以見到柔佛有黃厝港、巫許厝港、謝厝港、鄭厝港、李厝港、張厝港、洪厝港、劉厝港、楊厝港等。

有的港則以港主或投資人的商號為名，像是茂盛港、源發港、源順港、德盛港、泰盛港、永順利港、和成港、和興港、恒順港、合春港、永泰港。前述所列舉的商號，其總部都設在新加坡河口。換句話說，柔佛的部分地名其實是由新加坡河旁的商店所決定的。

此外，港主多會招募自己的同鄉進來港腳協助開發及管理，因此港主的

身分也會決定港區的族群結構。從資料上看來，這些種植人有九成是潮州籍人士，可想而知，十九世紀的柔佛各港，其實有著濃濃的潮汕味。

政治上，港主與統治者基本上是互惠互利的，可說是利益共同體，柔佛統治者因為甘蜜、胡椒而獲得豐厚的稅收，同時也得以鞏固政治勢力，最終受英國承認，正式成為柔佛國蘇丹。我們至今可以見到柔佛新山大皇宮內的裝潢，作為馬來統治者的宮殿，它的大殿並非是以馬來文字為主，柔佛各港主所贈送的漢字匾額，才是大殿的主要裝置，也因此，這個大殿被今人稱作「華族禮堂」，由此可見華人港主與馬來統治者之間的關係。不過很可惜，大皇宮於二〇一一年整修之後，就暫時未再對外開放參觀。但據說在二〇二〇年底，柔佛蘇丹決定將大皇宮重新對外開放，而整修後的皇宮將把更多先前沒有陳列出來的漢字匾額重新安置上去，因此值得期待。





11 | 10

圖10 新山皇宮大殿上的漢字匾額。
資料來源：自偉攝於2005年1月17日。

經濟上，港腳也是一個生產單位，港主需要對外招募甘蜜、胡椒園的園丘投資者以及苦力勞工。人們在園丘種植甘蜜，所採摘的甘蜜葉則會在港腳的工寮進行熬煮、加工，曬製，最後船運出口。除了生產事務，港主也掌控了其他的經濟大權，像是港區內的煙、酒、賭博、妓院等營利事業的專賣權，皆由港主所主導。

甘蜜經濟至今已消失超過百年，一些仍然存在的港腳也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變得貌合神離，有的因為發展，甚至可能連貌也沒有，面目全非。因此要了解港腳聚落，挑戰性相當大。我們也只能夠從柔佛老港腳的一些斷簡殘篇來拼湊港腳的原貌。

根據考察，港腳聚落規模不大，只有一條短短的小市街。港主的大厝、收繳地租的公館、提供港區生活機能的雜貨店、巴剎（菜市場），以及賭館、鴉片館、妓院都在市街當中。在



圖11 港腳的基本格局

註：除了墓地照片之外，模式圖以及照片都取自陳厝港的藍本，它也還是柔佛最早的港腳。
資料來源：白偉權繪

生活單調的港腳當中，華工們唯一的消遣就是這些活動了，許多人往往也因為過度消費，而欠下港主許多的債務，永遠無法翻身。

市街除了商店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廟宇了，廟宇一般離河流不遠，也幾乎會面對著河流。碼頭也是港腳的核心部件，港腳人們生活物資的取得以及胡椒、甘蜜的出口、人員的往來都仰賴港口。再來就是廣大的種植園了，甘蜜熬煮和加工的工寮也都設於種植園裡頭。

港腳聚落外圍不遠處則是安葬先人的墳地。然而，我們在港腳聚落中能夠找到的墓碑十分有限，除了相信是港主及其家屬的墓之外，就沒有看到其他的墓碑了，這一方面除了說明港腳人口規模不大之外，或許也透漏了在這些邊區的底層人士較無法像地方領袖一樣有能力取得像樣的安葬。安葬這件今天看似基本的大事，在當時或許不是理所當然。

港腳裡的甘蜜、胡椒經濟雖然為華人提供了南來築夢的樂園，但這樣的榮景並非永恆不變，隨著化學染料及鞣革劑的使用，國際市場很快地便對甘蜜需求銳減。另一方面，柔佛統治者為避免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因此也引

進歐洲資本，發展其他的產業。到了二十世紀初之後，橡膠成為國際市場的新寵，甘蜜對柔佛的經濟比重愈占愈小，最終被時代淘汰。

一九一七年，柔佛政府甚至宣布廢止港主制度，收回華人港主的港權，港腳聚落雖在，但人們已紛紛轉種具經濟價值的橡膠，使得原本的甘蜜產銷網絡、社會運作走向解體，港腳已名實分離。此外，更多的情況是港腳人口外流，聚落逐漸解體，加上陸路交通在二十世紀初開始取代了河運交通，許多港腳最終消失於荒煙蔓草之中。

經過重新詮釋的「港腳」文化

雖然小小的港腳無法抵擋發展的洪流，但凡走過必留下痕跡，港腳聚落這些時代的遺跡並不會因此而在地表上被抹除，它的後續發展與變化，如何重新被人們所詮釋才是有趣的議題。

港主制度廢止之後，可以見到人口的外流，也可以見到部分居民繼續留守，也有新的住民移入。現今，支撐港腳的甘蜜經濟當然不復存在，許多住在港腳聚落的居民，或許早已不知道什麼是甘蜜，什麼是港腳了。

在距離新山二十七公里的 kangkar Pulai，當地居民現今以客家人為主，這批新的住民大致在二十世紀初移入。在他們的詮釋下，港腳（*kangkar*）稱之為「江加」，而延伸出「江加埔萊」的地名。另外在新山陳厝港附近的一條 Jalan Kangka Kechil（意譯：小港腳路），在早年的中文路牌中，「港腳」也被詮釋為「港下」，在現地也可以見到被詮釋為「更加」的「港腳」，如今，當地的外勞居民可能還多過華人。

由此可見後來的人在聽到 *kangkar* 時，所浮現的概念天馬行空，且已經脫離了河流的意涵。不過，在一些閩南語系為主的地方，港腳仍然保留，像是柔佛北部麻坡郊區的一個小地方 Bukit Kangkar，還是被稱作「武吉港腳」。

雖然上述所看到的港腳，其名稱大多已經走樣，然柔佛境內還是有些「表現優異」的港腳，像是柔佛中部的永平港，它不僅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具有規模









12
14 13
15

圖12 柔佛昔日丁宜縣的這個港腳遺跡必須先穿越上游叢林才能抵達。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14年8月4日。

圖13 不同的「港腳」詮釋。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11年7月9日；2014年7月28日。

圖14 經過詮釋的港主正神。
資料來源：白偉權2012年7月15日攝於新山成林第一花園關聖壇。

圖15 身騎老虎的洪仙大帝。
資料來源：白偉權2011年7月10日攝於柔佛拉央拉央洪仙大帝廟。

的市鎮，它的馬來文地名始終保留了Yong Peng的稱法，是馬來西亞少數採用中文音譯的官方地名。另一個是柔佛東北部豐盛港，這個地名已經從聚落名升級成為縣名了，雖然官方稱作Mersing，但中文媒體及教科書仍然稱之為「豐盛港縣」。

另一方面，走訪一些舊港腳，雖然已經斗轉星移，但是港腳的廟宇還在。像柔佛第一個港腳陳厝港，當地的地方廟—靈山宮香火依舊，廟裡還供奉著潮州人的元（玄）天上帝。當地後人也在廟宇裡安放了港主陳開順的神位。陳氏是由新加坡進入柔佛開墾的先驅，也被馬來統治者天猛公委任為第一任甲必丹。

❖ 歷史小辭典

甲必丹（Kapitan）

頭銜名稱，源自葡萄牙（capitão）與荷蘭文（kapitein），為船長、統帥之意。早期歐洲列強殖民東南亞城市時，為了便於統治不同的社會群體，

因而推出甲必丹制度，委任該社群的領袖為甲必丹，賦予他們治理底下社群的權力，達到間接統治的效果。

這種運作方式常見於東南亞各地的港口城市，不同社群如華人、印度人等族裔，都有他們的甲必丹。在馬來半島，早在十六世紀葡屬馬六甲時期，便已經有華人甲必丹的出現。甲必丹制度也被一些馬來土邦吸收，因此可以見到一些馬來蘇丹及封地主也會委任甲必丹。進入二十世紀之後，隨著殖民政府行政體系的完善化，治理能力提升，甲必丹制度也被逐漸廢除。

在一些新建的廟宇，筆者也見過「港主正神」神位，但問當地居民何謂「港主」，所得到的回答竟是廟宇靠近河流，因此設立港主的神位，以表對河神的尊敬。可見港主與河神之間的想像聯結。倘若這片土地不曾出現過港主，結果可能不會一樣。

除了在港腳內可以見到元天上帝廟之外，柔佛許多港腳的廟宇也主祀洪仙

大帝。這是南馬地區（含新加坡）所獨有的神祇，無法在台灣、福建、廣東一帶找到。據說洪仙大帝有剋虎患的特殊功能，祂的塑像也都會騎著一頭老虎，在虎患頻傳，人們談虎色變的甘蜜時代，祂應該會很受歡迎。雖然現在港腳已經解體，老虎也從地方大患成為瀕臨絕種的受保護動物，但這些信仰仍然延續，成為一地的地方公廟，洪仙大帝的神格與功能，顯然也被賦予了另一層意義。

在一些民俗習慣上，柔佛許多地方還保有「謝港」的傳統，「謝港」於每年的農曆十一月初七前後舉行，這項傳統與本地的歷史脈絡有關，在中國原鄉尚未見到有這項活動。在以河運為主的甘蜜時代，「謝港」估計與當時甘蜜、胡椒採收的時令或工作節奏有關，以廟宇結合地方對於河流表示感謝。

在陸路交通的時代，人們與河流的關係日漸疏離，謝港已經失去它的實質意義，許多人或許也說不出何謂「謝港」，但港還是要繼續謝，這個節日還是廟宇的大日子，被記錄在廟宇年度行事曆之上。在柔佛振林山（Gelang Patah）、馬西（Masai）、新山市區、笨珍（Pontian）、北干那那（Pekan Nanas）、陳厝港都還能夠看到謝港的慶典，它主要是以游神繞境、平安晚宴

或是在河邊舉辦祭祀儀式等方式進行。在繞境方面，往往也結合了各族的文化表演、花車等現代化元素。

雖然柔佛甘蜜時代已經不復存在，但柔佛還是有民間及文教組織有感這段歷史的重要性，而致力於復興甘蜜文化。新山中華公會轄下西北區聯絡委員



圖16 笨珍福德廟的謝港爐主頭家名單。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17年1月20日。

會便特別設立了柔佛甘蜜種植與教育推廣小組，遠赴印尼探尋尚存的甘蜜種植園，去學習甘蜜的種植與加工方法。他們也致力於在柔佛重新復育甘蜜株，並且與各地方華社組織合作，把植株種植到州內的舊港腳以及中小學，希望傳承地方文化。

除了柔佛的華人社會，既然港主、甘蜜、胡椒對於柔佛王國的起家有這麼直接的關聯性，那麼官方方面當然也能找到有關甘蜜時代的蹤跡。長久以來，柔佛便有民間傳說指歷任蘇丹都十分照顧地方華社的說法。在十九世紀末，英國政府曾要求柔佛蘇丹封禁華人會黨組織，但被蘇丹否決。一九六九年，全馬發生五一三族群衝突事件，各地都受到影響，唯獨柔佛安然無事，民間都認為是蘇丹對華人愛護有加的緣故，因此勒令柔佛御林軍嚴格對付任何種族的滋事者。

我們在柔佛州裡頭，也可經常見到甘蜜裝飾的公共設施。從花盆的石雕、電燈柱上的鐵花，甚至在近期所建立的柔佛新行政中心——依斯干達城的州政府廣場，都能夠找到甘蜜的圖騰，甘蜜儼然已成為柔佛的官方符號了。







17
18

圖 17 新山市區與甘蜜、胡椒圖騰有關的裝置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 2016 年 1 月 25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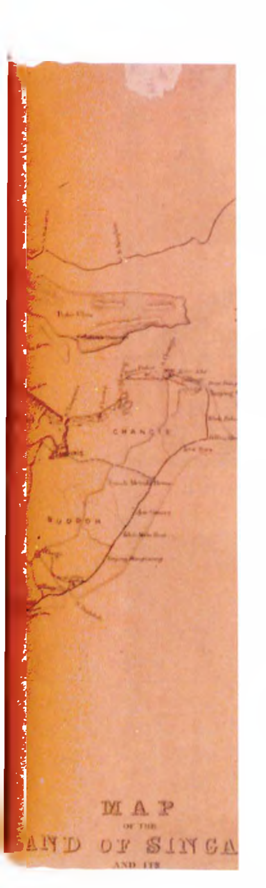
圖 18 柔佛新政中心依斯干達城廣場上的巨型甘蜜圖騰（局部）

資料來源：黃燕儀博士提供，攝於 2019 年 5 月 20 日

回到新加坡

看了柔佛的港腳之後，我們再回到新加坡，作為柔佛甘蜜、胡椒的發源地以及終端市場，新加坡當然也能夠找到港腳相關的蛛絲馬跡。但因為開發的關係，新加坡港腳的實體聚落都已消失得一乾二淨，它們只是以地名的形式留存下來。

從一八七三年的舊地圖當中，可以見到新加坡港腳多位在離市區較遠的北部地區，這裡的港腳與柔佛一樣沿河分布，分別有蔡厝港、林厝港、劉厝港、巫許港、朱厝港、陳厝港、曾厝港、楊厝港等，其中蔡厝港和楊厝港已經成為今天的捷運站名，林厝港則是新加坡西北部的規畫區，因此地名至今仍為人所熟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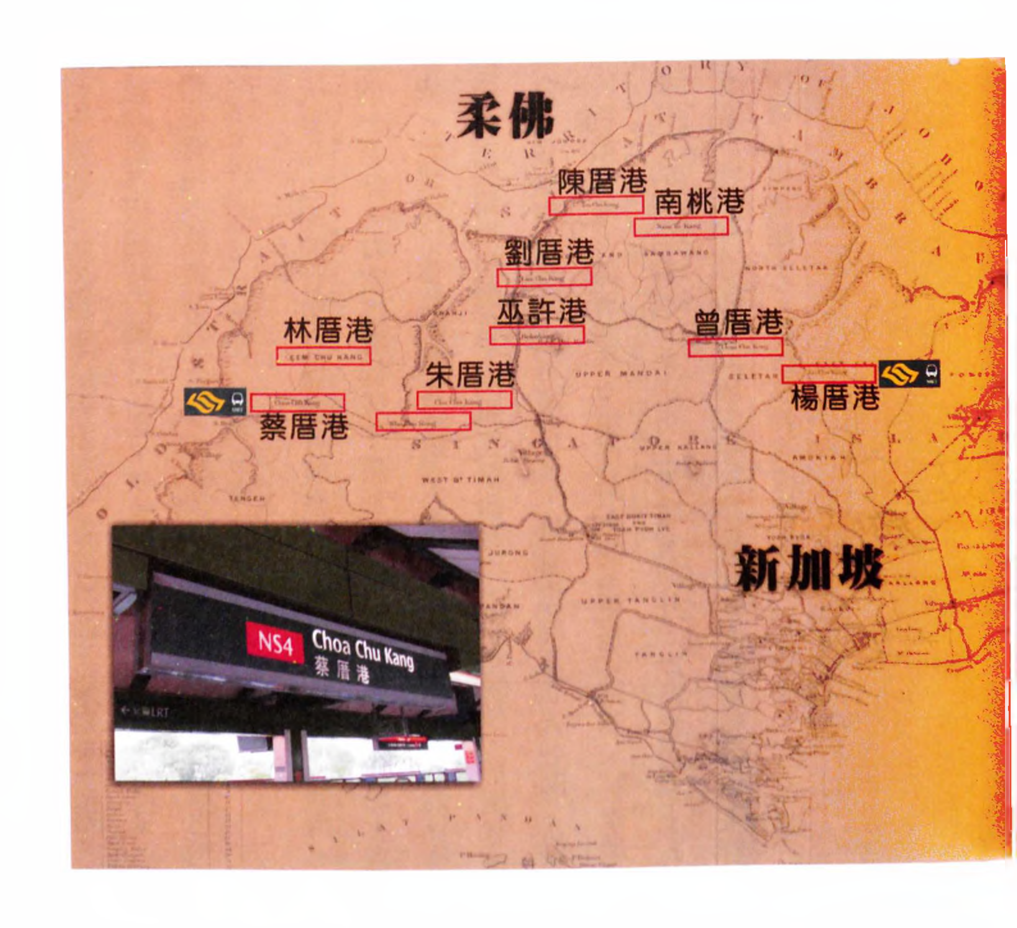


圖19 1873年的新加坡港腳分佈

資料來源：白偉權繪，底圖取自 Wahid Khan.（1873）." Map Of The Island Of Singapore And Its Dependencies." Singapore: Surveyor General's Office.

其他與港腳有關的捷運站名還有：蔡厝港西、後港、盛港、港腳等。這些百年地名掛在捷運站的顯眼位置，傳統與現代相映成趣，但又一點違和感也沒有，相信穿梭於捷運站的人們，已經沒有多少人能夠聯想到它們與甘蜜之間的關係了。

今天鮮為人知的甘蜜在過去曾經是新柔歷史舞台上的要角，極盛一時。在過去的一百年，甘蜜經濟促成了新加坡和柔佛崛起，開啟了長達百年的新柔關係史，也決定了當時柔佛各地華人的聚落形式。從更小的社會尺度來看，華人的移入，潮州人的崛起，民間文化的形塑，緣起緣滅，都與甘蜜經濟有關。

現今，甘蜜經濟雖然已不復存在，港腳也成為歷史名詞，但它的餘韻仍然能見於新柔各地。陳厝港外夕陽照射下的「更加」路牌、花車閃爍及馬來鼓藝表演襯托下的謝港繞境、新山街上的甘蜜燈柱，以及每天早上人頭攢動的蔡厝港捷運站，這些景象都標誌著甘蜜、港腳正以另一種形式繼續存在，它們在延續的同時，也被賦予了新的意義與價值。

延伸閱讀

Trocki, C. A.（1976）. "The origins of the Kangchu System 1750-1860."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49（2）: 132-155.

白偉權，《柔佛新山華人社會的變遷與整合：一八五五—一九四二》，加影：新紀元學院，二〇一五。

白偉權、莫家浩、莊仁傑編，《二〇一八年新山華族歷史文物館年刊．港主與地方社會》，新山：新山華族歷史文物館，二〇一九。

白偉權編，《二〇一七年新山華族歷史文物館年刊．古廟、遊神與地方社會》，新山：新山華族歷史文物館，二〇一八。

何國光、蘇建勳、蕭開富，《甘蜜再現柔佛》，新山：新山中華公會轄下西北區聯委會，二〇一九。

吳華，《新山今與昔》，新山：海南會館，二〇〇〇。

南院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中心，《潮人拓殖柔佛原始資料彙編》，新山：南方學院，二〇〇三。

鄭良樹，《柔佛州潮人拓殖與發展史稿》，新山：南方學院，二〇〇四。

尋找消失的拿律舊礦區❶

馬來半島蘊藏了豐富的資源，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冒險家、投機者經常造訪的地方，對他們而言，這裡處處充滿機會。其中一項讓大家對此地趨之若鶩的資源就是錫礦。可以這麼說，馬來半島（西海岸）的中、北部特別是森美蘭、雪蘭莪、霹靂、彭亨這四個州，其境內許多城鎮的興起都有賴於錫礦這項產業活動，像是主要城鎮芙蓉、吉隆坡、怡保，都是因為錫礦而起，是以錫礦經濟為基底的城市。錫礦產業也造就了不少富可敵國的商業鉅子，本書後面將會提及的鄭景貴、陸佑、張弼士、謝春生、邱氏家族都是此例。

錫礦雖然為馬來半島中、北部地區和人民帶來無限的機會，但在這光鮮亮麗的背後，卻也充滿了黑暗與血腥。十九世紀馬來半島的礦區可說是華人大

❶本篇曾於二〇二〇年一月一日發表於本人在馬來西亞網路媒體《當今大馬》的專欄「南國築夢」當中，內容經增補成為此文，文章保留原來題名。

規模分類械鬥的戰場，從馬六甲內陸、雙溪烏戎、雪蘭莪、拿律，甚至暹羅南部的普吉島，由南而北幾乎無一例外。在它們之中規模最大，死傷最慘重的，當屬霹靂北部的拿律了。

拿律是馬來半島北部最大的礦區，在當地採礦的華人分屬海山和義興兩大陣營，兩大陣營長久以來對礦產資源（水源和礦地）的競爭，加上馬來統治階層的政治糾紛，進而在一八六二年至一八七四年間，爆發了歷時長達十年的武裝衝突——「拿律戰爭」（Larut War）。十年間參與械鬥的華人數以萬計，根據一八七二年《海峽時報》（Straits Times Overland Journal）的報導，其中一場械鬥在一天之內至少有一千人被敵對陣營斬首！❷拿律戰爭也迫使英國殖民政府放棄其對馬來半島各馬來王國一貫的不干預政策，出面協調平定戰事，簽訂了《邦咯條約》，最終使這些地區成為英國的保護邦，開啟了馬來亞的英治時代。

❷ The Gazette says that some thousands of the Chinese have lost their lives during the riots, no less than 1,000 having been beheaded in one day by their opponents. Straits Times Overland Journal, 11 April 1872 Page 5.

❖歷史小辭典

拿律戰爭

拿律是十九世紀馬來半島最重要的錫礦產區，這裡自一八四〇年代開始便因錫礦資源的發現而吸引大量華人湧入，逐漸形成以礦業為基礎的華人社會。

一八六〇年代開始，當地兩個具有會黨性質的採礦集團：義興和海山兩黨，前者由惠州客家人和新寧、新會、肇慶的廣府人所組成；後者則是以增城客家人為首，加上番禺、南海、順德、東莞的移民所組成。兩大集團開始因為錫礦資源的爭奪，而各自擁立不同的馬來領袖，爆發了長達十年的「拿律戰爭」。該衝突在英國的介入下結束，拿律華人社會也在英國的治理中朝向穩定發展，華人幫群間逐漸呈現相對整合的狀態。

拿律戰爭是馬來西亞史上最嚴重的華人社會衝突之一，這場衝突導致英殖民勢力全面介入馬來半島，在馬來西亞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拿律戰爭衝突陣營組成成員列表

年代	義興陣營	海山陣營
第一次拿律戰爭（一八六二年）	惠州	增城、福建
第二次拿律戰爭（一八六五年）	惠州	增城、福建
第三次拿律戰爭（一八七二年）	惠州、新寧、新會、開平、恩平、潮州 拉惹阿都拉（Raja Abdullah）	增城、番禺、南海、順德、東莞、福建 拉惹伊斯邁（Raja Ismail）

曾在台灣協助李仙得在琅嶠地區處理羅妹號事件的畢麒麟，也在一八七四年來到霹靂，成為平息拿律戰爭的其中一名關鍵人物。戰後的拿律正式易名為「太平」（Taiping），以期許這片土地永遠和平安寧，Taiping也是馬來西亞現有極少數以中文為官方名稱的地名。

熟知馬來西亞歷史的人都會知道，海山和義興兩大公司所爆發的拿律戰爭，其發生的深層原因在於礦區的爭奪。按一般論述，海山的勢力範圍即是今天的太平，而義興的勢力範圍則是甘文丁。然而根據地圖，太平與甘文丁兩大市鎮其實相距近六公里。六公里對於熱帶栽培業抑或是現在的交通條件而言，並不遙遠，但對於面積規模小的錫礦場而言，卻已經是相當遠的距離了，那麼兩派的礦區爭奪究竟所謂何事？歷史中煞有其事的記載又應該如解讀？對於這個問題，恐怕必



圖1　寧靜的太平湖——過去為拿律戰爭的古戰場。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15年1月27日。

須要還原及釐清早期兩派的礦場空間分布才行。

要尋找拿律的舊礦區並非易事，原因在於拿律是個老礦區，後來所見到的礦地許多可能也是拿律戰爭後所開發的。另外，十九世紀中葉歷經大規模開發的拿律，到了十九世紀末逐漸沒落，其錫礦生產中心的地位就已被南邊的近打河谷所取代。此後有許多的礦區被另做開發，礦池也被填平，使得當地原有的地景面目全非。因此尋找拿律戰爭時期的礦地分布，並欲進一步得知該礦區所屬的陣營，相當具有挑戰性。

雖然如此，我們還是能夠透過一些研究方法盡可能將一八七四年拿律戰爭結束前的礦區分布還原出來。像是尋找當時所留下的文獻敘述，特別留意文獻所提到礦場以及華人發生衝突時的地名，並配合古地圖和現今的地圖來找出大致的礦區範圍。在此範圍中，再透過當地過去及現今的土地利用，包括礦湖的土地利用以及一些地標（例如老廟）的位置，去加以定位。這些斷簡殘篇都是幫助我們拼湊早年的礦場位置的有用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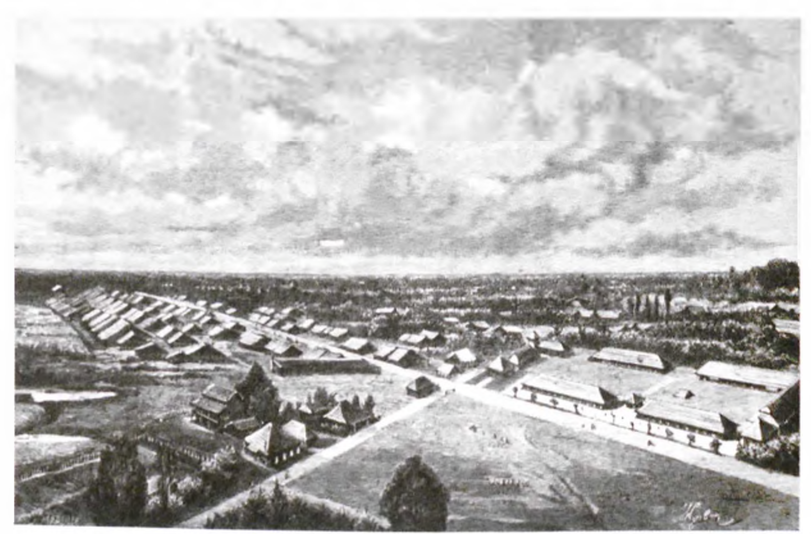
尋找拿律舊礦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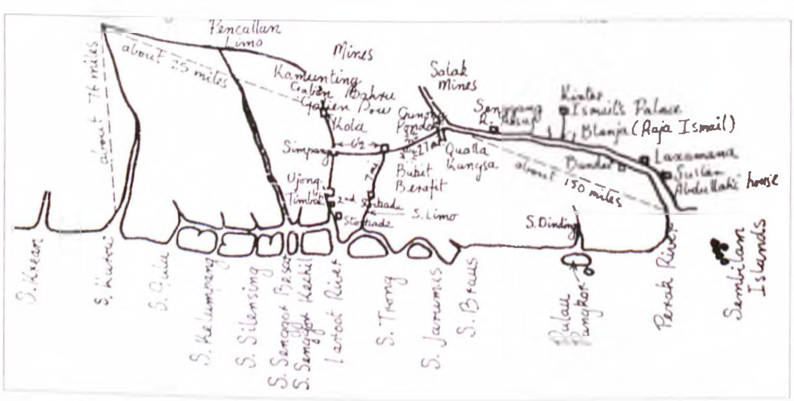
首先，我們先開始釐清太平和甘文丁兩大拿律市鎮。根據歷史事實，兩大市鎮雖然分屬海山和義興的勢力範圍，但是在拿律戰爭時期，兩大市鎮其實並不存在，它們是拿律戰爭之後英國人為了明確劃分兩派勢力範圍，而在礦池旁重新規畫建立的新市鎮。因此在過去，海山和義興的採礦場範圍，並不見得是今天的市鎮。❸

據載，在太平和甘文丁還未建鎮時，海山和義興的勢力範圍有另外的名字，海山礦區稱為「吉甯包」Klian Pauh；義興的勢力範圍則稱為新吉甯 Klian Bahru。在馬來文當中，Klian 意指礦場。吉甯包與新吉甯的地名現今已較少人為人所知。

在空間上，根據瑞天咸在拿律戰爭結束之初（一八七四）所繪製的地圖，便揭示了吉甯包和新吉甯的所在位置，它們都位在內陸沿山地區。這樣的空間分布有它的道理。根據地形學的侵蝕與沉積原理，富含錫礦的砂石在山坡地被

❸當時的市鎮是哥打（Kota），即今天的鳳山寺一帶，吉甯包和新吉甯所產的錫礦多從內陸集散於此，然後再運往馬登出港。





2

3

圖2 繪製於1880年至1881年間的太平市區，當時是太平建鎮第六個年頭，這相信也是有記錄以來，最早的太平市景。

資料來源：白偉權翻拍自 Errington, J. de la Croix.（1882）. *Les Mines d'Etain de Perak* [Tin Mines of Perak].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圖3 1874年瑞天咸所繪製的霹靂地圖，在拿律河下游往上游處依序標註了Galien Pow（吉輦包）和Galien Bahru（新吉輦），他也在旁特別標註了「Mines」（礦）的字眼。

資料來源：白偉權翻拍自 Swettenham, A. Frank（1975）. *Sir Frank Swettenham's Malayan Journals, 1874-1876*. Kuala Lumpur,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3.

雨水沖蝕之後，便被地表徑流帶走，最終因為重力的緣故，較重的錫礦沙自然在搬運的過程中先行沉積，它們主要堆積在坡度驟降的谷口及山腳一帶，愈往下游的地區，堆積量愈少。由此，沿山一帶構成錫礦蘊藏區，即我們所見到的吉輦包和新吉輦。以實際環境與地圖相互參照，已經提供大致的礦區所在，但可惜瑞天咸的地圖尺度較大，未能提供細部的空間資訊。

海山礦區吉輦包

在梳理完礦區的整體位置之後，接下來必須瞭解的是細部的礦區分布。那麼，海山所屬的 Klian Pauh 究竟在哪裡？所幸這是一個相對容易解答的問題，雖然史料上少有材料明確指出海山礦場的位置，但是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它離太平不遠，而根據舊報章的記載，拿律戰爭結束之後不久，海山礦區隨即就被規畫為公園，並於一八八〇年啟用，即今天的太平湖公園，這個公園堪稱馬來

半島上第一個公園。令人玩味的是，象徵增城海山勢力核心❹的何仙姑廟，也位在今天太平市區接近太平湖的地方。至於當局將具有經濟生產價值的礦場規畫為公園的原因，筆者將另文討論。

從地圖上看，太平湖並非是單一的大湖泊，而是一個湖泊群。它的範圍相當大，在不計算公園其他陸地面積的情況下，現有的湖泊面積總計就已有約十九公頃。根據歷史材料，無論是吉輦包還是新吉輦，它們都是由多家礦場組成的礦區，因此今天所見不同的湖泊很可能是不同的礦場，故由此判定太平湖區應該是海山礦區吉輦包的所在。然而必須留意的是，雖然湖泊區可以被理解為海山的礦區範圍，但海山的範圍可能不僅限於今天的湖泊區，像是在太平湖東北部沿舊甘文丁路的地方，當地目前雖然沒有湖泊，但是卻有一所名為Klian Pauh的國民中學。在吉輦包國中的北側，也有一座名為Kampung Klian Pauh Baru的村莊。這些地名線索都揭示了舊時吉輦包的空間範圍。

❹ 海山公司以增城人為主流，海山的重要領袖也都是增城籍，而何仙姑信仰則是增城人的原鄉信仰，因此研究相信該廟是海山公司的重要社會組織。



4

5

圖4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休閒公園——太平湖。
資料來源：白偉權翻拍自 Wright, Arnold., & Cartwright, H. A.（Eds.）.（1908）.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British Malaya: Its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London: Lloyd's Greater Britain Publishing Company. p. 858.

圖5 太平湖與何仙姑廟。
資料來源：白偉權繪，底圖取自 Great Britain. Inter-service Topographical Department & Great Britain. War Office.（1944）. Taiping Retrieved 21 Dec 2019, from http://nla.gov.au/nla.obj-322654221.

義興礦區新吉簟

在得知海山礦區的位置之後，接下來就需要釐清義興礦區的位置了。甘文丁不像太平那樣，礦區因為太平公園（太平湖）的規畫而被保留下來成為有利參照點。但甘文丁與太平類似的地方在於，它是拿律戰爭之後，為了區隔海山義興兩大勢力，而規畫出來的市鎮。因此可想而知，當時的新吉簟礦場位置肯定不是位在今天的甘文丁鎮。雖然甘文丁也有一座粵東古廟，但是根據粵東古廟的《倡建粵東古廟》碑文，粵東古廟其實創建於一八八二年，這個年份已經是後拿律戰爭時期的事了。在刪去甘文丁的可能性之後，接下來必須要推斷的是新吉簟可能的相對位置。

新吉簟的可能地點理應是位在甘文丁接近太平市區的方向，如此才能構成我們見到的資源（礦地、水源）爭奪。事實上，甘文丁與太平市區之間是由舊甘文丁路（Jalan Kemunting Lama）所連接，這條古老道路或許是新吉簟經吉簟包通往馬登港口（錫礦由此輸出檳城）的道路，因此礦區很可能出現在其周邊。

為此，筆者對舊甘文丁路沿線進行訪查，在該路段距離甘文丁一點八公里處，太平三點三公里處的地方，見到一間供奉大伯公的福德祠，該廟建立時間不詳，但重修於一八九九年。該廟廟名也標有當地的小地名，作「新港門」。新港門也是早期華人對於新吉輦或義興礦區的指稱。因此福德祠的廟名，提供了一個很明確的線索，即新吉輦的範圍其實也包含本區。

再觀察福德祠周遭範圍的環境，該廟矗立在史格士山（Scott Hill，華人稱「伯公嶺」）東側，在它的對面則是麥士威山（Maxwell Hill），兩山之間是一塊狹長的谷地，這片谷地地勢異常平整，重要的是，這條錫礦區帶其實往東南方向也能夠延伸至吉輦包所在的太平湖區。這裡現今已作為政府軍事用地。而打開太平一九一三年調查的舊地形圖（Topo Map）顯示，該地區在一九一三年以前仍是一片礦地，可見到處處礦湖。比對一九二九年的霹靂歲入圖（Revenue Survey Map），這片礦地其實是鐵船（dredging）採礦區。可以肯定的是，鐵船是殖民時期的產物，由於當時許多華人舊礦場在傳統的技術條件下，已經無法繼續開採，因此許多礦地都被歐洲企業購下，發展鐵船採礦。因此鐵船礦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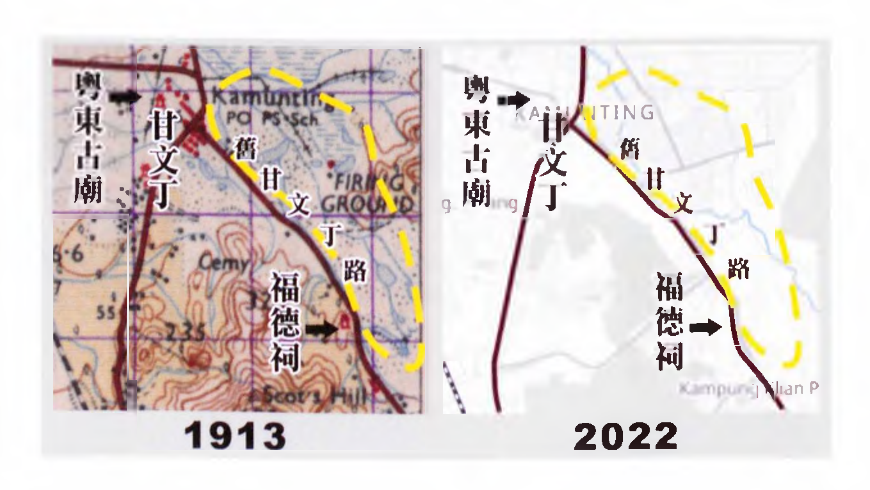


圖6 新港門的福德祠。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12年6月7日、2015年1月28日。

圖7 福德祠對面的舊礦區。

資料來源：1. 舊地圖：白偉權繪，底圖取自 Federated Malay States. Survey Department.（1943）. [Malaya 1:63,360] Retrieved 21 Dec 2019, from http://nla.gov.au/nla.obj-257422633.

2. 現今地圖：白偉權繪，底圖取自 openstreetmap.org

所在，為我們尋找新吉籠舊礦場的位置，提供了重要線索。

另外，根據太平文史研究專家李永球先生的〈甘文丁曾經「遷鎮」〉一文，福德祠對面在一九二〇年代以前曾經有過華人聚落，一些會館像是惠州會館也建立於此，但在一九二〇年代本區被歐洲鐵船收購以後，便已經遷至今天甘文丁市區粵東古廟附近了。早期的義興公司主要是由惠州人所組成，這裡是義興礦區，應該是合理的推斷。

綜合上述「新港門」福德祠的位置、本區地形、與吉籠包的連接性、舊礦地分布，再配合最早由英國人所繪製的地圖相對位置，我們幾乎能夠確認，義興舊礦區新吉籠所在的地方即是福德祠對面那片平坦的縱谷區。那麼，最後需要解決的，即是吉籠包和新吉籠兩大集團礦區之間的交界處了。

根據現有材料，絕大部分提到義興海山礦區的地名多比較籠統，較為細緻的空間範圍僅會提及吉籠包和新吉籠，而兩區內部的小地名則鮮少出現，所幸一八六二年第一次衝突時，在兩造礦主向檳城英殖民當局申訴的文件中，留下了關鍵性的線索。



圖8 1929年太平地區的土地利用分區圖可見到為甘文丁路右側都屬鐵船礦地。
資料來源：白偉權繪，底圖取自 Federated Malay States. Surveyor General F. M. S & S. S.（1929）. Perak 1929. [F. M. S Survey No. 244 1929].

兩大集團的礦區界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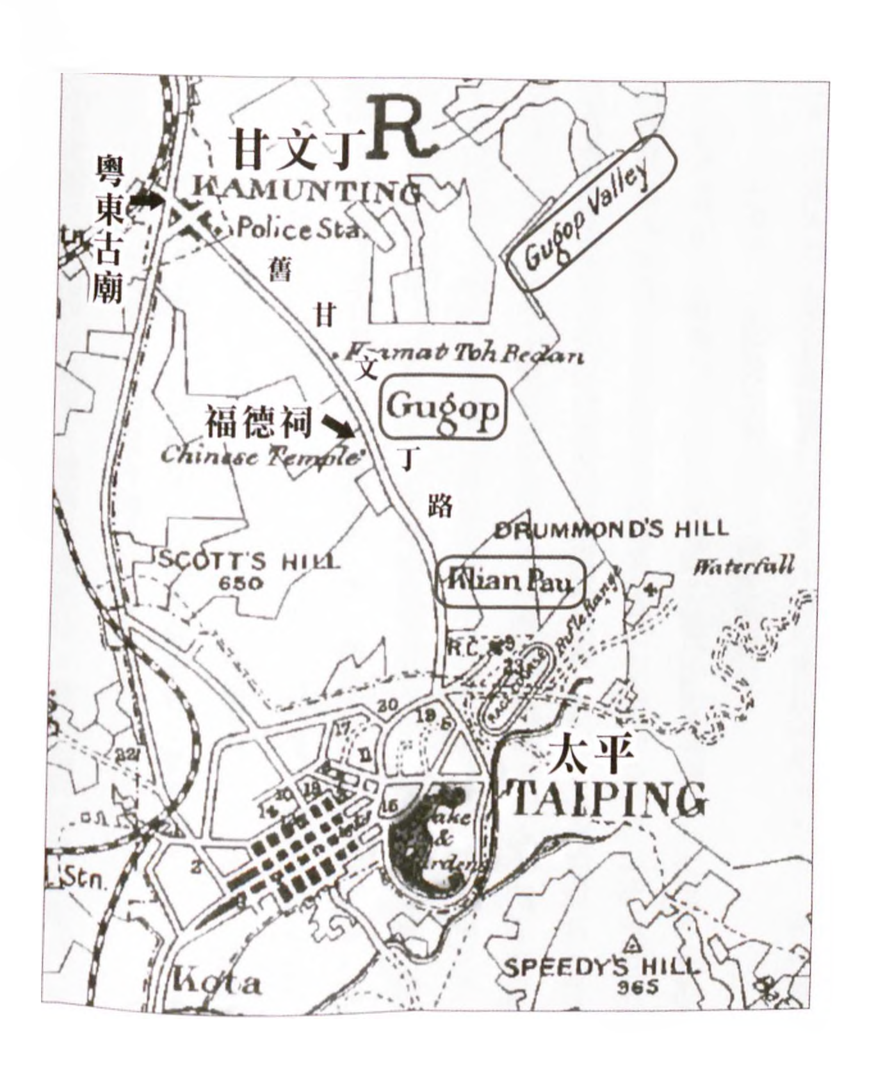
在殖民部檔案CO273當中，記載了義興公司伍庚辰和Ung Bun Chium對於海山領袖的控訴，這件事也是拿律戰爭爆發的導火線。他們指兩位海山礦主Yiong Kan和李觀貴率眾從他們位在「Gu Gok」的礦場前來搗毀伍庚辰的水道。從這段敘述中，我們雖然無法瞭解義興領袖礦場的所在地，但卻至少知道「Gu Gok」是海山礦區，而兩者前去破壞義興水道則多少顯示了這裡是海山礦區和義興礦區之間的前沿，因此「Gu Gok」這一地名對於義興——海山礦區交界的判定，有著重要的意義。

「Gu Gok」究竟是哪裡？根據一九一四年馬來亞鐵道公司（Federated Malay States Railway）出版馬來半島旅遊手冊中的太平地圖，筆者在舊甘文丁路新港門福德祠對面的地區，找到有個Gugop的地名，可以推知它就是資料上的「Gu Gok」。在現今的Google地圖中，當地附近也有個Gugup村（Kampung Gugup）。按此，Gugup就位在新港門當中，且已經接近今天的甘

文丁市區，因此可以確定，這裡是舊礦區，也是義興及海山礦區相互緊鄰的前線地帶。

總體而言，礦地的空間位置是瞭解拿律戰爭爆發的重要基礎，透過舊礦區的定位，我們大致還原了吉輦包和新吉輦這兩個海山和義興的礦區所在，對於兩派經濟生產空間的理解，必須要從帶狀的空間概念出發，而非點狀概念。意即它們都不是今天的太平和甘文丁市，而是在附近的條狀地帶。吉輦包由今天的太平湖開始，一直沿著麥士威山與史格士山之間的谷地往西北方向延伸，一直到 Gugup 一帶。而新吉輦礦區則是由 Gugup 一帶開始，一直往今天的甘文丁市區方向延伸。兩者位置緊鄰並且構成一條帶狀分布的錫礦地帶。這條錫礦地帶由多家分屬海山和義興的礦場所組成。按照地形學的原理，我們所見到的吉輦包和新吉輦其實是老天爺的決定，這樣的分布造成海山和義興礦區無可避免地按著這個條帶狀的地區發展，並出現緊鄰彼此的現象，最後才衍伸出 Gugup 的衝突，並開啟了長達十年的拿律戰爭。

物換星移，如今的拿律已是馬來西亞著名的旅遊城市，昔日的戰場——



10 | 9

圖9 Gugup的所在位置

資料來源：白偉權繪，底圖取自 Anonymous.(1914). *Federated Malay States Railways: Pamphlet of Information for Travellers: Tours in the Malay Peninsul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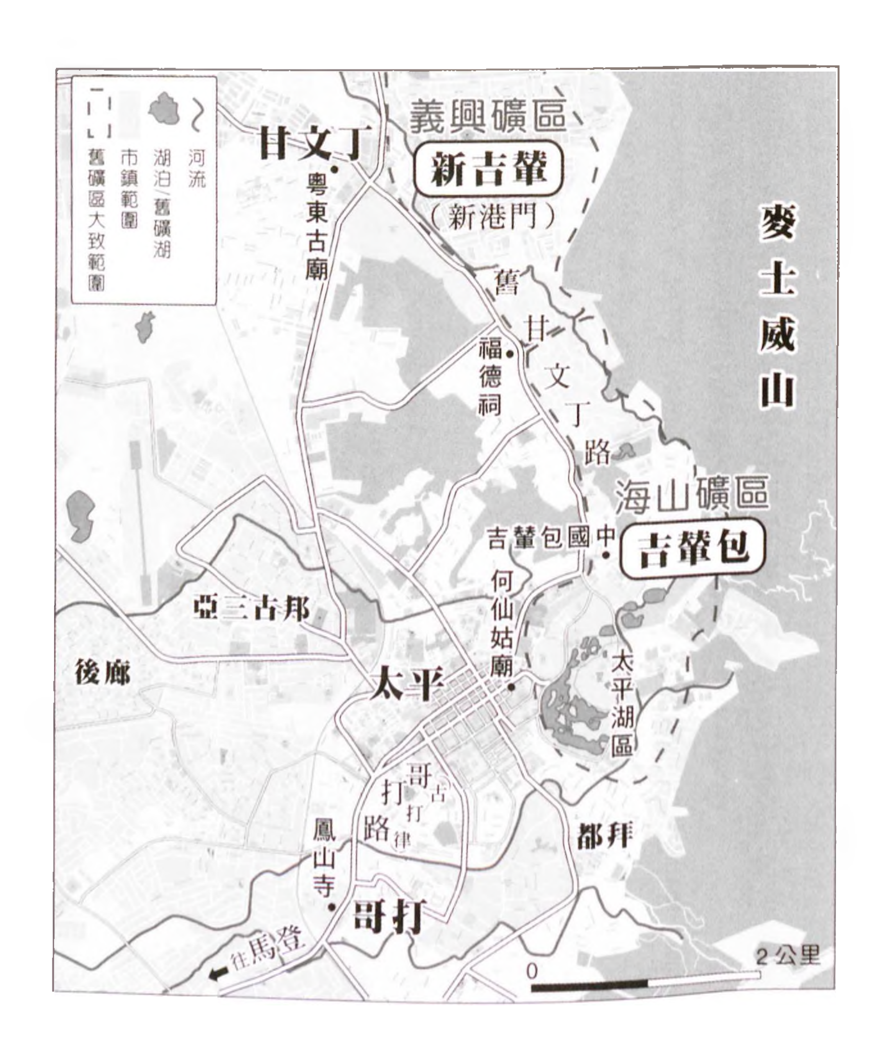


圖10 拿律的礦區的中樞結果
資料來源：白偉權繪，底圖取自 openstreetmap.org.

太平湖，如今已成為人們晨運、休憩野餐、拍攝婚紗的熱點，過去的腥風血雨已洗練出「太平」這個拿律的新名字。

延伸閱讀

白偉權，《國家、產業與地方社會的形構：馬來亞拿律地域華人社會的形成與變遷（一八四八—一九一一）》，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博士論文，二〇一六。

李永球，〈甘文丁曾經「遷鎮」〉，《星州日報》，二〇一一年四月十日。

Errington, J. de la Croix.（1882）. *Les Mines d'Etain de Pèrak* [Tin Mines of Perak].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Swettenham, A. Frank.（1975）. *Sir Frank Swettenham's Malayan Journals, 1874-1876.* Kuala Lumpur,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right, Arnold., & Cartwright, H. A.（Eds.）.（1908）.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British Malaya: Its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London: Lloyd's Greater Britain Publishing Company.

Anonymous. (1914) . *Federated Malay States Railways: Pamphlet of Information for Travellers: Tours in the Malay Peninsula.*

大園丘、印度人與南北大道上的牛隻告示牌

開著車走在馬來半島西海岸的南北大道高速公路上，只要看著窗外發呆，看著千篇一律的油棕園不睡著的話，不免會經常見到每隔不久，路旁就會閃過一個有牛隻符號，下面寫著「HATI-HATI MEMANDU」（小心駕駛）的告示牌。由於這個牛隻告示牌出現的頻率相當頻繁，不免引起大家無限想像。究竟它是要告訴我們有牛出沒，小心牛隻？還是只是用比較醒目的方式提醒大家開車要開慢一些，就像牛一樣慢？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們或許能夠透過其他的動物告示牌中得出一些端倪。

除了牛隻的告示牌之外，下了高速公路轉到一些鄉間道路之後，我們也經

常能夠見到其他動物的告示牌。其中最常見到的是馬來貘，其下方會寫「AWAS KAWASAN LINTASAN HIDUPAN LIAR」意即「小心野生動物穿越區」。意味著小心各種野生動物。當然，這裡的「野生動物」可能不僅止於馬來貘，它只是其中的代表。除了馬來貘之外，在一些地區也能見到猴子、大象、鹿、鱷魚之類的動物告示牌。

從這個角度看來，高速公路要大家小心的，確實真的就是牛隻了。那麼接下來不免令人生疑的就是，為什麼高速公路只能見到牛隻，而不見其他「神奇寶貝」？如果是這樣的話，高速公路兩旁的油棕園後面，是不是聚集了很多的養牛場及牛隻屠宰場？而園丘與牛隻之間的關係又是什麼？使得南北大道滿是這類告示牌。





1
2

圖1 南北大道上的牛隻告示牌。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13年8月19日。

圖2 在鄉間道路上所出現的動物告示牌。
資料來源：
1. 馬來貘告示牌在2019年5月4日白偉權攝於森美蘭的瓜拉庇勝（Kuala Pilah）。
2. 大象告示牌在2018年8月白偉權攝於柔佛的加亨（Kahang）。



圖3 馬來西亞南北大道上的牛隻告示牌分布。
說明：上圖油棕園分布為當代的資訊。
資料來源：白偉權繪。

大園丘與印度人

對此問題，我們試著打開殖民時期的土地利用圖，從比較詳細的地圖資料來釐清這一問題。柔佛是馬來半島油棕種植面積最廣的州，筆者因此選擇先從柔佛早年（一九二六）的土地利用情形著手。其中發現柔佛當時的土地利用分類相當單純，幾乎都以淺綠色和深綠色的土地利用為主。根據「地圖解碼器」——圖例的訊息，淺綠色所代表的是Small Holding，深綠色則代表Estate，兩者分別代表了小園丘和大園丘。大、小園丘的差別在於土地面積，當局以一百英畝❶（acre）為分野，在一百英畝以下的為小園丘，一百英畝以上的則是大園丘。一般而言，這類歐資大園丘的面積相當大，像是筆者曾經在二〇一二年到訪的森那美公司的古來大園丘（Sime Darby Plantation Ladang Kulai），它的種植面積就有五千零七十三英畝，❷約相當於兩個台北市大安區這麼大。這片園丘也正是由南北大道高速公路所貫穿。

早年這些園丘主要都是以種植橡膠為主。一般而言，小園丘所需的資本額

❶ 相當於零點四四平方公里。

❷ 相當於二十點五平方公里，見 Oil Palm Plantation Management Certification Report. http://www.rspo.org/sites/default/files/MY0202400_Sime_Darby_SOU_24_MA_2009_00_Summary_Report_Rev3_1.pdf

較小，一般為民間所投資、擁有；大園丘則不然，它的資本額巨大，一般多是歐洲大企業所經營。馬來亞的園丘業主要由歐資公司所把持，像是在一九三一年，歐洲資本的橡膠園丘雖然在各族群的園丘所有權中，只有百分之四十二點四，但他們的園丘面積卻占了整個馬來亞園丘面積的約百分之七十五。❸

仔細一看，大園丘和小園丘在柔佛的分布相當有規律，小園丘幾乎分布於沿海一帶，大園丘則是主要在內陸，它的分布與內陸地區公路、鐵路的開發相輔相成。換句話說，高速公路所經過的柔佛段地區，主要是大園丘的集中地。這個現象在同一時期馬來半島另一種植大州——霹靂亦是如此，差別在於霹靂的大園丘遠比柔佛來得多，小園丘反而較少。因此，牛隻又與歐洲大園丘又有著什麼樣的關係呢？是否是與歐洲人喝牛奶、吃牛肉的飲食習慣有關？

事實上，喝牛奶、吃牛肉確實是歐洲人的飲食習慣，但作為資本家階級的歐洲人，由於人數較少，因此消費量不多。目前也沒有跡象顯示橡膠園或是油棕園在種植事業之餘，還有發展畜牧業。

不過，除了歐洲資本家之外，園丘內還有另一大族群——印度人。印度

❸ 華人所經營的園丘為百分之四十二點四，但面積只有百分之十六點九，印度人更少，他們所經營的園丘占比為百分之十點五，所占面積僅有百分之二點九。見 Kernial Singh Sandhu (1969) *Indians in Malaya: Some Aspects of Their Im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1786-1957).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2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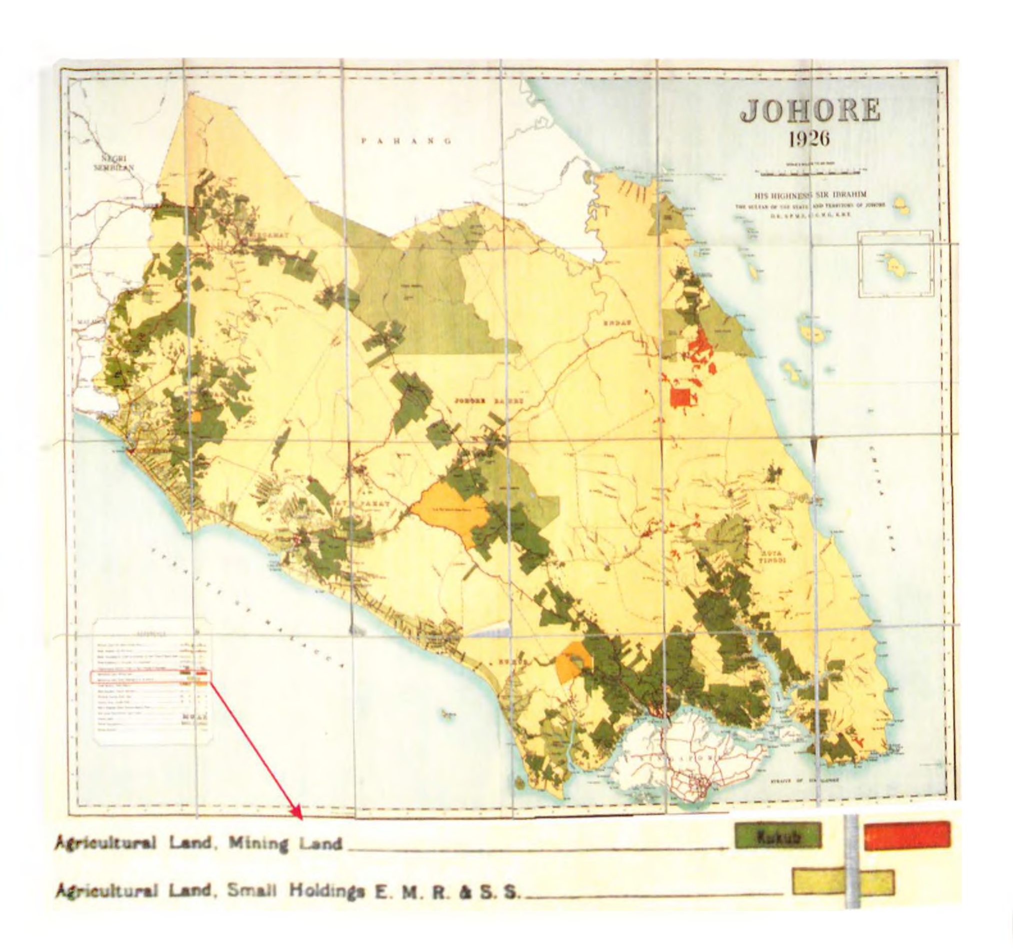


圖4 1926年的柔佛土地利用圖

資料來源：白偉權繪，底圖取自 Survey Department.(1926). *Johore 1926.* Malaya: Survey Depart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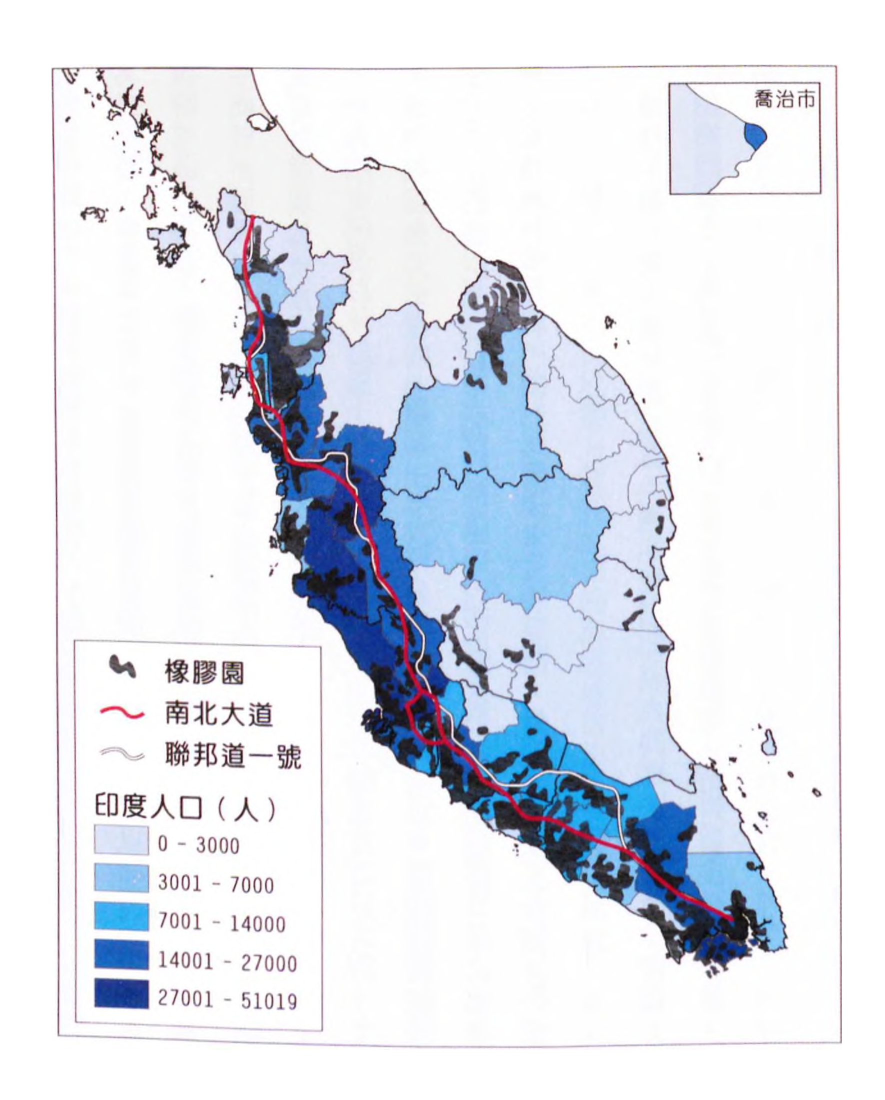


圖5 1931年馬來半島的印度人口分佈（按縣）。

說明：橡膠園為1953年的分佈情形。聯邦道一號公路是戰前貫穿整個馬來半島的主要道路，於1939年全線竣工，是當時物產出入口和人口往來的重要幹道。後來，此道路的功能為南北大道所取代，後者建成時間為1994年。

資料來源：白偉權繪，數據依據：Vlieland, C. A.（1932）. *British Malaya. A Report on the 1931 Census and on Certain Problems of Vital Statistics*. London: Crown Agents for the Colonies.

人是馬來亞第三大民族，他們大多是在二十世紀初橡膠產業發展後，大批移民到馬來亞的。而翻查一九三一年英屬馬來亞的統計資料便可以發現，印度人所分布的地區，其實大致和歐資大園丘的所在地相互重疊。

此外，若觀察二十世紀初至二十世紀中葉馬來半島印度人所從事的職業別就可以發現，一九三一年從事農業的印度人便占了該族群的百分之六十點五，一九四七年是百分之五十三點四，到了一九五七年都還有百分之四十七點四，比例相當高，這裡的「農業」絕大部分都是指園丘工。❹而根據同一時期（一九三一年）馬來亞園丘工的族群比例，印度籍園丘工就占了百分之七十三點五，遠超過其他種族，雖然比例後來有所下降，但到了一九五七年，仍有百分之五十二點八。❺

換句話說，有大園丘的地方，就能找到印度人的蹤跡。若將今天南北大道所經過的地方，與當時印度人的分布進行疊圖觀察，也可發現馬來半島主要道路、印度人分布以及大園丘，三者的空間分布可說是吻合的。那麼，這樣的共生關係又是如何形成的？

❹ Kernial Singh Sandhu.(1969). *Indians in Malaya: Some Aspects of Their Im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1786-1957).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247

❺ Kernial Singh Sandhu.(1969). *Indians in Malaya: Some Aspects of Their Im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1786-1957).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257

與英殖民體系共生的印度人

綜觀整個馬來半島，印度人以及大伯公主要分布在半島西海岸地區，特別是霹靂、雪蘭莪、森美蘭以及柔佛，這樣的分布其實有它的歷史軌跡。從十九世紀末開始，英殖民地勢力便從原來的海港城市如新加坡、檳城、馬六甲往馬來半島內陸的土著邦國（Natives States）延伸。英國在霹靂、雪蘭莪、森美蘭地區發生礦區內亂（甚至內戰）之際，放棄原來的不干預政策，進入這些地區平亂，最終控制了這些地區。到了二十世紀初的首個十年，馬來半島基本上都已經成為英國的勢力範圍。

在整個英屬馬來亞的架構底下，本區基本上可以分成三個政治單元，分別是海峽殖民地、馬來聯邦，以及馬來屬邦。前者完全由英國所控制，可說是英國領土的一部分。馬來聯邦和馬來屬邦的差別則在於英國在前者的主導權較大，其內政、外交、軍事皆由英國參政司（Resident）所掌管，蘇丹雖然存在，但只是虛位領袖。馬來屬邦則仍由蘇丹所主導，但英國會派駐顧問官（Advisor）

對於行政決策提供建議。

印度裔人口在每個殖民屬地的多寡，似乎是與英殖民在當地的控制力量成正比。其中，海峽殖民地擁有高比例的印度人，但礙於土地面積的關係，海峽殖民地印度人在人數上仍然不及馬來聯邦，但卻已經比馬來屬邦來得多了。

除了海峽殖民地港市之外，最多印度人聚集的是由英國所間接主導的馬來聯邦。這裡可說是海峽殖民地重要的腹地，海峽殖民地用以進行轉口貿易的物產，無論是錫礦還是橡膠等經濟作物，都源自這裡。這些廣大腹地可說是殖民地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印度人與英國人在殖民地當中其實是具有共生關係的，無論是在公共領域或是私人商業領域當中都是如此。

在殖民地的「官民」關係中，印度人可說是英殖民者的最佳夥伴，雖然一般認為華人才是最佳，但此說或許只適用於經濟領域上。許多華人確實在這片「化外之地」藉由殖民地的自由貿易而冒出頭，但在另一方面，華人與歐洲人在商業上經常又處於競爭的關係。隨著殖民控制力量的發展，無論是歐洲資本

或是殖民政府的機能，都逐步在蠶食華人的經濟領域，例如二十世紀初南馬華人的胡椒、甘蜜產業逐漸為歐洲人主導的橡膠產業所取代；馬來聯邦地區華人的錫礦收購與加工業也在二十世紀之後轉由歐資主導；在航運領域方面亦是如此，華人戎克船貿易由歐洲電氣船所取代。此外，華人的祕密會社或會黨組織也被殖民政府視為是殖民地治理的大患。因此在政治和商業上，華—英關係永遠是處於「友達以上，戀人未滿」的尷尬狀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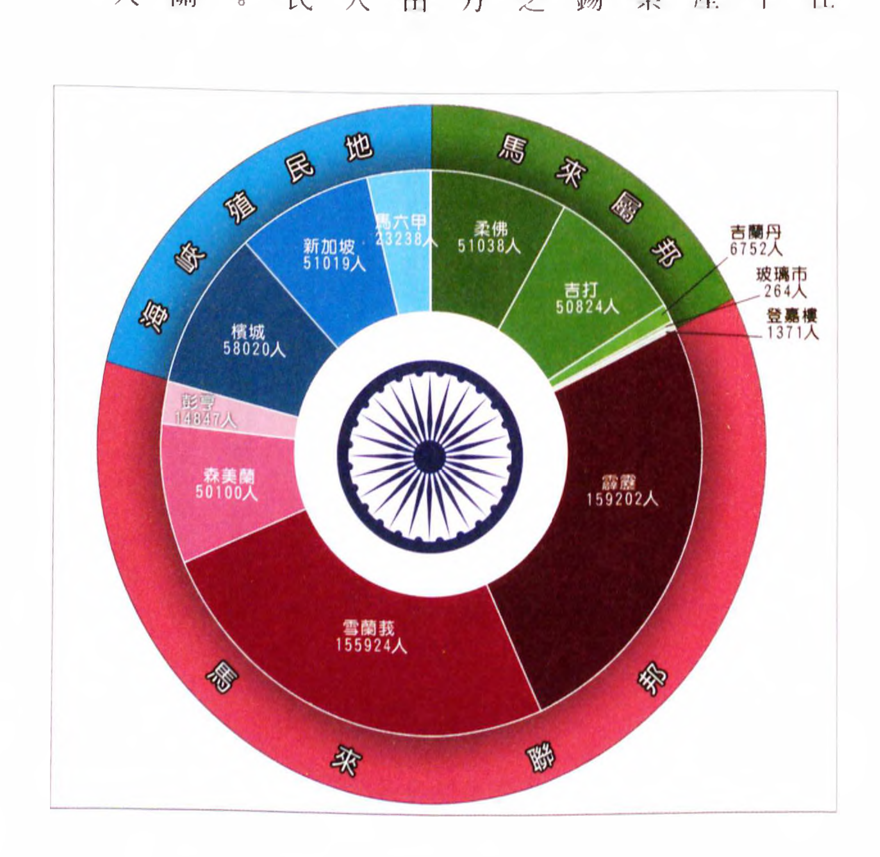


圖6 馬來亞三大行政區域中的印度人分佈（1931年）。
資料來源：白偉權繪，數據依據：Vlieland, C. A.（1932）. *British Malaya: A Report on the 1931 Census and on Certain Problems of Vital Statistics*. London: Crown Agents for the Colonies.

印度人則不同，英國在近三百年對印度的殖民統治當中，已建立對印度人的熟悉和信任感。事實上，印度是英國在遠東地區最重要的大本營，在印度出生長大的英殖民官員和商人亦不在少數。這些在印度成長或長期服務的英國人基本上都能掌握印度語，因此英國人來到馬來亞這個新的殖民地之後，對印度人的熟悉感與信任感是遠大於中國人的。

此外，在一八六七年海峽殖民地未獨立成為殖民部（Colonial Office）底下的直接管轄單位之前，本區也直屬孟加拉管轄區（Bengal Presidency）所管理。另一方面，英國也在印度實施教育，培育了不少通曉英語的印度人，並直接吸納為公職人員，因此印度有相當多的人是熟知英殖民政府行政運作的。

在此背景下，英國在取得新殖民地之後，往往也會將印度人引進公家體系，因此可以見到，殖民地的律師、警察、軍人、公務員、工友，都不乏印度人的臉孔。這種印度人受到重用的現象不僅限於英屬馬來亞，英屬緬甸的情況更是如此。❻

在園丘產業上，印度人自然也成為歐洲商人重要的夥伴。在十九世紀末

❻ 理查．考科特（Richard Cockett）著，廖婉如譯，《變臉的緬甸：一個由血、夢想和黃金構成的國度》（*Blood, Dreams and Gold: the changing Face of Burma*），台北：馬可孛羅，二〇一六。

至二十世紀初，歐洲商人便隨著殖民治理的腳步進入馬來半島各邦，特別是英殖民力量較強的馬來聯邦，在當地發展咖啡、茶、橡膠的種植。雖然當時華人已經占據馬來半島最大的勞動人口，但華人不見得是英資的首選。

本地歐資商人大多利用工頭尼制度（Kangany System）來招募勞工，後來歐洲資本家也與政府合作，於一九〇七年三月設立一個半官方的組織——印度移民委員會（Indian Immigration Committee），建立一套系統性大量輸入及招募勞工的機制，為大園丘提供穩定的勞動力。是年九月，海峽殖民地政府頒布《淡米爾移民基金法案》（*Tamil Immigration Fund Ordinance*），以成立基金來負擔印度勞工從印度前來馬來亞的各種開銷以及工作期滿後歸國的船費，這個基金由印度移民委員會所管理。❼總體而言，對印度而言，英屬馬來亞政府所規畫的印度移民政策，相對於其他印度移民目的地國而言，是較具競爭力的。❽

❼ 黃惠儀：〈淡米爾移民基金法案〉，收錄於尋找歷史座標點辭條資料庫，二〇一六，http://ahis.ch.ncc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K2n5we/record?r1=98&h1=0

❽ Kernial Singh Sandhu (1969). *Indians in Malaya: Some Aspects of Their Im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1786-1957)*.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55.

❖歷史小辭典

工額尼制度

工額尼在淡米爾語中為「工頭」或「領班」的意思。即透過本地相熟的工頭作為中介，由他們返回印度家鄉去招募勞工。當然這套制度有利有弊，好處在於具有彈性以及成本低廉，但壞處就是會出現雇主或工額尼假借優渥的工資和條件為號召，誘騙勞工。來到馬來亞的勞工也需要以工作抵債，這無異於令人詬病的華人豬仔（契約勞工）制度。

在國家力量與資本家的共同推動下，大量的印度人開始移入馬來亞，每年的移入人口從一八八〇年的五千零五十三人，一直到一九三五年的六萬六千三百五十人（見左表）。他們與華人一樣，有的在工作期滿後便返回印度，有的則在這些種植園落地生根。因此在整個殖民時期，每當人們列舉殖民地的民族與經濟時，印度人總是會以園丘工的姿態出現。印度人－園丘已成為大家

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馬來亞的印度移入人數

單位：人

十九世紀	移入人數	二十世紀	移入人數
1880年	5,053	1910年	83,723
1885年	21,510	1915年	75,323
1890年	18,473	1920年	95,220
1895年	16,005	1925年	90,706
1900年	38,529	1930年	70,317
1905年	39,539	1935年	66,350

資料來源：Saw Swee Hock.（2015）. *The Population of Malaysia Second Editio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 35.



圖7 1924年倫敦大英帝國博覽會馬來亞手冊橡膠篇中所展示的印度勞工。

資料來源：白偉權翻拍自The Malayan Governments.（1923）*Rubber: British Empire Exhibition, London 1924*. Singapore: Fraser and Neave.

對於印度人的刻板印象。

園丘裡的印度人

南來馬來亞的印度人也有顯著的族群和地域之分。基本上，約有百分之九十八的印度移民都是來自南印度的馬德拉斯管轄區（Madras Presidency），❾特別是馬德拉斯港周邊的北阿爾果德（North Arcot）、帝魯吉拉帕利（Trichinopoly）以及坦賈武爾縣（Tanjoe）。會離鄉背井南來的，主要都是當地的阿迪德拉維達人（Adi Dravida）等其他低種姓的人。❿因此出現在馬來亞的印度人，嚴格上來說應該是淡米爾人（Tamil），他們所說的也是印度話中的淡米爾語；呈現在我們眼前所謂的印度文化，其實也是淡米爾文化。

當然除了淡米爾人之外，另外兩個南印度的移民群體是泰盧固人（Telegu）和馬拉雅拉姆人（Malayalam），由於他們人數較少，因此在與外界互動時，還

❾ 即今天的淡米爾那都邦（Tamil Nadu）。

❿ Kernial Singh Sandhu (1969). *Indians in Malaya: Some Aspects of Their Im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1786-1957)*.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59-161.

是免不了會融入淡米爾人的圈子。根據筆者與印度同事的訪談，即使是淡米爾人、泰盧固人，或是馬拉雅拉姆人，他們自己也難以就外觀上來區辨彼此。

至今，雖然許多的印度人已經離開園丘，但是作為本地印度人普遍的起源地，許多大園丘內仍然保有印度元素。種植園就像是個小型的地方社會，根據筆者所到訪的古來大園丘，從大路轉進園丘入口處時，會見到園丘駐警，凡入內者都需要登記。園丘內一般會分為第三大區，除了種植區之外，還有勞工村以及高階管理員宿舍區。

園丘內基本上是與世隔絕的，一般基本生活機能也能夠在園丘內完成。我們能在

圖8　古來大園丘的淡米爾小學





9
10

圖9　古來大園丘的印度廟。
圖10　古來大園丘的禁止放牛牌。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12年10月28日。


往士年納
沙威新村
學校
雜貨店
倉庫
勞工宿舍
種植園
0
200 公尺



圖11 古來大園丘的空間結構。
資料來源：白偉權繪。

印度人與大園丘的共生關係，並未因為馬來亞的獨立、英政府的退場而出現改變，反倒是到了九〇年代開始，因為世界市場對於橡膠需求的轉變而開始逐漸脫節。這時期，隨著人造膠的普及，以及其他橡膠產地之間的競爭，導致橡膠價格逐年下跌。許多的種植業者，無論是大園丘的財團或是小園主，都紛紛轉種另一項市場的新寵——油棕。因此可以見到整個馬來西亞的油棕種植面積在一九九〇年之後便逐漸拋離橡膠。

由於機械化日趨普及，油棕本身的生產工序對於勞工的需求也並未像傳統橡膠業那麼大，加上更為廉價的外勞，使得印度人逐漸在園丘的勞動市場上失去競爭力。此外，也有許多城市附近的園丘歷經都市化，而改變原先的土地利用，由園丘開發為住宅區。在整個社會經濟的變遷當中，較為無奈的是，印度人由始至終所扮演的角色都是園丘工，⓫並不像華人一樣，能夠轉變為資本家階級的小園主，因此在九〇年代熱帶栽培業的轉型期間，印度人只能陸續離開園丘，開始移居城市，去尋找新的就業機會，一切從零開始。

其中，身為全國人口主要移入大區的新山，對熱帶栽培業印度勞動力的

⓫根據統計資料，即使在一九五七年，印度人擁有園丘的比例是很低的，在所有的園丘主裡面，印度人只占了百分之十七點九，低於歐洲人的百分之二十四點一以及華人的百分之五十二點九。而在土地占有比例方面，印度人只占百分之七點五，遠低於歐洲人的百分之六十五點七和華人的百分之二十四點五。見 Kernial Singh Sandhu (1969). *Indians in Malaya: Some Aspects of Their Im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1786-1957)*.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252.

釋放最有感受。筆者曾經對於新山的一個廉價住宅區——茉莉花花園（Taman Melor）⑫進行過住戶的調查。茉莉花花園建於一九八七年，是一個擁有七棟五層樓組屋所組成的住宅區，擁有六百九十六戶。然而在一九八七年至二〇〇八年這二十一年間，印度人遷入的戶數從七十七戶增加到一百五十四戶。其中，有一百一十二戶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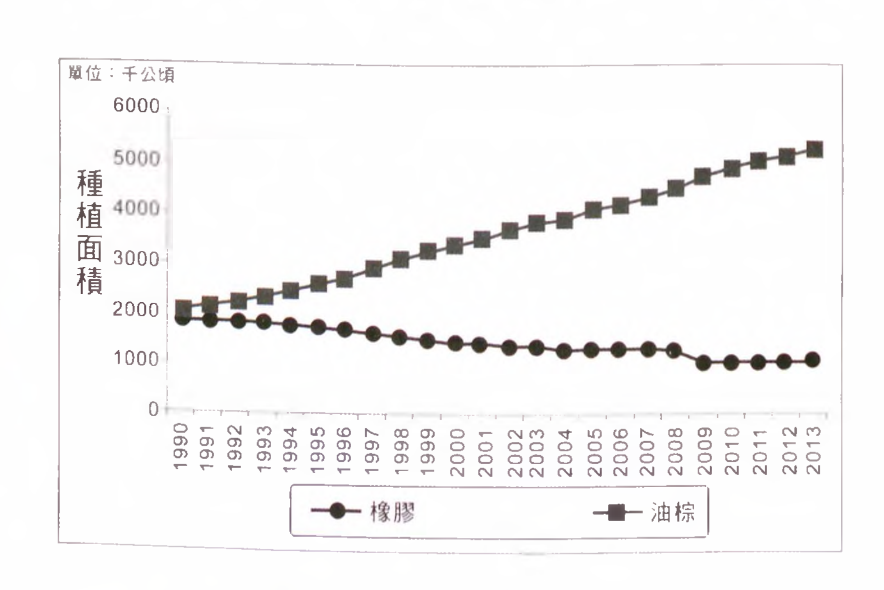


圖12 馬來西亞橡膠與油棕的種植面積消長（1990年—2013年）。
資料來源：白偉權繪，Ratnasingam et al.(2015). "The Prospects of Rubberwood Biomass Energy Production in Malaysia." *BioResources*. 10(2): 2526-2548.

⑫ 馬來西亞的新式住宅區多稱作「花園」，這是一九七〇年代開始興起的一種住宅形式。

是屬於承租的單位，顯見在這二十年間新山市郊印度裔外來人口增加十分顯著。⑬

這種產業變遷和移動對印度人而言，算是新的改變，他們不像華人，有著幾代人的累積，至少在社會上都已經掌握了穩定的維生方式。許多剛來到城市發展的印度人，一切從零開始，他們由於教育程度低，所能夠掌握的行業多是低階的勞力工作，階級向上流動的機會少，貧困問題一直都是印度裔普遍的悲歌。

貧困也導致印度人的犯罪率特別高，在二〇〇〇年代，馬來西亞開始盛行騎摩托車搶奪的犯罪案件，其中尤以新山和吉隆坡這兩大人口移入區最為猖獗。根據二〇〇四年馬新社（Bernama）的報導，當年馬來西亞在首五個月就發生了五千五百一十七宗搶奪案，其中柔佛特別顯著，達到六百五十四宗，而印度人則是犯罪率最高的族群。⑭這類犯罪活動持續多年，報章無論是地方或是全國版，幾乎天天都出現這類報導，造成人心惶惶。

我們若是在Google以「搶奪」、「馬來西亞」的關鍵字去搜尋新聞報導，便

⑬ 白偉權・陳國川，〈馬來西亞花園聚落中的族群關係：柔佛州新山縣茉莉花花園的個案研究（一九八七—二〇〇七）〉，《環境與世界》第二十三期（二〇一一），頁四九—七四。

⑭ 〈李寶華：各方面有必要全盤研究攫奪案猖獗的原因〉，馬新社，二〇〇四年六月二十二日，http://finance.bernama.com/news.php?id=110189

可以發現在許多報導中，搜尋匪多是印度人，其他的搶案新聞亦是如此，造成了社會對於印度人的負面印象。直到今天，人們走在印度人較多的地方，還是會被提醒需要格外小心。

總體而言，南北大道上伴隨著熱帶栽培園一同出現的牛隻告示牌，其背後其實是一部由馬來亞英殖民者、歐洲商人、南印度移民所共同譜寫的一部殖民經濟和族群產業的交響樂章。以英國為首的歐洲資本，隨著英殖民勢力的延伸而進入馬來半島內陸，馬來半島也由此進入世界體系，成為提供歐洲工業發展的原料供應地。在世界市場需要橡膠時，馬來亞各地隨即轉變為處處的橡膠園。

由於英國與印度之間長久以來的殖民關係，當英資園丘需要大量勞力時，印度人自然在此時期大量移入，大園丘裡的園丘工作也自然成為本地印度人的族群產業，形成只要有大園丘的地方，就會有印度人的分布。

這一曲印度族群產業的交響樂，同時具備了希望與哀愁的曲目。從印度原鄉的角度來看，這些低種姓的社群在離開原鄉之後，很可能在新環境中因為

有了不同的互動對象，而出現不一樣的機會。從哀愁的角度來看，這些在工額尼制度下進入園丘工作的印度勞工，他的處境與地位其實與十九世紀那些中國苦力無異，永遠處於勞動階級，少有翻身的機會。

與華人所不同的是，在十九世紀苦力的年代之後，二十世紀的華人移民已經以自由移民為主了，即使是後來的華人，也多能夠透過血緣和地緣的紐帶而得以在社會上安身立命。而印度人則沒那麼幸運，由於到了二十世紀中葉甚至七〇年代，許多印度人仍然維持著二十世紀初以來的園丘工生活，因此當面臨八〇至九〇年代園丘經濟轉型而被迫出城時，印度人的悲歌便開始為人所見，貧窮、毒品、搶奪、結社成了人們對印度人揮之不去的印象。

雖然這些負面的刻板印象其實在一定程度上建基於經驗事實的累積，但筆者認為，我們應該需要反思的是，這樣的客觀事實背後其實源自於移民史和經濟史上的結構性問題。園丘經濟雖然造就了許多的華人、馬來人小園主，也造就了歐資的崛起，從而推動了整個英屬馬來亞經濟的蓬勃。但蓬勃的背後，仍然會有部分群體成為背後的犧牲品，對此，我們或許更應該抱持

同理的心去看待這個與我們一起生活的第三大族群。否則的話，便像是高速公路旁的牛隻告示牌，每天即使有幾萬輛車穿梭其中，但卻鮮少被人所「看見」。

延伸閱讀

Kernial Singh Sandhu.（1969）. *Indians in Malaya: Some Aspects of Their Immigration and Settlement*（1786-1957）.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aw Swee Hock.（2015）. *The Population of Malaysia Second Editio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白偉權、陳國川，〈馬來西亞花園聚落中的族群關係：柔佛州新山縣茉莉花花園的個案研究（一九八七—二〇〇七）〉，《環境與世界》第二十三期（二〇一一），頁四九—七四。

大歷史下的古砲故事

一六四一年一月，荷蘭東印度公司以猛烈的砲火攻陷葡屬馬六甲，結束了葡萄牙在馬六甲長達一百三十年的殖民統治，開啟了馬六甲的荷治時代。隔年，荷屬巴達維亞發出一道命令，派遣在荷葡馬六甲戰役中立下大功的拉莫提（Johannes Lamotius）前往福爾摩沙（台灣）。當時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其實已經控制了大員一帶的南台灣地區，唯台灣北部仍由西班牙人所控制。拉莫提此行的任務即是要征服北台灣。

在台北的雞籠（基隆）一役中，荷蘭和西班牙火力差距甚大，西班牙每發射十枚砲彈，便換來荷蘭人兩百枚的砲彈還擊。在猛烈的砲火攻勢下，荷蘭終於攻破雞籠，將西班牙勢力逐出台灣，成為台灣唯一的歐洲霸主。綜觀馬六甲

的荷葡戰爭抑或是雞籠的荷西戰爭，火砲都是他們制勝的關鍵。

在大航海時代這個關係錯綜複雜的國際社會，征戰、貿易、移民、通婚等是連結這些國家和部族的紐帶，一切運作按照叢林法則，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在此背景之下，火砲更顯得重要且實在。因此每當我們走訪一些曾經在歷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地方，都不難發現有許多的大砲遺跡，像是在馬六甲古城區便有許多大砲的裝置，成為當地一大特色。

作為大航海時代國際貿易的重要節點，台灣當然也是大國角力的場域，因此這裡曾經也是重砲部屬的地區。像是在淡水、基隆、安平這些老城，都還能找到一些古老大砲。雖然它們不見得全是原物，但至少足以代表當地的意象。這些古砲雖然毫不起眼，經常容易為人所忽略，但它卻是過去那段大歷史的產物，也曾在特定時空中履行它的使命，因此每尊古砲的背後都有它精彩的故事。本章，我們以馬來西亞檳島、北海，以及瓜拉雪蘭莪（Kuala Selangor）三地的古砲作為考察對象，看看它們如何串聯整個大歷史？在大歷史的框架之下，又有哪些精彩故事？

遊走於馬來王國之間的Seri Rambai

在馬來西亞，若要尋找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古砲，並不見得只能跑到馬六甲，況且馬六甲旅遊區的大砲，許多也是仿製品。而全馬能找到最經典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大砲，就只有在檳城了。檳城在一七八六年由英國人開埠，這裡雖然從頭到尾都不曾被荷蘭殖民，但卻擁有一尊相當有名的大砲。當走訪檳城世遺區，買票進入康華麗斯堡（Fort Cornwallis），就會在城牆上見到幾尊面向大海的古砲。

這些大砲有的是英國大砲，上面有著象徵英國皇室「R」（Royal）的銘文，而其中一尊明顯較大，十分雅緻，上面有兩圈環繞著



圖1 安平古堡上的古砲。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16年11月15日。

砲身的雕花，砲尾處刻上了「VOC」，很明顯是出自荷蘭東印度公司。砲的最尾端還刻上了一串拉丁文：「IAN BERGERUS ME FECIT 1603」。估計是製造者的名字以及鑄造年代。值得注意的是，除了「VOC」和前述的拉丁文，在「VOC」上方也刻有一組爪夷文字，至於內容為何，我們現場無法解讀。令人費解的是，為什麼檳城這個英國屬地會出現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大砲？而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大砲上為何又會刻上爪夷文？再者，一六〇三年距離檳城開埠的時間整整早了一百八十三年！這種種時空混搭，接錯線的情況令人摸不著頭腦。

回去翻書，才知道這尊砲大有來頭，有專



圖2 檳島康華麗斯堡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大砲。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15年7月31日。

爾的名字，但非荷蘭文，而是馬來文，名為Seri Rambai（音譯：斯里蘭拜），這也是馬來西亞現存年代最久遠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古砲。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一九四八年便有旅馬的歐洲人道格拉斯（Douglas）撰文記錄它。根據道格拉斯的記載，這尊古砲砲身上的爪夷文銘文就像達文西密碼般，是解答它身世的關鍵。

託道格拉斯的福，他認識的一名檳城馬來官員幫他解讀了上面的內容，這段文字內容隱含了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這段爪夷文字標題為「蘇丹的俘虜」，內容如左：

> 蘇丹的俘虜由我們Sri Perkasa Alam Johan Berdaulat所拿取。當時，我們委派Sri Maharaja及其將領，以及Laksamana、Raja Lela Wangsa於一〇二三年（按：一六一三年）去攻打柔佛。

上述銘文中的Sri Perkasa Alam Johan Berdaulat便是亞齊（Aceh）統治

者，從這段爪夷銘文可以得知，該砲是亞齊王國統治者的戰利品，而一〇二三年是回曆，相等於西元的一六一三年，也就是斯里蘭拜大砲出廠後的第十個年頭，因此這是後來另外再刻上去的。那一年，也正是亞齊與柔佛交戰的一年。那麼，這尊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大砲為何會出現在柔佛呢？原來這尊大砲是一六〇六年荷蘭人送給柔佛蘇丹阿拉烏丁利亞沙三世（Sultan Alauddin Riayat Shah III）作為結盟的禮物，以便與柔佛共同對抗馬六甲的葡萄牙人。荷蘭也協助柔佛建立碉堡以及提供軍火。根據歷史記載，荷蘭海軍將領彼得・威廉姆斯・韋爾霍夫（Pieter Willemsz. Verhoeff）正是於一六〇六年因為結盟之事而前往柔佛，所以估計這尊荷蘭砲即是在當時被安置在柔佛。無奈，亞齊最終還是攻陷了柔佛都城峇都沙瓦（Batu Sawar）並將柔佛蘇丹俘虜至亞齊。

❖ 歷史小辭典

柔佛王國

歷史上，柔佛王國所指涉的意義有二：首先是成立於一五一二年的「舊柔佛」（Old Johor）；再來是成立於一八八六年的「新柔佛」（New



圖3 促成荷蘭與柔佛王國軍事結盟的荷蘭海軍將領彼得．威廉姆斯．韋爾霍夫。
資料來源：荷蘭國立博物館，https://www.rijksmuseum.nl/collectie/SK-A-1469（Public Domain）。

Johor）。舊柔佛為馬六甲王朝的末代蘇丹所建立，延續了馬六甲王朝的王室血統。它所統轄的範圍包括了馬來半島南部以及散布在半島南方的群島，包含新加坡以及廖內－鈴牙群島（Riau-Lingga Archipelago）；新柔佛為柔佛王國大臣天猛公（*Temenggong*）所成立的新王朝，領土範圍則是今天馬來西亞的柔佛州。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所謂「柔佛」的領域範圍變化不定，故容易引起混淆。

這尊砲自柔佛被搬到亞齊後，一待就是接近兩百年。直到一七九五年，它再次因為大國結盟，而被送到雪蘭莪王國。當時亞齊統治者希望尋求雪蘭莪蘇丹依布拉欣（Sultan Ibrahim）的胞弟拉慈那拉（Raja Nala）的合作，以便與亞齊共同對抗杜順（Dusun）人。之後這尊大砲便一直安置在雪蘭莪王國國都瓜拉雪蘭莪的碉堡裡面了。

斯里蘭拜在雪蘭莪一待就是百年，直到一八七一年，英國船艦在瓜拉雪蘭莪清剿海盜，這尊砲最終才被搬上英國戰艦運往檳城。據說運到檳城之後，

它即被丟棄到康華麗斯堡外海，直到一八八〇年才被拖起。在打撈過程中，傳說它不願意上岸，因此人們無論怎麼搬，都無法撼動它。直到後來人們找來雪蘭莪的馬來統治者東姑古丁（Tengku Kudin，一八二二—一九〇九）前來說服大砲。東姑古丁綁了一條繩索在大砲上，大砲便聽話地浮了起來。之後它便安放在海邊的康華麗斯堡，成為今天我們看到的大砲了。

人們普遍相信這尊斯里蘭拜具有靈力，對於想要懷孕的婦女更是特別有幫助，只需要把鮮花放進砲口中，便能保佑懷孕成功，所以那邊曾經還有人對其膜拜。

北海的浮大鎗

說到被膜拜，檳榔嶼對岸威省的北海（Butterworth）確實有一尊被立廟供奉的大砲。事實上，被供奉的「物件」在華人民間信仰之中其實並不稀奇，例

如同為威省的大山腳（Bukit Mertajam），當地過去以產甘蔗著稱，這裡一個叫做「蔗芭」的地方，其地方公廟石巖宮便供奉了蔗磨，當地人稱之為「蔗較將爺」。台灣也有類似的宮廟，像是安平的妙壽宮，裡頭供奉了一艘巨大的朱府王爺王船、高雄紅毛港的保安堂，也供奉了一艘日本戰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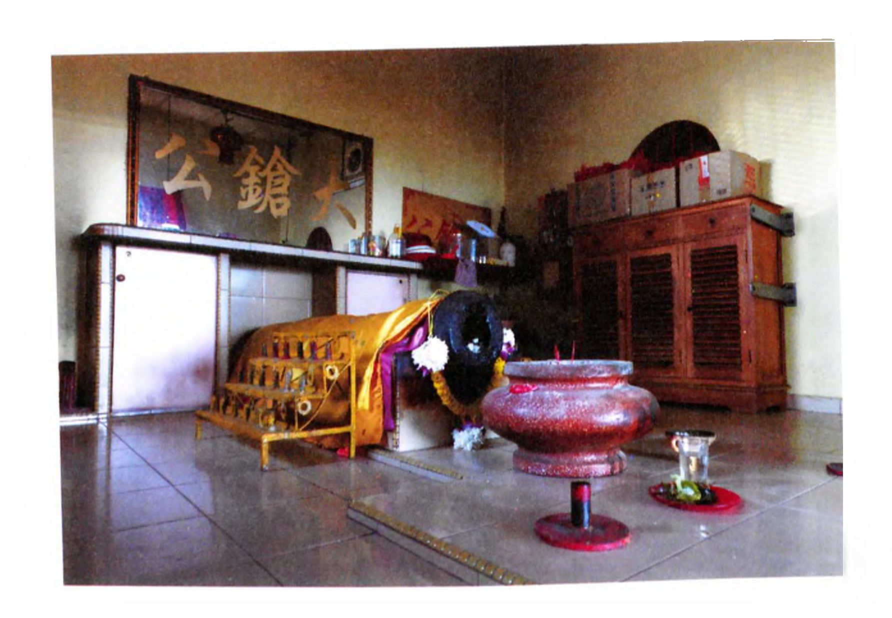
這間供奉大砲的廟宇稱為「大銃公廟」，也有作「大槍公廟」，位在北海渡輪碼頭旁的漁村中，該處稱為新橋頭。正確來說，該廟應該寫做「大銃公廟」，「大銃」源於閩南語對於大砲的指稱，但由於發音上「大銃」（*tōa-chhèng*）和「大槍」（*tōa-chhèng*）同音，而現代人比較少接觸「銃」這個閩南漢字，因此「槍」逐漸取代「銃」的使用。當然，所謂「大銃公」所指的當然就是這尊被供奉的大砲了。

大銃公廟外觀並不起眼，規模也不大，裡面的主神就是這尊大砲（長約二公尺）。大銃公擺放在地上，由一塊黃布覆蓋（時為綠色布），後方是一塊「大銃公」三個字的大牌匾，前面則是供奉它的供品，包含甘文煙、荖葉、檳榔、花等等。從這些供品看來，人們很明顯就是以參拜拿督公的方式來對待大銃

公，多少反映了人們對大鎗公的理解與想像。

這座廟宇的歷史如何？究竟有多久，目前已不可考，但歷史學者 A. E. Coope 曾在一九四七年左右到訪大鎗公廟，並且將考察報告刊登於第二十期的皇家亞洲學會馬來亞分會的期刊上。文章也刊載了兩張當時拍攝的珍貴照片。當時的大鎗公廟還是亞達屋（木製屋身，棕櫚椰屋頂），地上比較髒，而砲身其實有拉丁字母，只是灰塵很多，字跡也不明顯，故即使砲身沒有蓋上黃布，但還是無法辨識。從 A. E. Coope 所拍攝的照片中，大鎗公上掛有「藍卓公」的布條，「藍卓」即是我們今天所稱的「拿督」（Datuk），只是在檳城，因為當地居民多為福建人，因此用福建話漢字——「藍卓」（*ná-toh*）來表示拿督。

根據 A. E. Coope 的田野資料，這尊大鎗公的來歷眾說紛紜，版本眾多，而且不同族群有著不一樣的版本。其中馬來人認為，它與檳島上的斯里蘭拜其實是一對伴侶，而斯里蘭拜是男／雄性，北海這尊為女／雌性，人們相信它是在一八七一年與斯里蘭拜一同被英國人由雪蘭莪搬來檳城。然而，後來不知何故，這尊大砲離家出走，由檳島漂浮至對岸的北海現址，對於這個神蹟，它便







4

5

圖4 北海新橋頭的大鎗公。
資料來源：林愛莉提供，攝於2021年11月16日。

圖5 1940年代的大鎗公廟。
資料來源：白偉權翻拍自Coope, A. E.（1947）. "The Floating Cannon of Butterworth."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0（1）: 126-128.



有了個傳神名字，馬來人將它稱作「Meriam Timbul」，Meriam是馬來語的大砲，Timbul則有漂浮之意。有趣的是，當地華人也有此說法，因此也稱之為「浮大鎗」（*phû-tōa-chhèng*）。

對此傳說，馬來人還有另外的版本，他們認為檳島的斯里蘭拜確實有女性伴侶，而該女性伴侶確實也跳進海中漂浮到其他地方了。但他們認為「離家出走」的大砲已經不知所蹤，但肯定不是北海的這尊浮大鎗就是了。

除了漂浮的傳說，也有另一個傳說認為，這尊大砲其實是由一名馬來貿易商佐翰（To Johan）所有，他的商船由於經常往返馬來半島和暹羅貿易，在海盜猖獗的時代，許多商船都會在船上設置大砲作為防禦。後來佐翰退休之後，便將大砲丟棄在岸邊附近的淺水域當中。久而久之，該地逐漸陸化，海水消退後，便留下這尊大砲。

另一個說法則認為，這尊大砲是在霹靂拿律戰爭時期，拿律義興公司領袖蘇亞祥所有。蘇亞祥是一個充滿傳奇色彩的歷史人物，他原居於檳城，後於一八四〇年代末五〇年代初到拿律開採錫礦，但在一八六〇年代，當地義興與

海山兩大陣營發生嚴重械鬥，蘇亞祥在逃回檳城時不幸被馬來領袖抓獲，最終遭到斬首。斬首後，據說化身成為河裡的白色巨鱷，後來當地人也在河邊建立蘇藍卓公廟來供奉他，該廟確實存在，而在太平市區，也有一條以他為名的街道，即 Panglima Ah Chong 路。至於他的大砲為何會出現在檳城北海？傳說就沒有交代了。

另根據 A. E. Coope 的記錄，市政局官員需要定期在大鑌公身上塗抹豬油，若沒有照辦的話，大鑌公將會跑回海中。目前這個傳統與說法已經失傳。

無論如何，人們普遍認為大鑌公具有靈性，因此才立廟供奉。雖然目前大鑌公主要為華人所祭拜，但長久以來，它的信眾涵蓋了各個族群。在伊斯蘭教尚未被馬來西亞國家法令和宗教局進行嚴格的規範化之前，早期的馬來宗教司每年也會主持宗教儀式來祭拜大鑌公，這個儀式甚至也有印裔參加。對於他們而言，大鑌公是他們的聖人（Keramat）信仰，今天的馬來人依舊以「Keramat Merial Timbul」稱之，這屬於馬來傳統習俗（adat）的範疇，與他們的伊斯蘭宗教無關，因此沒有教義上的衝突。

除了馬來人的祭祀，早期在農曆八月十五日，大鍋公廟也有暹羅舞的祭祀儀式，但這種祭祀儀式並不是每年都能看到，而是看大鍋公的需要而定。在一九二〇—三〇年代，曾發生過村民沒有按照大鍋公的意思辦理祭祀儀式，當地隨即發生了瘟疫，死了一些人，人們相信這是觸怒大鍋公所致。

總體而言，這尊大鍋公充滿了矛盾，它喜歡豬油，但又被當成馬來籍的拿督公來奉祀，它在傳說中的角色是檳島斯里蘭拜的女性伴侶，但又以男性化的大鍋「公」被人們理解。唯一不衝突的是，無論是華裔、巫裔、印裔抑或是暹裔，他們心目中都有各自版本的大鍋傳說與形象，充分體現了馬來西亞多元交融的社會本質。

瓜拉雪蘭莪的馬來大砲 Petoi Boga

除了檳城之外，另一個保有許多大砲的地方是瓜拉雪蘭莪，這個地方相

當冷門，並非熱門的觀光景點。瓜拉雪蘭莪是早期雪蘭莪王國的舊都，在都城還沒有搬到瓜拉冷岳（Kuala Langat）以及巴生（Klang）之前，雪蘭莪王國的都城便座落於此。

這裡是雪蘭莪河的出海口，也因為這條河的緣故，這個王國便稱為雪蘭莪王國，乃至成為今天雪蘭莪州的州名。地形上，雪蘭莪河出海口的左岸（南岸）有一座山，稱為Bukit Melawait（音譯：武吉美拉華蒂），華人俗稱「皇家山」，該山海拔約二百多公尺，馬來統治者在山上建立了一座名為Kota Melawati（音譯：哥打美拉華蒂）的碉堡。山下沿河的地方，也有一個海拔較低的小丘，統治者在此前沿地帶建立了Kota Tanjung Keramat（音譯：哥打丹絨克拉莫）堡，作為皇家山的防禦前哨。這樣的天然條件使得這裡成為雪蘭莪王國的防禦要塞，它也扮演著控制人流及貨物出入口的區位機能，十分具有戰略價值。即使到了英殖民時期，瓜拉雪蘭莪縣的縣署也設置於這座居高臨下的皇家山上。在早年紛亂的國際社會，這裡也是兵家必爭之地，統治者就在此設置大砲等火力，檳城的斯里蘭拜也正是在這些大國博奕的背景下，而被送到了瓜拉雪蘭莪。

據了解，雪蘭莪在一七三八年到一七四三年曾經和北部的霹靂（Perak）王國交惡，為了加強防禦，雪蘭莪統治者將十尊大砲設置在雪蘭莪河沿岸，五尊設在海岸，而皇家山腳和山頂則設有五十尊大砲。雪蘭莪的軍火有許多來源，除了馬來人自行鑄造的大砲之外，他們也喜歡一些舶來品，常見的有來自英國與荷蘭的火砲。十八世紀時，雪蘭莪王國與英國算是十分要好的，英國也提供軍火給雪蘭莪。

一七八四年，雪蘭莪與亞齊結盟，聯手攻打荷屬馬六甲。此舉也引來了荷蘭人的反擊，荷蘭將領德克・范・霍根（Dirk van Hogen）也聯合了蘇門答臘錫國（Siak）統治者拉惹莫哈默阿里（Raja Muhammad Ali）一起攻打瓜拉雪蘭莪。兩國聯軍最終在短時間內占領雪蘭莪，並驅逐蘇丹依布拉欣（Sultan Ibrahim）。占領瓜拉雪蘭莪後，荷蘭人也將皇家山原來的「Melawati」改名為「Altingburg」，那是以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巴達維亞的時任總督威廉・阿諾・阿爾廷（Willem Arnold Alting）作為命名。而哥打丹絨克拉莫（Kota Tanjung Keramat）則被荷蘭人改稱為「Utrecht」（烏特勒支），那是一位在此戰役中為荷

蘭東印度公司取得勝利的將領。

無獨有偶，早在一六三九年荷蘭人占據大員（台南）之後，為了為了加強熱蘭遮城（今安平古堡）的安全性，荷蘭人也在熱蘭遮城西南方的高地，也就是目前湯匙山安平第一公墓上建了一座碉堡，稱為烏特勒支堡（Fort Utrecht），用以保衛熱蘭遮城。該處在一六六二年被鄭成功摧毀，但沒想到在一百多年後，荷蘭人在雪蘭莪也建立了名字相同的烏特勒支碉堡來保護皇家山，因此無論是名字還是功能，都與台南的烏特勒支堡一樣。

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一七八四年七月占領瓜拉雪蘭莪的Kota Tanjung Keramat及Bukit Melawati之後，也從馬六甲搬來了許多的大砲。但荷蘭人在此只有短短不到一年，隔年一月，蘇丹依布拉欣便在姊夫老拿督彭阿瓦（Datuk Penggawa Permatang Mahabijaya Penggawa Tua）以及彭亨的阿都馬吉（Bendahara Abdul Majid）的協助下，在短短的一夜間便驅逐了荷蘭人。

物換星移，過去的煙硝味已經不復存在，現在的皇家山已是為人們帶來美好回憶的休憩景點。至今，若登上皇家山，還能夠見到相當多尊面向馬六甲

海峽及雪蘭莪河口的大砲。其中一尊上頭刻著荷蘭東印度公司「VOC」標誌的大砲，其砲口也有一圈花紋，唯這尊VOC大砲在製作的精緻度上仍遠不及檳城斯里蘭拜，也沒有任何的傳奇故事。

不過在這尊VOC砲的不遠處，有一座三位雪蘭莪蘇丹的王陵，王陵範圍內有一座被圍起來的亭子，這座亭子是專為一尊大砲而設，該砲以黃布覆蓋，皇氣十足。由於它被圍籬包圍，遊人只能遠觀，不得親近。究竟這尊大砲是否出自荷蘭東印度公司？我們不得而知。但根據本地馬來學者的研究，它是馬來王國製造的大砲。該大砲是在一九六一年在雪蘭莪河南邊的雙溪毛糯河（Sungai Buloh）河口被發現。它的出現，與一九六一年雪蘭莪新任蘇丹沙拉胡丁阿都阿茲沙（Sultan Salahuddin Abuld Aziz Shah）的加冕儀式有關。

當年，蘇丹沙拉胡丁打算在巴生的皇宮進行加冕儀式，皇宮原有六尊大砲，蘇丹因而要求貴族拿督彭阿瓦（Dato Penggawa）從皇家山將當地的大砲搬來，以湊足七尊大砲。當時皇家山的碉堡中共有三尊大砲，它們分別以三位雪蘭莪蘇丹的名字命名。它們之中，拿督彭阿瓦將當地其中一尊名為「蘇

霹靂
瓜拉雪蘭莪
雙溪毛糯河口
吉隆坡
雪 蘭 莪 河
Tanjong Keramat
往下游
Tanjung Keramat堡
(Utrecht堡)
Melawati堡
(Altingburg堡)
Bukit Selangor
皇家山
SUNGEI
0
200



6

7

圖6 瓜拉雪蘭莪地理環境

資料來源：白偉權繪，底圖取自 War Office.（1945）. Kuala Selangor（HIND 1073）. London: War Office.

圖7 三位蘇丹王陵中的馬來古砲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16年12月20日

丹伊布拉欣」(Sultan Ibrahim)的大砲移至巴生。這層關係是微妙的，畢竟在一七八五年協助蘇丹伊布拉欣重奪瓜拉雪蘭莪的，也正是拿督彭阿瓦。但就在搬移的前一天，瓜拉雪蘭莪發生巨響，導致該地區發生停電。他們前往現地一看，發現蘇丹伊布拉欣大砲前的大樹已經倒下，並呈現燒焦的痕跡。在驚訝之餘，他們仍按照蘇丹的指示，將此砲移往巴生。

在遷移之後，拿督彭阿瓦以及涉事的宮廷官員都患上了疾病，以致精神恍惚。在求助巫師之後獲知，這尊「蘇丹伊布拉欣」需要被遷返原處，否則的話，則必須尋找另一尊大砲去填補「蘇丹伊布拉欣」砲的空洞。然而在尚未獲得蘇丹及州議會的核准前，他們只能選擇後者。因此，在巫師的指示下，他們來到雪蘭莪河口南方十二公里處的雙溪毛糯河口去尋找另一尊大砲。當他們抵達現場時，果然發現河中有一尊大砲。神奇的是，他們將大砲搬上快艇之後，便立即風雲變色，快艇的引擎也隨之停擺。經過巫師的溝通，原來這尊砲並不想被帶到瓜拉雪蘭莪，它希望返回馬六甲的五嶼(Pulau Besar)，與另一尊大砲重聚。最終，在巫師的勸說下，它終於願意前往瓜拉雪蘭莪，快艇的引擎也

恢復運作。

在大砲搬移至皇家山後，人們將它安放在三位蘇丹陵墓的範圍內，這或許是與一位王陵守墓者三普伯（Pak Sampul）在同一時間的夢境有關，他夢見蘇丹陵墓內有三尊蓋著黃布的大砲，於是就成為我們今天所見到的這尊大砲了。這尊砲的方位坐北朝南，砲口面對著其來源地，南邊的雙溪毛糯河河口。大砲歸位後，拿督彭阿瓦的病也隨之康復了。另外根據三普伯的說法，這尊砲其實是有名字的，它名為「Petoi Boga」。這個名字來自武吉斯（Bugis）語，為白色公主之意，因此是女性（雌性）的大砲。此外，為了紀念這起事件的主角，他們也將 Petoi Boga 以拿督彭阿瓦命名，稱為「Meriam Penggawa」，意即「彭阿瓦砲」。

這尊大砲在一九七六年相傳也有自己爆炸的紀錄，該次爆炸據傳造成瓜拉雪蘭莪地區的警察局、消防局、郵局都能感受到明顯的震動，爆炸聲響連遠在適耕莊的居民都能聽見。由於大砲是瓜拉雪蘭莪的特色，從實體大砲的數量、大砲的傳奇性及神聖性，我們便不難理解為何現今瓜拉雪蘭莪縣的縣徽，

會選擇使用大砲的元素了。

古砲是常見於許多歷史觀光景點的擺設物，它很多時候是毫不起眼的，若不留意它的話，它只是一堆雞肋的廢鐵，供人摸一摸，拍拍照。然而，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期當中，大砲是重要且尖端的武器，它在帝國版圖的伸縮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無論是在海上或是陸地上，都能為人們提供保護。因此，大砲是帝國開疆拓土的重要工具，像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在馬六甲和雞籠一役，便是以絕對的火砲優勢將西班牙人趕走。在一些時候，它也是兩國結盟的結盟品，像是檳島的斯里蘭拜便是荷蘭與柔佛、亞齊與雪蘭莪的結盟物。由此可見，大砲對當時社會而言，具有一定程度的神聖性，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檳島

圖8 瓜拉雪蘭莪縣的縣徽。
資料來源：瓜拉雪蘭莪縣政府官網，https://kualaselangor.selangor.gov.my/kualaselangor.php/pages/view/62?mid=180.

的斯里蘭拜還是北海的大鎗公，抑或是瓜拉雪蘭莪王陵前的Petoi Boga，在民間論述中都有著神奇力量，並且個性十分擬人化，而它們的神跡可說是跨族群的，華人、馬來人甚至印度人都有他們各自的故事版本。

其實本篇所提及的這幾尊大砲只是冰山的一角，馬來西亞其他地區、印尼、泰國乃至東南亞各地，都有類似的古砲故事，像是印尼雅加達的葡萄牙大砲Si Jagur、泰國曼谷的北大年大砲Phaya Tani等，它們的背後都一樣有著大歷史下的民間傳說，等待我們去細細品味。

延伸閱讀

Coope, A. E.（1947）. "The Floating Cannon of Butterworth."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0（1）: 126-128.

Douglas, F. W.（1948）. "The Penang Cannon, Si Rambai."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1（1）: 117-118.

Gibson-Hill, C. A.（1953）. "Notes On the Old Cannon found in Malaya, And Known To Be Of Dutch Origin."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6（1）: 145-174.

Mohd Haidi Mohd Kasran, Rozeha Harun & Mohd Hairul Izwan Mohd Kasran.（2020）. "Meriam di Kota Melawati, Kuala Selang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Malay World and Civilisation* 8（2）: 19-24.

Payung Mahkota Dirgahayu Raja Melayu.（2011）. *Mesteri Meriam Penggawa Negeri Selangor-Penjaga Kerajaan Selangor*. Url: http://ku-alam.blogspot.com/2011/04/mesteri-meriam-penggawa-negeri-selangor.html.

Winstedt, R. O.（1934）. "A History of Selangor."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2（3）: 1-34.

Winstedt, R. O.（1992）. *A History of Johore, 1365-1941*. Kuala Lumpur: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華夷交融的拿督公信仰

走在馬來西亞的街道或是華人住宅區，經常能夠在街頭巷尾、住宅前、大樹下，抑或是大樓後方的角落見到類似台灣鄉間的小土地公廟。這些小土地公廟設計簡單，與其說它是小廟，倒不如說它是簡單的小神龕。它的屋頂沒有過於華麗的龍雕，較多的是像馬來西亞普通平房的那種倒「V」字型的屋頂。沒錯，它確實是為了供奉土地神而設的神龕。然而走近一看，裡面所供奉的神祇雖然看起來與我們一般所見的土地公相似，但在穿著打扮，甚至長相上，卻與我們熟知的土地公有些許出入。這尊神明便是馬來版的土地神——「拿督公」。

典型拿督公的長相與土地公幾乎相同，同樣是留著白色長鬍子的長者形

象，只是膚色略黑。穿著上，祂的帽子與土地公相似，但設計較為簡單，嚴格說來應該是馬來人或伊斯蘭教徒所戴的「宋谷」（songkok）。拿督公所穿的服裝也並非中式服裝，而是馬來人的上衣（baju）和圍幔——「沙郎」（sarong）。有別於土地公手上所拿的如意，祂所持的會是馬來短劍（kriss）。而拿督公手上的中國式金元寶以及拐杖，則與土地公所持的大致相同。是的，拿督公就是這樣一尊參雜著中國與南洋在地色彩的神祇。

什麼是拿督？

字面上，拿督公源於馬來語的 Datuk 或 Dato，❶為爺爺之意，馬來人會用以稱呼祖父以及尊稱男性長者。此外，拿督也是馬來貴族及領導階層中的一種尊稱，這些拿督的位階有高有低，高者可以是在整個馬來王國當中統領一整片封地的諸侯，❷低者可以是協助諸侯管理地方的基層領袖。因此若翻

❶ 兩者雖然發音一致，但是目前馬來西亞教科書的規範用字會傾向於使用 Datuk，但民間仍可見到 Dato 的用法。

❷ 例如霹靂一國（Perak）八大貴族當中的 Dato Sedika Raja 和 Dato Sagor。





圖1 華人聚落內的拿督公神龕。
資料來源：白偉權2018年10月13日攝於雪蘭莪新古毛新村。

圖2 土地公福德正神（左）與拿督公（右）。
說明：此照片拿督公左手所持的是紅旗，手持金元寶和拐杖的拿督公像可參見p. 161圖。
資料來源：白偉權2011年7月13日攝於雪蘭莪吉膽島。

開馬來歷史文獻，總是會見到許多的拿督。在十九世紀馬來半島華人大開發時期，前來維生的華人，便需要和這些拿督打交道，以承租農地、礦地及繳納稅收。

在現今，拿督也成為一種勳銜，擁有拿督頭銜的人，多半擁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在每年馬來西亞各州蘇丹華誕時，也會冊封勳銜予州內的有功人士，而拿督便是其中一個冊封的項目。當然，在拿督之上，還有拿督斯里（Datuk / Dato Sri）、丹斯里（Tan Sri）、敦（Tun）等等。拿督之下，也還有許多不同的名目。

在馬來西亞，拿督已是普遍可見的勳銜，這個傳統馬來封號已不僅限於馬來人，也有相當多的華人被封為拿督。有些州甚至可以透過捐錢予皇室而獲得拿督的封號，報章上也經常可見恭賀某某人獲得拿督勳銜的廣告。雖然現今的拿督可能已經有些氾濫，但從另一個角度而言，拿督已經深入民心，即使後來拿督的「含金量」已逐漸降低，但拿督在本地人心目中的長者或社會領袖形象，卻是未曾改變的。

本地華人用自己的語言把Datuk進行音譯詮釋，再將之文字化，並且後方加多一個華文固有詞——「公」以方便理解。在語言上，廣東話和福建話是馬來西亞最主要的兩大華人語系，在廣東語言方面，雖然廣府話和客家話有所不同，但他們在念馬來語datuk時，會將之詮釋為漢字的「拿督」（粵語：*naa*^{4}-*duk*^{1}；客語：*ná-dug`*）。而福建語系當中的閩南語和潮州話，則較常會將之詮釋為漢字的「藍卓」、「籃卓」（閩南語：*nâ-toh*；潮語：*nâ-toh*）、「那卓」（閩南語：*ná-toh*；潮語：*ná-toh*）、「藍督」（閩南語：*nâ-tok*；潮語：*nâ-tok*）或「拿卓」（閩南語：*ná-toh*；潮語：*ná-toh*）等等。或許是因為大眾傳播或是製造廠商的關係，廣東話為詮釋的漢字——「拿督」在馬來西亞較為常見，反觀「藍卓」較少，但若是我們見到「藍卓」的寫法，這就表示我們所在的地區多半是以福建人為主流了。❸像是在檳城、吉打、玻璃市以及霹靂北部的太平這些以福建人為主的地區，籃卓、那卓都是常見的拿督公寫法。

❸ Peter Kang (2014) "From Hokkien to Mandarin: the changing geography of written scripts for the deity of Na Tuk Kong among the Hokkien descendants of the Northern Malay Peninsula." *Journal of Taiwanese Vernacular* 6 (2): 58-85.

形形色色的拿督公

在形象上，拿督公的形式多樣，除了上述一開始所提及的馬來版土地公形象之外，我們也可以見到以馬來酋長與王公貴族形象的拿督公，他們戴著馬來傳統的布帽，如同馬幣上蘇丹所戴的帽子。有的兩邊甚至有持槍的護衛；有的則身穿皇室特有黃衣；有的則是馬來人的形象，但是卻如同佛教修行者一樣盤腿而坐；也有的拿督公穿著西裝大衣和西褲；有的旁邊則配有拿督婆，與中國傳統的土地公、土地婆概念一樣。

人們對於拿督公的配偶，有很多不同的稱呼，像是拿督奶奶或拿督娘娘。拿督婆在造型上通常戴著頭巾（tudung），以伊斯蘭教婦女的形象出現。根據筆者的田野觀察，南洋的拿督婆並非像中國的土地婆一樣有著傳統女性「不出廳堂」的特徵。本地的拿督婆有的地位頗高，有些公廟也會大肆慶祝拿督婆千秋寶誕（如柔佛州峇株巴轄海口的青龍宮），有的宮廟主神甚至就是拿督娘娘（雪蘭莪巴生吉膽島的拿督娘娘宮）。這樣的現象或許也對應了南洋土著女性地

位相對較高的傳統。❹

馬來西亞各地的拿督公也以很多種不同的形式被人們所塑造，除了塑像的之外，較常見的形式還有牌位式的。牌位一般多是以漆上紅色的木板配上金色的雕刻字體，寫上「拿督公」或「拿督公神位」等。有的也會在拿督公神位的中榜文字的兩旁刻上對聯，較常見到的是「拿管地方興旺；督理財源廣進」，充分展現了拿督公的神格職能。此外，有的牌位也會刻上拿

圖3 柔佛新山三善宮的拿督奶奶。
資料來源：白偉權2012年10月23日攝於柔佛州新山三善宮。

❹ 早年許多下南洋來的華商在不同地區娶了土著婦女，並將本身的生意交由土著太太管理，他們也與土著太太繁衍下一代，形成峇峇娘惹社群。

督公的人像圖形，取代文字的使用。另一種形式是以畫像或照片的形式，將拿督公畫像放進相框中，置於神龕內膜拜。但這種形式較少見，筆者在一次造訪霹靂州南部沿海市鎮——安順時，在當地普遍見到。

另一種較常見的形式是石塊或土堆型的拿督公，人們會將一些長相特殊的石頭，或是因為白蟻窩而形成的大土堆視為可能會有神靈的存在，特別是當這些自然物在人們的夢中或是生活中被認為有靈驗的事件，人們便會開始在石塊或土堆旁插香膜拜，有的也會用紅布、金花或是其他裝飾品裝點它們，若是這位拿督公持續靈驗的話，人們甚至會在現地蓋廟供奉。

總體而言，無論是塑像、牌位、畫像抑或是石頭、土堆型的拿督公，這些形式都與華人在原鄉供奉土地公的方式如出一轍，唯一不同的是，中國和南洋文化交融後所產生的拿督公，人們對他的想像可能更加豐富，或許是人在南洋地域的緣故，本地拿督公的受重視度也高於本地的土地公。

土地公與「代天巡狩」

拿督公的出現，顯然是中國傳統信仰文化和南洋馬來文化碰撞❺之後的結果。傳統上，華人便有土地崇拜的習慣，並將土地神具象化成為老者的形象。土地神掌管了農業社會的收成與自然環境的安定，是土地的管理者。華人來到馬來亞之後，無論是從事熱帶栽培業（香料、甘蜜、橡膠等的種植）還是採礦業，都與土地脫離不了關係，土地崇拜自然也隨之扎根南洋。然而在這片中華帝國之外的南洋異域，土地管理者自然不是傳統中國的身穿唐裝的土地公，估計孫悟空用金箍棒在此敲打地上所呼叫出來的也不會是祂們，而是馬來籍的土地管理者Datuk。Datuk無論是在字面意義上或是在馬來王國的角色（地方頭人）上，都與土地公一致。或許是如此，便催生了本地的拿督公信仰。

例如早年的華人礦場幾乎都會安奉拿督公，礦工們每天早晚均須膜拜拿督公，以保護工作安全，避免意外事件發生，同時期望藉由神力召喚大量錫苗。❻在現今馬來西亞的新村，特別是雪蘭莪，霹靂、森美蘭、彭亨一帶的新

❺ 在傳統馬來社會其實也有甲靈信仰，但在現代馬來社會進一步伊斯蘭化之後，這種傳統已逐漸消失。

❻ 馬來亞華人礦務總會編，《馬來西亞華人錫礦工業的發展與沒落》，怡保：馬來亞華人礦務總會，二〇〇二，頁九〇。

村，村中幾乎每條路的路口都設有拿督公的小神龕，像是筆者到訪的雪蘭莪新古毛新村便是如此，該新村面積大約零點二八平方公里，裡面擁有十四座拿督公神龕。

在雪蘭莪沿海的吉膽島和五條港漁村，幾乎家家戶戶門外都能找到拿督公神龕。此外，對於討海的漁民而言，不同海域也有它所屬的拿督公，人們也會在海中插上長長的竹製旗杆，表示拿督公的存在，有的則會在海上建立獨立的拿督公小廟用以祭祀。總體而言，拿督公已成為人們生活中的一部分，祂甚至取代了華人土地公的信仰功能。

雖然一般認知中的拿督公是以在地化土地公的形象出現在民間，但拿督公與中國傳統土地公最大的不同點在於拿督公有很強的個人特色，祂們許多都有名字，像是拿督哈山（Dato Hassan）、拿督阿里（Dato Ali）、拿督阿旺（Dato Awang）、拿督歐士曼（Dato Osman）等，神龕等處上有的會寫上祂們的名字。這種情形有點類似於台灣所能見到那些有名字的有應公或地基主。

事實上，馬來傳統社會當中其實早有聖人崇拜的傳統，一些地方長老、





圖4 雪蘭莪新古毛新村內的拿督公神龕。
資料來源：白偉權繪，底圖取自 openstreetmap.org.

圖5 海上的拿督公廟。
資料來源：白偉權 2014 年 11 月 5 日攝於雪蘭莪五條港漁村。

英雄或巫師，在過世之後由於持續被人們所緬懷，或是出現顯靈事件而被認為會保佑地方，被地方社群尊奉，稱之為Keramat或Dato Keramat（聖者）。❼因此也有一說認為正是因為華人來到馬來亞後，吸收了馬來人的Keramat信仰，而產生出拿督公崇拜。但無論如何，這種由人而成神的過程，與其說祂是土地公，但祂更像由幽魂升格成為能夠代天巡狩的王爺，只是在馬來西亞，有很多應該成為王爺的「人」最終在地化成為了拿督公而已。若從這個思路出發，便不難理解馬來西亞除了正港的馬來人拿督公之外，其他族群也具備了成為拿督公的潛能，而馬來西亞各地確實有這些案例。

先從正港的馬來人說起，在雪蘭莪沿海瓜拉冷岳縣的蚶山（Jugra，又稱蚶山）天寶宮，便供奉了拿督尊王。除了主祀拿督王之外，還供奉了祂的皇后、弟弟、義子等其他王室成員以及侍衛。這位拿督尊王正是十九世紀的第四任雪蘭莪王國的統治者——蘇丹阿都沙末（Sultan Abdul Samad）。蘇丹在位四十一年之久，由於華人認為蘇丹勤政愛民，因此蘇丹駕崩後，便被華人所供奉。拿督尊王的塑像甚至參照蘇丹的真實樣貌打造。由於這位拿督位階高至蘇丹，因

❼ 另外根據周福堂的研究，馬來人也會將一些大樹、石頭、猛獸（如鱷魚、老虎）等自然物視為是有靈性的Keramart來崇拜。見Cheu Hock Tong.（1996）*Malay Keramat, Chinese Worshippers : the Sinicization of Malay Keramats in Malaysia*.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Malay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 2.

此頗有名氣，雪蘭莪沿海一帶的拿督公有許多都是分靈自此。

再來是雪蘭莪武來岸（Broga）由原住民成神的石拿督公。據說在十九世紀華人南來時因為水土不服，全賴一位名叫石滿的原住民指點草藥良方，因而受人敬重。石滿晚年修行，後來也失蹤了一段時間，有幾位村民同時夢見石滿羽化成仙，並被玉帝冊封為「石拿督」。之後，人們發現石滿骨骸，後來便將他安葬並立廟祭拜。石拿督由此成為當地的地方神，石拿督公廟也成為武來岸地區的地方公廟。

華人成為拿督的情形也頗為常見，較著名的案例有霹靂太平馬登的蘇藍卓，蘇藍卓原名蘇正祥或蘇亞祥，是十九世紀中葉當地義興礦區的領袖，然而在一八六五年第二次拿律戰爭期間，蘇正祥因戰敗而在逃亡期間遭敵對陣營所擄獲，最終被處死。❽蘇氏死後顯靈成為河中巨鱷，人們在河邊為祂立廟為蘇藍卓。另一個華人拿督則是在霹靂與檳城交界處——巴里文打（Parit Puntar）的鄭藍卓，祂原名鄭亞文，是一名蔗園督工，無奈在一次火災中為救同僚而喪生。人們為感念祂而為祂立廟，尊奉祂為鄭藍卓或鄭伯公，成為現今的藍卓古

❽《大馬史下的古廟叢事》中，北海的「浮大鎖」便是蘇正祥所有。

廟。這間拿督公廟已成為地方居民的信仰中心，最終發展成地方大廟，連媽祖和三山國王都成為鄭藍卓的配祀神。該市鎮的一條大街也以祂為命名，為鄭伯公路（Jalan Teh Peh Kong）。

除了馬來人本身、原住民和華人之外，馬來西亞也有錫克人死後成為拿督的案例，馬來西亞著名反對黨領袖卡巴星（Karpal Singh）是十分受人愛戴的政治明星，名望甚高，無奈他於二〇一四年因車禍過世。三年後，霹靂安順（Teluk Intan）天峰宮的壇主兼乩童便決定請人製作塑像，供奉拿督卡巴星。拿督卡巴星成為最「年輕」的拿督，至於祂的「神力」如何？是否會持續壯大？則有待進一步觀察。在馬來西亞北部的檳城、吉打、玻璃市地區，當地因為靠近泰國，與泰裔居民雜處，因此也有泰國裔的拿督公。❾

從這個由人成神的角度而言，拿督公並不只是單純的土地公信仰，它內部其實也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性，一方面可以說祂類似華人原鄉的王爺信仰，另一方面又可說祂是吸收了馬來人的聖人信仰，可謂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但祂和土地公比起來，這種類似王爺型的拿督，應該分作兩個不同的信仰體系來理解。

❾ 見 Cheu Hock Tong. (1996). *Malay Keramat, Chinese Worshippers: the Sinicization of Malay Keramats in Malaysia*.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Malay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p. 25-26.

圖6 霹靂巴里文打新興港的鄭龍章。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19年9月13日。



祭祀方式、禁忌與異族想像

既然拿督公作為是馬來亞土地公的在地版，那麼祂的祭祀方式一定也有異於中國傳統的土地公。人們如何對待或祭祀異域神——拿督公？這是一個非常值得觀察的現象，因為華人在從未將其他族群提升至祭祀層面的時候，很多的對待方式都是一種文化創新，這個過程將能夠體現華人對於他族的想像。

在拿督公廟裡，除了祭拜用的香與土地公一樣之外，祭拜拿督公時還會使用甘文煙，它是一種小塊圓形中間凹進去的小香塊。泰國人及印度人在祭祀時幾乎都會使用甘文煙，馬來西亞和印尼的一些巫師也會使用甘文煙。在祭拜拿督公時，人們會將甘文煙放置在一個陶土製的矮腳小托盤上，點燃之後便會冒出很大的濃煙，人們便將此濃煙用來在神像和神龕內部來回熏放。

在其他貢品上，除了唐茶之外，人們大多會供奉咖啡、椰漿飯、馬來糕等馬來食物，相當具有南洋風情，估計台灣人在供奉土地公時，應該不會為祂提供咖啡和偏辣的食品。此外，人們也會將馬來菸絲、菸草、雪茄、檳榔，以

及吃檳榔所會搭配的石灰、荖葉放在盤子上，供拿督公享用。在拿督公的身上，經常也會見到印度花圈，這或許是華人把馬來人和印度人的習慣當做是劃一的南洋元素，而聯想在一起，也可能是因為印度人也經常祭拜拿督公，因此為華人所吸收才出現的結果。但無論如何，它已成為祭拜拿督公的其中一種貢品。

當然，若仔細觀察，拿督公的喜好會因為不同的地區而有所不同。在二○一九年筆者到檳城參加會議時，便在下榻的飯店附近見到一場拿督公祭祀儀式。該拿督公名叫「哈芝哈山」（Datuk Haji Hassan），被供奉在一家車行樓上，屬於私人供奉的拿督公。當天剛好是拿督公誕辰，車行老闆便將拿督公神像請下樓，現場也辦桌宴請了親朋戚友、同行前來用餐慶祝。老闆另一方面也邀請了暹羅傳統劇團到場在拿督公前演出，據一位在旁操辦拿督公請神儀式的法壇師傅表示，這位拿督公指明喜歡看暹羅戲，因此老闆每年都會邀請暹羅戲班前來演出。該暹羅戲班班主亞正先生也是居住在檳城州的泰裔，他們自稱「暹人」（*siãm-lâng*），該戲班也有華人成員。愛看暹羅戲的拿督公在一定程度上或許也是北馬地區與泰國長久以來保有密切關係的一種體現。

❖ 歷史小辭典

北部四邦與「暹人」

北部四邦指的是馬來半島北部深受暹羅（今泰國）影響的玻璃市、吉打、吉蘭丹和登嘉樓四州。這四個馬來古國長期以來是暹羅的藩屬，其統治者會定期向暹羅送上金花作為貢品，每當有王位紛爭時，他們也會尋求暹羅的仲裁。正因為政治上與暹羅密不可分，該地區也有不少暹羅人定居，形成暹羅社群。這些暹羅人保有本身的信仰文化及生活方式，幾乎無異於暹羅內地，他們世代居住在馬來西亞，如今已是馬來西亞公民，由於長期與本地馬來人和華人互動，因此也能口操馬來話和福建話。

一九〇九年，英國與暹羅簽署《曼谷條約》，北部四邦正式轉為英國屬地，並且與南部的柔佛合為另一個英殖民行政體系——「馬來屬邦」（俗稱「五州府」），馬來亞獨立後，它們便成為馬來亞聯合邦底下的州屬。現今，北部四邦仍然能見到許多的泰國寺廟及暹羅村。



圖7 愛看迦羅戲的馬來拿督公。
資料來源：白偉權2019年7月10日攝於檳城喬治市。

另一方面，祭拜拿督公也有需要遵守的禁忌，這些禁忌都與伊斯蘭生活方式有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不能供奉有豬肉的食品，一些廟宇也明文規定廟宇吃「白肉」者禁止進入。事實上，白肉所指的是豬肉，只是在馬來拿督公廟範圍內，避免使用「豬」字。此舉與在馬來人面前說「babi」（馬來語：豬），會被視為不尊重的概念一樣。生活溝通上，華人會以「*bah*」（福建話：肉）作為「babi」的代稱。這項禁忌主要是因為華人認為拿督公是伊斯蘭教徒的緣故，華人對此習慣相當敏感。因此，華人神明祭祀常見的燒肉、肥豬肉都無法在拿督公的供品中見到。說到伊斯蘭，我們也可以見到一些頭戴白色哈芝帽的拿督公，這或許是因為製作塑像者認為去過麥加朝聖的拿督公能夠更加靈驗吧。⑩

此外，在進入拿督公廟或是踏進拿督公神龕的範圍內，人們也會張貼告示要求參拜的信眾需要脫鞋，這能夠與馬來人傳統在家中以及進入回教堂祈禱時，都需要脫鞋洗腳的習慣相對應。在馬來西亞也可見到許多的拿督公神龕也會選擇漆上伊斯蘭的代表色——綠色，有的也會用伊斯蘭星星和新月來作為神龕屋頂的裝飾。

⑩ 前往麥加朝聖的人，能夠在其名字前冠上哈芝（Haji）的名號，且可以戴上白色的哈芝帽。

從拿督這些與眾不同的供奉方式來看，拿督在馬來西亞華人民間眾多神明中，是一個相當特殊的存在。這種特殊的對待其實也反映在華人對於拿督公的觀感上。拿督公雖然神格不高，但是人們對祂是既尊敬又害怕的。這種畏懼或許源於華人對於異文化那種未知和陌生的想像。比方說，大家看到千奇百怪的泰國神，所會出現的反應不外乎會有兩種，第一個是盡量遠離，第二是覺得祂們應該有著強大的神祕力量，能夠比傳統的正神還要靈驗。華人對於拿督公的觀感也與泰國神的例子類似（但或許不會像泰國神那麼顯著），認為拿督公在靈驗度方面，會超越土地公。

筆者所居住的地方樓下有間廟宇，拿督公是當中的配祀神，該拿督公據說在求財方面相當靈驗，甚至有印度人也因為拿督公的托夢而中了馬票，因而經常來祭拜。另外，筆者小時候，就曾經被母親告知，在路邊尿尿的時候，務必先口中默念：「借 *mie* 厠尿，借 *mie* 厠尿（粵語），閃啊（福建話）」深怕所尿中的樹、石頭中有拿督公的神靈。而拿督公也不能用手亂指，雖然其他神明按理也應是如此，但是卻被告知拿督公比較凶，最好不要招惹，若對拿督公不敬，

肚子痛等壞事將很可能應驗。此外也有傳言表示，山上的拿督公非常兇，進山工作的人需要特別留意，萬一得罪了山拿督，也將會生病。由此看來，人們對於未知的、陌生的事物總是會賦予無限的想像。

由於拿督公被認為較有靈力，因此馬來西亞華人請拿督公降乩的現象也是相當普遍的，不像台灣的土地公鮮少出現乩童。拿督公除了提供問事之外，也常提供醫療服務。像是柔佛麻坡的青面拿督，天天無休，每晚八時至十二時都提供看病服務。雪蘭莪武來岸的石拿督也是以治病著稱。有





9 | 8

圖8　拿督公廟外禁止白肉和入廟脫鞋的告示。
資料來源：白偉權2014年2月10日攝於麻坡青面拿督公廟。
圖9　拿督公神龕上的星星和新月。
資料來源：白偉權2020年1月25日攝於雪蘭莪蛤山天寶宮。

些廟宇的拿督公雖然並非是主祀神，但卻是降乩提供服務的主要神明，因此可見拿督公與信眾的關係相當密切。像是在雪蘭莪州加影（Kajang）主祀仙四師爺的師爺宮，拿督公誕也是該廟的大日子，每逢拿督公誕辰，廟方便會邀請拿督公降乩，信眾也會在這天齊聚一堂，為拿督公獻上生日賀禮，除了能見到前述提及雪茄、荖葉、檳榔之外，還能見到華人的紅雞蛋，甚至插有蠟燭的西式生日蛋糕。

在這位加影拿督公生日當天，筆者也人在現場，除了關注供桌上的生日貢品之外，筆者也關注拿督公降乩



圖10 加影師爺宮拿督公誕的生日貢品。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18年8月31日。

時所使用的語言。在吵雜的人群中，老拿督聲音顯得十分微弱，於是問了問在旁的理事，得知這位拿督公雖然是馬來人，但卻口操福建話，有趣的是，這間師爺宮原是以客家和廣府人為組成基礎的廟宇。因此，馬來、福建、客家、廣府四者元素的交雜，相映成趣。在加影附近的武來岸石拿督公廟，當地的原住民拿督公在降乩時，也不說馬來語，而是說當地盛行的惠州客家話。

拿督公無論是字面上、形式上或是神明本身的性質上，都展現了華夷元素的融合。而拿督公最初如何被發明，已經不得而知，但祂絕對是本地華人與馬來人共同「研發」的成果。拿督公的祭祀方式也在在顯示了華人對於異族文化的想像和對待方式，當然這套想像系統不必然是完全與事實對應，當中也有衝突的部分，例如華人雖然知道拿督公是穆斯林，但伊斯蘭教的教義是明確禁止偶像崇拜的，反觀許多拿督公不僅有塑像，還長年享有香火，與伊斯蘭教義形成極大的反差，華人選擇性不去處理拿督公與真神阿拉之間的關係，從這個角度來看，拿督公或許已被華人信眾陷於不義。不過在馬來西亞，即使國家有專責的主管機關（宗教局）管理國內的伊斯蘭教事務，但對於拿督公信仰，政

府並未有任何的限制。無論是否與伊斯蘭教義有所衝突，拿督公信仰畢竟是出自華人對本地民族的尊敬之心，也是華人精神上融入本土的最佳證明，在此大前提下，其他一切的細節，或許已經顯得不重要。

延伸閱讀

Cheu Hock Tong.（1992）. "The Datuk Kong Spirit Cult Movement in Penang: Being and Belonging in Multi-Ethnic Malaysia."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3（2）: 381-404.

Cheu Hock Tong.（1996）. *Malay Keramat, Chinese Worshippers: the Sinicization of Malay Keramats in Malaysia*.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Malay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eter Kang.（2014）. "From Hokkien to Mandarin? the changing geography of written scripts for the deity of Na Tuk Kong among the Hokkien descendants of the Northern Malay Peninsula." *Journal of Taiwanese Vernacular* 6（2）: 58-85.

Rivers, P. J.（2003）. "Keramat in Singapore in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76（2）: 93-119.

陳愛梅，〈淺析馬來西亞唐、番拿督公的史料和傳說〉，《八桂僑刊》第四期（二〇一八），頁一五—二三。

廖文輝、莊國民，〈試析馬來西亞華巫親善之事例：以馬六甲馬接新村為例〉，《八桂僑刊》第二期（二〇一六），頁四〇—四四。

貳、跨域的社會菁英

丹絨端：東南亞海洋及晚清歷史舞台中的「絕島」

在二〇一五年從吉隆坡驅車返回柔佛時，特地避開千篇一律的高速公路而選擇了一條沿海的舊路（聯邦道五號）南下，希望能夠欣賞沿途的風光。在上Google地圖查詢路線時，發現在森美蘭州波德申一帶有一塊森林保留地，而在此保留地當中，有個叫做「Cape Rachado」的燈塔，該地稱作「Tanjung Tuan」，相信Cape Rachado和Tanjung Tuan屬於同一個地方，只是語言的差異而已。Cape Rachado這個名字深深引起了我的興趣，相信這座燈塔應該是過去歐洲殖民者所留下的古跡吧，於是便將這個景點列入行程當中。

在將要抵達時，依路牌的指示向右往大海的方向駛入，我們逐漸抵達目

的地。在到達時，前面出現的一塊「森美蘭—馬六甲邊界」告示牌令我大吃一驚，不是至少還有二十公里才到馬六甲邊境嗎？怎麼告示牌告訴我這裡就是馬六甲了⁉原來，這個Cape Rachado雖然在森美蘭州境內，但卻為馬六甲所管轄，因此只要往前一走，就真的抵達馬六甲州境了。對於這種一個區塊內含有隸屬於他地的地區，地理學將之稱為「飛地」（enclave）。

走進這塊馬六甲飛地，經過一輪的爬坡森林步道，前面逐漸露出山頂的曙光，接下來映入眼簾的是一座典雅的白色燈塔，燈塔周邊面積不大，前方便是陡峭的懸崖。這個懸崖雖然險峻，但是眼前所見到的，是一片壯闊的馬六甲海峽。這個森美蘭州內的馬六甲祕境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原來這裡的中文叫做丹絨端，由於它不是一個熱門景點，因此報導不多，有的只是寫說這裡是觀鳥天堂、附近的海灘很漂亮，再不然就是說這裡有口歷史悠久的「荷蘭井」以及懷疑是馬六甲開國蘇丹拜里米蘇拉（Parameswara）的馬來聖人墓，這孤零零的燈塔和岬角已快被人遺忘。不過，若是使用「Cape Rachado」去延伸查詢的話那就不得了，葡萄牙—荷蘭海戰、馬六甲城、鄭和

航海、雪蘭莪王國等的大歷史開始一一浮現眼前，最後甚至連清末在北京朝中發起維新變法的康有為也與這個丹絨端有所關聯！究竟丹絨端在歷史上扮演什麼角色？康有為又與它有著什麼樣的關係？



圖1 丹絨端上的白色燈塔。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15年8月26日。

歷史小辭典

拜里米蘇拉與馬六甲王朝

馬六甲開國蘇丹，一三四四年出生於蘇門答臘巨港，為印度化古國「室利佛逝」（Srivijaya）的王子。在室利佛逝王國遭到爪哇的政權「滿者伯夷王國」（Majapahit）攻陷後，他們一族先流亡至廖內，後到淡馬錫（即新加坡）並自立為王。拜里米蘇拉後來還是不敵滿者伯夷王國的進犯，於是再往北輾轉逃至今天的馬六甲。

一四〇二年他在馬六甲一帶尋遊時，在當地森林中見到一頭聰明的鼠鹿將其獵犬踢入河中，於是認定此為吉兆，這裡應是復國的絕佳地點，於是便以他所倚靠休息的馬六甲樹為名，在此建立了強盛的「馬六甲王朝」。

馬六甲政權建立初期，拜里米蘇拉也曾到大明向明成祖朝貢，也獲明成祖冊封為馬六甲國王，並贈予詔書和印璽。馬六甲王國全盛時期時，其領土範圍涵蓋了馬來半島、廖內，以及蘇門答臘南部東岸一帶。在拜

里米蘇拉時代，馬六甲王國仍是一個印度化的國度，到了第二任蘇丹改宗伊斯蘭教之後，它才成為伊斯蘭教化的王國。馬六甲王朝共歷經十位統治者，最後於一五一一年為葡萄牙所占領。

地理學上的丹絨端

馬六甲飛地丹絨端自一九二一年便被馬六甲政府列為森林保留地，全區陸地面積約八十八公頃，其燈塔則座落在海拔九十四公尺的山崗上。❶孤寂的丹絨端能與眾多的大歷史扣連，其實與它本身先天上的地理DNA有關。

丹絨端位在森美蘭海岸的盧骨河與寧宜河出海口之間，「丹絨」音譯自馬來語Tanjung，是岬角之意。在馬新一帶，不乏這類「丹絨」的地名通名，像是柔佛笨珍的Tanjung Piai，麻坡的Tanjung Emas，馬六甲的Tanjung Bidara等。只要海岸有突出的地形，或是一些河流出海口的凸岸，都能夠找到「丹絨」的

❶ K. Mat-Salleh, R. Tami and A. Latiff. (2003).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Value Of Tanjung Tuan. The Myrtaceae-Dominated Coastal Forest Reserve Of Malaysia." *Journal of Tropical Forest Science* 15 (1): 59-73.

地名。一般而言，海岸地區在地質結構上，有著軟硬岩層的交替分布，經過海浪等媒介的侵蝕，軟岩部分容易被沖刷，而迅速後退，硬岩則消退速度較慢，可以歷久不衰。如此因為岩層結構的不同所造成的差異侵蝕，便容易出現突出的岬角。

丹絨端在地質上由花崗岩和石英岩山體所構成，❷這些堅硬的岩層搭配周邊的沼澤及沙岸，便雕琢出鶴立雞群的丹絨端。從地圖上看，丹絨端可說是馬來半島西岸最為突出的岬角。也因為此一地理上的DNA，使得丹絨端長久以來便是航海者航行時的重要地標，進而被繪入各個時代的航海圖當中。

❖田野小辭典

馬來化的中文地名通名

在馬來西亞經常能找到許多馬來化的中文地名通名。其中，較常被作為地名通名來使用的是與環境相關的地形名稱，特別是山丘、河流、

❷ K. Mat Salleh, R. Tami and A. Latiff. (2003)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Value Of Tanjung Tuan, The Myrtaceae-Dominated Coastal Forest Reserve Of Malaysia" *Journal of Tropical Forest Science* 15 (1): 59-73

岬角、海灣、渠道等。馬來人在此長期居住，許多地方早已出現馬來地名，後來到此的華人大多以音譯漢字來詮釋這些馬來地名。經過長時間的標準化，這些地名專名開始有了固定的寫法。像是河流 sungai，被寫作「雙溪」，地圖上簡寫為 Sg.；海灣 teluk 作「直落」，簡寫為 Tlk.；岬角 tanjung 作「丹絨」，簡寫為 Tj.；山丘 bukit 作「武吉」，簡寫為 bkt.；渠道 parit 作「巴力」，簡寫為 Pt.。這些通名與特定專名一同使用，因此可以見到雙溪大年（Sungai Petani）、雙溪毛糯（Sungai Buloh）；直落爪哇（Teluk Jawa）、直落吉蘭（Teluk Kerang）；丹絨比艾（Tanjung Piai）、丹絨馬林（Tanjung Malim）；武吉巴西（Bukit Pasir）、武吉公滿（Bukit Koman）；巴力峇九（Parit Bakar）、巴力蘇隆（Parit Sulong）等。這些通名多音譯自福建話。

大航海時代中的丹絨端

查過去的歷史記錄，丹絨端有很多不同的稱呼，而最為人所知的便是「Tanjung Tuan」以及「Cape Rachado」，前者為馬來文，後者為葡萄牙文。除此之外，阿拉伯人將之稱為「Madura」（岬角之意），❸中國人則稱之為「假五嶼」。然而這些都不是它最古老的名字，據考證，這裡的古地名是「Sang Ywang Ujong」或「Sang Hyang Hujung」，殖民時期的學者相信這是古代東南亞印度化時期的地名，而這個地名也出現在十四世紀的爪哇詩歌當中，為「神聖之角」的意思。在十五世紀初伊斯蘭文化傳入馬六甲之後，「Tanjung Tuhan」的名字才逐漸開始被人使用，它在字面意義上仍然與過去的印度化地名相同。不過隨著時間的演變，原來的Tuhan（音譯：都漢）已經簡化成了Tuan（音譯：端）。❹無論名字為何，唯一可以確定的是丹絨端自古以來便出現於各個不同族群的地理知識當中。

較早繪有丹絨端的是一五九五年荷蘭地圖學者林舒登（Linschoten）及巴魯

❸ J.V. Mills And J.V.G. Mills (1974). "Arab Abd Chinese Navigators in Malaysian Waters in About A.D. 1500"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47 (2) 1-82.

❹ Douglas, F. W. (1938) "Malay Place Names Of Hindu Origin"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6 (1): 150-152. Bremner, M. J. & C. O. Blagden. (1927) "Report of Governor Balthasar Bort on Malacca 1678"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5 (1): 1-232. Gullick, J. M (1949) "Sungei Ujong"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2 (2): 1-69.

達努斯（Paludanus）所繪製的東亞❺地圖，這個岬角以「C. Rachado」示人。綜觀當時馬來半島西海岸自吉打以南，也只有十二個地名，而Cape Rachado便是其中之一，足見它的重要性。葡牙人在一五一一年占領馬六甲之後，使成為本區域的霸主，因此Cape Rachado也源自葡萄牙語，字面上為斷裂岬角之意。❻

緊接下來則是葡萄牙籍地圖學者伊利狄亞（Emanuel Godinho de Eredia，一五六三—一六二三）於一六〇二年所繪製的馬六甲內陸圖，❼該圖除了以「Tanjon Tuan」標示之外，也標註了葡萄牙文「caboracsado」。圖中的丹絨端是周邊唯一的地標，也是全圖最為突出的岬角。一六五二年，法國地圖學者尼古拉斯・三遜（Nicolas Sanson）在其繪製的蘇門答臘、爪哇與婆羅洲地圖❽當中，也標上了「R. Rachado」。

另一名法國地圖學者貝爾林（Bellin）在一七五五年所繪製的馬來半島南部航海圖，❾則讓我們對當時的丹絨端有更具體的圖像，他的地圖除了描繪海洋各點位的深度之外，還標示了船隻的航行路線。我們可以見到一條虛線從丹絨

❺ Linschoten, Jan Huygen Van & Paludanus, Bernard. (1595). (*East Asia.*) *Exacta & accurata delineatio cum orarum maritimarum rum etiam locorum terrestrium que in regionibus China. Cauchinchina. Carte de Malacca & de China, & Isles de Sumatra, Java, Moluques, Manilles, & Japan.* Amsterdam. Chez Evert Cloppenburgh.

❻ Bremner, M. J. & C. O. Blagden. (1927). "Report of Governor Balthasar Bort on Malacca 1678."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5 (1) 1-232.

端南岸的河口（寧宜河）與馬六甲相連，這正是寧宜內陸雙溪烏絨地區出產金礦、錫礦的貿易路線。此外，這張地圖也繪製了丹絨端的立面素描，以供航海者辨認地標之用。丹絨端無疑成為探險者人們駛入寧宜的指引。

除了上述提及的歐洲人之外，中國作為大航海時代國際村的一員，丹絨端也出現於中國的典籍之中。在明朝茅元儀所編的《武備志》叢書中便收錄了一幅《鄭和航海圖》。明朝時期的丹絨端以「假五嶼」被中國人所認知。在「假五嶼」的下一個地標，便是滿剌加（馬六甲）的官廠，因此可以得知當船隊在經過假五嶼之後，船員們便需要整裝駛入馬六甲了。考查《鄭和航海圖》的繪製時間大約是在十五世紀初，可算是現有最早出現丹絨端這個地標的中國典籍了。

作為馬六甲海峽這個繁忙國際水道上的重要地標，丹絨端當然不只是出現在地圖當中，它也是一些重大歷史事件的見證者。在一六〇六年八月十六日至十八日，葡萄牙與荷蘭東印度公司兩大海上強權便在丹絨端岸外爆發大規模的海戰。這場戰役掀開了荷蘭與葡萄牙接下來爭奪馬六甲的序幕，雖然戰爭的

❼ Godinho de Eredia, Manuel (1602) *Nova tavoa geographica da tera do sertam de Malaca.*

❽ Nicolas Sanson (1652) *Les Isles De La Sonde entre lesquelles sont Sumatra, Iave, Borneo,* &c. Paris N. Sanson

❾ Bellin, Jacques Nicolas (1755) *Carte Reduite des Detroits de Malaca, Sincapour, et du Gouverneur* Paris Chez M Bellin.





4 2
5 3

圖2 1595年的「C. Rachado」。
資料來源：白偉權翻拍自 Linschoten, Jan Huygen Van & Paludanus, Bernard.（1595）.（*East Asia.*）*Exacta & accurata delineatio cum orarum maritimarum rum etiam locorum terrestrium que in regionibus China, Cauchinchina. Carte de Malacca & de China, & Isles de Sumatra, Java, Moluques, Manilles, & Japan.* Amsterdam: Chez Evert Cloppenburgh.

圖3 1602年的「Tanjon Tuan au. caboraesado」。
資料來源：白偉權翻拍自 Godinho de Eredia, Manuel.（1602）.*Nova tavoa geographica da tera do sertam de Malaca.*

圖4 1652年的「R. Rachado」。
資料來源：白偉權翻拍自 Nicolas Sanson.（1652）. *Les Isles De La Sonde entre lesquelles sont Sumatra, Jave, Borneo, &c.* Paris: N. Sanson.

圖5 1755年「Cap Rachade」與馬六甲城的航路圖。
資料來源：白偉權翻拍自 Bellin, Jacques Nicolas,.（1755）. *Carte Reduite des Detroits de Malaca, Sincapour, et du Gouverneur.* Paris: Chez M. Belin.

最後荷蘭不敵葡萄牙，但卻也促成柔佛王國、亞齊王國與荷蘭的合作，最終在三十五年後的一六四一年，將葡萄牙逐出馬六甲。

除了凶險的海戰之外，丹絨端也有美好的一面。一六六三年十一月，荷蘭籍的沃爾特．舒頓（Wouter Schouten）醫生便在其《東印度紀行》（*Oost-Indische voyagie*）一書記載到：「傍晚從馬六甲出發前往孟加拉時，船隻出航沒多久就遇上風暴，於是先在馬六甲岸外附近拋錨。破曉之後，天氣變得可愛（lovely）。陽光及溫和的天空，伴隨著微風，我們終究起航，經過翠綠的Cape Ressados岩石山崗……」❿

回顧過去，無論是航海圖，歷史事件，抑或是古人的遊記，總是少不了丹絨端的身影。丹絨端之所以重要，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馬六甲這個當時的國際大都會。它是船隻航行進入馬六甲前的地標，而根據《馬來紀年》的記載，這一帶其實是受到馬六甲王朝所管轄。到了葡屬馬六甲時代，荷蘭東印度公司也曾經在丹絨端設立要塞，作為監視過往船隻和觀察馬六甲葡萄人動向的據點。⓫進入荷蘭時代之後，荷屬馬六甲至少在一六七八年便將丹絨端至北部的

❿ Merewether, E. M (1891) "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The Dindings From The 17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Time." *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3: 35-47

⓫ Peter Borschberg (2010) *The Singapore and Melaka Straits: Violence, Security and Diplomacy in the 17th Century*. Singapore: NUS Press. p.173-176

⓬ Verhoeven, F.R.J. (1964) "The Lost Archives of Dutch Malacca 1641-1824."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37 (2): 11-27





6
7

圖6 15世紀初《鄭和航海圖》中的「假五嶼」。
資料來源：白偉權翻拍自 W. Z. Mulder. (1942). The "Wu Pei Chih" Charts. *T'oung Pao*, 37(1), 1–14. http://www.jstor.org/stable/4527221.

圖7 1606年丹絨端岸外的葡萄牙——荷蘭大海戰。
資料來源：荷蘭國立博物館，https://www.rijksmuseum.nl/en/collection/RP-P-OB-75.448 (Public Domain).

巴生一帶，納入其管轄範圍。⓬

雖然如此，筆者也發現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丹絨端的管理歸屬是十分模糊且不斷變動的。除了葡萄牙、荷蘭等海上強權之外，也可以見到這裡時而由森美蘭的米南加保勢力所轄，時而又落入雪蘭莪的武吉斯人之手。到了英屬馬六甲時期，英國人於一八六〇年代獲得雪蘭莪統治者的同意，並在此建立燈塔，並沿用至今，這也是現有比較可靠的記錄中，丹絨端出現燈塔的時間。到了十九世紀末英國全面控制馬來亞之後，這裡才比較明確地由海峽殖民地⓭中的馬六甲所轄。⓮

無論丹絨端的管轄權何時正式歸入馬六甲，但可以確定的是，丹絨端的命運與一百多公里外的馬六甲緊密相連，馬六甲賦予了丹絨端存在的意義。在丹絨端正式隸屬於海峽殖民地之後的幾年裡，四千四百公里外的北京正陷入世紀亂局，進而迎來一位當時華人家喻戶曉的重要人物，他就是康有為。

⓭海峽殖民地政府下轄新加坡、馬六甲、檳城，首府設在新加坡。

⓮在一九二八年的地形圖之中，該處開始出現「馬六甲屬地」(Malacca Territory)的註記。

康有為與「絕島」丹將敦

康有為是晚清時期影響中國歷史發展進路的重要人物，他的發跡始於一八九五年，當時清朝和日本簽署關係到台灣命運的《馬關條約》。這一喪權辱國的消息傳至北京之後，一群以康有為為首的知識分子隨即聯名上書光緒皇帝（史稱「公車上書」），開啟了往後清帝國一系列的政治改革鬥爭。隨後，康氏也獲得朝廷重用，發起戊戌變法。無奈，這個維新變法只持續了百日便因為慈禧發動宮廷政變而以失敗告終。雖然如此，但康有為已成為當時中國維新派的代表人物。

在保守派的報復行動下，康有為唯有逃離中國，展開海外流亡生活。他最後受到新加坡富商邱菽園之邀而於一九〇〇年二月流亡至新加坡。無奈時為新聞人物的他，所到之處都被記者「肉搜起底」。由於當時盛傳刺客緊追康有為的腳步，南來欲刺殺康有為，刺康傳聞鬧得滿城風雨，一時造成草木皆兵，風聲鶴唳。為了保護康有為，時任海峽殖民地代理總督的瑞天咸於是撮康有為

物色了一個絕佳的躲藏地點，那便是懸孤半島海岸的丹絨端了。相信康有為是第一個，可能也是唯一一個與這裡有所連結的中國名人。丹絨端也因為康有為的關係，從東南亞海洋史正式「connect」至晚清的中國史。



圖8 曾寓居丹將敦的康有為。
資料來源：美國國會圖書館，https://www.loc.gov/resource/cph.3a36142/.（No known restrictions on publication.）

一九〇九年七月，康有為在總督瑞天咸的安排下，來到丹絨端，同行的還有二太梁隨覺、妾室婉絡、弟子梁鐵軍和僕人吳積仁。康有為將這裡稱作「丹將敦」這應該是源自康有為用廣東南海家鄉話詮釋「Tanjung Tuan」而來。在粵語音譯當中，「丹將」幾乎與馬來語的「Tanjung」吻合。長久以來，學界對於這個丹將敦多有誤解，認為是新加坡岸外的一個島嶼。⓯這個誤解或許源於康有為用了另一個更具文學性的名詞來指稱這裡，那就是「絕島」。對於維新失敗流亡海外的康有為而言，為了躲避刺客的追殺，而乘船來到這個與世隔絕，鳥無人煙的海崖，在此遙想故國，確實無異於身處「絕島」。

康有為在丹將敦停留的時間不長，僅僅兩週，但所留下的紀錄卻不少，現有能夠找到他與丹將敦相關的文字記錄便有三封家書以及六首詩作，分別為：《上母親書》（一九〇〇年八月二日）、《上母親書》（一九〇〇年八月十一日）、《與同薇書》（一九〇〇年八月十一日），以及詩作《七月，偕鐵君及家人從者居丹將敦燈塔》、《丹島多奇石，拾得百餘枚以壓歸裝，鐵老亦相與拾石自遣》、《攜婉絡坐石上口占》、《丹將敦島古木甚嶙峋，題詩其上》、《偕婉

⓯ 王慷鼎，〈康有為南遊詩中「丹將敦島」考〉，《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學刊》第一期（一九九七），頁一三三—一四五。

絡竟日下山拾石弄水，晚歸上山小憩松下》、《七月朔，入丹將敦島，居半月而行，愛其風景，與鐵君臨行回望不忍去。然聯軍鐵艦，日繞島入中國見之憂驚，示鐵老》。從這些紀錄讓我們可以得知康有為兩週以來在丹將敦的生活點滴。

根據這些紀錄，在兩週的絕島生活當中，康有為便是住在燈塔之上。總督每週會派遣船隻來送信，以讓康有為獲知外界的消息。在其他的時間，康有為基本上都是看看風景、踏青、撿撿石子和枯木、投石自娛，以及寫詩，日子算是平淡。例如康有為在《丹島多奇石，拾得百餘枚，以壓歸裝，鐵老亦相與拾石自遣》中提到：

袖中滄海帶歸來，割取雲霞錦一堆。
丹島壓舟無異物，行裝怪石百餘枚。
皚皚白塔壓丹宵，大海濤頭起怒潮。
日日崖濱來撿石，秋風吹浪聽蕭蕭。

丹將敦的生活雖然不如其他大城市，但對於剛剛遠離是非之地的康有為而言，能悠然自若的行走，不需要擔心刺客的追殺，已是一大樂事，一連數月的憂煩得以暫時消停。因此可以見到他在向母親報平安的《上母親書》（一九〇〇年八月二日）中，便表示這裡「……山海佳勝，每日弄水看雲，身體極好，今年僅得此樂，真可愈頭風忘憂患也……然男今年以數日來最樂……」

康有為在丹將敦的生活雖然愜意，且「今年以數日來最樂」，但作為流亡者的他，仍然情牽故國，從一些他在丹將敦所作的詩句，不時流露出一絲流亡者的無奈。[16]像是在與妾室婉絡坐在石頭上賞月時有感而發的《携婉絡坐石上口占》詩句中，便提到：

半輪新月上微明，浩浩風聲挾浪聲。
偶作瀛洲仙眷屬，不堪回首望神京。

[16] 高嘉謙，〈詩、帝國與孔教的流亡——康有為的南洋憂患〉，收於氏著，《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台北：聯經，二〇一六，頁三四九—三九一。

總體而言，康有為是相當滿意丹將敦生活的，不過原先預計將在這裡生活三週，但到了第二週，總督便提前從新加坡前往馬六甲，然後到此將康有為一行人接到下一個地點——檳城了。臨行前，康有為看來十分不捨，還回首凝望丹將敦不忍離去，於是便作了一首《七月朔，入丹將敦島，居半月而行，愛其風景，與鐵君臨行回望不忍去。然聯軍鐵艦，日繞島入中國見之憂驚，示鐵老》，為自己兩週的丹將敦生活做出總結：

> 丹將敦島住半月，弄水聽潮憶舊蹤。
> 海浪碧藍分五色，天雲樓塔聳高峰。
> 風號萬木驚吟狖，濤涌崩崖嘯臥龍。
> 隱几愁看征艦過，中原一線隔芙蓉。

森美蘭境內這個面積僅八八公頃的馬六甲飛地丹絨端，其面積雖小，但

它在東南亞海洋歷史的大舞台上從不缺席。丹絨端憑著其地理DNA加上臨近馬六甲的區位因素，而在數百年來以不同的名稱出現在各國地理學家的航海圖上，與其他少數幾個地名一同並列於馬來半島的西岸。除了作為航海者的地標之外，它也見證了百年來馬六甲、葡萄牙、荷蘭、英國、柔佛、亞齊等海上強權的消長。到了二十世紀初，這裡也因為康有為避居，而連結至晚清的歷史，為其原來的大航海意象注入了些許中國色彩。如今，荷——葡海戰的硝煙、康有為與婉絡撿石的身影早已灰飛煙滅，康有為所居住的「皚皚白塔」⑰依舊矗立於丹絨端海崖之上，在「浩浩風聲」⑱之中，俯瞰馬六甲海峽上的過往船隻，繼續迎接下一個百年。

延伸閱讀

Peter Borschberg.（2010）. *The Singapore and Melaka Straits Violence, Security and Diplomacy in the 17th Century*. Singapore: NUS Press.

⑰ 出自康有為的〈丹島多奇石，拾得百餘枚以壓歸裝，鐵老亦相與拾石自遣〉。

⑱ 出自康有為的〈與婉絡坐石上口占〉。

高嘉謙，《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台北：聯經，二〇一六。
張克宏，《亡命天南的歲月：康有爲在新馬》，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二〇〇六。

畢麒麟：從台灣實習生到南洋大佬

在新加坡和檳城的老市區，分別有三條豎立著 Pickering Street、Upper Pickering Street 以及 Lebuh Dowing（Downing St.）的路牌，三者看似毫不相干，但在華人民間意義上卻都指涉著同一個人物，那就是畢麒麟，一位對於新馬早期華人社會影響甚巨的人物。

畢麒麟雖然落在新馬，但相信熟知台灣史的人大多都不會對這個名字感到陌生。這位英國人曾在一八六〇至七〇年代這段期間參與了台灣納入世界體系初期的大歷史。畢麒麟最初任職於打狗（高雄）海關，後來擔任英商天利行（Messrs. McPhail & Co.）和怡記洋行（Elles & Co.）的職員，協助英商收購台

灣的樟腦。在一八六七年羅妹號事件發生之後，畢麒麟也隨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越過番界，前往琅嶠地區與斯卡羅人協調此事件。畢麒麟晚年時，也撰寫了一本記述他在台灣時期的回憶錄——*Pioneering in Formosa: Recollections of Adventures Among Mandarins, Wreckers, & Head-Hunting Savages*，這本書的中譯本《歷險福爾摩沙：回憶在滿大人、海賊與「獵頭番」間的激盪歲月》在二〇一



圖1 新加坡的畢麒麟街上段路牌。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17年7月16日。

〇年時也由台灣前衛出版社出版。

然而，對畢麒麟本人而言，台灣七年的光陰只是他人生中的起跑點，馬來亞（含新加坡）才是他人生的主戰場，他離開台灣以後，便前往新馬地區服務長達二十年。在這二十年間，他成為英殖民政府在英屬馬來亞管理華人事務的最高決策者，對於新馬華人社會歷史發展影響深遠。他甚至也是英殖民勢力全面深入馬來半島的參與者之一。因此畢麒麟對於新馬歷史而言，遠大於他在台灣史上的地位。因此「畢麒麟」至今已成為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歷史教科書中必然會出現的名詞。究竟台灣如何成為畢麒麟人生的練習場，離開台灣之後，他在馬新地區又有什麼際遇？對馬新地區帶來哪些影響？

畢麒麟與福爾摩沙

畢麒麟生於一八四〇年，打從十六歲時，他便成為海員，展開了海上生活，

他隨船隊在緬甸、暹羅、馬來群島以及中國一帶的商港活動。歷經六年的航海生活，他在二十二歲時，有機會在福州任職於由英國人所管理的海關，並學習當地方言以及官話（Mandarin）。一八六〇年《北京條約》簽訂後，清廷加開雞籠和打狗兩地作為淡水和安平的外港。一八六三年，清廷頒布暫行章程，打狗正式開港。在此大背景之下，也因為他的語言天賦，因此在一八六三年被台灣海關專員麥士威先生（Mr. Maxwell）相中，邀請他前往台灣協助南部（打狗）海關的設立工作。畢麒麟就此與台灣結緣。

根據畢麒麟的自述，他到了台灣後，也開始學習閩南話，直到精通閩南語之後，他於一八六五年被調任至安平海關，並逐漸結識許多的中國官員。兩年後，（一八六七），畢麒麟受到英國洋行——天利行的賞識，受到僱傭。無奈，天利行在該年發生捲款風波而被拍賣行拍賣，而另一家洋行怡記洋行（Messrs. Elles & Co.）成功將它收購，因此剛入職的畢麒麟再次轉換新東家。

與此同時，一八六七年，發生了美國商船羅妹號在屏東外海觸礁沉沒，棄船登岸的船員全數遭到斯卡羅人殺害，史稱羅妹號事件。事後，美國駐廈門領

事李仙得隨即來台尋找失蹤的船員，此事件也開啟了畢麒麟在台灣的另一段旅程。他擔任李仙得的通譯，前往當時仍屬於番界的屏東琅璠地區。兩人奔走各社去調查與協調事件，最終也直接參與了李仙得與斯卡羅大頭目卓杞篤（Tok-e-tok）所簽訂的《南岬之盟》。此一過程不僅記錄在畢麒麟晚年的回憶錄，也在二〇一六年被陳耀昌作為寫作題材，寫成《傀儡花》這部歷史小說。二〇二一年，更被公視拍成十二集的史詩劇《斯卡羅》。

無論是擔任海關稅務司還是洋行代理人，畢麒麟在台灣的生活都與樟腦密不可分，打從他擔任稅務司起，他便已經開始在台灣大量收購樟腦，期間也與清朝官方有過多次的衝突。到了一八六八年，在台英國商行與清廷的緊張關係進一步加劇，德記洋行（Tait & Co.）和畢麒麟所任職的怡記洋行陸續發生樟腦遭到沒收，甚至發生英人與清兵武裝衝突的事件。畢麒麟也不例外，他為了收回被清廷所沒收的樟腦，而在前往和官員交涉的途中，遭到清兵襲擊負傷。

總體而言，畢麒麟在台灣的生活是充滿挑戰的，到了一八七〇年，畢麒麟因為發燒以及感染了痢疾，因此告假一年返回英國老家休養。在英國期間，

畢麒麟結識了時任海峽殖民地總督的沃德（Sir Harry St George Ord，任期：一八六七—一八七三），從此改變了他的命運，也預示著他的台灣生活畫下休止符。

畢麒麟在台灣雖然僅僅七年，但這裡卻是他人生經驗的試煉場，畢麒麟在台灣不僅習得閩南語，還在擔任稅務司、洋行職員以及處理羅妹號事件擔任通譯時期，培養出能夠利用本身的語言天分，而穿梭於華、洋、原住民之間，運籌帷幄的本事。另一方面，沃德總督所治理的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新加坡、檳城、馬六甲），算是本區域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當地在人口上又以閩粵地區的華人移民為大宗。特別是福建人（閩南人），他們又是其中的優勢族



圖2 29歲（1869年）離開台灣前的畢麒麟。
資料來源：白偉權翻拍自 Pickering W. A.（1869）. *Pioneering in Formosa: Recollections of Adventures Among Mandarins, Wreckers, & Head Hunting Savages*. London: Hurst & Blackett. p. 233.

群。當時的海峽殖民地社會浮動，華人會黨林立，其紛亂程度與清代台灣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如何與華人共處，如何治理華人社會，一直是英殖民政府關心的重大議題。因此畢麒麟的才華備受賞識，很快被當成知華派，而被延攬到海峽殖民地去。當時的畢麒麟，正值而立之年。

通譯員與「救火」專員

一八七二年，畢麒麟正式抵達新加坡，在法庭擔任通譯員，成為當時海峽殖民地唯一通曉中文的英籍官員。當時的海峽殖民地及馬來半島正值多事之秋，馬來半島從北到南的礦區像是拿律、雪蘭莪、雙溪烏絨都陸續因為礦區紛爭，而造成不同陣營華人之間的戰爭，死傷慘重。由於戰禍不斷延燒，也造成了海峽殖民地的紛亂。到了一八七三年，甚至有二百四十八名海峽殖民地商人聯署要求英殖民政府介入這些紛爭。

在此背景之下，新任海峽殖民地總督克拉克（Sir Andrew Clarke，任期：一八七三－一八七五）便委派精通福建話的畢麒麟首先前往霹靂的拿律去處理兩派華人的問題。畢麒麟在一八七四年一月三日抵達檳城，四日開始與海山——大伯公會、和合社——義興兩大陣營的華人領袖交涉，最終促成大英帝國與霹靂王國《邦咯條約》（*Pangkor Engagement*）的簽訂。在《邦咯條約》之外，還有一個由兩造華人領袖（共二十七人）與英國簽訂的《邦咯副約》，代表英政府進行簽字的就是海



圖3 在拿律地區進行營救行動的（左起）端洛甫、畢麒麟和史必迪。
說明：此速寫是於1874年2月2日由同行的瑞天咸所繪。瑞天咸也是未來的馬來聯邦總參政司、海峽殖民地總督。
資料來源：白偉權翻拍自 Swettenham, A. Frank.（1975）. *Sir Frank Swettenham's Malayan Journals, 1874-1876*. Kuala Lumpur,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48.

峽殖民地輔政司（Colonial Secretary of S.S）蘭德（H. L. Randell）以及畢麒麟。

《邦咯條約》的簽訂對於馬來亞歷史而言有著標誌性的意義，它成為英國勢力全面伸入馬來半島各個土邦的起點。隨後，雪蘭莪、森美蘭、彭亨等邦也陸續以相同的方式成為英國的殖民保護邦。在條約簽訂之後，畢麒麟也受委派，與端洛浦（Samuel Dunlop）、瑞天咸，及人在當地的史必迪上尉（Captain Speedy）一同處理拿律後續的維和任務。畢麒麟在這事件上居功不小，他也在過程中更加了解馬來亞華人的特性。

❖ 歷史小辭典

邦咯條約

由於拿律的礦區衝突一發不可收拾，對於周邊英殖民城市的經濟與治安已造成嚴重衝擊。一八七三年開始，英國人一方面以武力及遊說的方式平息義興、海山雙方糾紛，另一方面則著手處理霹靂州蘇丹繼承權

問題。一八七四年一月二十日，在英國的安排下，海峽殖民地總督克拉克偕同兩派霹靂統治階層的要員，以及拿律兩大華人陣營的領袖在霹靂邦咯島（**Pulau Pangkor**）岸外進行談判，並簽署《邦咯條約》。

《邦咯條約》的簽訂意味著拿律武裝衝突的結束，此條約雖然是英國和霹靂之間的定約，但它卻可被視為是馬來亞歷史發展上的新里程碑，自此以後，英國改變其不干預政策，開始將勢力從原本的海峽殖民地擴展至馬來半島。

在整個一八七〇年代，隨著華人人口漸多，殖民地所面對來自華人的問題也日漸嚴峻，會黨紛爭、人口販賣、娼妓、賭博等給殖民統治者帶來很大的挑戰。於是，政府在一八七七年做了一個相當創新的安排，即設立一個專門管理華人事務的單位——華民護衛司署（Protectorate of Chinese）。而受委任為第一任華民護衛司（華民護衛司是單位名，也是官職名）者，便是畢麒麟。

畢麒麟可說是一名學者型的殖民地官員，打從他來到新加坡開始，便一直關注華人社會的深層結構，並且深入會黨組織進行人類學式的資料收集和調查，這種做法與他在台灣時，深入府城以外的地方，對生番、熟番、客家、福佬人進行調查的方式如出一轍。為了了解華人會黨組織，畢麒麟也曾實地走訪會黨的堂口，觀看入會儀式，他自己甚至也加入義興，成為華人會黨的一員！他也曾在一八七八年六月在新加坡皇家亞洲學會海峽殖民分會（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的會議中發表了〈華人祕密會社及其起源〉（“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and Their Origin）的文章。❶隔年再度在同樣地方發表第二部分有關新馬地區會黨組織運作的文章。畢麒麟擔任華民護衛司長達十二年（一八七七－一八八九），後續英殖民政府在新馬地區所出台的理華政策，都與畢麒麟脫離不了關係。

❶ 這篇文章成為後人了解十九世紀海峽殖民地華人會黨的必讀材料。

畢麒麟的理華政策

擔任華民護衛司的畢麒麟，其最大的KPI便是如何為英殖民政府治理好紛亂的海峽殖民地華人社會。對此，畢麒麟發現馬新地區華人結社之風普遍，會黨林立，他早在一八七六年便在《海峽觀察報》(*The Straits Observer*)指出，海峽殖民地三地的礦工、船工、手工業者、農業經營者以及一些不良分子，幾乎都是會黨的成員。而海峽殖民地和其他馬來土邦的華人，更有高達百分之六十具有會黨身分，因此幾乎可以這麼說，會黨是華人社會的基本組成單位。台灣雖有洪門組織，但由於台灣在清廷治下，因此活動或許未像馬新地區般的公開，因此，馬新華人社會可謂是台灣類似情況的放大版，故若要治理華人社會，便得要妥善處理好會黨的問題。

❖ 歷史小辭典

會黨

會黨也稱為「祕密會社」或「私會黨」，係一個具有共同目標或利益的人群所組成的祕密組織，它與普通社會的社會組織是相對的概念，因此這類組織經常被冠上「私」或「祕密」的名稱。私會黨的運作擁有一套明確且高度規範性的準則、祕密儀式和誓詞，這些準則、儀式、誓詞、各種禮儀的主觀目的是要責令會員對群體事務保密，它也蘊含著各式各樣的制約機能，相當具有組織性。因此無論外界對其存在的了解多麼透徹，它始終是一個祕密會社。

南洋的祕密會社主要源自明末清初的反清復明組織——「天地會」或「洪門會」，這些反清人士為了逃離清廷的統治而紛紛移往海外（包括台灣），其中，南洋擁有數量龐大的天地會組織成員。經過時間的推移，天地會分裂成許多不同的分支，其中「義興」和「海山」是本地區最常見的

會黨組織。晚期，它們幾乎都已成為以牟利為主要目的的經濟團體，原初的反清色彩已經淡化。

對於華人會黨的治理，殖民政府打算採取嚴厲打擊的手段，對此，政府曾試圖推動維護治安法（*Preservation of The Peace Act*），並在法令下將公司認定為危險組織，然後再動用警察制度對這些公司的首領進行調查。但此一作法並不被畢麒麟所認同，他根據過去的經驗，認為拿律的華人會黨組織曾經炸毀馬來封地主的官邸、殺死馬來巡捕，因此鎮壓將會帶來反抗，導致動亂。畢麒麟也借鑑了中國的經驗，提到傳統中國社會之中，有著一套從上而下的社會控制體系，例如中國城鎮內每一條街都由一名「地保」（*ti-po*）所管理，地保向縣令（District Magistrate）負責，對下治理地方的秩序，中國便是透過這個方式得到安定的。由於畢麒麟的中國經驗主要源自台灣，「地保」也是清代台灣的地方治理人員，而他所提及的發音 *ti-po* 也是以閩南語發音，因此他所指的傳統中國，極大可能是指台灣。若此說成立的話，台灣經驗對於畢麒麟的治華哲

學，便有著很深的影響。

由於畢麒麟認為會黨是華人移民生活中的一部分，因此不建議強行打壓，而應該採取登記的方式讓其註冊，以讓會黨在政府的掌控之中。他也提出實施甲必丹制度，委任可信賴且有影響力的華人領袖作為政府的代理人，治理華人社會，他認為荷蘭、葡萄牙等國在東南亞治理華人的成功經驗，應該為英國借鑒。畢麒麟在擔任華民護衛司期間經常遊走於殖民地會黨大佬之間，當出現會黨紛爭時，畢麒麟也經常充當調停仲裁的角色，逐步樹立了他在華人社會當中的「政府」形象。

畢麒麟對華人的治理看似放任，但他也有從其他方面逐步弱化華人會黨的影響力。其中最大的政策就是華工保護的政策，他制定了華工的引進、工時、薪資等主顧關係條例，將華工納入政府政策的保護，防止華工遭到虐待及剝削，進而瓦解了會黨透過苦力（豬仔）貿易或賒票制對華工的控制。

另一個與華工政策一體兩面的是婦女政策，畢麒麟對妓院做出各種規範，包含設定不得進行人口買賣，以及不得有十六歲以下的少女從事性服務的規

例。畢麒麟也聯合華人領袖設立保良局，收容那些從人口販賣活動及妓院救出的女子。這些政策表面上看起來，損害了華人會黨的利益，但卻也為許多依靠會黨組織達成商業利益的社會領袖提供了其他的出口。以檳城保良局為例，其創始人胡泰興、辜上達、許心美、王文德、王明德無一不是在檳城叱咤一時的會黨領袖（當時，社會賢達、商人、會黨領袖經常是三位一體的）。

畢麒麟的理華政策算是成功的，歷史學界也普遍認為在畢麒麟治理下，馬來亞華人社會治安有了很大的改善。他的婦女及華工保護政策也使得馬來亞華人社會逐步從苦力為主的移墾社會逐步過渡到自由移民的社會。無奈，官場環境是複雜的，畢麒麟「與會黨共生」的概念始終飽受另一派人士的批評。在一八八七年畢麒麟抱病休養期間，新任總督史密斯（C. C. Smith）在未經與畢麒麟商量的情況下，便對會黨實施鎮壓政策，並於一八八八年頒布社團條例（*The Societies Ordinance of 1889*），在馬新地區全面封禁會黨。值得注意的是，畢麒麟也在一八八九年被編入退休名單，憲報於一八九〇年正式公告畢麒麟退休，他隨即返回家鄉英國，結束了在亞洲超過半生的生活。

ORDER IN COUNCIL No. 24 OF 1889



5 | 4

圖4 1889年霹靂政府封禁天地會組織的告示。
資料來源：Perak Government Gazette 1892: 625.

圖5 晚年的畢麒麟。
資料來源：白偉權翻拍自 Pickering W. A.（1898）.*Pioneering in Formosa: Recollections of Adventures Among Mandarins, Wreckers, & Head-Hunting Savages*. London: Hurst & Blackett.

紀念畢麒麟

雖然畢麒麟在海峽殖民地最後的日子並不順遂，他「與會黨共生」的理華政策最終也未能延續，但他在一八七七年至一八八八年的十年間所進行的改革卻普遍受到民間的肯定，成功樹立他在華人民間的地位。雖然有關當時民間社會對於畢麒麟觀感的紀錄較少，但我們卻能從早期華人民間對於街路名和機關名的稱呼，約略看出畢麒麟當時的「江湖地位」。

在當時的新加坡，華人將畢麒麟稱作「大人」，這是傳統中國對於官員的尊稱。此外，華人民間普遍並不使用「華民護衛司署」這

圖6 新加坡與畢麒麟相關的民間及官方街道名

資料來源：白偉權繪，底圖取自 Central Survey Office.（1918）. *Plan of Southern Congested Part of Singapore Town*. Central Survey Office: Kuala Lumpur.

一名詞，反而將此機構稱之為「北麒麟」或「大人衙」，畢麒麟顯然成為華民護衛司的代名詞。此外，在檳城，華民護衛司及其所在的唐寧街（Downing Street），也被稱為「大人關」、「大人衙門」。❷

一九〇五年英國人Firmstone在《皇家亞洲學會海峽分會會刊》（*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發表了一篇名為Chinese Names of Streets的文章，裡頭記載了當時新加坡的官方及華人民間街道名的對照表，其中有四條街道由於是華民護衛司署的所在地或是落在其附近，因而都以「畢麒麟」為命名，像是：畢其麟後、北其麟直街、北麒麟對面戲園後、北麒麟對面戲園街。這些都是華人以自己熟悉的語言對官方英文街名的命名，屬於民間的命名系統。

一九二四年七月，新加坡市政局通過一項決議，將華民護衛司署所在的馬交街（Macao Street）以及馬交街上段（Upper Macao Street）分別改名為畢麒麟街（Pickering Street）以及畢麒麟街上段（Upper Pickering Street），以紀念畢麒麟這位通曉多種方言，精於華人事務的殖民地官員。此街道更名於一九二五

❷ 其他名稱還有：護衛司關、政務司關、政務衙門、外關、牌館、問話館。見Lo Man Yuk. (1900). "Chinese Names of Streets in Penang." *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33: 197-246.

年一月十一日正式生效，並且沿用至今，這年已是畢麒麟過世後的十七個年頭。物換星移，畢麒麟街上的華民護衛司建築已不存在，後人僅能以路牌憑弔這一窮極一生研究華人語言、傳統及思想，❸屬於台、新、馬華人大時代中的人物。

1905年新加坡與畢麒麟有關的民間街路名

官方街名	民間街名	釋義
Canal Road	畢其麟後	位於華民護衛司後面
Havelock Road	北其麟直街	與華民護衛司同一排
Lim Eng Bee Lane	北麒麟對面戲園後	華民護衛司對面的戲院的後方的巷子
Wayang Street	北麒麟對面戲園街	華民護衛司對面的戲院所在的街

註：Canal Road為最早的華民護衛司所在地，後來才遷至馬交街。

資料來源：Firmstone, H. W. (1905). Chinese Names of Streets and Place in Singapore and the Malay Peninsula. *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42: 53-208.

❸ 畢麒麟在其回憶錄中提及：I have spent the greater part of my life amongst the Chinese, and am conversant not only with their dialects, but also with many of their customs and their mode of thought. 見 Pickering, W. A. (1898). *Pioneering in Formosa: Recollections of Adventures Among Mandarins, Wreckers, & Head-Hunting Savages*. London: Hurst & Blackett. P.IX.

❖歷史小辭典

華民護衛司

官職名，第一個華民護衛司於一八七七年在新加坡成立，此後成為英殖民政府管理華人社會事務的最高權力機關。它係由英殖民政府所設立，權力很大，其最主要目的是保護華工，抑制華人私會黨，並透過其他職能如調解華人民間各種糾紛或訴訟、監督鴉片貿易、保護華工及婦女(妹仔，mui tsai)的權益來瓦解私會黨在華人社會中所建立的秩序，並取代私會黨的機能。繼新加坡之後，馬來半島其他華人聚集的英國屬地如檳城(一八八一)、太平(一八八三)、吉隆坡(一八九〇)、怡保(一八九三)等也相繼設立華民護衛司。畢麒麟是馬來亞首位華民護衛司。

延伸閱讀

Leon Comber.（1956）.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An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9（1）: 146-162.

Lim, Irene.（2016）. *The Chinese Protectorate*. National Library Board of Singapor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1346_2008-12-10.html.

Lim, Irene.（2016）. *William A. Pickering*. National Library Board of Singapor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1345_2008-12-03.html.

Ng Siew Yoong.（1961）. "The Chinese Protectorate in Singapore, 1877-1900."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2（1）: 76-99.

Pickering W. A.（1876）. "The Chinese i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Straits Observer*（*Singapore*）, 15 November 1876, Page 2.

Pickering W. A.（1878）.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and Their Origin, Part 1." *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 63-84.

Pickering W. A.（1879）.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and Their Origin, Part 2." *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3: 1-18.

Pickering W. A.（1898）.*Pioneering in Formosa: Recollections of Adventures Among Mandarins, Wreckers, & Head-Hunting Savages*. London: Hurst & Blackett.

必麒麟著，陳逸君譯《歷險福爾摩沙：回憶在滿大人、海賊與「獵頭番」間的激盪歲月》，台北：前衛，二〇一〇。

白偉權，〈被遺忘的《邦咯副約》：紀念拿律終戰一百四十五周年〉，《當今大馬》，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日，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460945.

白偉權，〈看得見的拿律女性：英治前夕一場婦女營救行動〉，《當今大馬》，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八日，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467068.

李珮瑩，〈海峽殖民地的華民護衛司〉，《政大史萃》第五期（二〇〇三），頁九五—一一一。

林志強，〈林亞相與畢麒麟遇襲案〉，收於白偉權編，《二〇一七新山華族歷史文物館年刊》，新山：新山華族歷史文物館，二〇一八，頁五八—六〇。

棉蘭——檳城——板橋：
蘇門答臘客家張氏兄弟在檳城

馬來西亞檳城素有「東方之珠」的美稱，當地最著名的旅遊景點莫過於亞依淡（Ayer Hitam）的極樂寺了。可以這麼說，極樂寺幾乎是所有到訪檳城遊客的必到之處，無論是與檳城相關的旅遊文宣，還是以檳城為主題的衣服、紀念品，極樂寺都會是圖文中的主角。

極樂寺是一座十分有故事的佛寺，它依山而建，沿著樓梯上山時，可以見到萬金油虎豹兄弟所捐建的牌樓。繼續往上爬了許多階之後，會抵達廟門，進入寺廟前可見到康有為等名人刻在巨石上的墨寶。❶此外，在《辛丑條約》簽訂後的庚子賠款在中國及海外僑社引起譁然之際，極樂寺住持妙蓮法師也率先發

❶ 例如康有為在一九〇三年所題的「勿忘故國」、錫王胡國廉（胡子春）一九〇四年題的「煒耀外」、丝善家陳西祥（米商林寧綽夫人）一八九五年的「見義勇為」等。

動籌款，成為國內外僧人愛國籌集賠款的濫觴，因此極樂寺也獲得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親賜的《大雄寶殿》及《海天佛國》的牌匾。

極樂寺在十九世紀末建立不久隨即發起大規模的擴建，當時的擴建幾乎動員了整個檳城的政商名流。在他們之中，出力最大的是一位名叫張煜南的客籍華商。張氏是當時清廷駐檳城的副領事，他將這片土地買下供建廟之用，並且號召捐款，由於出力最大，因此成為極樂寺的大總理。另一位積極捐助的是他的胞弟張鴻南，他們都是當時富甲一方的商人。

然而有趣的是，張氏兄弟並非檳城在地



圖1　檳城極樂寺
說明：照片右下方可見到許多當時名人所留下的墨寶。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15年1月29日。

人，而是荷屬東印度（今印尼）蘇門答臘棉蘭的商人。更值得一提的是，張鴻南與台灣板橋林家有著聯姻關係，是林爾嘉的親家，林家長子林景仁便是迎娶了張鴻南的長女張福英。台灣閩南及南洋客家兩大家族的世紀聯姻，在地方上傳為佳話。而促成這樁婚事的，正是這位極樂寺大總理張煜南了。

究竟張氏兄弟是誰？檳城如何會成為這些蘇門答臘商人的活動場域？除了極樂寺之外，檳城還有他們的足跡嗎？他們又是如何與千里之外的台灣板橋林家產生關係？這是本章所要關注的。

蘇門答臘的客家張氏兄弟

印尼張氏兄弟在南洋發跡的故事十分經典，即出生於清末，在南洋成為一方開拓主，其生活時空橫跨清朝和民國，是那個大時代的締造者。張氏兄弟原籍廣東梅縣松口。大哥張煜南（一八五〇—一九一一）早年在家鄉幫父親從

事糧食和雜貨的買賣，到了十六歲至十七歲時，便隨一位商人前往荷屬東印度群島的首都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謀生。

在巴達維亞，張煜南在同屬客家人的貿易商張弼士底下謀生。三年後，他累積了一些積蓄，便從事當店生意，成為一名商人，開始在社會上嶄露頭角。到了一八七七年，荷蘭殖民地政府委任張煜南為巴達維亞岸外的翁魯斯特島（Onrust）僑領。雅加達對張煜南而言，其實只是其人生的試煉場，他真正人生舞台，其實是蘇門答臘的棉蘭。

到了一八八〇年，張煜南離開爪哇，同時將弟弟張鴻南（一八六〇—一九二一）接來南洋一同發展。根據張鴻南為荷蘭政府服務三十週年紀念所出版的《張耀軒博士開拓南洋卅年紀念錄》顯示，他們先前往檳城發展，但由於「初至檳榔嶼見英人所為一切布置井井有條理知此無處有幾何展布之餘地遂決然捨此他就」，❷所以選擇到對岸的棉蘭發展。

棉蘭現今為蘇門答臘最大城，也是當地最重要的旅遊城市。我們可別小看棉蘭，當地在二〇〇四年時，便已經有高級的崇光百貨，這時候連馬來西

❷編者不詳，《張耀軒博士拓殖南洋卅年紀念錄》，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二二；棉蘭：出版社不詳。這裡指的是張鴻南，但筆者相信這個經驗也是張煜南所遇到的。

亞的第二大城新山也都還沒有。❸但是當地貧富差距問題確實也相當嚴重。此外，當地郊區有著世界最大的火口湖——多巴湖（Lake Toba），遠近馳名。但是在一八八〇年，棉蘭市尚未誕生，大家所熟知的，其實是當地的日里王國（Deli Kingdom），張氏兄弟最初便是在該國的拉布漢（Labuhan）落腳，現今，這裡已經成為大棉蘭地區的一部分了。

日里王國與馬來半島眾多的馬來王國一樣，是一個由馬來蘇丹所統治的前現代化國家。但自一八六〇年代開始，荷蘭及歐洲的資本開始湧入發展熱帶栽培業，特別是菸草種植，開啟了日里（Deli）周邊地區發展的契機。張氏兄弟正是在這個起飛時期來到日里經營糧食生意，為當地歐資園丘供應糧食和必需品。張氏兄弟在棉蘭也涉足熱帶栽培園的開發，像是張鴻南於一九〇六年發展橡膠種植，成為蘇門答臘最早的橡膠種植先驅。他不僅是第一個經營橡膠種植的華人，也是第一個聘僱歐洲籍經理的華人企業主。到了一九〇九年，他已經擁有二十三座園丘。無論如何，到了一八八〇年代末，日里境內的棉蘭地區，也逐漸成長為人口聚集的大城市，而張氏兄弟後來也定居於棉蘭市區。

❸ 紫光一九九四年在吉隆坡開業之後，就直到二〇一九年雪蘭莪沙亞南（Shah Alam）及新山（Johor Bahru）才開始有紫光百貨。

作為棉蘭的開發先驅，張氏兄弟也因為本身解決問題的能力而受到馬來統治者和殖民政府的青睞。當時這些種植園經常發生動亂，無論是華工之間抑或是勞資之間的糾紛，都仰賴他們居中協調。因此，張氏兄弟很快就成為當地華人社會的領袖。張煜南在一八八四年，也就是他到日里發展的短短四年內，便被荷蘭殖民當局委任為雷珍蘭（Lieutenant），一八九三年升任甲必丹，一八九八年更受委為棉蘭瑪腰（Major），這已經是荷蘭殖民統治體系中，社會領袖所能得到的最





3 | 2

圖2 張煜南（左）與張鴻南（右）
資料來源：荷蘭萊頓大學圖書館：https://digitalcollections.universiteitleiden.nl.

高職位了。另一方面，張鴻南也與兄長一樣受統治者重用，陸續受封為雷珍蘭、甲必丹，在一九一一年張煜南逝世之後，他也接任瑪腰之位。



圖3 張鴻南在棉蘭市區的宅邸。
資料來源：廖筱紋博士提供，攝於二〇一八年七月九日。

❖歷史小辭典

瑪腰、甲必丹、雷珍蘭

為荷屬東印度群島的華人官制。為了以最低成本達至最有效的統治，荷蘭也與其他南洋殖民地一樣，採取一種間接統治的方式，透過委任該社群的社會領袖來治理底下社群。與英屬馬來亞不同的是，荷蘭殖民政府在甲必丹之上，設立了「瑪腰」(Major)。在瑪腰之下，依序為「甲必丹」(Kapitan)、「雷珍蘭」(Lieutenant)。這些名字多是以福建話音譯而來。除

了這三者以外，在荷屬東印度群島的華人公堂之內，還能找到其他職銜名稱，像是文書「諸葛礁」（Secretaris）、官員「胡勃實」（Opsir），管理遺產、孤貧福利之職的武直迷（Boedelmeester）。

作為棉蘭的社會領袖，他們也與當時十九世紀其他地區的華商一樣，對於地方建設投入甚鉅，成為政府治理地方的另一把手。地方上，他們建立了華人義山、創建了濟安醫院。他們也出錢建立棉蘭的女子學校、敦本學校，蘇門答臘東岸各華人市鎮的中華學校，張氏兄弟也出資甚多。張氏兄弟的投入並不僅止於華人社會的範疇，在公家領域亦是如此，他們也出資建立荷蘭學校，建立勿拐灣海口（Belawan）瘋人院，棉蘭市區內的肉類市場（一八八六）、魚市場（一八八七）、菜市場（一九〇六）以及蘇門答臘東部一切道路、橋梁等交通建設也是出自張氏兄弟之手。張鴻南也出資贊助棉蘭大回教堂 Mesjid Raja 的興建。❹由此可見，他們深受政府和民間的信任，兩兄弟也受荷蘭殖民政府委任為棉蘭市議會議員。馬來統治者的關係方面，無論是日里蘇丹還是龍葛

❹當然，張氏兄弟的輸捐及影響力範圍並不僅止於棉蘭，對祖國亦然，這也是成功海外華商十分常見的典型，作為獨霸一方的巨賈，他們對祖國的捐助也不遺餘力，從清廷的海防經費、京師醫局、陝西籌賑、廣西籌賑、廣東水災、潮州水災，都可以見到張氏兄弟的捐款，與其他商賈一樣，他們也有捐官行為，例如張煜南為光祿大夫（正一品），張鴻南為榮祿大夫（從一品），這已是捐官等級最高也是最貴的官位了。其原鄉松口當地的松源河口、盤安、石橋、松口南岸河堤建設、松口高等小學、溪南公立小學，福建龍巖見峰橋、石星橋、粵江

（Langkat）蘇丹，都與張氏兄弟有著深厚的情誼，日里蘇丹甚至讓自己的王子認張鴻南為乾爹，蘇丹也經常邀請張鴻南及其家人到王宮做客。

在一九一六年九月，為了慶祝張鴻南服務荷蘭殖民政府三十週年，全棉蘭市也為此慶祝了一週。因此，要說張氏兄弟是「棉蘭王」，一點也不為過。今天，張鴻南的大宅還矗立在棉蘭的市區，該宅邸保留完整，現今已改為博物館，裡頭展示的是他們當時的家居擺設，與檳城、馬六甲那些峇峇娘惹的宅邸無異，傳統中國與南洋色彩交融，十分雅緻。這裡也曾是板橋林家林景仁居住棉蘭期間，其中的生活場所之一。說到這裡，讀者不免感到困惑，究竟這張氏兄弟與馬來亞、與檳城的關係是什麼？這兩位「棉蘭王」怎麼與檳城產生關聯？

檳城與棉蘭：馬六甲海峽北部的雙城

在談論張氏兄弟與檳城的關係之前，我們先來看看現今檳城——棉蘭兩

橋，都是由他們所捐獻。他們的觸角也伸入香港，當地著名的東華醫院也有他們的捐獻記錄。一九一七年，香港大學還頒發了榮譽法學博士給張鴻南，對其貢獻予以肯定。因此，張鴻南可說是港大最早的榮譽博士之一。

地的關係。棉蘭雖然自殖民時期以來，便與檳城分屬於不同的政治轄區，兩地也隔了一片廣闊的馬六甲海峽（相當於台灣海峽兩岸的距離），但兩地的社會往來卻十分密切，可以這麼說，棉蘭與檳城的關係，更甚雅加達。在經濟模式上，蘇門答臘也是以熱帶栽培業為主，有別於爪哇的稻作農業社會，其經濟形態和地景上，更接近於馬來半島。

檳城和棉蘭在社會上也有著很高的同質性，例如華人組成上，兩地都是以福建人為主，福建話是兩地的優勢語言。不僅如此，棉蘭所操的福建話也與檳城一樣夾雜了大量的馬來語，其口音也趨近於檳城音，例如對「魚」的叫法，棉蘭人會叫做「*hu*」而不是「*hi*」，這是檳城及其周邊特有的口音。因此棉蘭福建話與吉打、玻璃市、北霹靂地區一樣，同屬於以檳城為核心的大北馬地區福建口音。在飲食文化上，炒粿條同為兩座城市具代表性的旗艦美食，即使在爪哇，人們也會覺得棉蘭炒粿條比較好吃，對此，印尼人的觀點會認為：因為棉蘭接近檳城！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檳城與棉蘭也有頻密的船班對渡，現今，兩地每天

都有往來的飛機航班。棉蘭也成為許多檳城人假日的後花園，檳城也是許多棉蘭中產階級前往消費、醫病的目的地。在文教方面，早期棉蘭雖然是荷蘭殖民地，但是因為地緣的關係，他們的英校反而比較盛行，棉蘭華人將子弟送入英校者，遠比送入荷蘭學校的來得多，這與爪哇的情況截然不同。當地開辦的英校，無論是創辦人還是老師，也多來自檳城，而棉蘭說英語的華人，也多於說荷蘭語者。總體而言，相信沒有人會否認檳城和棉蘭密切的雙城關係。其實，這樣的雙城關係由來已久，而張氏兄弟正是這條雙城關係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作為棉蘭富可敵國的華商領袖，他們當然不可能只是單憑棉蘭的商業而閉門造車。張氏兄弟的商業網絡是跨區域性的，這個網絡的另一端，就是檳城，因此他們與檳城商人往來密切。其實早在一八八〇年張煜南離開爪哇，並經由檳城前進棉蘭，很大程度上便可能與他在爪哇的老東家張弼士有關。張弼士是誰，或許現今不見得很多人知道，但熟知檳城的人，一定知道檳城喬治市老城區那棟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建築保育獎的藍色大屋。沒錯，那棟藍屋正是張弼士的宅邸。❺

❺ 若關心中國紅酒的人，必然也會知道張裕葡萄酒，那便是張弼士所創立，他是中國葡萄酒業的奠基人。張弼士在十九世紀末是個響噹噹的人物，他在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年）被委任為清廷駐檳城副領事，後再升任為駐新加坡總領事。

張弼士早在一八七七年便與其他爪哇商人到檳城投資了，並且在棉蘭也設有分行。因此這與張煜南從爪哇北上的時間——一八八〇年是吻合的，張弼士也在檳城成立船運公司——萬裕興。股份上，張弼士占了萬裕興的百分之五十股份，另外百分之四十則為張氏兄弟所有。張弼士和張氏兄弟的船運公司經營棉蘭到檳城、新加坡、香港、上海的航線，將棉蘭與馬來亞、中國連接了起來。這塊萬裕興招牌至今還掛在藍色大屋側邊的門額上，萬裕興招牌以及其藍色牆壁經常成為旅遊雜誌談到檳城時所選用的照片。

張氏兄弟與張弼士以及一些檳城商人也涉足銀行業，他們於一九〇七年在棉蘭合資開設日里銀行（Deli Bank）。當中，張弼士出資二十萬盾、張煜南十五萬盾、張鴻南十萬盾、邱朝仲十萬盾、謝榮光十萬盾。除了邱朝仲之外，張弼士和謝榮光都是與張氏兄弟一同建立極樂寺的大總理。張氏兄弟深受張弼士的信任，張弼士在棉蘭的商業利益，基本上都是交由張氏兄弟打理。張氏兄弟後來在檳城華人社會的活動，張弼士也是當中的關鍵人物，但那已經是後話，我們將在下一節進行交代。一九一六年張弼士過世後，張鴻南是他的遺產

執行人，足見他們之間的關係。

除了這些客家商人之外，張氏兄弟與其他的檳城福建商人也有著密切的關係，特別是檳城的邱氏族人。與之有生意夥伴關係的邱氏族人就有邱朝仲，他也是蘇門答臘亞沙漢（Asahan）的甲必丹，邱朝仲過世之後，其子邱善佑也繼續與張氏兄弟合作。另外則是與張氏兄弟同一時期在日里發展，並獲委任為名譽雷珍蘭的邱登果，上述幾位邱氏族人尚且是可以在一些學術研究資料上找到的。

張鴻南還有另一個赫赫有名邱氏商業夥伴，這或許是連張鴻南女兒張福英也不知道的。在張福英《娘惹回憶錄》當中，曾經提及張鴻南在棉蘭遇到的一場車禍，當時張鴻南在檳城的商業夥伴「Koo Han Liong」來訪棉蘭，之後他們在一同驅車出門時遇上嚴重的車禍，「Koo Han Liong」便在此車禍中受傷，然後病情惡化而身亡。根據筆者的比對，當年叱咤檳城華人社會的邱公司的董事、也是建德堂大哥的邱天德，其子邱漢陽便是於一九一七年在棉蘭遇車禍而亡的，時間也剛好相符，因此張福英回憶錄筆下的商業夥伴「Koo Han Liong」

即是邱天德的公子邱漢陽了。有關邱氏家族的故事，詳見〈派衍海國：大航海時代中的新江邱氏族人〉一章。

張氏兄弟和這些檳城富商究竟合作些什麼呢？當然就是那個時代最賺錢的餉碼生意了，像是他們與張弼士（一八九四）、邱朝仲（一九〇五—一九〇八）承包了整個蘇門答臘東海岸的鴉片專賣權。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與邱朝仲和邱善佑承包了蘇門答臘東海岸的賭博專營權。張氏兄弟與這些檳城商人一同經營的，還有鹽、當鋪、酒的專營權。



圖4 張弼士的大宅——「藍屋」。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15年1月29日。

❖ 歷史小辭典

餉碼

指專營事業的稅收承包權，該制度也稱餉僞制、包稅制、包餉制，英文文獻寫作 Revenue Farming。餉碼的專營權主要有賭博餉碼、酒餉碼、當碼、娼碼、鴉片餉碼、鹽碼等項目，即凡是有著大量需求的必需品或服務，都可以成為餉碼專營的範疇。

在政府尚未有能力掌控境內的稅收時，便會透過委任有能力控制經濟資源者（一般為幫群或會黨首領）為包稅人或餉碼主。包稅人無論徵收多少，只須按照與政府訂立的固定金額定期上繳政府即可。

一般而言，每項專利餉碼大約為期二至三年不等，期限結束後便需要重新競標。一些商人會組成合股公司，集資競投。然而，投得餉碼並不意味著絕對只賺不虧，餉碼商仍然會面對走私活動所帶來的挑戰，歷史上也不乏餉碼商無法繳付稅金的事例，因此殖民政府也不一定單以「價

高者得」作為專利權發包的原則。馬來半島許多著名的華商先輩其實都擁有餉碼商的身分。

在馬來半島一些歷史悠久的老廟，也能夠見到經營餉碼事業的商號，人們可以從「傌」或「碼」的關鍵字進行推斷，像是富商陸佑的「隆記傌」。

由上可見，棉蘭的開發與檳城有著密切的關係，綜觀這些與張氏兄弟一同投資棉蘭的資本家，幾乎都有著檳城背景，因此不難想像其管理層、勞工、資金，大部分都來自檳城。而根據統計資料，蘇門答臘的鴉片、米糧，也多進口自檳城，檳城也是蘇門答臘北部物產的出口目的地。因此檳城與棉蘭的雙城關係，其歷史發展軌跡早在十九世紀末便已經奠定了。既然如此，檳城及棉蘭兩地的互動也不是單向的，檳城商人可以到蘇門答臘，張氏兄弟自然也可以涉入檳城華人社會。底下，我們就來看看張氏兄弟在檳城的社交圈子，以及他們在檳城所留下的史蹟。

張氏兄弟的檳城網絡

如果說棉蘭是張氏兄弟實際經營、發展事業的地區，那麼檳城就是他們的社交舞台了，畢竟許多的大頭家都居住在檳城，許多投資與發展的策略都是他們在檳城做出決策，然後實踐在棉蘭等的腹地。❻有鑒於此，張氏兄弟也無可避免地經常往來檳城，他們在檳城的最大關係人便是張弼士和謝榮光了。從張福英在《娘惹回憶錄》的記敘可以得知，張鴻南帶著家人從棉蘭乘船至檳城，上來船上迎接他們的便是謝榮光，❼他也是荷屬亞齊的甲必丹，在發跡之後也定居於檳城。謝榮光與張氏兄弟不僅有著商業夥伴關係，他與張煜南也是親家的聯姻關係，張氏將女兒嫁給謝家，因此當時小福英是以伯父稱呼謝榮光的。他們一家到了檳城之後，也是居住在謝榮光家。

除謝榮光之外，他們另一個檳城連結當然就是張弼士了，張氏兄弟是張弼士一手提拔起來的，可以這麼說，沒有張弼士，就沒有今天的張氏兄弟。張弼士不僅把張煜南從爪哇引進日里，更是手把手地將張氏兄弟牽進檳城。張弼

❻ 像是十九世紀的拿律戰爭和普吉島礦區械鬥，衝突雙方陣營的決策者都是居住在檳城的頭家，也因為這樣的關係，這些地區的動亂最終也蔓延至檳城，促發了檳城社會的動盪，例如在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的檳城大暴動。

❼ 謝榮光，字春生，號夢池，一八四六年出生於婆羅洲的坤甸（Pontianak）。

士是享譽南洋及清廷的商人，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他獲清廷委任為第一任駐檳城副領事，統管檳城及其周邊的僑民事務。到了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他升任駐新加坡總領事之後，便前往新加坡，所留下的空缺便推薦由張煜南補上，張煜南由此成為第二任駐檳城副領事。

年齡上，張弼士屬於張氏兄弟的叔伯輩，分別比他們長十歲及二十歲，小福英也稱他為伯公，並且見面時也對張弼士行長輩親屬的跪拜禮，張弼士與謝榮光在檳城的宅邸就在同一條街上，因此張鴻南的孩子們經常往來兩家的庭院。

根據《娘惹回憶錄》所提供的線索，張氏兄弟在檳城的好朋友還有鄭大平。鄭大平是霹靂拿律海山大哥鄭景貴❽的兒子。作為鄭景貴的繼承人，鄭大平自然也財勢雄厚，他也是霹靂太平（之前為拿律）的甲必丹，但常居檳城。他在檳城有著一座擁有無敵海景的宮殿式豪宅，檳城第一座游泳池也是由他所建。對於這座豪宅，張福英印象非常深刻，她在回憶錄幾乎花了很大的篇幅來介紹鄭大平的宅邸，原因無他，就是因為他的豪宅其中一部分建在海底，鄭夫人當時邀請張鴻南夫人以及小福英在這裡享用下午茶，這裡就像現在的海底世界主

❽ 鄭景貴所主導的拿律礦區戰爭可說是馬來亞全面進入英殖民統治的開端，檳城邱氏族人也在鄭景貴的陣營之中，他們在戰爭中獲得勝利，也使鄭景貴成為檳城最富裕的頭家之一，社會地位顯赫，若論社會排敘，鄭景貴無論是年齡（他比張弼士長二十歲）還是在資歷上，都在張弼士之上，因此在檳城，一山豈有二山高，我們便不難理解為何張氏兄弟離開爪哇之後，會以檳城發展空間不多為由，前往棉蘭發展。

題樂園一樣，上面是個玻璃罩，能夠看到各種魚類在頭上遨遊，這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即使是在今天，也是超級富豪的豪宅才可能會有這樣的派頭，只可惜這座享負盛名的宮殿豪宅後來被拆毀了。

從上述幾位張氏友人的身分，揭示了他們在檳城堅實的社會網絡關係。若要找尋他們的共通點的話，除了商人之外，「客家」就是貫穿他們的最大公約數了，可以見到無論是張弼士（大埔）、謝榮光（嘉應）、鄭景貴父子（增城）、甚至與之一同出資擴建極樂寺的戴喜雲（大埔），都是當時著名的客籍領袖。他們這條客家線也反映在張氏兄弟在檳城所參與的社會公益建設上。

在檳城，比較早的張氏兄弟史蹟就是白雲山廣汀公塚了，那是檳城廣東社群（廣府、客家、海南、潮州）所使用的義山。在一八九一年，廣東社群發起整理山墳清除野草的勸捐活動，在眾多的捐資者碑文名單當中，也見到張氏兄弟的名字。接下來則是極樂寺，早在一八九五年妙蓮禪師號召擴建極樂寺的時候，張氏兄弟就參與其中，成為大總理之一了。極樂寺其他的總理也都是他們的「客家班底」，即張弼士、謝榮光、鄭景貴、戴喜雲。作為主要贊助人，

極樂寺許多角落都能夠找到張氏兄弟的題字，像是廟宇大殿中可以找到張鴻南及張煜南分別撰寫的石柱聯，極樂寺外面的大石頭，也刻有張煜南的墨寶，例如：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巨石上的「福祿壽康」、同一年的「福紀絡籌祥開槐閣 福壽 壽綿瀛籙慶集蘭階」。❾

極樂寺也立有《張煜南頌德碑》，當中除了詳述張煜南的功績之外，也提及廟方為此而建立了張煜南功德堂以及他的壽域（生壙），並於每年的元旦日、元宵日、清明日、端午日、七月初七、七月十五、八月十五準備素菜、果品、香燭，同時誦經唸咒來迴向報答張煜南。不過這項傳統到了今日似乎未有持續流傳。除此之外，極樂寺還有一個「賓客止步」的亭閣，裡面供奉著建立極樂寺的大功德主，他們以塑像的形式被安放在一個神龕內，當中包含二十二位商人以及五位禪師的塑像。在這間小拜殿內，還有一尊人型一比一大小，穿著清朝官服的塑像，這位就是張煜南了。看著拜殿內滿是身穿清朝官服、民國裝，同時又是馬來亞著名歷史人物的塑像，很是壯觀。

在一八九五年極樂寺籌建時，檳城還有另一件大事，那就是鄭景貴海記

❾ 張家對檳城極樂寺有貢獻，張鴻南過世時，極樂寺住持本忠還從檳城帶來二十名和尚為張鴻南誦經。

棧的落成以及鄭景貴的七十五歲大壽。當時，以時任新加坡總領事張弼士為首的一眾以愚弟、愚姪、姻姪為署名的紳商、甲必丹贈送了寫上讚文的祝壽屏風予鄭景貴。這個名單當中，便包含了「誥授中議大夫賞戴花翎候選同知前署理檳榔嶼等處副領事官」的「愚弟」張煜南。

到了隔年（一八九六），鄭景貴主持的湖內光裕祠大伯公廟進行重建，於是動員了各地人際網絡發動籌款，這次募款的範圍很大，從碑文中，可以看到來自霹靂怡保、太平、拿乞、甲板、安順以及蘇門答臘棉蘭的捐款。張煜南當然也參與了捐款，且款額排名第四。而在他之前的，也都是他的朋友圈，像是鄭景貴（三百五十元）、謝榮光（二百五十元）、張弼士（二百元）。這座廟至今仍然存在，就在檳城國際機場附近。綜觀張氏兄弟這幾年對檳城華人社會的參與史蹟，絕大部分可以說是從張煜南擔任檳城副領事期間進行的。到了一八九六年他卸任副領事之後，張氏兄弟並未就此淡出檳城。

在一八九九年，張氏兄弟同樣與張弼士一起捐建檳城後山浮羅山背（Balik Pulau）的「玄武山」。⑩浮羅山背是檳城的客家地區，根據一九三〇年殖民政

⑩ 從廟名以及主祀神明玄天上帝來看的話，檳城浮羅山背玄武山其實源自陸豐的玄武山。

府對於華人方言群的人口統計，當地客家人甚至占了百分之四十。玄武山是一座主要由客家人所崇祀的玄天上帝廟，算是當地最古老的廟宇，也是當地公所的所在。如今這座廟已經改建，但是整體還保留著原來的格局，唯廟宇主體建築前的亭子仍為原建築體，它的四根石柱前面一對刻上了張弼士和謝榮光的名字，後面一對則是署名「日里甲必丹張鴻南」的刻字。再來可以找到張氏兄弟史蹟的就是宣統元年（一九〇九）的海珠嶼大伯公廟了，廟宇的石柱聯由張煜南所撰，



6 | 5

圖5 極樂寺由張煜南所題寫的墨寶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19年7月11日

圖6 極樂寺功德殿內的張煜南像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19年7月11日

大廳內的石柱聯則是張鴻南所撰。隔年，張氏兄弟也奉獻了一塊匾額予檳城大伯公街（King Street）福德祠。

綜觀張氏兄弟在檳城的史蹟，其實大部分都與他們的人際網絡有關，特別是這些客籍的社會關係線——張弼士、謝榮光、鄭景貴等人。而這些史蹟除了極樂寺之外，無論是廣汀公塚、湖內光裕祠、玄武山、海珠嶼大伯公廟、大伯公街福德祠，都是廣東、客家色彩明顯的社會群落，這些機構基本上都是由張弼士、鄭景貴、謝榮光等人所



圖7 浮羅山背的玄武山。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13年8月28日。

主導，因此每當需要動員時，都會互相拉抬，此舉也成為張氏兄弟融入檳城社會的重要契機。

潮汕鐵路與板橋林家的聯姻

張氏兄弟在棉蘭發跡後，檳城可以說是張氏兄弟另一個人生舞台，讓他們上升到另外一個層次，成為區域性的華人紳商。到了一九〇〇年代，當時候正值清廷提倡興業救國的熱潮，清廷積極招募華商回國進行建設，張弼士便是回去建設祖國的其中一人。張弼士受委的計畫就是著名的潮汕鐵路，在張弼士底下實際執行這項計畫的，則是張氏兄弟以及謝榮光。對於這些建設，許多國家也希望介入，藉此擴大自身在中國的影響力，潮汕鐵路也因此成為列強角力的競技場，而日本和英國便是其中的要角。日本藉由其南進基地——台灣，推行其南支政策，積極介入潮汕鐵路，板橋林家相信也在此背景下涉入其中，

形成林家和張家聯姻的契機。

其實早在明治四十二年（一九〇二），台灣總督府便委託愛久澤直哉成立一家國策公司——「三五公司」在廈門活動，保護日本的利益，這位愛久澤直哉也是後來把日資引進柔佛的關鍵人物（見〈日資會社、台灣總督府與消失的柔佛日資橡膠園〉一章），在台灣，他也是促成北客南遷的推手之一。⓫在潮汕鐵路計畫有了眉目之後，愛久澤直哉便開始與這些華商接觸。在合作上，清政府傾向於讓本國人經營。然而，華商有資金，但技術方面還是需要與其他國家合作，愛久澤直哉便有了介入的機會。

根據台灣歷史學者蔡龍保的研究，潮汕鐵路帳面上的創辦人有四位，除了張煜南、謝榮光之外，還有香港鴉片商吳理卿、台籍商人林麗生。其中林麗生與愛久澤直哉關係密切，他曾任大阪商船會社廈門支店的買辦，並協助愛久澤直哉在華南的事務。愛久澤直哉與張煜南、吳理卿、林麗生都簽有密約，確保工程到位後，使用日籍技師參與鐵路建設。資金方面，南洋的張煜南和謝榮光聯合出資一百萬，另外的資金則來自吳理卿和林麗生合資的一百萬。實際

⓫ 愛久澤直哉在彰化、高雄成立源成農場和南隆農場，引進許多北部的客家人到當地拓墾。至今，高雄美濃南隆地區的五穀宮內還供奉著愛久澤直哉的長生祿位。

上，吳理卿和林麗生只是帳面上的人物，用以滿足清廷對於投資者身分的資格審查，因此他們的資金實際上是來自三五公司，而三五公司背後的金主則是台灣總督府。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潮汕鐵路公司正式成立，由張煜南擔任董事長，謝榮光、吳理卿和林麗生為倡建總理。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潮汕鐵路正式完工通車。那麼，這項鐵路工程究竟如何會促成台灣板橋林家與張氏家族的聯姻呢？

針對這個問題，張福英的回憶錄提供了很好的線索，這門親事其實在張福英十三歲那年由伯父張煜南所安排，原因是「……林家幫過伯父一個大忙……」，那年正是一九〇九年。其實在潮汕鐵路公司成立之後，他們引進日本人進行修建和經營的舉措引起地方社會的不滿，加上後來成本預算不斷超支，在中國社會整體都沉浸在抵抗列強的仇外氛圍下，張煜南也背負了叛國、勾結外人的罵名。但到了一九〇九年，事情有了戲劇性的變化，與日本最有關聯的台籍人士林麗生同意退股，而他所留下的股份則由張氏兄弟購回，整起事件才得以平息。

若查詢林麗生的背景，他與板橋林家雖無血緣關係，但卻是世交。其父林鶴年早年因為受到板橋林家林維源的招募，而從福建來台拓墾營商。他又因為喜好詩文而與板橋林家有共同的嗜好和社交圈子。在甲午戰爭台灣割讓予日本之後，林鶴年也和林維源一起內渡廈門鼓浪嶼。林鶴年的兒子林輅存與林家下一代的交情也頗深。因此可以看到喜好作詩的林景仁（即張鴻南的女婿）曾經在《漢文台灣日日新報》發表〈送林輅存觀察內渡〉的詩作。[12]林麗生是林鶴年的長子，他也曾任英商嘉士洋行的買辦，板橋林家對於洋行的投資，也是經由林麗生之手。但一九〇〇年洋行倒閉之後，林麗生也備受牽連，虧損了三十幾萬，當中也包含板橋林家的資金。[13]無論如何，我們可以知道林麗生與板橋林家有著密切關係，林麗生與其弟林輅存也與林景仁相識，因此在一九〇九年林麗生退股這件事情上，板橋林家或許在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張、林兩家在同一年的定親，估計也與林麗生在潮汕鐵路的退股有關，不過目前仍無史料能直接證明此事。

除了林麗生的人際網絡之外，張煜南與林爾嘉也有其他可能的聯繫網。

[12] 林景仁，〈送林輅存觀察內渡〉，《漢文台灣日日新報》，一九〇八年九月十一日，第一版。

[13] 〈受累甚鉅〉，《台灣日日新報》，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四版。

根據黃賢強的研究，在潮汕鐵路興建的同時，林爾嘉也在臨近的福建進行漳廈鐵路的興建，他在當地的合作夥伴是張煜南的舊識胡子春（永定客籍人士），胡子春是馬來亞著名礦家，有「錫王」之稱，他也是鄭景貴的姪婿，胡子春的名字也與張煜南共同出現在鄭景貴的祝壽屏風上。此外，林爾嘉的姻親陳寶琛與張煜南的關係也很密切，他是張弼士在國內興建實業的職場夥伴，他到南洋各地籌措漳廈鐵路的資金時，也曾到訪張煜南大力貢獻的極樂寺，並留下兩首詩。無論如何，從這些人際網絡線索來看，張、林兩家的聯姻其實與張氏兄弟回國建設潮汕鐵路有著絕對的關係。

棉蘭張家與板橋林家在一九一二年進行世紀婚禮，有趣的是，兩家的結婚大典並非在台灣或是廈門舉行，而是在棉蘭。婚禮之後，也不是張福英搬到台灣或廈門，而是林景仁留在棉蘭。主要原因在於當時中國仍處於政權更替的混亂之中，加上林景仁身體不好，其父母認為棉蘭的氣候較適合兒子，才讓他們長居棉蘭。當然，板橋林家也期許林景仁能夠藉由張鴻南的社會資本，為家族在南洋拓展事業版圖。也因為這樣，林景仁有機會在棉蘭跟隨岳父張鴻

南習商，並擔任日里銀行經理，這也是他在南洋學習商業、拓展人脈的開始。在南洋，林景仁與著名的華商像是陳嘉庚、林文慶都有不錯的交情，特別是橡膠大王、慈善家、「學校禮堂大王」[14]李光前，兩人更是摯友。

在棉蘭期間，林景仁也留下了兩部詩集，分別是描寫蘇門答臘馬達山（Brastagi）的《摩達山漫草》以及多巴湖的《天池草》，這兩部詩集與他在台灣完成的《東寧草》，合為著名的《林小眉三草》，這部作品文學價值相當高，並受到台灣文學界的重視，林景仁可說是台灣漢詩人當中，對於南洋有大量書寫的第一人。林景仁和張福英的孩子們後來多定居於新加坡和檳城。

林景仁與張福英家族的故事也被張福英寫進了她的回憶錄——「*Memories of a Nyonya*」當中，這本回憶錄在二〇一七年被翻譯成中文，為《娘惹回憶錄》，由國立台灣文學館出版。二〇一九年九月到二〇二〇年三月，台灣文學館便以張、林兩大家族的跨國聯姻為故事主軸，規畫了名為「娘惹浮生：二十世紀初期台灣古典文學」的特展，展現台灣古典文學（林景仁詩作）南渡的行跡。文

[14] 李光前對於家鄉各地的慈善教育事業不遺餘力，特別是全馬各地華校在興建禮堂時，都會得到李光前的幫助，因此許多學校的禮堂舞台中央上方，都有大大的「光前堂」三個字，光前堂可說是許多馬來西亞華校子弟的集體回憶。





8
9

圖8 林景仁《天池草》的創作地點多巴湖。
說明：多巴湖是火山噴發作用所形成的，為世界最大的火口湖。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15年2月22日。

圖9 台南台灣文學館外「娘惹浮生」的大型看板。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19年12月24日。

學館外的中正路旁也展示了該特展的大型看板，具有南洋土生華人圖樣風格的看板設計與台南街頭形成有趣的風景。

❖ 歷史小辭典

峇峇娘惹

也稱「土生華人」（Peranakan），特指馬來群島地區土著與外來者通婚後所生下的後裔。因此除了土生華人之外，也有土生印度人、土生荷蘭人、土生阿拉伯人等，在馬來半島的語境當中，峇峇娘惹或Peranakan特指土生華人，就個別意義而言，峇峇（Baba）指的是男性，娘惹（Nyonya）指的是女性。在海峽殖民地馬六甲、檳城、新加坡有著為數眾多的土生華人社群，因此文獻上也將他們稱作「海峽華人」（Straits Chinese）。由於他們移民歷史較早，較融入在地，且能掌握馬來語、英語等在地語言，因此在商業上往往占據了相當大的優勢，進而成為對社會具有影響力的一群。

峇峇娘惹有著自己的語言、穿著以及飲食習慣。語言上，峇峇語最大特色是參雜了馬來語、福建話甚至英文的元素，像是長桌稱為「*toh panjang*」、「*toh*」是福建話當中的桌子，「*panjang*」是馬來語當中的「長」，該詞彙的結構與中文顛倒，此為馬來文的語法。飲食上，他們偏向馬來式的口味，無辣不歡，辣椒和椰漿是娘惹菜的重要元素。唯與馬來人不同的是，他們可以食用豬肉。穿著上，峇峇們的穿著唐裝，與中國人無異，但到了後期，因為受英國人影響，他們更傾向於穿著西裝。娘惹則穿著馬來服裝—***baju kebaya***。這些外顯性的文化特徵經常成為判斷峇峇娘惹身分的指標。

延伸閱讀

Buiskool, Dirk Aedsge.（2009）. "The Chinese Commercial Elite of Medan, 1890-1942: The Penang Connection."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82（2）: 113-129.

Godley, Michael R.（1993）. "Thio Thiau Siat's Network." In John G. Butcher and H. W. Dick（eds.）, *The Rise and Fall of Revenue Farming: Business Elites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State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 Palgrave Macmillan.

Loh Wei Leng.（2009）. "Penang as Commercial Centre: Trade and Shipping Networks."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82（2）: 25-37.

Pin Pin.（2017）. "The Existence of Tjong Yong Hian Family Business in Development Dynamics of Medan City."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136: 89-93.

Wong Yee Tuan and Lee Kam Hing.（2014）. "Aceh-Penang Maritime Trade and Chinese Mercantile Network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rchipel* 87: 173-202.

余美玲，〈詩人在南洋：林景仁《摩達山漫草》、《天池草》探析〉，《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二十四期（二〇一七），頁一九九—二四三。

林景仁，《林小眉三草》，台北：龍文，一九九二。

張福英著作，葉欣譯，《娘惹回憶錄》，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二〇一七。

黃賢強，〈客籍領事與檳城華人社會〉，收於鄭赤琰編，《客家與東南亞》，香港：三聯書店，二〇〇二，頁二一三—二二七。

黃賢強，〈張煜南與檳榔嶼華人文化和社會圖像的建構〉，《亞太研究論壇》第三十四期（二〇〇六），頁一六—三五。

黃賢強，〈東南亞—台灣—閩粵：兩大家族的跨地域婚姻與政商網絡〉，《華人研究國際學報》第十一卷第二期（二〇一九），頁五九—八〇。

編者不詳，《張耀軒博士拓殖南洋卅年紀念錄》，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二一；棉蘭：出版社不詳。

蔡龍保，〈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鐵道部的南進支援：以潮汕鐵路的興築爲例〉，《輔仁歷史學報》第二十八期（二〇一二），頁二三三—二六九。

盧耀軒、Arthur S. Nalan、楊景，〈張氏兄弟在日里地區建設中參與的角色〉，《印尼高校中文系協會學報》第四卷第二期（二〇二〇），頁一一—二一。

海山大哥與港大系主任：賴際熙與馬來亞的聯繫❶

筆者二〇一二年到霹靂州北部的市鎮——太平收集論文資料時，首次踏入歷史悠久的增龍會館，會館禮堂中高掛著馬來西亞歷史課本中曾出現的海山大哥鄭景貴像，在其同一側則高掛了一張貌似袁世凱，但又不知其人的陌生相片，下面只列了「賴際熙遺照」五個字。他看來與鄭景貴有著同樣重要的地位，然而會館的主事者對他所知甚少，這樣的反差引起筆者的好奇。回去後依名字上網搜尋才知道，原來賴際熙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他是前清太史，民國時期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的創院主任。會館牆上海山大哥與港大學院主任的照片交織在一起，構成玩味無窮的畫面，不禁令人好奇他們之間的關係，究竟賴際熙與馬

❶ 本篇曾於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及二十四日，分上、下兩篇發表於本人在馬來西亞網路媒體《當今大馬》的專欄〈南國築夢〉當中，部分內容及資料經過修正及更新成為此文，文章保留原來題名。

來亞的連結關係為何？引起筆者的興趣。

賴際熙是誰？

從一些基礎資料得知，賴際熙與甲必丹鄭景貴同是增城人。所不同的是，賴際熙並非從商出身，他是讀書人，他於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二十四歲時中舉，到了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考中二甲進士，並獲皇上欽點為翰林院庶吉士，成為清廷任官的儲備人才。他五年後任國史館協修，再升任總纂，所以也被後人尊稱為太史。在以士、農、工、商為分類的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當中，賴際熙無疑位處社會金字塔的尖端，是當時社會頂尖的知識分子。然而在清朝覆滅之後他便流亡香港，成為旅港前清遺臣。他在香港創立學海書樓教授國學，後來也受時任港大校督的香港總督金文泰委託籌備設立中文學院，為香港中文教育的發展奠定基礎。同一時期，他也積極推動客家人的凝聚意識，成為

最早的客家組織——香港崇正總會的發起人。上述所提及的組織至今仍然持續發展。賴際熙在社會上也擁有良好的政商關係，與許多當地社會名流巨商如馮平山、利希慎，甚至港督金文泰❷都私交甚篤。

從目前的資訊看來，賴際熙在空間屬性上是香港的、中國的，與南洋關係較薄弱。那麼，他與馬來亞淵源又是從何開始？



圖1　太平增龍會館內的賴際熙與鄭景貴。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12年6月7日。

❷ 例如賴際熙曾在一九一七年在銅鑼灣利園宴請港督金文泰。見一九一七年二月十三日〈賴際熙邀港督於利園〉，《香港工商日報》，頁[illegible]。

賴際熙多次到訪英屬馬來亞

從現有的史料整理，賴際熙在清代至民國期間至少來馬四次。目前見到最早來馬的紀錄是記載在《翰苑流芳：賴際熙太史藏近代名人手劄》的一張黑白照片，照片中是年輕留著辮的賴際熙，他與另一名看來年紀相仿的人合照，賴際熙坐在賓客的位置，此照片攝於檳城大伯公街的相館。另外三次來馬則記載在其文集《荔垞文存》的字裡行間，估計是在一九二〇年、一九二六年、一九三〇年之間。這四次已知的南遊，每一次必定落腳檳城，再往霹靂、吉隆坡等地遊歷。單從清代賴際熙來馬時於檳城所拍的照片，我





3 2

圖2 身穿官服的賴際熙

資料來源：白偉權翻拍自鄒穎文編，《翰苑流芳：賴際熙太史藏近代名人手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2008，頁11。

圖3 賴際熙南來檳城時所拍攝的相片。

資料來源：白偉權翻拍自鄒穎文編，《翰苑流芳：賴際熙太史藏近代名人手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2008，頁12。照片持有人為賴恬昌先生。

們難以斷定他的時間和緣由，但從鄭景貴方面入手，或許可以為此問題的解答提供一些線索。

賴際熙與鄭景貴

賴際熙與鄭景貴年紀相差四十二歲，一八六五年鄭景貴在領導第二次拿律戰爭時，賴際熙才出生，賴氏二十四歲中舉時，鄭景貴已年近七十。鄭景貴對原鄉捐助不少，是鄉里敬重的老者，賴際熙在增城應早已聽聞鄭景貴。在賴氏所編撰的《崇正同人系譜》套書中，鄭景貴是唯二❸被記錄的海外華商，但該條目只是介紹鄭氏的功績，並未提及兩人的關係。

然而，在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檳城鄭景貴慎之家塾落成時，各政商名流所致贈的匾額卻揭示了賴際熙和鄭景貴的關係。當時賴際熙題撰了一副對聯，❹他在這幅對聯末端以「姻晚生」的身分落款，說明了他或他的家族和鄭

❸ 另一位被記載的是航商六。

❹ 以中朝閥閱作外藩屏瀚，著湖海南來應推第一；有諸國聲華備汾陽福澤，倫唐宋盛事此既重今。

賴際熙多次到訪英屬馬來亞

從現有的史料整理，賴際熙在清代至民國期間至少來馬四次。目前見到最早來馬的紀錄是記載在《翰苑流芳：賴際熙太史藏近代名人手劄》的一張黑白照片，照片中是年輕留著辮的賴際熙，他與另一名看來年紀相仿的人合照，賴際熙坐在賓客的位置，此照片攝於檳城大伯公街的相館。另外三次來馬則記載在其文集《荔垞文存》的字裡行間，估計是在一九二〇年、一九二六年、一九三〇年之間。這四次已知的南遊，每一次必定落腳檳城，再往霹靂、吉隆坡等地遊歷。單從清代賴際熙來馬時於檳城所拍的照片，我



3 | 2

圖2 身穿官服的賴際熙

資料來源：白偉權翻拍自鄒穎文編，《翰苑流芳：賴際熙太史藏近代名人手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2008，頁11。

圖3 賴際熙南來檳城時所拍攝的相片。

資料來源：白偉權翻拍自鄒穎文編，《翰苑流芳：賴際熙太史藏近代名人手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2008，頁12。照片持有人為賴恬昌先生。

們難以斷定他的時間和緣由，但從鄭景貴方面入手，或許可以為此問題的解答提供一些線索。

賴際熙與鄭景貴

賴際熙與鄭景貴年紀相差四十二歲，一八六五年鄭景貴在領導第二次拿律戰爭時，賴際熙才出生，賴氏二十四歲中舉時，鄭景貴已年近七十。鄭景貴對原鄉捐助不少，是鄉里敬重的老者，賴際熙在增城應早已聽聞鄭景貴。在賴氏所編撰的《崇正同人系譜》套書中，鄭景貴是唯二❸被記錄的海外華商，但該條目只是介紹鄭氏的功績，並未提及兩人的關係。

然而，在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檳城鄭景貴慎之家塾落成時，各政商名流所致贈的匾額卻揭示了賴際熙和鄭景貴的關係。當時賴際熙題撰了一副對聯，❹他在這幅對聯末端以「姻晚生」的身分落款，說明了他或他的家族和鄭

❸ 另一位被記載的是戴喜雲。

❹ 以中朝閥閱作外域屏藩，當湖海南來，聽推為第一；有潞國聲華備汾陽福澤，柳中未盛事，此既並今。

家之間有著姻親關係。當時賴際熙三十四歲，已是一個中舉十年的舉人，唯尚未獲欽點為翰林。賴際熙當時相信也出席了親家宅第的落成慶典。賴際熙早年在檳城的照片或許正是在此次南來時所拍攝。這對藏於檳城慎之家塾的賴際熙手跡，相信也是現存已知他在南洋所留下的最早紀錄。由此便不難理解賴際熙每次都落腳檳城的原因，他往後在本地的社會關係網絡發展也從檳城出發。

四年後，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賴際熙獲欽點為翰林院庶吉士，身為甲必丹的姻親與鄉人，賴際熙獲翰林的事在本地增龍社群中必定是一件值得慶祝的大事，特別是在當時南洋社會滿是虛位頭銜的背景下，此真材實料的翰林牌更能讓增龍社群在幫群林立的華人社會中昭示本屬人士的威望。因此可以見到他們在會館中高掛了賴際熙的翰林牌匾。至今，太平增龍會館，檳城的增龍會館❺和五福書院❻也都保留有賴際熙的翰林牌匾。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會館、書院都是與甲必丹鄭景貴有直接關係的社團組織。就此看來，賴際熙早年與馬來亞的連結關係很大程度建立在增城這個地緣社群以及鄭景貴的姻親關係之上。

❺ 檳城增龍會館也有他的題字，唯年代不詳。

❻ 感謝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廖小菁研究員提供檳城增龍會館以及五福書院有關賴際熙文物的照片。









4
5

圖4 賴際熙送給鄭景貴的對聯以姻晚生自稱。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13年8月29日。

圖5 高掛於太平、檳城增龍會館以及五福書院堂上的翰林牌匾（左至右）。
資料來源：
太平：白偉權攝於2012年6月7日。
檳城：廖小菁博士提供，攝於2016年4月7日、8日。

鄭景貴與賴際熙雖然關係密切，但是兩人的年紀始終差距很大，進入民國初期，鄭景貴便與世長辭，但賴際熙與馬來亞的關係並未因此結束。清朝覆亡後，賴際熙旅居香港，在新的時代裡，他仍與本地關係密切。

士與商：賴際熙與其他馬來亞華商的關係

士與商雖然是傳統中國社會階級中頭尾兩個極端，但自晚清以來，中國士商的藩籬逐漸模糊，在香港及馬來亞這些英殖民地更是如此。從賴際熙的文集《荔垞文存》不難發現，他與殖民地華商的關係頗深。該文集收錄了不少他送給一些華商名流的祝壽表文、頌詞及墓誌銘。當中來自香港的有不少，但是也不乏南洋的華商、僑領，他們都是在新的時代中使賴際熙繼續與馬來亞保持密切關係的人物。

1. 檳城：戴喜雲、戴芷汀父子（大埔籍）

除了鄭景貴之外，南洋與賴際熙關係最為密切的人就是大埔籍的檳城富商戴喜雲家族了。南洋著名的客家華商雖多，❼但戴喜雲卻與鄭景貴一樣，是唯二被賴際熙撰寫收錄於《崇正同人系譜》當中的華商，關係密切可見一斑。戴喜雲在拿律發跡，他在商業上相當受到鄭景貴的照顧，與鄭景貴關係密切。他在一八九一年及一九一〇年分別包得拿律總餉碼和霹靂賭博餉碼。一九〇八年戴喜雲也被清廷委任為駐檳城的副領事。戴、賴兩人雖然不同鄉，但有著同為客家人、清廷官員，以及鄭景貴聯繫的共同關係。戴喜雲去世之後，賴際熙也為他撰寫了〈誥授榮祿大夫檳榔嶼領事官星嘉坡總領事戴公府君墓表〉的墓誌銘。

賴際熙與戴喜雲的長子戴芷汀也有不錯的交情。據《荔垞文存》所載，他們曾經在增城羅浮山黃龍觀學道，算是同門師兄弟，據筆者推算，賴際熙比戴芷汀年長四歲。❽戴氏後來到福建擔任知州，清朝覆亡之後便回到檳城。賴際熙至少曾經在一九二〇年及一九三〇年到過檳城去拜訪戴芷汀。一九二〇年去

❼ 例如黎錫士、廖春生、梁碧如、張煜南、張鴻南兄弟、胡子春等。

❽ 一九二〇年賴際熙年齡為五十五歲，而同一年，戴芷汀慶祝五十一歲生日。

檳城的時候正值戴氏五十一歲生日，賴際熙為他寫下了〈誥授朝議大夫芷汀太守老弟六秩開一壽序〉。一九三〇年去的時候則是戴的六十大壽，賴也為戴芷汀寫了〈戴芷汀大兄六十壽序〉。有趣的是，這回戴芷汀的稱謂從賴的「老弟」變為「大兄」。事實上，到了民國時期，戴芷汀是賴際熙在南洋最重要的人脈，兩人關係甚好，一些前清的讀書人也是透過賴、戴二人的這條管道到南洋發展。❾

2. 雪蘭莪：郭德修、郭喬村兄弟（大埔籍）

除了檳城之外，賴際熙也透過戴芷汀的關係在客家人聚集的吉隆坡建立了社會關係網絡。經過戴氏的介紹，賴際熙結識了雪蘭莪大埔籍的客家富商郭德修、郭喬村兄弟，郭德修也是一九一二年雪蘭莪茶陽會館的重建者。郭氏兄弟的母親慶祝七十九歲大壽時，戴芷汀也轉知賴際熙為郭母撰寫〈敕封儒人郭母劉太孺人七秩晉九榮壽大慶序〉的祝壽文，該文的時間不詳。

❾ 例如另一名前清太史黎湛枝，他雖然與賴際熙在清朝地位同等，甚至還在同一年獲得翰林院名銜，但他到香港之後就沒那麼幸運，面臨生活困難，因此寫信給賴際熙希望獲得他的手信到南洋去投靠戴芷汀。見鄒穎文編：《翰苑流芳：賴際熙太史藏近代名人手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二〇〇八。

3. 雪蘭莪：楊宜齋（大埔籍）

賴際熙在一九二二年時也走訪了吉隆坡，並在當地結識一名客家大埔籍的社會領袖楊宜齋。楊氏在雪蘭莪以礦業起家，清代時也捐有奉政大夫的五品官，民初也與其他頭家共同創辦辟智學校。他其中一名孫子就是後來著名的新加坡首席大法官楊邦孝（一九二六—二〇二〇）。一九三三年前後，楊氏及夫人慶祝八十大壽時，他也有贈送〈誥授奉政大夫楊宜齋先生暨德配藍宜人八秩雙壽榮慶序〉的祝壽文。

4. 怡保：梁克堯（嘉應籍）

一九三〇年賴際熙南來檳城參加戴芷汀的六十大壽時，也認識了霹靂嘉應籍的梁克堯。梁克堯是霹靂的礦家，少壯南來時在同鄉梁碧如（客籍檳榔嶼副領事）的霹靂咖啡山礦場學礦。發跡之後，其產業分布在萬里望、怡保、斯裡並。梁克堯母親羅氏七十一歲大壽時，賴際熙也為她寫了一篇〈梁伯母羅太夫人八秩開一榮壽大慶序〉的祝壽文。

5. 檳城：時中學校

除了為一些社會名流富商題寫讚頌詞之外，檳城客籍富商戴喜雲、謝春生、梁碧如所創辦的崇華學校建立新校舍之後，賴際熙在一九三〇年南來時也為該校撰寫了一篇〈三達堂記〉的序文，以緬懷三人對於海外辦學的貢獻（賴際熙寫序時，該校已易名為時中學校）。按該文內容，〈三達堂記〉似乎是要以碑刻的形式存放於時中學校。然而該碑文至今未見，原因不詳。

賴際熙作為前清翰林太史，是傳統中國的士紳階級，他筆下所寫的商人理論上都屬封建制度下的下層階級，但這不影響賴氏的社交，在新的環境中，賴際熙必須順應時勢做出各種調適，能屈能伸，以應付新的時局，這些社會關係也成為他順利經營各種事業的運作關鍵。另外也可以見到，賴際熙在南洋的社交網絡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檳城戴氏家族展開，因此在二十世紀當中，戴芷汀的角色格外重要。

港大中文學院籌設與賴際熙的南洋網絡

在新的時代中，與華商關係的經營對賴際熙而言格外重要，以賴際熙在創辦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的過程為例，當時港英政府其實缺乏辦學經費，有別於現今政府在教育上的巨額經費投注，身為籌備主任的賴際熙因而負起籌款的責任。在一九二六年八月，賴際熙便與港大校長韓和惠爵士（William Hornell）一同前往南洋向華商募款，其中賴際熙的摯友戴芷汀也有捐獻鉅款。他們也得到吉隆坡錫礦家陳永和廖榮之的捐助。陳永是吉隆坡陳氏書院的成員、舊國家皇宮（今已成為博物館）也是由他所建造。賴際熙此行共募得四萬多元。其他《荔垞文存》中出現的富商雖然沒有記錄在港大的校史當中，但是相信也在捐款者之列。這次籌款主要用作教職員薪俸、購書、修整教室等用途。因此港大中文學院的成功創辦很大程度上有賴於賴際熙的社會關係網。

賴際熙與星洲客屬總會

賴際熙與馬來亞的關聯或許也少不了客家運動的推展。在一九二〇年代，整個香港以至南洋地區的客家人開始出現客屬一體的團結氣氛。而賴際熙正是香港崇正總會的領袖，當時與賴際熙一同推動客家事務的還有富商胡文虎。同一時期，新加坡客家社群也於一九二三年在當地發起籌備成立星洲客屬總會。在籌備期間，前述與賴際熙關係良好的富商戴芷汀、梁克堯、楊宜齋、廖村喬等都擔任了名譽贊助或名譽協理。經過七年的籌備，總會終於在一九二九年建立並舉辦成立開幕大典。胡文虎當時也同時任香港崇正會和星洲客屬公會首任會長。作為香港客屬團體創辦人的賴際熙也題贈了「客屬總會」的匾額給星洲客屬總會，該匾額現今還高掛在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大門之上。[10]

賴際熙是少數與本地華人歷史有深厚淵源的高端文人，從他的生平事蹟可以得知，他與馬來亞的聯繫相當多元。就目前所搜集到的材料得知，他早年很可能因為與海山大哥鄭景貴之間的姻親與地緣關係而與馬來亞產生地理連

[10] 星洲客屬總會在一九二九年召開各地代表大會之後，成為團結馬、新及東南亞地區客家組織的「南洋客屬總會」。

結。雖然鄭景貫在一九一六年便已經離世，但是賴際熙年少時與戴芷汀之間的同門關係卻也延續了他在本地的社會連結。晚近，因為港大中文學院的籌款以及客家網絡的發展原由，更讓賴際熙多次來馬，也加深了他與馬來亞華人社會的聯繫。我們可以從中見到地緣、姻緣、友誼、教育、客家在這當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們也可以從賴際熙身上見到這位前清知識分子如何順應時代變遷而努力調適，善用各種社會資源，最終為各領域做出貢獻。



圖6 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大門上的賴際熙手跡。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18年5月20日

延伸閱讀

賴際熙著、羅香林編，《荔垞文存》，台中：文听閣，二〇〇八。

南洋客屬總會，《客屬年刊銀禧紀念號》，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一九五六。

方駿，〈賴際熙的港大歲月〉，《東亞漢學研究》第二期（二〇一二），頁二八二—二九三。

鄒穎文編，《翰苑流芳：賴際熙太史藏近代名人手箚》，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二〇〇八。

黃賢強，〈檳城華人社會領導階層的第三股勢力〉，收於氏著，《跨域史學：近代中國與南洋華人研究的新視野》，二〇〇八，頁一一〇。

趙雨樂，〈賴際熙：香港傳統中文教育的重要推手〉，收於氏編著，《近代南來文人的香港印象與國族意識》，香港：三聯書店，二〇〇八。頁一〇九—一二二。

港大的陸佑銅像：尋訪香港與馬來亞的歷史聯繫[1]

香港大學是亞洲首屈一指的頂尖大學，一九五六年的一個秋天，香港大學古樸典雅的本部大樓裡學者政要雲集，大家在此出席一尊華人銅像的揭幕儀式，以紀念這位先賢對大學所作出的貢獻。港督葛量洪（Sir Alexander Grantham）也是座上嘉賓，他受邀為這尊華人銅像揭幕。這尊銅像正是馬來亞著名礦家——陸佑（一八四六—一九一七）。幾個月前，港大校方也將本部大樓內新修好的大禮堂（Grand Hall）以陸佑命名，稱為陸佑堂（Loke Yew Hall）。陸佑這位遠在馬來亞的礦家究竟與香港有何關係？他為何被香港大學所紀念？進而使「陸佑像」和「陸佑堂」成為港大深具代表性的地標。

[1] 本篇曾於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六日發表於本人在馬來西亞網路媒體《當今大馬》的專欄「南國風雲」當中，部分內容及資料經過修正及增補成為此文，文章保留原本題名。

拿律養成的礦家

陸佑祖籍鶴山，他十三歲（一八五八）便南來新加坡打拼，經過幾年的拚搏，約十七歲時便成功成為一名雜貨店（興隆號）東主。這時的拿律正好也處於錫礦大開發時期，或許是人際關係的介紹，他在二十一歲時便將生意交由經理打理，之後便北上拿律尋求發展。

早年的拿律派系分明，陸佑初到拿律之時（約一八六七），當地才剛發生過兩次嚴重的械鬥事件。年輕的陸佑在當地跟隨Chan Kam Chong和Ng Sow Swee學習打理業務，❷擔任行扛，因此有機會習得各種「know how」。從陸佑的籍貫以及所跟從的頭家礦主，相信他屬義興陣營。在第三次拿律戰爭期間，據傳他也盡忠職守，為所屬陣營提供穩定的糧食供應。

陸佑在拿律學礦並累積一定的經驗和資金之後，便開始與人合資開辦礦場。他的關係不僅限於義興內部，在拿律戰爭結束之後的英治初期（一八七六），他也與大伯公會（建德堂）大哥邱天德在甘文丁合作開辦礦場。

❷ Chan Kam Chong和Ng Sow Swee的名字出自Wright, A和Cartwright, H於一九〇八年所著的*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British Malaya: Its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筆者從相似的拼音和有可能的人物進行對照，懷疑他們是拿律廣府籍的頭家陳甘全和新加坡有著義興背景的福建籍頭家吳秀水，但Chan Kam Chong和Ng Sow Swee究竟是誰？則有待更多的史料來說明了。

與邱天德的合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陸佑當時已經能夠獨當一面，成為具有實力的礦主了。陸佑前後在拿律待了大約十五年，這段期間也正是他的青壯時期，因此在拿律這段時間的歷練，對他未來作為礦家的養成十分重要。

首富之路：錫礦、餉碼與政治關係的經營

拿律戰爭之後，隨著馬來半島的馬來封地界線逐漸被打破，大部分地區被納為英國屬地，陸佑也在一八八〇年代開始往近打地區發展。此外，他也將大規模的資金投入中馬一帶，他在雪蘭莪的萬撓、沙登、新街場、雙文丹，彭亨的文冬、關丹，森美蘭等地都擁有錫礦場，成為聞名全馬的錫礦大王。

除了錫礦之外，另一個讓陸佑晉升馬來亞首富的關鍵是餉碼承包（revenue farming）。餉碼是一種稅收承包制度，針對一些需求量大的商業領域，特別是將今天被認為是「撈偏門」的行業，例如鴉片、酒、賭、當、妓院等產業設定



為專利，將其經營權承包給具有很強社會控制能力的富商。在那個時代，餉碼稅也是殖民政府最重要的稅收入來源。陸佑在一八八〇年代也陸續獲得霹靂、雪蘭莪、彭亨的總餉碼承包權（General Farm），透過礦區控制與餉碼承包這把雙刃劍統攬了殖民地所有最賺錢的行業，進而成為馬來聯邦當時其中一位最富裕的華商。

事業版圖的發展往往與統治階層關係的經營相輔相成，根據學者約翰．布徹（John Butcher）指出，陸佑在承包餉碼的同時，也經常會以對地方輸捐作為回饋，協助地方政府進行各種基礎建設，使得地方政府能向中央交出漂亮的政績。例如他曾捐獻大筆資金從事文冬道路的建設，因此獲得彭亨參政司的信賴。他在投資雪蘭莪錫礦業時，也同時在當地建設道路。一八九三年，他也響應雪蘭莪參政司的號召，共同建立吉隆坡的維多利亞書院（Victoria Institution），就連當地主要提供印度人就讀的衛理男校（Methodist Boys' School）成立時，他亦有捐獻，成為創校人之一。陸佑的熱心公益使他深受統治者的信任，馬來聯邦總參政司瑞天咸更讚譽陸佑是他見過最富進取心

（enterprising）的華人。綜觀陸佑所捐獻的地區，都是他資本利益分布之處，足見投資與奉獻兩者的密切關係。

陸佑除了在馬來亞各地賺錢之外，他也與其他華商一樣，堅守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原則，因此他也積極介入社區事務。在中馬地區，陸佑積極融入本地甲必丹葉亞來所發起的仙四師爺信仰，因此可以見到雪隆各地的仙四師爺廟，都有陸佑大力支持的蛛絲馬跡，像是加影的師爺宮在一八九八年建立新廟時，他與雪蘭莪甲必丹葉傑良（葉觀盛）便共同擔任倡建紳董，他所經營的餉碼公司「隆記傌」也在「光緒己亥年」（一九〇〇）致贈了一塊「神明顯赫」的匾額予加影師爺宮。除了加影之外，雪蘭莪的新古毛，彭亨的文冬及瓜拉庇劵的師爺廟，其創建也與陸佑有關，廟裡頭也會掛有陸佑的肖像。其中文冬的師爺廟還是陸佑連同張弼士、謝春生一同創建的。此外，陸佑也是雪蘭莪各大重要的華人機構，如雪蘭莪中華大會堂、吉隆坡廣東義山、雪隆廣肇會館、雪蘭莪錫礦總局、雪蘭莪中華總商會的領導人。

作為二十世紀馬來亞首屈一指，無論是在民間及官方都具有深厚影響力





1
2

圖1　吉隆坡仙四師爺廟內的陸佑（左一）肖像。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10年2月4日。

圖2　吉隆坡老城區的陸佑大廈。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17年1月29日。



的巨商，馬來半島乃至新加坡各地也留有不少有關他的地景地物。像是霹靂的丹絨馬林（Tanjung Malim）、吉隆坡市區、彭亨的文冬（Bentong）以及新加坡都有以陸佑為命名的道路。除了新加坡的陸佑街，前述幾個馬來半島市鎮的陸佑路都位在精華地段，吉隆坡老城區也有一座「陸佑大廈」。

❖歷史小辭典

仙四師爺信仰

馬來半島在地發展出的華人民間信仰，主祀仙師爺和四師爺，也有的說法指三師爺和四師爺。兩位神祇都是由本地歷史人物羽化成神，為人所崇拜。其中，仙師爺或三師爺指的是甲必丹盛明利，他原籍廣東惠州，之後南來馬來半島從事礦業，他在十九世紀中葉任森美蘭雙溪烏絨甲必丹，他也是當地採礦集團海山公司的首領。

然而他在一次礦區械鬥中，被敵對陣營義興公司殺害，其部下葉亞

來將他的死加入了靈驗神跡，用以鼓舞士氣，最終贏得勝利。戰事平定後，盛明利正式被地方社會奉為仙師爺（或三師爺）。

四師爺的身分不詳，有說法指他是葉亞來的部下鍾來（嘉應籍），另一說則指他是提拔葉亞來擔任吉隆坡甲必丹的葉四（新安籍）。無論如何，仙四師爺信仰與吉隆坡開埠功臣甲必丹葉亞來有著密切的關係。該信仰也隨著礦區的開發和移民的流動而往吉隆坡周邊擴散，今天的仙四師爺信仰主要分布於雪蘭莪、森美蘭以及彭亨三州。它是一個兼具在地性（中馬礦區）和族群性（客家、廣府）的華人民間信仰。

從南洋到香港：餉碼最後的黃金歲月

一九〇〇年代，多年來在馬來亞已累積雄厚資金與豐富餉碼經驗的陸佑也開始將觸角伸至香港。他於一九〇五年注資香港，協助一家面臨虧損的鴉片

餉碼稅公司。一九〇六年開始，他才以個人名義從港英政府手中獲得香港鴉片餉碼權，此舉可說是陸佑與香港產生連結的開始。

值得注意的是，陸佑雖然承包香港的鴉片餉碼，但他在當地華人社會裡頭似乎並不活躍，在一些重要廟宇或是主要華人公共組織（如東華三院）都未見到他的名字，有別於他在馬來亞基層社會的運作模式（賺錢、投入華人社會、擔任各地華人組織的領袖）。由此也凸顯了他在香港的發展主要所仰賴的，是他雄厚的資金以及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在港的「群眾基礎」反而不是他所重視的。

抵制鴉片聲四起

另一方面，正當陸佑控制香港鴉片餉碼的同時，清帝國各地（包括與香港關係密切的廣東）、日治台灣、美屬菲律賓以及南洋各地華人社會也開始對吸

食鴉片所衍生的社會問題有所醒覺。一九〇六年，在馬來亞各主要大城，如新加坡、檳城、怡保、馬六甲等地陸續成立了反鴉片會（anti-opium society），他們迅速串聯，同時向殖民政府施壓封禁鴉片，形成一股強大的勢力。隨後，香港政府在壓力下也正計畫逐步取消鴉片餉碼制度。

在一片抵制鴉片的聲浪中，作為當時香港「鴉片大王」的陸佑自然也成為社會上批判的目標。在一九〇八年，社會上也開始有傳言指陸佑這位鴉片既得利益者威脅（threatened）香港政府，表示一旦禁止鴉片，就必須賠償其餉碼損失。面對輿論的批評，陸佑特地透過報章訪問以及香港的律師發表聲明以駁斥相關傳言，表示自己也樂於見到政府逐步封禁鴉片，並表明他不會要求任何的補償。值得注意的是，此一爭議發生之後，我們就無法得知陸佑是否還有承包香港鴉片餉碼了，而香港鴉片餉碼制度也在一九一四年正式終止。

陸佑與香港大學

陸佑承包香港鴉片餉碼期間（一九〇五—一九〇八），除了遇上日益高漲的反鴉片意識之外，也遇上了香港大學的籌建。盧吉（Frederick Lugard）在一九〇七年接任港督之後，便開始著手籌畫建設香港大學，陸佑也曾在港大開辦後捐獻了五萬元。

港大現今雖然是一所財政豐厚的頂尖大學，但它在



圖3　今被列為法定古蹟的香港大學主樓。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18年3月1日

草創初期卻維持不易，該校在一九一一年開幕之後的三年就面臨連續的虧損，到了一九一五年（香港鴉片餉碼制度終止的隔年）甚至出現存續危機。就在此時，陸佑向港大提供了五十萬元港幣分二十年攤還的免息貸款，頓時令港大渡過了倒閉危機。五十萬元對於當時的香港而言是一筆天文數字，因為香港的首富何東在當年的捐獻也僅是十萬元。而在港大建校前夕，從整個廣州所籌措的捐款，也僅十三萬餘元，足見陸佑的這筆款項貢獻甚大。

值得注意的是，在陸佑幫助港大渡過難關的同一年，他也獲頒聖米迦勒及聖喬治勳章（Order of St Michael and St George, CMG）。隔年（一九一六），港大舉辦了第一屆大學畢業典禮，陸佑亦獲頒了名譽法學博士的學位，就此成了港大的第一屆「畢業生」，但他當時並未出席典禮。該年與陸佑同梯的名譽法學博士還有許多馬來亞一帶的熟悉面孔，包括張弼士、張鴻南以及伍連德。

陸佑的捐款或許出自其一貫對教育的重視，以及與殖民政府關係密切，回饋社會的表現，但無論如何，在社會上一片對於鴉片的道德撻伐聲浪當中，

鴉片商對於社會公益的輸捐，確實有助於讓社會淡忘其負面形象。

馬來亞學子與香港大學

陸佑的這五十萬元免息貸款並非沒有條件，根據《香港大學校史》（*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一書作者梅樂彬（Bernard Mellor）的記載，陸佑要求港大日後必須保留四個獎學金名額，供來自海峽殖民地和馬來聯邦的清寒學子前來升學作為附帶條件，此舉也開啟了港大與馬新地區許多華人子弟的聯繫，本區也成為港大在香港本土以外，校友會規模最大的地區。

雖然陸佑獎學金主要提供馬來亞清寒子弟作為升學獎助，但是在那個年代有能力升讀大學的人，其家庭都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因此我們經常可以見到許多來自本地大家族的子女負笈香港。其中也包含了檳城大伯公會領袖邱天德的

族人，例如電學專科畢業的邱崑發和工科專業畢業的邱義利，他們的畢業慶功匾額（「學究雷車」、「業滿功成」）至今仍高掛在檳城龍山堂邱公司的祠堂當中。港大在一九一六年才有首批畢業生，而兩人分別在一九二一年以及一九二四年畢業，可算是港大最早的一批畢業生了。

除了邱公司之外，一些馬來亞礦家的子女也拿這筆獎學金前往香港升造，例如在一九三六年，銀行買辦與戲院東主Foo Win Poe的長子Foo Yeow San，以及萬里望（Menglembu）礦家劉發榮的公子劉



圖4 檳城龍山堂邱公司祠堂牆上高掛的畢業慶功匾額。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15年7月30日。

維漢，劉維漢也是後來的怡保市長以及霹靂州馬華公會主席。該獎學金至今仍然存在。

銅像製作

從上面的敘述可以得知陸佑與香港大學的淵源。到了一九五〇年代，港大已經茁壯成長，成為本區域首屈一指的大學。一九五五年前後，為了紀念陸佑的貢獻，港大校方特地到馬來亞徵集陸佑的照片，以便為他製作銅像。後來校方選擇了其子陸運濤私藏的父親近照，於是便送往倫敦，由著名雕塑家皮爾金頓．捷克遜（Pilkington Jackson）操刀。這張照片是晚年陸佑的站立照，他身穿唐裝身披袍子，左手拿著帽子，背景卻是熱帶的椰林，該照很可能是一九一六年港大校長義律爵士（Sir Charles Eliot）到吉隆坡頒發榮譽法學博士學位予陸佑時所拍攝，因此他身上的可能就是博士袍和博士帽。雕塑家根據

此照片配合自己的巧思，所雕塑出來的陸佑銅像也添加了原照片所沒有的騎士勳章。港大這尊陸佑像與吉隆坡陸佑墓上由英國雕塑家弗雷德里克・約翰・威爾考克森（Frederick John Wilcoxson）於一九二六年所雕塑的銅像大致相同，都有雕上勳章，惟墓上的銅像為全身像，手持帽子的方向也有所不同。

香港與馬來亞距離雖遠，但是因為共同的殖民體系而有了密切互動往來的契機。從陸佑在拿律的養成，馬來聯邦的發跡，到香港承包鴉片餉碼、港大財政危機的解決，一直到港大陸佑像的設立，都揭示了同一殖民體系的地方之間密切的資本流動、知識流動，以及社會上密切的網絡關係。也因為這層關係，使得香港在某個時代上而言，會被歸類為南洋或東南亞的北緣，為南洋華人社會的其中一部分。這個過程也使得我們今天走在香港的街頭，經常容易見到一些馬新地區的元素，這種特色是在其他國家或地區較少見到的。







5
6

圖5 陸佑的近照與港大本部大樓的陸佑像。
資料來源：（左）白偉權翻拍；（右）白偉權攝於2018年3月1日。

圖6 目前放置在港大陸佑堂樓上中庭的陸佑像。
說明：陸佑銅像與其右上方的禁菸告示與他作為香港鴉片餉碼商的身分，形成有趣的風景。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18年3月1日。

延伸閱讀

Bolton, K., & Hutton, C.（2000）. *Triad societies : Western accounts of the history, sociology and linguistics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London: Routledge.

Brown, Rajeswary Ampalavanar.（1994）. *Capital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South-East Asia: Studies in the economies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Basingstoke: MacMillan.

Butcher, J., & Dick, H.（1993）. *The Rise and fall of revenue farming : Business elites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state in Southeast Asia: Studies in the economies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Basingstoke: Macmillan.

Cunich, Peter.（2012）.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Mellor, Bernard.（1980）.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An informal histor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TODA Kenji.（2012）. "Anti-Opium Movement,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the Straits Chines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85-100.

Wright, A., & Cartwright, H.（1908）.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British Malaya : Its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London: Lloyd's Greater Britain Publishing Company.

李永球，《移國：太平華裔歷史人物集》，檳城：南洋民間文化，二〇〇三。

雪森彭礦務公會編，《雪森彭礦務公會一百二十年暨礦業史》，吉隆坡：雪森彭礦務公會，二〇〇六。

《南街殷賑》裡的南洋猛虎——永安堂

記得在二〇一七年的一個下午，為了準備馬來西亞獨中研習參訪團的考察活動，筆者來到台北大稻埕先進行一輪預查，看看有哪些史蹟適合作為考察講解的點位。走在民生西路看到剛被重新規畫為展示館的新芳春茶行，便被這棟文青味濃厚的老茶行所吸引，於是入內參觀。茶行二樓展示了一幅一九三〇年由台籍畫家郭雪湖所繪製的《南街殷賑》，這是一幅描繪日治昭和時期台北大稻埕繁華景象的寫實作品，裡面人頭攢動，招牌林立，街屋樓上晾曬的衣服也還隨風飄動，十分生動。然而，若是有仔細閱讀裡面的招牌和商號，便會發現左邊建築上有個熟悉的招牌，那就是今天廣為人知的虎標萬金油了。換句話說，來自南洋的虎標萬金油，竟然也出現在昭和時期的台灣。



圖1　台灣畫家郭雪湖的畫作《南街殷賑》(局部)。
說明:《南街殷賑》繪製於1930年代,原作典藏於台北市立美術館,圖片經郭雪湖基金會授權使用。

看到萬金油之所以會讓筆者感到驚奇，主要原因在於清領台灣，雖然與南洋一樣是個移民社會，但卻仍處於清廷治下。進入日治之後，台灣雖然轉化為「海外」，卻與華人所在的「南洋」屬於不一樣的政治氛圍。總體而言，在筆者腦海中，台灣和南洋始終是不同的個體，因此南洋萬金油的猛虎招牌成為了台北街頭上的特殊風景。本章就來梳理虎標萬金油如何在永安堂主人胡文虎的經營下，成為南洋第一藥品，以及日治時期它在台灣的發展。

緬甸永安堂——猛虎的發跡

今天的虎標萬金油屬於虎豹企業有限公司所有，該公司長久以來便以新加坡為基地，因此它在很多人的腦海中，屬於新加坡品牌。然而，這家跨國企業的發跡地並非在新加坡，而是在緬甸仰光。在過去，它有另外的名字——永安堂。

永安堂成立於一八七〇年代，創辦人是原籍中國福建永定的客家人胡子欽。胡氏在十九世紀中葉便前往仰光，以賣藥行醫為業，並創設永安堂。胡子欽有三個兒子，文龍、文虎，和文豹。文龍早逝，因此胡子欽在一九〇八年辭世後，永安堂最終是交由虎豹兄弟打理。胡文虎接手後，便遊歷香港、中國及南洋各地考察藥業的發展。

在香港期間，胡文虎見到許多成功的知名品牌都有十分顯著的圖案標識。事實上也如此，若打開早期的報紙，很多深入民心的產品，它們的名稱不見得一定得很「高大上」，而更重要的是朗朗上口的名稱和形象。因此許多的歐美品牌「落地」新馬之後，也都以別具特色的在地化名稱出現於庶民大眾眼前，像是美國的 Lilly's Milk 煉乳，便因商標有個牛頭和翅膀，而稱之為「飛牛頭」牌，倫敦 Guiness Stout 公司的黑啤酒，因為商標有個狗頭，因此稱為「黑狗啤」，這個稱法甚至還沿用至今。因此不難想像胡文虎也開始思索永安堂的代表物。

當然，要找永安堂代表物並不難，胡文虎選擇了自己名字中的「虎」字，

作為商品的代表。根據研究，萬金油上這隻張口長嘯，朝左跳躍的猛虎應該是出自香港嶺南派廣告畫家關蕙農之手。❶有了猛虎的助威，永安堂建立了鮮明的形象，胡文虎回緬甸後，便研製出各式藥品，同時冠上老虎的圖樣行銷各地。因此在胡文虎接手後，永安堂開始由仰光的永安堂，成為南洋的永安堂，他們以萬金油、八卦丹、頭痛粉、清快水、止痛散等聞名於南洋地區，永安堂也正式走向南洋其他城市，於各埠設立分行。



圖2 永安堂跳躍的猛虎。

❶ 衣若芬：〈文圖學與東亞文化：一九〇—三〇年代虎標永安堂藥品的報紙廣告〉，《東亞文化研究》第一期（二〇一五），頁一六一—一九五。

從緬甸到新加坡

在一九〇八年胡文虎正式接手永安堂的第十三個年頭，他於一九二一年開始在暹京曼谷開設第一間分行，兩年後，也在新加坡開設他第二間分行。有鑒於新加坡這個區域大都會的市場潛力及其對周邊地區的影響力，永安堂的重心也逐漸轉移至新加坡，最終在一九二六年擴建新加坡永安堂的製藥廠，並宣布將此作為永安堂的總行，而仰光老店則由弟弟文豹繼續經營。虎標在今天成為大家心目中，與新馬掛鉤的品牌，也就是由此開始。現今的人們可能已經很難想像最初的虎標萬金油原來是一家緬甸公司，加上馬來亞的官方動物是老虎，更容易促使人們在觀念上有「接錯線」的情況。

其實早在永安堂還未在南洋各埠開設分店時，便已經開始鋪設其在南洋地區的網絡了。在馬來亞地區，至少一九一九年新加坡的《新國民日報》，就已經出現仰光永安堂的虎標萬金油廣告，估計這應該是現有最早的萬金油廣告吧。這則廣告搭配了一幅有趣的圖畫，圖中有位緬甸的武士扛著萬金油，

萬金油包裝上還明顯見到那隻向左跳躍的猛虎，最上方還有一句「天下第一家」的文案，顯見當時永安堂主人胡文虎的宏圖壯志。此外，盒子上除了中文之外，也有緬文，相當具有緬甸文化風情。此外，在一九二〇年新加坡的《叻報》，也可見到永安堂頭痛粉的廣告，那是一個緬甸禮儀兵拿著頭痛粉廣告的旗幟。

這些廣告的背後，搭配的是他在各地的代理商，在一九二三年他尚未正式在新加坡設立分行之前，新加坡各大藥行，像是杏生堂、萬川棧、杏和堂、萬春堂、永生堂、余仁生、萬春和、會豐商店、萬安和、何長春、周蘭記

天下第一家
總發行所仰光埠
廿四條街門牌四十八號永安堂
廣東街門牌一百廿七號虎豹行
各埠商店均有寄兌
本主人胡文虎謹啓

圖3 1919年於新加坡《新國民日報》中的永安堂虎標萬金油廣告。

等，已經有代理永安堂的藥品了。❷這些藥行多是由客家人所經營，顯見客家網絡的重要性。

刷爆存在感的行銷天王

正式落腳新加坡之後，胡文虎在新加坡以尼路（Neil Road）八十九號作為總部，這是一棟位在街道三角窗的三層樓建築，而在這棟永安堂建築尖端，還有一個第四層的八角閣樓，其造型有如萬金油的瓶身，那是永安堂配藥的地方，一般人不得進入，這棟建築至今仍在，但已出租作為餐飲用途。新加坡也是胡文虎繼續擴展其虎標王國的基地，一九三四年開始，永安堂也在檳城、漢口、汕頭、福州、棉蘭等地設立分行。其中，檳城分行至今仍在，其外觀還保留了早期永安堂主要的旗艦藥品的文字，例如八卦丹、止痛散、頭痛粉，而這三項藥品現今已經停產，因此外牆上的字，顯得格外珍貴。

❷沈儀婷，《譜寫虎標傳奇：胡文虎及其創業文化史》，新加坡：八方文化工作室，二〇一三。

由於藥品是日常必需品，需求量及消耗量都很大，若要持續在商業競爭中屹立不倒，就必須要像現在的麥當勞、可口可樂般，竭盡所能地在人們的生活當中去刷存在感。對此，胡文虎把刷存在感這件事發揮得淋漓盡致，他的等級相信應該是前無古人的。為了宣傳，他特地改裝了一輛老虎造型的汽車，穿梭於大街小巷，引起話題。他也僱人穿著老虎服裝，穿街走巷，宣傳永安堂藥品。

除了直接宣傳之外，胡文虎也與早期許多商人一樣，藉由社會公共事務參與，對於有需要的群體進行輸捐，從中提高個人的知名度和影響力，進而使這些付出轉化為社會資本，從而回饋到個人的事業上。因此胡文虎在馬新各地十分活躍，他曾經在一九二八年，即將總部設於新加坡的兩年後，擔任當時新加坡華人最高學府華僑中學的總理，並



圖4 檳城永安堂址。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16年8月6日。

捐鉅款支援學校的建設，對於新加坡其他民辦學校如養正學校、崇正學校、南洋女校等，也都大力支持。在檳城極樂寺，他也出資捐建牌樓。他也以永安堂的名號捐棺施藥。不僅如此，他也積極投入祖國建設，捐建了不少的學校和醫院。每當祖國有天災時，他也成為本區捐款最多的商人之一。在蔣介石北伐時，他也捐款一萬以示支持。藉由這些動作，成功打造了他慈善家以及愛國商人的形象，廣為庶民大眾所推崇。

總體而言，可以見到胡文虎在進入一地市場之後，便藉由各種途徑來發揮他的影響力，本文所舉也僅是冰山一角，但值得一提的是他所建立的虎豹別墅和萬金油花園。

虎豹別墅：相簿中共同的照片

胡文虎的藥業王國愈來愈大之後，他也於一九三七年花費巨資在新加坡

巴西班讓（Pasir Panjang）建立了虎豹別墅以及萬金油花園，作為他與胞弟胡文豹在新加坡的居所。別墅與花園是一體的，其中別墅的部分位在萬金油花園中央的高崗上。這座花園豪宅耗費了二十五萬叻幣興建，別墅主體建築由六個鍍金穹頂組成，為了打造這六個穹頂，據說還特別收購了當時全新加坡的黃金存貨。當時的報章亦報導，虎豹別墅的照明甚至超過新加坡其他住宅的總和，甚是豪華。❸

包圍著虎豹別墅的則是萬金油花園，它可說是這棟別墅的附屬花園。整座園林以萬金油以及中國古典民間故事為主題，且聘請匠師將這些民間故事雕塑出來。因此裡面除了處處看到萬金油的老虎之外，還可以見到西遊記、薛仁貴、白蛇傳，以及二十四孝的各種故事，像是臥冰求鯉、乳姑不怠等的雕塑。此外，也有許多勸善和因果報應的故事，佛祖、觀音的雕塑，其中的佛祖，是採取緬甸式設計。萬金油花園內還有胡子欽和夫人李氏的紀念塔，展現胡氏兄弟的孝心。總體而言，整座萬金油花園是一個綜合中國歷史、民俗文化、宗教、道德價值的大型展示櫥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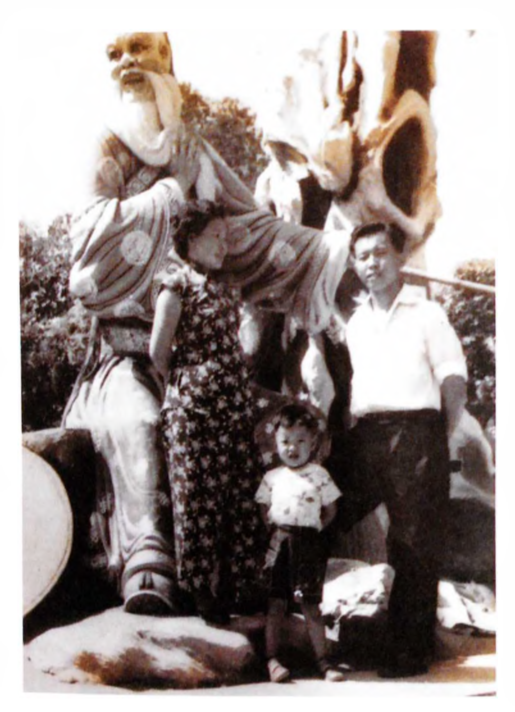
❸ A $250,000 Bungalow: "Mr Aw Boon Haw's Villa at Pasir Panjang", in Sunday Times, 31 January 1937, p.36.

值得一提的是，胡文虎並未將這座別墅和花園視為私人領域，而是具有一定的公共性。他的虎豹別墅經常用以舉辦活動、招待賓客，而外圍的萬金油花園則免費對外開放，供社會大眾入內參觀休憩。因此，萬金油花園成為新加坡一個展示胡文虎全民形象以及虎標品牌故事和企業價值的公共空間，在許多國外介紹新加坡的旅遊文宣中，也都少不了虎豹別墅及萬金油花園這一景點。

因為萬金油花園的公共性，加上它的設計定位符合當時普羅大眾的口味，因此成為當地人們假日以及訪客到訪新加坡的必遊景點，相信許多新馬華人家裡的相簿，必然會有幾頁是屬於虎豹別墅的歡樂回憶。像是在一九五七年時，馬來亞芙蓉的馮東成帶著一家大小到新加坡探親，便與妻子帶著年幼的子女到虎豹別墅遊玩，留下了一張合照。到了一九七〇年代，照片中小男孩的姊姊已到了二十幾歲，便來到新加坡工作，在戀愛時期，虎豹別墅必然也是他們的約會地點之一。到了一九九〇年代，兩人結婚生子之後，也帶著兒子白偉權到虎豹別墅遊玩。虎豹別墅和萬金油花園無疑成為本地區不同世代華人的集體記憶。

在筆者的童年記憶中，虎豹別墅是一個百去不厭的景點，它與西方的迪士尼、環球影城無異，處處充滿驚喜和樂趣。在筆者童年的九〇年代，虎豹別墅已經成為收費的主題樂園，由新加坡旅遊局所管理。除了戰前就有的那些山水、人物石雕之外，裡面也有穿著老虎、熊熊衣服的巨型卡通，以及裝扮成唐僧、古代士兵的人員可以合照。有冷氣電影院定時播放牛郎織女的動畫短片，其中最讓人期待的是「十殿閻羅」的景點。那是一座巨大的龍型建築，巨龍內展示的是十殿閻王的主題故事，以石雕模型結合聲光效果展示地獄的各種景象，用以導人向善。它最具創意的地方在於以坐船的形式由龍口駛入觀看十殿閻羅。從這樣的景點設計看來，不難想像虎豹別墅在當時人們心目中的地位。二〇一六年馬來西亞柔佛州永平（Yong Peng）的德教會，也在其寺院範圍內建造了與虎豹別墅類似的巨龍，只是規模遠比新加坡虎豹別墅的巨龍來得小。

無奈後來新加坡世代轉換之後，受英文教育的新一代對於中國傳統價值與民間故事普遍陌生，連帶對於虎豹別墅已經沒多大的興趣。再者，裡頭純粹





5
6

圖5 馮東成夫婦及兒子。
資料來源：攝於1957年。

圖6 筆者與母親。
資料來源：攝於1990年。

靜態展示的石雕也逐漸無法滿足今人的需求，虎豹別墅因而慘淡經營。這裡更一度差點被另作開發，但有鑒於它的歷史價值，最終未有執行。二〇一一年，新加坡新的地鐵環狀線開經虎豹別墅，當局也在它的門口開設以虎豹別墅為名的地鐵站。二〇一七年，筆者再度到訪此地，目的是文史考察，虎豹別墅在不同時代總會有它的意義。

星系報業

除了虎豹別墅之外，另一個因為打造永安堂藥品而產生的結果就是是胡文虎的星系報業王國。胡文虎深知媒體宣傳對於其企業發展的重要性，因此可以見到打從緬甸永安堂時期，他便已經開始在南洋各地透過平面媒體來為其商品進行宣傳了，所以早年也花了不少預算在廣告宣傳之上。在一九二六年正式將永安堂遷至新加坡後，胡文虎乾脆自行辦報，自己宣傳和打造自己的品牌，

因此便於一九二九年在新加坡創立他的第一家報社——《星洲日報》。

由於胡文虎在中國與蔣介石關係密切，也常捐資協助國民黨政府的地方建設，屬於愛國商人的標竿人物，因此報紙首頁右上角的「星洲日報」四個標題大字也是請來蔣介石題字，而「蔣中正題」的姓名落款也同時被呈現在標題左邊，向社會大眾昭示胡文虎與國府間的密切關係。有趣的是，永安堂提防假冒的廣告亦出現在此創刊號頭版的左下角。在運作上，胡文虎也請來當時著名的讀書人來擔任主筆，像是前清舉人，與康有為關係密切的維新派志士邱菽園便是星洲的第一任總編輯（見〈丹絨端：東南亞海洋及晚清歷史舞台中的「絕島」〉一章），文人郁達夫也曾


星洲日報
蔣中正題
商務印書館
SIN CHEW JIT POH, LTD.
THE CHINA OPTICAL CO.

圖7《星洲日報》創刊號上的蔣中正墨寶。
資料來源：白偉權翻拍。

被延聘為文藝版主編。此後《星洲日報》也成為馬來亞華文文學發展的搖籃，對胡文虎而言，自己旗下的報章也成為宣傳永安堂商品和其個人理念的平台。

繼《星洲日報》之後，胡文虎也在汕頭成立《星華日報》（一九三一）、廈門成立《星光日報》（一九三五）、新加坡成立《星中日報》（一九三五）、廣州成立《星粵日報》（一九三七）、重慶成立《星渝日報》（一九三七）、香港則開設《星島日報》（一九三八）、檳城開設《星檳日報》（一九三九）等，因此早在戰前，胡文虎已布下其宣傳上的天羅地網，他旗下的報紙都以星字開頭，因此人們也以星系報業稱之。

有趣的是，《星洲日報》在本地與另一家《南洋商報》形成競爭關係，而《南洋商報》的老闆便是著名的僑領陳嘉庚，他們倆經常在各方面爭鋒相對，甚至對簿公堂，例如在老虎標誌的使用、華僑中學的校門捐獻等，報紙媒體便是他們爭鋒的另一個擂台。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分家後，開啟了新加坡《星洲日報》和馬來西亞《星洲日報》的時代，大馬《星洲日報》設址在吉隆坡。到了一九八二年由於政府規定國外資本不得控制本地報章，因此胡家將《星洲日報》

轉手。隔年，胡氏家族也放棄經營新加坡的《星洲日報》，玩味的是，該報最終與《南洋商報》合併，成為《聯合早報》。新加坡《聯合早報》以及馬來西亞的《星洲日報》和《南洋商報》至今都是當地最具影響力的華文報章。雖然物換星移，但蔣中正的墨寶「星洲日報」仍然作為該報的報頭，每天出現在馬來西亞的報攤之中。位在吉隆坡八打靈再也（Petaling Jaya）的星洲總部大樓外牆大字，也是蔣中正的「星洲日報」。

客家與胡文虎

除了藥油之外，胡文虎在東南亞另一最重要但又鮮為人知的影響就是客家意識的傳播。客家人南來的時間雖早，但是當時的「客」，其實是傳統中國本籍制度中，本貫主義下的「客」，因此是以籍貫出發，而非族群的概念。由此可見客家人的團結並非理所當然，相互打鬥更是本地客家人歷史的常態。到了

二十世紀初，中國民間出現「客家非漢」的論述，引起中國乃至海外客籍人士的嘩然，胡文虎也參與了香港賴際熙連同其他客籍領袖所發起的崇正總會（見〈海山大哥與港大系主任：賴際熙與馬來亞的聯繫〉一章），團結客家人，並在賴際熙之後將崇正總會發揚光大。

繼香港之後，胡文虎也有感於南洋各地有著二百萬的客家人，他們長久以來各自為政，實為可惜，若將這些人成功團結起來，將會是很大的力量。因此也在一九二九年聯合其他馬新客籍領袖，在新加坡成立「星洲客屬總會」（後改組為「南洋客屬總會」），這個總會作為團結南洋客家人的最高機構。

為了傳播客家意識，胡文虎有系統地從論述建構開始做起，以他為首的南洋客屬總會資助香港大學教授羅香林進行客家源流的研究，撰寫《客族源流與文化》一書。他們也在一九三八年花錢從香港訂購一萬本《客家研究導論》到新加坡，並號召各地客籍富商捐款購書，並廣為宣傳客家中原正統的觀念。當時，由於中國正值內憂外患，新加坡的客籍領袖也普遍認為，加強客屬同仁之間的團結其實是祖國人民團結的一部分，不僅有助於強化反漢奸及籌賑工作，

也能發揚客家精神，❹因此胡文虎提倡組織各地客屬分會，「藉以互通声气，冀由小团结而成大团结」。❺

於是，胡文虎透過新加坡其他客籍商界領袖，到馬來半島各地區遊說地方人士成立客屬公會。過程中，當然有的地方積極響應，像是霹靂的客籍僑領梁燊南便響應胡文虎的號召，串聯地方人士成立霹靂客屬公會。有些地方也因為經費、人力的問題，而在客屬公會的設立上有不同的步調。對於這些地方，胡文虎除了派員指導之外，也會提供資金上的援助。因此胡文虎可說是新馬客家社群的精神領



圖8　霹靂客屬公會原本掛在大廳的領袖照片。
說明：左邊戴眼鏡者為胡文虎。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16年8月6日。

❹《南洋商報》，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四日，第一版。

❺《南洋商報》，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六日，第十六版。

袖，就類似於陳嘉庚在福建社群中的地位一樣，所以可以見到這些屬會在開幕時，大多也會邀請胡文虎前來主持開幕，例如笨珍、麻坡、吉蘭丹吉賴、庇朥等地的客屬公會皆是如此。胡文虎的照片，也多會懸掛在這些屬會的大廳上。根據當時的說法，星洲客屬總會在南洋所串聯的屬會，共團結了二百萬客家人，所構成的集體力量相當可觀。❻

永安堂展店台灣

虎豹兄弟自一九二三年將永安堂總部設址新加坡之後，便陸續向南洋和中國各地像是上海、香港、吧城（今雅加達）、檳城、汕頭、漢口、天津、福州、棉蘭等地設立分店。到了一九三五年（昭和十年），胡文虎也正式來到台灣展店。同年底，日本政府為了紀念在台灣執政四十年，因而在台北舉辦了台灣博覽會，當時永安堂也加入參展行列，在台北大放異彩。隔年，永安堂在台營

❻〈南洋商報〉，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八日，第八版。

業的消息也刊登在該年四月十一日的《台灣日日新報》裡，並以「虎標で世界をする永安堂台灣支店も藥種界に咆哮」為題，與胡文虎早年在新加坡《新國民日報》中的「天下第一家」廣告調調相似，展現了永安堂的自信，報章中也刊登了虎標那隻跳躍的猛虎、胡文虎的照片以及他的三大主打良藥：八卦丹、萬金油和頭痛粉的照片。

虎標永安堂在台北迅速進入狀況並非理所當然，其實在永安堂尚未在台灣設點之前，胡文虎便採取類似當年永安堂來新加坡之前的做法，即透過代理商先讓自己的商品接觸在地市場，以評估市場潛力。台灣的一些藥行像是乾元、楊裕發商行、吉祥藥房都曾代理他的商品，這些藥房都位在當時繁華的大稻埕。因此永安堂一九三五年來台時，也選擇了大稻埕的太平町三丁目，即今天的今延平北路二段一帶。從這個年代來看，可以得知一九三〇年代郭雪湖中元節期間《南街殷賑》中的永安堂，其實乃是在代理的時期或是永安堂來台初期所繪製的。而根據一九三〇年（昭和五年）五月《台灣日日新報》的報導，可以得知永安堂萬金油的台灣總代理就是乾元藥行，❼該號當時也祭出宣傳，凡

❼《漢文台灣日日新報》，一九三〇年九月九日，第四版。

是消費達三十元者，均能獲得一張免費的永樂座電影院入場券。乾元行至今仍然營業，已是大稻埕少數由日治時期營業至今的老店。

胡文虎將永安堂台灣支店的業務，委由同為永定中川胡氏的胡仲英打理，由這位宗親出任分行總經理。有趣的是，胡仲英的名字也出現在台灣新民報社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所出版，介紹台灣重要人物的《台灣人士鑑》一書當中。❽根據記載，胡仲英來自檳城，在一九二六年胡文虎到檳城開設分店時，便擔任經理職。之後又調任永安堂上海（一九二七）、福州（一九三二）分行擔任經理，協助胡文虎拓展海外業務。之後又在一九三五年回到新加坡本店任職，同年才再被派來台灣。因此在來台之前，胡仲英已擁有相當豐富的管理經驗，足以應付各種挑戰。

虎標萬金油進來台灣時，也複製了南洋的模式，一方面售賣他的商品，一方面也參與台灣的社會公益。像是在一九三〇年胡文虎到訪台北時，也順道去參觀台北艋舺聞人施乾所創設，收容乞丐的愛愛寮，當時愛愛寮剛落成，到訪的胡文虎也捐獻了五百元聊表心意。❾一九三四年（昭和九年），到訪台

❽ 台灣新民報社調查部，《台灣人士鑑》，台北：台灣新民報社，一九三七，頁九六。

❾《漢文台灣日日新報》，一九三〇年十月十一日，第七版。

北的胡文虎也曾捐獻千元，供建設消防標識之用。⑩

今天，虎標依然是人們家喻戶曉的藥品品牌，無論是馬來西亞、新加坡、台灣、香港的藥妝店及機場，都能輕易買到萬金油等虎標系列商品。若仔細關心這個藥油的過去，便會發現它所譜寫的是一部南洋華人社會及商業發展的大歷史。在戰前的那段時期，國家的界線相對模糊，而明顯的，是那塊由華人社會、商業網絡所交織出的人文地理區——「南洋」。胡文虎以及他的虎標萬金油便是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中，而成為「泛南洋」的萬金油。在胡文虎推廣萬金油及其他永安堂藥品時，我們也能從他身上看見民族、愛國、公益這些屬於那個時代的日常生活價值。有趣的是，雖然台灣因為歷史的緣故，而始終有別於「南洋」，這裡並沒有華僑社會，而當南洋華人組織抗日救國活動時，台灣漢人更是處在尷尬的位置。不過，在萬金油的層面上，無論是產品本身的使用者，或是胡文虎的行銷與管理策略，它所展現出的是一種庶民日常生活上的共性，新加坡、檳城、棉蘭、曼谷、香港、仰光、上海、台北便在這個基礎上就此connect！雖然這個時代已經成為歷史，但所不變的，還是萬金油那股不變的南洋味道。

⑩《台灣日日新報》，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一日，第八版。



9
10

圖9 虎標萬金油在台的第一家總代理——乾元行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14年10月26日

圖10 具有「南洋味道」的虎標萬金油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21年10月3日

延伸閱讀

Sherman Cochran.（2006）. *Chinese Medicine Men: Consumer Culture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古玉梁，《胡文虎報業王國：從興盛到衰落》，八打靈：文運企業有限公司，二〇〇五。

白偉權、張翰璧，〈由小團結而大團結：星洲客屬總會與南洋客家意識的傳播與維繫（一九二三—一九五七）〉，收於黃賢強編，《會館、社群與網絡：客家文化學術論集》，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客家文化研究室、茶陽（大埔）基金會、八方文化創作室，二〇一八，頁八三—一一四。

朱迪·布蘭德爾、蒂娜·特伯維利合著，胡文虎基金會譯，《虎豹花園：一位中國的百萬富翁建構的太虛幻境》，香港：胡文虎基金會，二〇〇七。

衣若芬，〈「文圖學」與東亞文化：一九二〇—三〇年代虎標永安堂藥品的報紙廣告〉，《台大東亞文化研究》第三期（二〇一五），頁一六一—一九五。

李培德，〈華商跨國網絡的形成、延伸和衝突：以胡文虎與陳嘉庚競爭爲個

案〉，《華人研究國際學報》第四卷第一期（二〇一二），頁五三—七四。
沈儀婷，《譜寫虎標傳奇：胡文虎及其創業文化史》，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二〇一三。
張永和，《胡文虎傳》，新加坡：崇文出版社，一九九三。

叁、橫向跨界的歷史

在新山遇見天地會以及它的大佬們

反清復明的天地會是中國大歷史的一部分，天地會在清代各地基層社會其實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因為它嚴格說來，還是一個地下組織，因此經常給人一種神祕且不可親近的感覺。

在台灣，清朝時期所發生的反清民變事件包含朱一貴事件、林爽文事件、戴潮春事件，都被認為很可能與天地會有關。天地會當然不一定是如我們想像中，有著「大檯」的抗清組織，它更像是一個反清的指標，只要是對於清朝有所不滿的人士，都可以高舉天地會、洪門會的旗幟來號召民眾，而各地的組織之間，並不見得具有從屬關係。另一方面，即使到了日治時代，在西來庵事件中領導抗日的余清芳，也打著「大明慈悲國」的旗幟來號召鄉親抗日，他的眾

眾手法非常「天地會」。

台灣雖然位在大清帝國邊陲，但天地會在台灣史上仍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但礙於天地會在清領下的台灣仍屬於非法組織，加上組織本身的私密性質，因此十分隱晦，很難找到有關天地會的史蹟。但在馬來半島這個清帝國的「化外之地」，天地會與民間關係的故事就變得很不一樣了。

天地會即生活

由於脫離了帝國版圖，這裡的天地會組織可以用「百花齊放」、「蓬勃發展」來形容。在清朝初年一直到十九世紀末葉，天地會對馬來半島甚至整個東南亞各地開發的重要性相當大。甚至可以這麼說，當時舉凡有華人的地方，當地經濟開發、社會領袖、底層群眾，有大部分都具有天地會背景！

這樣的說法或許會讓人覺得有點誇張，但根據英籍通譯官畢麒麟沒錯他就

是曾經任職於打狗海關及天利洋行、協同李仙得走訪琅璃地區協調羅妹號事件的畢麒麟）在一八七六年的說法，在當時海峽殖民地及各土邦的華人社會中，大約有百分之六十的華人具有會黨身分，其餘的百分之四十即使不是會黨成員，但也深受會黨的影響，會黨可說是當時華人社會生活中的一部分。值得一提的是，畢麒麟來到馬來亞後，自己也加入了天地會，成為天地會的一員！

由此看來，除了一些會內儀式本身就具有祕密性質之外，它已經算是公開的團體了。因此，新馬地區早期的開發史，自然也與天地會組織脫離不了關係。既然天地會組織對於馬來亞有著這麼高的重要性，且公開程度又比較高，要在田野中尋找到它們的蹤跡，也並非是件困難的事情。

天地會組織與柔佛的開發

在馬來半島的開發歷史中，有兩個非常大的天地會分支，它們是義興會

和海山會，各區域像是柔佛、森美蘭、馬六甲內陸、吉隆坡、霹靂等地的義興會和海山會並不見得有必然的連結或從屬關係，但它們的開發都離不開這兩大組織。以吉隆坡為例，它的開發者便是海山會的領袖葉亞來，在殖民時期，他也受委為甲必丹。若要尋找天地會蹤跡，筆者認為亞洲大陸最南端的城市——新山或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新山是柔佛州的首府，與新加坡隔海相鄰，現今人口大約一百萬餘人。新山開埠於一八五五年，它的開發主要與十九世紀新加坡的胡椒、甘蜜種植經濟有關。在當時，新加坡是本區域的胡椒、甘蜜種植中心，而在新加坡內陸從事種植的集團，幾乎都是天地會組織的成員，後因土地的不足以及土產價格波動，導致種植集團之間、種植者與收購者之間發生了土地及利益的糾紛。

在此情況下，獨具慧眼的柔佛統治者天猛公看好柔佛土地面積的優勢，便向新加坡的種植人伸出橄欖枝，邀請他們注資柔佛。同時，天猛公為了避免新加坡會黨惡鬥的情形在柔佛發生，他更在一八七三年的法令中明令獨尊義興的政策，意即任何進入從事胡椒、甘蜜種植的人，都必須承認義興是唯一的天

地會組織。由此，偌大的柔佛成為天地會義興成員們的樂土。

❖ 歷史小辭典

天猛公

傳統馬來官僚體系中的重要官職。從馬六甲王朝以至（舊）柔佛王朝時期，其在朝中的地位便僅次於蘇丹底下的丞相（Bendahara）。天猛公相當於現代的內政部長以及總督，主要負責轄區內的司法、治安、防禦、外國（商）人事務和貿易商品的稅收等。其餘在馬來官僚體系中常見的官職還有財務大臣（Penghulu Bendahari）、海軍大將（Laksamana）以及港務官（Syahbandar）。

義興進駐柔佛之後，各地的原始森林開始轉化為片片的胡椒、甘蜜種植園，柔佛一躍成為十九世紀世界最大的胡椒、甘蜜出口國。椒蜜經濟自此也成

為柔佛經濟的骨幹。由此可見馬來統治者與義興領袖、華商之間的緊密互惠關係。就連新加坡殖民政府要求柔佛統治者蘇丹阿布峇卡（Sultan Abu Bakar）封禁會黨，也遭到拒絕，甚至表示他自己就是義興的一員！因為義興公司在柔佛的法定地位，我們至今能夠在柔佛見到許多有關天地會組織的史蹟。



圖1 柔佛統治者蘇丹阿布峇卡。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Public Domain）

新山的天地會蹤跡

一八四四年，第一個響應天猛公號召，進入柔佛開發的便是潮州籍的義興領袖陳開順，在一八五五年新山建鎮時，他也受委任為柔佛第一任華人甲必

丹。陳開順於一八五七年在新山郊區的陳厝港逝世，陳厝港的地方廟——靈山宮還供奉著他的牌位。這個牌位是後人所製，他當時的神主牌則安奉在新加坡的義興公司——五虎祠當中，而牌位上還刻有「侯明義士」的字眼。

此外，陳開順的墓碑也在二〇二〇年出土，有趣的是，這位逝世於一八五七年的人，墓碑抬頭所刻的年號，竟不是「清」而是「明」！他神主牌上的「侯明義士」四個字也出現在墓碑上，天地會組織意識相當濃厚。另一方面，這些無法回國的天地會領袖雖然無奈，但也只有在馬來半島這片「化外之地」，他們才能享有這麼大的自由度。

除了陳開順之外，柔佛十九世紀的重要社會領袖，大多也具有義興背景，更是組織的領導人。像是柔佛第三任甲必丹佘泰興，他同時也是當時柔佛國議會當中的成員。今柔佛大皇宮前面的敦伊斯邁路（Jalan Tun Dr.Ismail），在一九七〇年代前，都稱作佘泰興路（Jalan Tai Heng），可見其重要性。此外，另外兩名義興領袖佘王癸以及二哥林亞相，以他為命名的道路至今仍然存在。

義興作為柔佛最大且唯一合法的黨派，新山的路名自然少不了以義興為

名的「義興路」Jalan Ngee Heng，我們所見到的路名，是以潮州話音譯的「義興」，契合本地義興以潮州人為骨幹的歷史，若換做是在與福建話為主的檳城或是新加坡，應該就被譯作是「Ghi Hin」了。

義興路在過去位處新山市區的尾端，連至郊區。現今，隨著都市擴張，現在的義興路早已成為新山市核心區內的道路了。義興路所連接的末端，則是義興村（Kampung Ngee Heng）。在義興村內，也能找到一所名為「義興」的政府小學（台灣稱「國小」）——Sekolah Kebangsaan Ngee Heng，這所學校至少在一九二〇年便已經出現。總體而言，我們所見到的義興路名，幾乎都位在新山市區，有的甚至還是主要幹道。

這些以天地會組織領袖為名的地名與街名雖然也能夠在台灣找到，像是台中大理的爽文路、爽文國中，南投中寮的爽文國小、爽文國中，台南的永華路。但不同的是，台灣是後來的政府因為不同的政治意識形態而給予命名的。新山的則是當朝政府所給予的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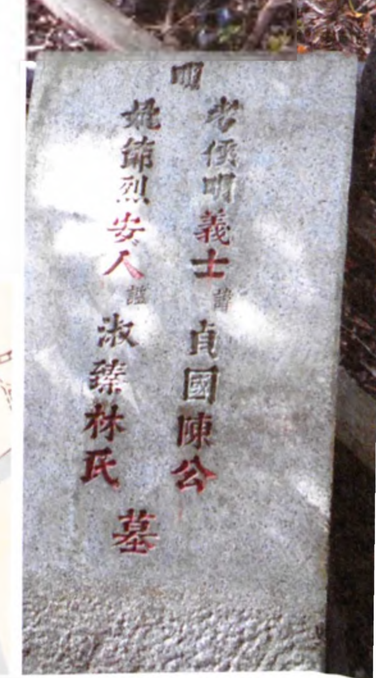






圖2 柔佛甲必丹陳開順刻有「明」字的墓碑。
資料來源：舒慶祥先生提供，攝於2020年1月。

圖3 在1944年的新山街地圖（局部）中可見到Jalan Tai Heng（余泰興路）。
資料來源：白偉權翻拍自Great Britain. Inter-service Topographical Department & Great Britain. War Office. (1944). *Johore Bahru town plan*. Retrieved 18 Sept 2021, from http://nla.gov.au/nla.obj-232754282.

圖4 新山關卡外可見到Jalan Jim Quee余仕癸路的指示牌。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13年1月1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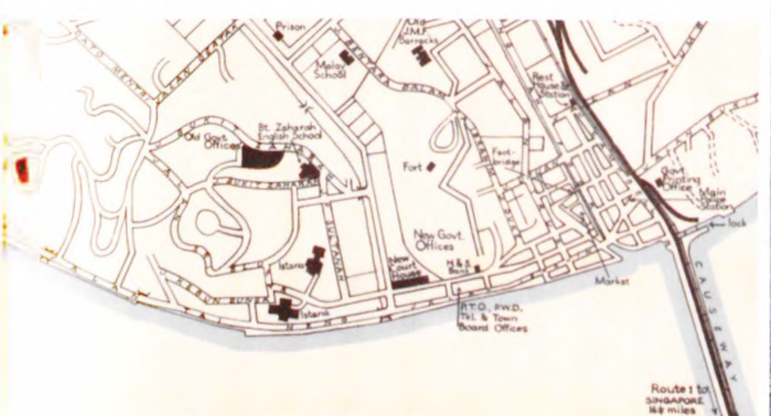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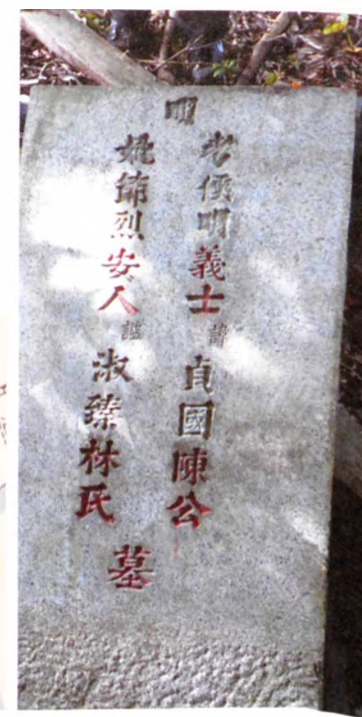


公司山
（今綿裕亭義山）
義興路
義興小學
義興村
林亞相路
佘王癸路
佘泰興路
（今敦伊斯邁路）
往新加坡
0
500公尺
柔佛海峽

5　圖5 新山市中心的義興路。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13年2月7日。

6　圖6 新山市區義興相關的地景。
資料來源：白偉權繪，底圖取自 openstreetmap.org.







3 2
4

圖2 柔佛甲必丹陳開順刻有「明」字的墓碑。
資料來源：舒慶祥先生提供，攝於2020年1月。

圖3 在1944年的新山的地圖（局部）中可見到Jalan Tai Heng（佘泰興路）。
資料來源：白偉權翻拍自Great Britain. Inter-service Topographical Department & Great Britain. War Office. (1944). *Johore Bahru town plan*. Retrieved 18 Sept 2021, from http://nla.gov.au/nla.obj-232754282.

圖4 新山關卡外可見到Jalan Jim Quee（余[illegible]癸路）的指示牌。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13年1月14日。



公司山
（今綿裕亭義山）
義興路
義興小學
義興村
林亞相路
佘王癸路
佘泰興路
（今敦伊斯邁路）
往新加坡
0
500公尺
柔 佛 海 峽

5

6

圖5 新山市中心的義興路。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13年2月7日

圖6 新山市區義興相關的地景。

資料來源：白偉權繪，底圖取自openstreetmap.org.

義興大佬們長眠的義山

另一個較容易遇見天地會的地方，當屬新山義興成員或領袖長眠的義山或公司山了。在新山的公司山（綿裕亭義山）裡頭，最值得一看的就是刻有天地會反清復明意味的「洕」墓。根據蕭一山所編的《近代祕密會社史料》，「洕」字也出現在清代天地會的文件當中。「洕」是一個天地會成員所使用的祕密文字，作為「清」字的取代，寓意清朝無主，大明復半。

❖ 歷史小辭典

義山／公司山

義山是台灣所稱的公墓，在海外華人的脈絡中，主要是上層社會為許多客死異鄉的社會基層人士處理喪葬需求的一種社會照顧，因此以「義」字稱之。

由於早期的開發多是以公司股份制的方式進行，而我們所提的天地會組織到了東南亞之後，也因為維生所需而逐漸演化為具有商業性質的集團組織。到最後，天地會內的商業意味甚至要比它原先的政治意味來得強，因此可以見到馬來半島許多地方的開發都是由天地會背景的公司來包辦，在此情況下，公司為底下客工及居民而設立的義山又被稱之為「公司山」。

「汨」字墓現今主要出現在柔佛、新加坡、廖內等南馬區域的義山，至今還未在馬來半島南部以外的其他地區發現。作為唯一獨尊義興的國家——柔佛國的首府，新山無疑擁有數量最多的「汨」墓，達一百五十七座。筆者相信在世界其他的角落，應該找不到其他更密集分布的天地會組織遺跡了。

在這些「汨」墓墓主的身分上，幾乎九成為潮州籍，再從這些「汨」墓墓主的配偶情況以及石材的使用來看，他們多少具有一定的社會經濟地位，似乎不是一般的基層會眾。

當然，在整個義山當中，我們也能見到一些新山歷史上著名義興領袖的墓碑，像是佘王癸墓以及佘勉旺墓。有趣的是，作為新山義興金字塔頂端的領導人，他們的墓碑不僅未見到「氵月」的字眼，反而使用的是「清」字作為墓碑抬頭，在年代上也是用清朝皇帝的「光緒」紀年。更妙的是，他們也曾向清廷捐



圖7《近代秘密會社史料》中的反「氵月」復明圖
資料來源：白偉權翻拍自蕭一山編，《近代秘密會社史料》，台北：文海，1972
圖8 刻有「氵月」字的墓碑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14年8月18日

購官銜，佘壬癸官拜奉政大夫，佘勉旺官拜儒林郎。這些輸捐行為或許是出於愛國心，更有可能是清廷的捐官制度提供了他們在本地提高社會地位的機會。

這些案例也讓我們細緻的了解到，所謂反清復明的天地會組織，並非是我們想像中，如同金庸武俠小說般這麼政治性，而更多的是社會及商業色彩，凸顯了海外華人那種能隨環境變化，能屈能伸的逐末個性。

綿裕亭義山的另一個重要天地會史蹟是一座刻有「明」字的「明墓」，它是義興公司的總墳，建造於一九二一年。那是當時柔佛政府❶封禁會黨之後，末代義興成員將組織信物進行安葬的衣冠冢。

當時的義興公司在清盤時，也將部分財產二萬元捐給新山華人社會創辦的寬柔學校。至今，每逢春秋二祭，寬柔校董都會前往綿裕亭義山致祭。在致祭場合中，一眾興學辦校的社會領袖與前面的天地會總墳，形成獨特的風景。沒錯，在傳統的華人社會當中，祕密會社是一種社會的常態，也是一種生活方式，他並非如一般想像中，一定是黑白分明的，或一定非得定義是黑是白、合法或是非法。就像亞洲第一學府香港大學主樓的陸佑堂，經過穿堂陸佑銅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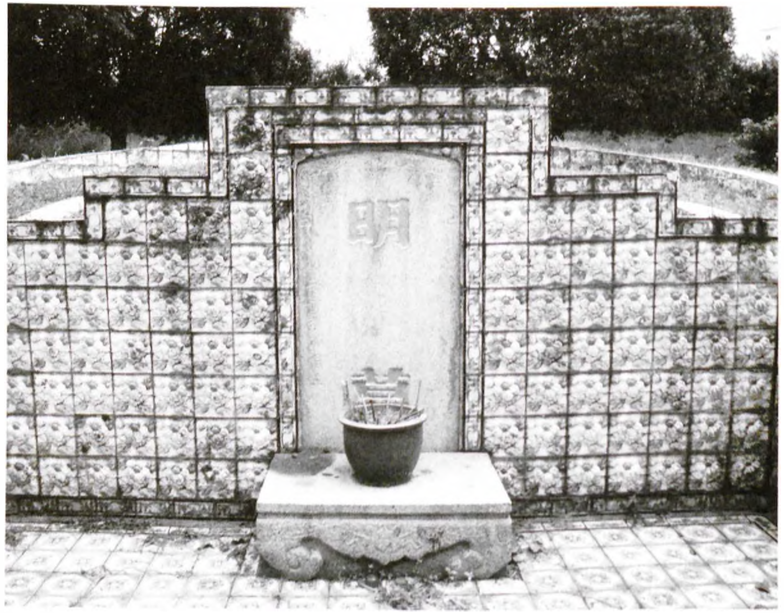
❶柔佛在一九一〇年便已成為英國保護邦。

的同學們，又有誰會想起早年捐資港大辦學的陸佑，曾經是新馬甚至香港的鴉片專賣大王呢？（見〈港大的陸佑銅像：尋訪香港與馬來亞的歷史聯繫〉一章）

天地會組織隨著移民的腳步，往東來到台灣，亦往南來到東南亞。而在馬來亞的天地會與台灣的相比，當然有其相同與相異之處。天地會組織的祕密性質與結社方式，估計大同小異，不外乎一些祕密祭祀儀式、暗號、手勢，以及作為對現實社會或政治體制不滿而聚眾結盟的號召。然而，位居帝國邊陲的台灣，無論再怎麼邊陲，它終究還是屬於帝國之域，無論在經濟型態、政治體制上，都與馬來亞的環境有很大的差異。

在東南亞，這片化外之地無心插柳地為這些在帝國被封禁的人物提供了絕佳的發展舞台，使他們從「流寇」成為這片土地和社會發展的推手。因此從新山的田野中可以見到，天地會組織被馬來統治者獨尊、天地會領袖受委為管理底下華人的甲必丹、新山市街出現以他們為名的道路、義山中有著刻上天地會祕密文字的墓碑、天地會組織捐獻文教，學校董事每年前往天地會總墳致祭的這些情景。可以見到天地會這個中國近代的大歷史也落實在現今新山人的日





9
10

圖9　向清廷捐官的義興領袖佘勉旺大墓。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10年8月8日。

圖10　義興總墳——明墓。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10年1月25日。

常生活當中，只是在新山所見到的這些天地會人名和組織名，或許早已被賦予其他的意義。

延伸閱讀

白偉權，《柔佛新山華人社會的變遷與整合：一八五五—一九四二》，加影：新紀元學院，二〇一五。

白偉權，〈綿裕亭義山的「涓」墓〉，收於安煥然編《新史料．新視角：青年學者論新山》，新山：南方大學學院，二〇二〇，頁一—二四。

白偉權、陳國川，〈從政治標示到族群邊界：馬來西亞柔佛州新山綿裕亭「涓」與「皇清」墓的研究〉，《南洋學報》第六十八期（二〇一四），頁八五—一一八。

莊欽永，《實叻峨嘈五虎祠義士新義》，新加坡：南洋學會，一九九六。

陳育崧，《椰陰館文存》第一卷，新加坡：南洋學會，一九八三，頁五八—五九。

派衍海國：大航海時代中的新江邱氏族人

在省道台十七線台南七股段一帶，曾經過非常大的一片魚塭區，而此魚塭區中間有座聚落，那便是篤加社區。這個看似平凡的海線聚落其實來頭不小，它是全台最大的單姓村（社區），這裡的居民幾乎都姓邱，台灣南部許多姓邱的人士有不少也是出自這個地方。

篤加社區已有幾百年歷史，它的開基祖邱乾成早在乾隆年間便由福建漳州海澄的新江社遷居台灣。來台後，他輾轉來到篤加，並在此建立了他這一系的祠堂，稱作「龍田祠堂」。龍字來自新江邱氏本身的姓氏堂號，他們的開基祖本姓曾，而曾的堂號是龍山堂。另按照原鄉的分房，邱乾成屬於田房，故以龍田為名。

篤加社區以文衡殿為信仰中心，供奉廣惠尊王（謝安）和謝府王爺（謝玄），兩尊神也稱作王孫大使爺或王孫元帥，這也是邱乾成由原鄉祖廟分香而來。篤加邱氏的宗族凝聚力強，並且要求格守祖訓，每年冬至是邱氏族人的祭祖日期，在祭祖當天，全台各地的邱氏族人都會回到篤加參與祭祖活動。

這裡也盛傳外姓不得入村的習俗，即外姓不得在當地建立家庭。居住在此的邱氏宗族有著自己的公產，足以維持一些村內的公共開銷，家訓也明確規定他們不能分家，必須全都維持在龍田祠堂底下。村中也有一所篤加國小，該校早期學生清一色為邱姓，估計當時在此就讀的學生應該難以發展學生戀情。現今，該校單一姓氏的特色已經淡化。但無論如何，篤加的邱氏是一個相當特殊的宗族組織，內部具有很強的聚合力，能讓他們在早期台灣這個移墾社會當中持續保持強盛。

然而，若站在更大的視角來看台南篤加邱氏的話，則會發現在過去大航海時代當中，這支宗族在從福建遷往台灣發展的同時，也有許多的族人往南到更遠的地方發展。其中，馬來亞便是邱氏的另一海外大本營，他們在南洋的發

展並不亞於台灣的邱氏，而篤加邱氏只是海外眾多新江邱氏支系的其中一環。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新江邱氏在馬來亞的發展。

殖民港市中的新江邱氏

新江邱氏南來的時間相當早，在馬來半島幾個較早開發的殖民港市都有他們的足跡。其中比較早的記錄是在馬六甲，根據馬六甲最古老的廟宇青雲亭中的《興隆邱公牌記》，青雲亭亭主薛佛記❶（一八四三—一八四七任亭主）的外祖父便是來自新江社的邱興隆，按照他辭世的年代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計算，他可能在乾隆初年便南來馬六甲了，他的神主牌與馬六甲其他甲必丹、亭主的牌位共同並列於青雲亭的神龕之上。除了他以外，神龕上也有另一名邱氏族人邱士堅夫婦的牌位。由於神龕上的牌位並不多，因此相信他們都是當時的重要人物。

❶ 薛佛記也是新加坡開埠後，第一批由馬六甲前往新加坡經商的商人之一，是馬新歷史當中的重要人物。

無獨有偶，馬六甲三寶山上也有一塊誌期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的邱士甲墓，估計與青雲亭內的邱士堅來自同一家族。在嘉慶六年（一八〇一），青雲亭也進行了一次重修，在其《重興青雲亭碑記》當中，便有多名邱氏族人❷資助了此次的重修，而碑文撰寫人也是邱氏族人邱華金。在青雲亭正殿之上，也有兩塊由邱氏族人所致贈的匾額，第一塊是誌期嘉慶己巳年（一八〇九），由「澄邑新江太學生邱君惠」所致贈的「慈悲永現」匾，另一塊則是「澄邑新江太學生邱遜康」致贈的「道濟咸安」匾，唯年代不詳。❸

上述這些牌位及墓碑的墓主生活的年代與台南篤加邱氏的開基祖邱乾成（乾隆二十三年，一七五八年移居台灣）屬於同一個時期，而當時的馬六甲正值荷蘭統治時代。由於馬六甲開發較早，因此相信這裡是馬來半島邱氏族人最早落腳發展的地方。從他們所留下的文獻紀錄看來，這些亭主外祖父、贊助人、太學生身分都在在告訴我們，邱氏族人在馬六甲的勢力並不容小覷。

❷ 二十六名捐獻者當中，便有五人來自邱家。

❸ 在青雲亭後殿還有邱五茂兒子邱振增於光緒甲午年（一八九四年）所致贈的「佑我安康」匾。

❖歷史小辭典

青雲亭

位於馬六甲老街區內，是馬來西亞現存歷史最悠久的廟宇，創建於一六七三年荷蘭殖民時期，主祀觀音。青雲亭不僅是馬六甲華人社會的信仰中心，同時也是社會權力核心。

在荷蘭時期，殖民政府所委任的甲必丹都是青雲亭的領導人，到了英殖民時期，政府雖然廢除了甲必丹制度，但仍以亭主為政府治理華人社會的代理人。因此青雲亭也被稱為「華民之政務機構」，舉凡華人社會的糾紛訴訟、治安、祭祀、婚喪、福利等大小事務，都由亭主掌理，青雲亭自然也成為處理政務的地點。

如今，青雲亭已成為馬來西亞歷史古跡，也是世界文化遺產區的一部分，廟內除了祭祀的拜殿之外，也藏有不少清代和民國時期的石碑、匾額、楹聯。

除了馬六甲之外，檳城可說是邱氏族人在馬來亞的大本營，檳城在一七八六年開埠之后，便有很多華商從四面八方像是吉打、馬六甲、暹羅等地前來這個充滿希望的自由港定居或發展，從最早的嘉慶五年（一八〇〇）檳城廣福宮建立碑文《剏建廣福宮捐金碑記》當中，便可以見到相信是馬六甲甲必丹蔡士章「蔡甲必丹大」的捐款。在道光四年（一八二四）的《重建廣福宮碑記》當中，也可見到馬六甲青雲亭亭主梁美吉位居緣首的捐款，這位馬六甲社會領袖也擔任了廣福宮的董事，他的董事名字排行第二，在邱明山之後。此外，在一八四〇年代期間，馬六甲青雲亭亭主薛佛記也在檳城擁有椰園。❹因此相信檳城最早的一批邱氏族人除了從福建南來之外，很可能也有許多由馬六甲落腳檳城的族人。

檳城的邱氏族人也沿用了原鄉的曾氏堂號，在檳城成立了自己的祠堂——龍山堂，作為整個宗族的最高機構，龍山堂也供奉邱氏宗族的守護神大使爺、福德正神以及邱氏祖先牌位。一般而言，歷史學者也會將神主牌由原鄉遷移至移居地視為在地化的判斷標準，由此可見檳城邱氏族人已經算是在檳城落地生

❹ 見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年）的吝都檳榔《福建義塚碑記》。

根，視檳城為家了。在檳城這個貿易港市，龍山堂也有著富有商業色彩的名字，稱作「龍山堂邱公司」。

檳城邱氏按照第四世到第八世所繁衍的後代，可以分為四大角，這是他們的宗族結構，而每一大角又由不同的房頭所組成。像是第一角由海長、海二、海三、海四、海五五大房所組成，通稱「海墘角」；第二角則是由梧房、宅房、井房三大房組成，第三角為門房、嶼房兩大房所組成，第四大角則為岑房、田房、松房三大房所組成。各房子孫後來也另外成立文山堂邱公司（海長至海五）、邱氏敦敬堂公司（松、嶼、門、井、梧）。年代上，文山堂邱公司甚至比龍山堂成立得更早，但大家還是以龍山堂為宗族的最高組織。龍山堂邱公司由四大角各派代表，組成二十八人的信理會共同管理。他們在馬來亞仍採用中國傳統社會的族長（家長）制進行管理，族長有權裁決宗族內部的事務，權力如同現代概念上的司法權。族人的名字也採用的家族排輩的輩序詩（第八世至第四十七世），這首五言詩與台南篤加的家訓完全一致：





3 | 1
2

圖1 太學生邱君惠所致贈的「慈悲永現」匾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19年4月6日

圖2 檳城老城區內的龍山堂邱公司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13年8月27日

圖3 邱氏族人在南洋的大本營——殖民港市檳城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15年1月29日

圭璧呈雲瑞，人文煥國華；
台衡思繼武，鼎甲勵承家；
一貫書紳永，千秋錫福遐；
貽謀資燕翼，世業仰清嘉。

由於邱氏族人是檳城十八世紀末開埠以來的第一代居民，發展至十九世紀中葉，他們至少已經到達第四代了，許多邱氏族人也充分融入這個殖民地社會，能夠口操英語及馬來語，因此後世學者也多把他們歸入福建峇峇社群的分類之中。與邱氏發展類似的，還有檳城的謝家、林家、楊家、陳家，他們並稱為檳城五大家族。



邱氏家族在南洋的商業王國

作為檳城最早的家族之一，邱氏族人早已在各個領域中占盡先機，以致在各不同時代的政商界當中都能見到邱氏族人的身影。邱氏族人所經營的，又以土產（香料、錫礦、經濟作物）收購、船運、餉碼（鴉片、賭、酒）、苦力販運為主，這些都是早期馬來亞的大生意。

其中較著名的是海長房的邱天德，他是龍山堂及文山堂邱公司的董事，也是檳城和霹靂著名的餉碼商，他往來殖民地和馬來王國之間，為殖民政府及馬來統治者承包當地鴉片、酒、賭等專營項目的稅收。他在檳城也擁有大片土地，種植椰子等經濟作物。他也是當時檳城最大的苦力販運商。除了檳城之外，他在十九世紀中葉也參與投資霹靂的錫礦，因而與當地的採礦集團海山公司建立同盟關係。他所生產及收購的錫礦，也藉由自己的貿易公司坤和以及振美號進行銷售。邱天德也經營船運，穿梭於檳城、緬甸的毛淡棉（Moulmein）、蘇門答臘亞齊、暹羅攀牙（Takuapa）以及新加坡，同時收購當地的土產，像是毛

淡棉的米、攀牙的錫、亞齊的胡椒等來到檳城轉口。

另一位與邱天德一樣對於霹靂有較深介入的是邱允恭，他也是檳城的貿易商，後來也接手邱天德在拿律的利益，包含礦場和餉碼，他也開設熔錫廠，將所收購的錫礦進行加工、轉賣。邱允恭後來也投資瓜拉江沙（Kuala Kangsar），成為霹靂拿律戰爭之後，投資瓜拉江沙的第一批華商。

另一位不得不提的邱氏族人是梧房的邱忠波，他是檳城和新加坡著名的船運商，他旗下有多艘船隻往來檳城、拿律、新加坡，以及原鄉的廈門和汕頭港。他的船隻除了載送貨物之外，他也是苦力販運商，每年從中國運載一船又一船的苦力前來南洋。邱忠波也是拿律的錫礦投資者，在一八八一年，邱忠波也獲得新加坡的菸酒餉碼承包權。

除了在新馬發展的邱氏族人，也有族人往其他檳城周邊的區域發展，像是松房的邱朝仲，他最初也是在檳城及霹靂發跡，之後便遷往蘇門答臘中部的亞沙漢從事胡椒種植及糧食供應。由於邱朝仲能口操英語及荷蘭話，因此也相當受到荷蘭殖民政府的賞識，受委任為亞沙漢名譽甲必丹（Kapitan Titular，

甲必丹智廚禮）。他也在二十世紀初承包了蘇門答臘東部的賭博餉碼。其實像邱朝仲這樣，在荷屬東印度群島擔任領導階層的檳城邱氏族人也大有人在，像是任雷珍蘭的邱珍蘭；在一八八七年受委為日里拉布漢名譽雷珍蘭的邱登果；邱登果的兒子邱清德則於一九二二年受委為蘇門答臘棉蘭市的瑪腰，這已是荷蘭屬地華人的最高官銜。邱清德也是當地中華商會、福建會館的主席，也是蘇門答臘東岸賭博和鹽的餉碼主。

到了十九世紀末，檳城邱氏族人也開始將觸角伸入馬來半島南部區域。像是邱天德的兒子邱漢陽及孫子邱守仁、邱守義，以及族人邱仙丹等人也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這段期間到在新加坡投資於酒餉碼。他們也以新加坡為基地，將餉碼承包範圍擴及柔佛、馬六甲、廖內，甚至砂拉越。在同一時期，由於世居檳城的邱氏族人大多能掌握英語、馬來語甚至荷蘭語，因此他們也任職於檳城的歐資洋行，成為洋行買辦。買辦是連結地方和世界市場的中間人，占盡市場先機。檳城早期的洋行如 Friederichs Co、Katz Brothers、Mansfield, Bogaardt & Co、Schmidt, Kustermann & Co、Brown & Co 等洋行的職員名單，

都能見到邱氏族人。

許多人說富不過三代，然而邱氏族人卻打破這個規律，他們的光芒從十九世紀至今仍未消退。像是新加坡的邱氏家族便是如此。在十九世紀，邱揚陣從福建南來新加坡發展，在當地經營白米以及土產收購貿易，他也是新加坡漳州總會的發起人之一。他的幾個孩子也前往新加坡發展，當中最有名的是邱德拔，他投身銀行界，在新馬還未分家的時候，他創建了馬來亞銀行（Maybank）。馬來亞銀行至今還是馬來西亞最主要的銀行機構。後來他們也進軍房地產及酒店業，新加坡知名的良木園酒店（Goodwood Park）、假日大酒店、馬



圖4 19世紀馬新地區著名的邱氏族人。
說明：1. 邱天德；2. 邱朝仲；3. 邱漢陽；4. 邱仙丹；5. 邱揚陣。
資料來源：白偉權翻拍。

可波羅旅店等都是由他所創立，他更曾在二〇〇三年被《富比士》雜誌（*Forbes*）選為新加坡首富。在邱德拔過世後，以長女邱美玉（Mavis Khoo-Oei）為首的邱家（Khoo Family）也常年在福布斯新加坡富豪榜中排名前十。❺

邱氏家族的案例當然不是普遍的，要如何在那個年代保持控制力，而歷久不衰，其實不僅僅只是依賴商業上的打拚，還必須仰賴社會事務的參與。

公益事業、祕密會社及家族聯盟

邱氏家族在檳城的勢力很大程度上是源於對於各種公益事業的積極投入，藉由這些投入從中獲取社會資本，而此社會資本往往又能轉化為經濟資本，如此不斷正面循環，促成家族在社會上持續發揮影響力。

邱氏族人打從檳城開埠初期，便在檳城華人社會當中嶄露頭角，甚至扮演領導者的角色。目前最早的記錄是早在嘉慶十年（一八〇五）的義山增建紀

❺ 邱德拔家族雖然是從福建直接前往新加坡，但他的家族與檳城龍山堂邱公司亦有來往密切，到了邱德拔的時代，邱德拔也出錢資助檳城邱公司歷史文物館的建立。

錄當中，當時就已經有多名邱氏家族的成員參與了峇都蘭章（Batu Lanchang）福建公塚的增建。到了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邱氏家族的邱商，更成為了福建公塚的六名董事之一。在此之後的峇都蘭章福建公塚各年度的董事名單紀錄當中，都能夠見到邱氏族人的身影，像是邱如磋、邱心美、邱天德。而在檳城福建社群在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建立浮羅池滑（Pulau Tikus）福建公塚時，邱氏的邱峻文、邱峻對也是當中的董事人，捐獻名單中亦有不少邱氏族人。而檳城另一座福建義山——峇都眼東（Batu Gantong）也是如此，邱天德也是董事之一。

在檳城廟宇等其他社會公共事務上，也都可以見到邱氏家族的介入。在檳城的福建社群當中有幾間重要的廟宇，分別為清龍宮、俗稱蛇廟的清雲巖、水美宮、城隍廟，邱氏族人也都是裡面的重要人物，在不同時代年代的廟宇募款當中，捐資最多的那一位，也都是邱氏的成員，這些廟宇的董事人、總理也都來自邱氏家族，顯見他們在一段很長的時間當中，都不斷領導著福建社群。其中最常出現在這些捐款碑刻裡面的人物便是邱公司的董事、建德堂領

導人邱天德了，他在福壽宮（一八七七）、城隍廟（一八七九）、清雲巖（一八八○）、清龍宮（一八九一）的募款中，都是出力最深者，也是其中的總理和董事。一八九一年邱天德辭世以後，可以見到他的兒子邱漢陽在一九○○年以後也繼承他的衣缽，成為這些組織的董事及出資人。

邱氏族人在社會公共事務上的深入參與並不僅限於檳城，一些有著邱氏族人商業利益的地區，同樣也能夠見到他們對於社會公益事業的投入。像是在霹靂的拿律礦區，邱氏在當地有大量利益，因此在當地福建人的信仰中心鳳山寺，也能夠見到邱允恭的商號（中和）以及邱天德排名前二的捐款。在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太平福建義山的董事人名單中，也能找到邱氏的族人：邱陞蘊、邱如語、邱永祿，在十四名董事當中，邱氏便占了三人。另一方面，往新加坡發展的邱揚陣，也在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資助新加坡龍山寺的興建，他在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也捐獻了一口銅鐘及鼓予新加坡城隍廟，該銅鐘也刻有他以及五個兒子德順、德全、德拔、德音、德貫的名字。

邱氏族人另一個掌控檳城福建社群的重要途徑是祕密會社，即一般所俗

邱氏族人在檳城華人社會信仰領域中的投入

宮廟	緣首	董事	總理	族人
水美宮		✓		董事：邱心美（1822） 董事：邱有用（1918）
廣福宮		✓		董事：邱明山（1824）、邱峻整（1824）、邱石泉（1862）
福壽宮	✓	✓		緣首：邱天德（1877）、邱宜保（1884） 董事：邱啟福（1884）
金和宮受天宮		✓		董事：邱如磋（1877）
城隍廟	✓	✓	✓	緣首：邱天德（1879） 總理：邱天根（1879） 董事：邱天德、邱金經（1915）、邱清照（1927）、邱文岳（1927）、邱手掌（1927）
清雲巖	✓	✓	✓	緣首：邱天德（1880） 董事：邱天德（1880）、邱如磋（1880） 總理：邱天根、邱天德、邱如磋
清龍宮	✓	✓		緣首：邱天德（1891） 董事：邱漢陽（1907）、邱衡本（1922）
慈山寺	✓			邱漢陽（1903）
極樂寺		✓		董事：邱漢陽（1907）

資料來源：整理自張少寬，《檳榔嶼華人寺廟碑銘集錄》，檳城：南洋田野研究室，2013。

稱的會黨。當時的會黨組織有別於今天概念中的犯罪團夥，而是一種華人社會最基礎的組織方式，這種形式源於明末清初流亡到南洋地區的反清義士。到了十九世紀，根據畢麒麟的說法，絕大部分華人都有會黨身分，因此會黨可說是華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檳城開埠時，大部分華人主要隸屬於天地會組織義興公司，然而到了一八四〇年代，義興內部發生糾紛，後來以邱公司家長邱肇邦為首的一眾漳州福建人從中脫離，於一八四八年成立建德堂（也稱大伯公會）。根據一八六〇年代建德堂的先生Lim Beng Kwa的說法，留在義興內的福建人以泉州人為主，出走組織建德堂的人則以漳州籍的五大家族（邱家、謝家、林家、陳家、楊家）為首，除了陳家之外，其餘的家族都是來自漳州海澄三都地區，邱公司的家長邱肇邦便是這個組織的創始人。由於建德堂的領導人多來自五大家族，他們在檳城扎根數代，因此建德堂也被認為是由福建峇峇所領導的祕密會社。這五大家族也在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共同組成「福建公司」，成為福建社群檯面上的最高機構。

在建德堂的領導層方面，同樣由大哥、二哥、三哥領導，下有先生及紅棍一名，在兩者之下擁有兩個理事會，前者是由四名成員組成的高級理事會、後則是由十二人組成的次級理事會，這些組織底下還有各地頭（地段，相當於台灣的「角頭」）的代表。在福建人為主體的檳城社會，建德堂可說是當時影響力最大的集團，控制著大量的資源。而在邱肇邦之後領導建德堂的，便是邱公司的董事邱天德了，他可說是檳城最有影響力的華人。

檳城曾經在一八六七年爆發過義興和建德堂之間的「檳城大暴動」（Penang Riots），衝突長達十餘天，死傷慘重。在此衝突當中，作為會黨領袖的邱天德因而被殖民當局被判處死刑，但考慮邱天德在檳城華人社會的影響力，政府最終未執行判決，邱天德只被關押七天後獲釋。此外，邱天德的弟弟邱天保則為建德堂的第二把交椅。

❖歷史小辭典

檳城大暴動

一場發生於一八六七年的社會衝突，涉及事件的兩造分別為福建人為主的建德堂（大伯公會）和以廣府人、客籍人士為主的義興公司，事件源於兩派在拿律的利益紛爭，最終在檳城因為一些細故而暴發蔓延全檳城的大規模衝突。其中，建德堂與馬來人的紅旗會結盟，義興公司則與馬來人的白旗會結盟，兩大對立陣營械鬥持續十餘天。

過程中，雙方也使用了大砲與槍械，建德堂下令只要看到廣府人就得發動攻擊，義興也出價十二元或二十元懸賞建德堂會員及領袖的人頭，一些馬來村莊以及邱天德在壟尾（Paya Terubong）的房子也在衝突中被燒毀。檳城的這場暴動也令檳城歐洲社群及英國政府首次遭受到華人社會衝突所帶來的威脅，一些歐洲人為主的社區也紛紛搭建起武裝柵欄以求自保。現今檳城喬治市龍山堂邱公司前的Cannon Street即「大銃巷」，便

是因為檳城大暴動中，建德堂陣營架設大砲而得名，另一說法則是指殖民政府炮轟建德堂陣營，在此炸出一個洞而命名。

在檳城這個貿易港市當中，這些祕密會社也隨著檳城華商的貿易網絡，往周邊地區如新加坡、棉蘭、泰國南部、緬甸、霹靂以及吉打一帶擴散。建德堂亦是如此，隨著檳城的資本擴張至暹羅的普吉島，馬來霹靂王國的拿律參與採礦活動。特別是以福建人為主體的普吉島，建德堂更是主導當地華人社會的會黨組織，而普吉島當地的建德堂成員名冊也由領導人邱天德所保管。

除了拿律和普吉島，建德堂另一個活躍的地點是英屬緬甸地區，在緬甸的仰光、土瓦（Dawei）、丹佬（Megui）、毛淡棉等城鎮都能找到建德堂。所不同的是，緬甸並無鎮壓會黨的法令，因此建德堂得以公開活動至今，與一般的會館無異。會黨作為開發地方的利益集團，邱氏家族也利用會黨的力量控制了這些地區的苦力供應以及菸、酒等各種餉碼的取得，邱天德、邱天保、邱忠波、邱朝仲都是這些經濟活動的主導者。

邱氏在社會上能夠持續維持領導地位，另一個起到積極的作為是邱氏與其他檳城大家族的聯姻關係。檳城華人社會主要由五大姓，即邱、謝、林、陳、楊五大家族所主導，除此之外，王家、葉家、許家、辜家、杜家也都是檳城大戶，他們也各有自己的貿易王國，在社會上也有不少人與邱氏一樣，受殖民政府委任為社群領袖。邱氏家族與這些門當戶對的家族往來密切，很多時候是透過聯姻來加強彼此的關係，最終達到一加一等於三的效果。

像是邱朝仲的父親邱清臨便是與早年檳城甲必丹辜禮歡的孫女辜輕煙結婚。米商顏伍美的長女和次女也都嫁予邱家。邱公司家長邱心美娶了陳家的陳理娘；邱月山的兒子則娶了暹羅粦廊（Ranong）郡主許心廣的女兒；邱漢陽則娶王家的女子；邱天保的女兒則嫁予陳家。不僅如此，邱家也有和其他種族的大家族聯姻的記錄，例如邱天保將另一名女兒嫁給阿拉伯裔的亞齊商人Syed Mohamed Alatas，他也是檳城馬來會黨組織——紅旗會的領導人，紅旗會與建德堂也有著結盟關係。此後也可以見到邱天保與亞齊有密切的貿易往來。當時亞齊人正對抗荷蘭殖民當局，當地的軍火主要從印度經由檳城轉口輸入，邱天

保便是亞齊軍火祕密輸運的核心人物。❻從這個角度來看，邱氏與這些大家族不僅是過去福建原鄉的「舊鄰居」，還透過婚姻的網絡鞏固關係成為自家人。

新江邱氏史蹟巡禮

新江邱氏本身可說是成功版馬來亞華人史的寫照，他們自十九世紀起便在馬來亞的歷史舞台上獨領風騷，因此本地區自然能容易見到他們所留下的史蹟。其中，最多邱氏史蹟的地方當然就是檳城了。

提到檳城邱氏史蹟，便不得不提座落於檳城喬治市老城文化遺產區內的龍山堂邱公司了。這是新江邱氏的總祠堂，它的位置十分隱密，必須由一個毫不起眼的門口進入巷子中，經過一、兩次的轉折才能見到氣宇非凡的龍山堂，有種柳暗花明的感覺。那是一棟矗立在一片花崗岩廣場上的兩層樓閩南式廟宇建築。它正對面的是一座典雅的戲檯。周邊還有一些建築，例如宗族成員開

❻ Wong Yee Tuan (2015). *Penang Chinese Commerce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ig Five*. Singapore: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 P.56

會的宗議所、呈排的兩層樓街屋，這些街屋是從前邱氏族人所居住的地方——「十六間」，如今已經轉做古董旅館、紀念品商店以及龍山堂售票處之用。

邱公司的主體建築主要由四個部分所組成，一樓正殿部分為正順宮，這裡供奉著與台南篤加文衡殿相同的王孫大使爺。在正殿的台階前，也有一對栩栩如生的錫克警衛的石雕，兩尊石雕相貌各一。閩式建築中的錫克族雕像充分展現了邱氏族人世居檳城後，融入在地文化的宗族特色。

正順宮左邊則是福德祠，供奉福德正神，祠內兩壁也掛滿了歷年邱氏族人取得學士學位的匾額，可以見到畢業自馬來亞大學、澳洲大學、倫敦大學的族人，他們有的是醫學學位，有的是經濟學位，有的則是工程學位，都是專業人士。在正順宮右側，則是邱公司的宗祠——詒穀堂，其正殿供奉了歷代邱氏族人的神位。神台上方及兩側也有掛滿了邱氏族人受封的匾額，像是新加坡維新志士、詩人邱菽園（峇房）在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高中舉人的匾額「文魁」，便掛在詒穀堂正廳之上，這已是海外邱氏族人獲清廷官銜當中最高的一位。他中舉的那年正好也是中日甲午戰爭清廷戰敗的一年，作為讀書人的他，





5
6

圖5 由邱氏為首的檳城五大家族所創建的建德堂。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13年8月26日。

圖6 龍山堂正殿前的錫克警衛石雕。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19年7月10日。

也參與了當年的公車上書。後來康有為南來組織保皇會分會，與「丹將敦」產生連結，也都與邱菽園有關（見〈丹絨端：東南亞海洋及晚清歷史舞台中的「絕島」〉一章）。此外，邱清德任棉蘭瑪腰的匾額，也高掛於此。邱公司一樓則是文物館，陳列了邱氏宗族在檳城發展的歷史。

在喬治市還有一座位在海墘新路（Lebuh Victoria），貌似龍山堂邱公司的文山堂邱公司。這座祠堂是由邱氏四大角當中的海房所有，其中邱天德也是文山堂的董事。後來的文山堂就沒有總堂龍山堂這麼幸運，它年久失修，二〇一九年才由台灣文化部出資，與文山堂邱公司合作進行彩繪修復。參與修復的單位還有國立台灣藝術大學以及國立台南藝術大學。

在龍山堂邱公司隔鄰，則是建德堂總部的所在，這座會黨總部實際上以福德正神廟的形式存在，正殿除了供奉福德正神之外，也供奉了建德堂開基盟主邱肇邦的神位——「皇清開基建德堂盟主肇邦邱府君神位」。作為祕密會社總部，它的入口與邱公司一樣隱密。建德堂與邱公司之間有密道相連，該密道如今已用紅磚封起，密封的痕跡依然顯著。而五大姓所組成的福建公司，其會

址也位在福德正神廟當中。

除了宗祠機構外，在檳城還有許多有關邱氏族人的地景，其中比較顯著的是喬治市老城區一座由邱善佑開設的邱善佑戲院。邱善佑是亞沙漢甲必丹邱朝仲之子，出生於馬六甲，後前往檳城發展，也曾是蘇門答臘的賭博餉碼主。他於一九二六年開設邱善佑戲院，它也是後來的大華戲院，是很多老檳城人的集體回憶。該建築至今保存完好，仍矗立在以他為名的邱善佑路（Jalan Khoo Sian Ewe）上。

能像邱善佑一樣被拿來用做道路命名的還有市區內以邱四方為名的四方巷（Soo Hong lane）以及邱朝仲為名的邱朝仲巷（Khoo Cheow Teong Court）。當然，作為邱公司頭號人物的邱天德，檳城必然也有以他為名的道路。在檳城亞依淡，便有多條以邱天德為名的道路，像是天德路（Jalan Thean Teik）、天德巷（Lintang Thean Teik）、天德花園路（Jalan Taman Thean Teik），以及一條主要幹道——天德大道（Thean Teik Highway），該大道全長約三公里，貫穿今天的「天德園」地區，天德園是邱天德過去所開發的種植園，因此以他為

名。天德園如今已賣給不同的開發商發展為住宅區，其中一個花園住宅區也稱為「天德花園」(Taman Thean Teik)。專門用以安葬邱氏族人的龍山堂邱公司塚山以及殯儀館也坐落於此區，其中建德堂二哥邱天保也葬在該塚山，邱天德本人則葬在附近的獨立塚地。在檳城其他專屬於邱氏族人的家塚還有邱其用園(一八五五)、邱石泉家族的怡和園(一八七一)、邱四方的四方園(一八七二)，以及邱心歡園(一八七八)。

在天德園地區的天德路上，也有一所由龍山堂邱公司所開設的新江學校，那原來是專為邱氏族人開辦的家塾，最初於



圖7 邱善佑戲院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16年8月2日





圖8 由邱公司塚山俯瞰天德園地區及天德大道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16年7月29日

圖9 檳城邱氏族人史蹟分布
資料來源：白偉權繪，底圖取自 openstreetmap.org.

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由邱有用開設於龍山堂本部內，初名為「邱氏兩等小學堂」。後來由於族人增加，才遷出龍山堂，戰後才再遷至現址。目前該校已成為政府下轄的社區學校，錄取附近地區的學生，然而學校董事仍為邱氏族人所擔任，他們仍然是該校建設的主力。

除了檳城之外，邱氏族人所到之處由於對地方社會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因此也能找到以他們為名的街路名，像是新加坡中峇魯（Tiong Bahru）的邱忠波路（Tiong Poh Road），以及砂拉越古晉的邱漢陽路（Jalan Khoo Hun Yeang），用以紀念他們的經濟貢獻。在新加坡，二〇〇七年邱德拔後人也以他的名義，捐資一億二千五百萬新元給政府在義順（Yishun）建立綜合醫院，因此醫院也被命名為「邱德拔醫院」。邱德拔的家族基金也在二〇〇六年捐資北京大學建立體育館，因此建峻之後，該體育館也被命名為「邱德拔體育館」，因此即使在北京，也都能夠見到「邱氏族人」。

總體而言，邱氏族人的家族歷史可說是東亞海洋大歷史中的縮影，他們在這個大航海時代中，憑著其冒險犯難的個性，前往台灣以及海外各地發展，

奠定家業。邱氏移民的年代久遠，雖然間中與原鄉的連結不斷，但早已視「海外」為家。在海外相對自由的殖民港市裡，他們以此為基地，穿梭於華、洋及土著之間，透過商業、家族、會社組織、公益事業等途徑統攬周邊地區的資源以及華人社會。在此過程中，可以見到邱氏族人並非單打獨鬥，而是團結家族的力量來取得競爭優勢，進而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歷久不衰。雖然他們所從事的經濟活動內容在今天看來並不十分的正面，但這必須要回到當時的情境，以當時的角度和脈絡來觀看，才不至於落入只有對與錯的辯證。

隨著時代的變遷，知道這段邱氏百年史的人已經不多，若不經過整理，許多人即使見到邱氏族人的史蹟，一般也會視而不見。然而隨著二〇〇八年檳城申遺成功，他們的事跡重新受到重視。伴隨著全球化資訊的流通，檳城邱公司的成員也得知台南篤加邱氏的存在，其信理員或家長們，也曾兩度組團到訪台南篤加，數百年後，台、馬兩地的海外邱氏終於在篤加龍田祠堂聚首。

延伸閱讀

Buiskool, Dirk Aedsge.（2019）. *Prominent Chinese During the Rise of a Colonial City: Medan 1890-1942*. Utrecht: University of Utrecht.

Khoo Salma Nasution.（2009）. "Hokkien Chinese on the Phuket Mining Frontier: The Penang Connec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Phuket Baba Community."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82（2）: 81-112.

Khoo, Kay-Kim.（1972）. *The Western Malay States 1850-1873: The Effects of Commercial Development on Malay Politics*.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ong Yee Tuan.（2015）. *Penang Chinese Commerce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ig Five*. Singapore: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

朱自強、陳耀威編，《檳城龍山堂邱公司：歷史與建築》，檳城：龍山堂邱公司，二〇〇三。

張少寬，《檳榔嶼福建公塚暨家塚碑銘集》，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一九九七。

陳耀威文史建築研究室著，《認識與欣賞龍山堂邱公司》，檳城：龍山堂邱公司，二〇〇四。

日資會社、台灣總督府與消失的柔佛日資橡膠園

開車行駛在柔佛鄉間，不時會見到以「日本」為名的地方名——Parit Jepun（巴力日本）。若以馬來語的「Jepun」來進行查詢的話，我們會發現到本區有不少叫做Parit Jepun的地方，有趣的是，在整個馬來半島，Parit Jepun都只集中在柔佛。在柔佛的麻坡（一個）、峇株巴轄（兩個）、居鑾（一個）、哥打丁宜（一個）這幾個縣都能找到Parit Jepun。

然而放眼望去，我們在Parit Jepun並未見到有關日本的一景一物，更不用說有日本人了。相反地，這裡所呈現的是馬來鄉區景觀，有的甚至荒煙蔓草，與今天大家對於日本的現代化意象相距甚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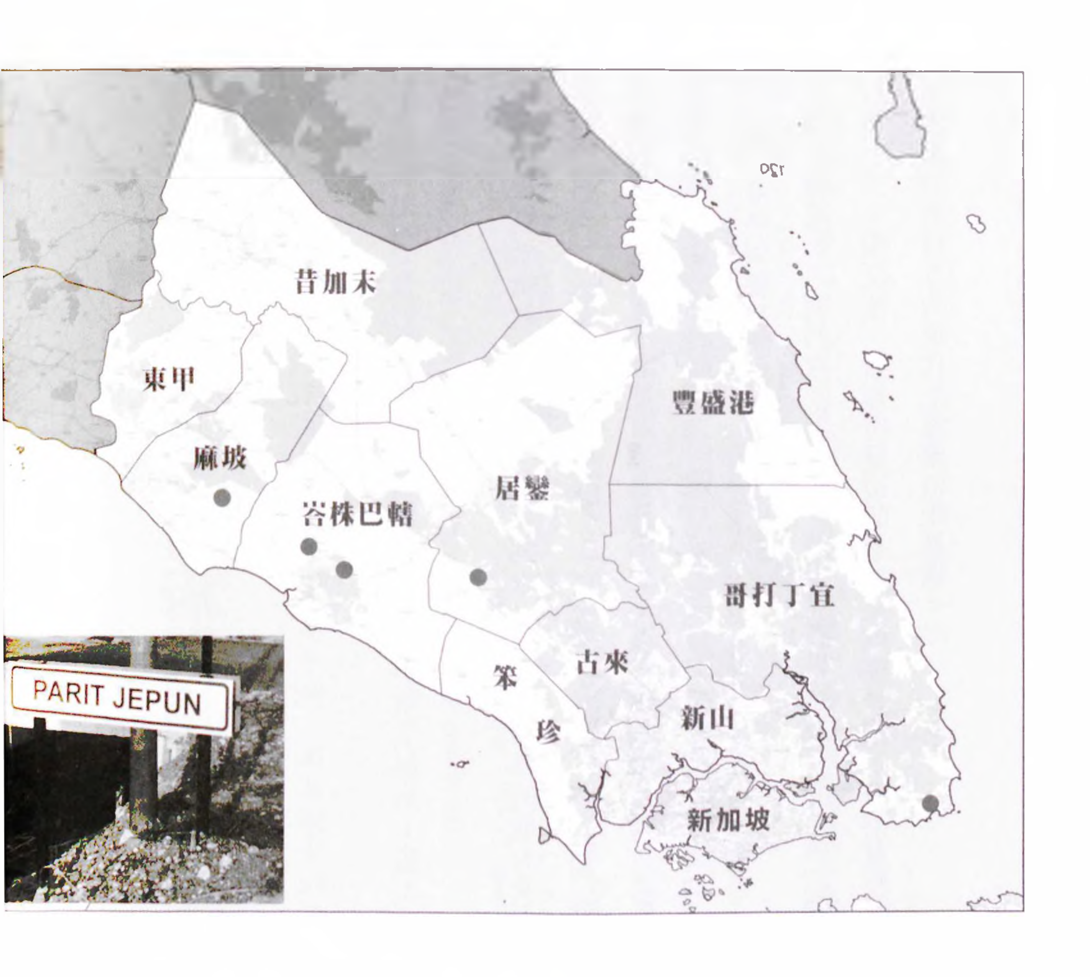


圖1 柔佛各地的Parit Jepun。
資料來源：白偉權繪，底圖取自openstreetmap.org.

事實上，巴力（Parit）在馬來語當中為水道、排水溝之意。這個地名在馬來半島西海岸沿海一帶尤其普遍，本區在自然環境上由於屬地勢低窪的沼澤區，因此開發時都需要挖溝排水，方能改善土質並作為農業用途。也因為沼澤區開發的歷史淵源，許多的排水道都是集體式開發，因此最終也形成了以巴力為單位的聚落。因此巴力日本的出現，令人聯想這是否與日本人的開發有關。

筆者後來查詢一些早期南洋日本人的資料發現，原來本區在戰前確實有不少日僑在此定居，而柔佛是當時最多日本產業投資的馬來王國，他們在本區域的投資主要以橡膠產業為主，其餘還有鐵礦以及水產養殖。在二十世紀初，日資陸續到柔佛開設橡膠園，到此的都是當時著名的財閥，像是三菱系、三井系、古河系、大倉系、森村系、藤田系等。❶這些日本人還成立了馬來亞日本種植家協會（Japanese Planters' Association of Malaya）。❷據統計，到了一九三九年（昭和十四年）日本在東南亞投資總額高達三億日元，其中橡膠便占了八千萬日元，占比最高。❸就分布地區而言，最多日資膠園的地區便是柔佛，柔佛的日資橡膠園主要聚集在柔佛河沿岸以及峇株巴轄兩地，而這也和我們所見到的

❶ Japanese Rubber Estates in Malaya. *Malaya Tribune*, 29 April 1915, Page 11。鍾淑敏，〈戰時期台灣人印度集中營拘留記〉，《台灣史研究》第二十四卷第三期（二〇一七），頁八八－九七。

❷ Japanese Rubber Estates in Malaya. *Malaya Tribune*, 29 April 1915, Page 11.

❸ 丹野勲，〈戰前日本企業の東南アジアへの事業進出の歴史と戦略：ゴム栽培、農業栽培、水産業の進出を中心として〉，《神奈川大学国際経営論集》第九十一期（二〇一六），頁一五－四一。

巴力日本的分布規律相符。

促成大量日本人來到柔佛開闢新天地的，很大程度上必須歸功於在台灣開發彰化源成農場和高雄南隆農場的三五公司主人——愛久澤直哉，以及台灣總督府。他們在無意和有意間促成了日資橡膠會社在柔佛的發展。究竟他們何以會來到南洋與柔佛結緣？我們先來看看柔佛在種植產業方面的背景。

柔佛王國：老牌的農業州

柔佛是現今馬來西亞老牌的農業州，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它一直都是本區域熱帶栽培業的重鎮（見〈甘蜜、港腳與百年新柔關係史〉一章）。無論是十九世紀的胡椒、甘蜜，還是二十世紀初的橡膠，抑或是二十世紀下半葉的油棕生產，它都是產量占比最高的。

其實打從十九世紀四〇年代開始，柔佛統治者便利用柔佛地廣人稀且位

置鄰近新加坡的地利之便，向新加坡的胡椒、甘蜜種植業者大開門戶，招商引資，使當時的柔佛成為世界胡椒、甘蜜的最大生產國。到了十九世紀末，隨著世界市場對於胡椒、甘蜜的需求減少，也使得柔佛統治者開始尋找其他足以取代胡椒、甘蜜的作物，同時將經濟逐漸轉向產業的多元化發展，而當時市面上出現另一種十分具有潛力的經濟作物，那便是橡膠了。

橡膠一直以來都是重要的工業原料，只是礙於生產技術的限制，導致此原料無法量產，直到一八九〇年代，橡膠在新加坡和瓜拉江沙植物園試種成功，開啟了橡膠時代的序幕。一九〇〇年代開始，歐洲企業開始在柔佛地區取得土地，發展橡膠種植。日本當時也正值工業化的高峰，對於橡膠這類原產品的需求也十分迫切，因此日資也緊隨歐洲資本的腳步，在二十世紀第一個十年進入柔佛。有趣的是，日資在柔佛的起始點，其實是台灣總督府和三五公司無心插柳的結果。

台灣總督府的「對岸政策」與三五公司

日本自一八九五年領有台灣之後，台灣便成為日本帝國往南擴張的前哨。第二任總督桂太郎便曾發表台灣與華南經營意見書，表示：「占領台灣是甲午戰爭勝利之結果，但不應只圖台灣島之經營而已，更重要是挾台灣、澎湖，藉其與華南沿岸相對之勢，進圖華南甚至南洋」。❹

換句話說，東南亞對台灣總督府而言，並不是一開始時的第一選項，對岸的華南地區（福建、廣東）的順位還排在南洋之前。因此在明治時期的台灣，其關注重點仍是以大陸為主。在此政策方向下，也催生出愛久澤直哉以及他的三五公司，即日後投資柔佛橡膠產業的第一人。

愛久澤直哉出生於明治元年（一八六八），在明治二十七年（一八九四）於東京帝國大學政治科畢業後，便進入三菱財閥的日本郵船會社任職，後也有幸擔任三菱總裁岩崎久彌的祕書。直到明治三十二年（一八九九）才在台灣總督府底下任職。

❹ 轉引自鄭政誠，〈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對福建鐵路的規劃與佈局（一八九八—一九一三）〉，《史匯》第十期（二〇〇六），頁四一五。

他在明治三十三年（一九〇〇）便受委為專賣局「囑託」（約聘人員），前往香港、新加坡、爪哇、暹羅、印度各地視察。他也帶回了南洋金雞納的種子，這次的出差開啟了他對於南洋的認識。❺愛久澤直哉返台後，又被任命為「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即經濟部的部長，負責台灣漢人農工商方面的經濟調查工作，❻該組織由台灣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所領導。❼

或許是愛久澤直哉在任南洋囑託以及台灣舊慣經濟調查的工作做得十分到位，抑或是其他社會網絡所致，我們可以見到他相當受到總督兒玉源太郎及行政長官後藤新平的器重，與兩人的私交也十分密切。後來總督府在華南政策當中，便重用愛久澤直哉，成立投資對岸的「三五公司」。

三五公司在帳面上看，是愛久澤直哉的公司，但實際上卻是日本帝國的國營企業，其背後資金來自外務省、陸軍省、台灣總督府，以及台灣銀行（由兒玉總督擔保向台銀貸款），該公司由愛久澤直哉全權負責，其任務是執行台灣總督府的「對岸政策」，即藉由經濟控制華南地區。❽若公司任務成功，它日後將直屬台灣總督府。而三五公司名稱的由來，據說是源於公司設立於明治

❺ 顧雅文，〈日治時期台灣的金雞納樹栽培與奎寧製藥〉，《台灣史研究》第十八卷第三期（二〇一一），頁四七－九一。

❻ 鄭政誠，〈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對福建鐵路的規畫與佈局（一八九八－一九一三）〉，《史匯》第十期（二〇〇六），頁六。

❼ 吳文星，〈京都帝國大學與台灣舊慣調查〉，《師大台灣史學報》第一期（二〇〇七），頁三九－四九。

❽ 鍾淑敏，〈明治末期台灣總督府的對岸經營：以樟腦事業為例〉，《台灣風物》第四十三卷第三期（一九九三），頁二〇七－二〇八。

三十五年（一九〇二），該年的愛久澤直哉正好也是三十五歲，因此以「三五」為名。

肩負國策使命的三五公司在華南地區首先是要協助保護台灣資本在福建的樟腦製造及專賣權。此外，愛久澤直哉也透過三五公司介入潮汕鐵路的建設，他邀台灣人林麗生與香港商人吳理卿合作，再聯合另外兩位著名南洋富商張煜南、謝榮光，兩組人合資各半，成立潮汕鐵路公司，希望藉由南洋華商與清廷的關係投得潮汕鐵路，然後再引進日資和技術人員進入華南（見〈棉蘭—檳城—板橋：蘇門答臘客家張氏兄弟在檳城〉一章）。❾除了福建鐵路和潮汕鐵路之外，三五公司在華南也有建設福建鐵路、龍岩礦山與汕頭水道等。

在一九〇二年至一九一一年間，三五公司的經驗雖然算是成功的，但是由於官方內部有著不同派系的角力，像是外務省對台灣總督府的制約。另一方面，愛久澤直哉因為個性及奢靡之風遭受非議，加上兒玉總督和後藤新平相繼調職。新任總督佐久間佐馬太則著重在台灣內山的理蕃事務，故對於三五公司的資助不斷減少。到了明治四十四年（一九一一），總督府停止為三五公司提

❾ 蔡龍保：〈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鐵道部的南進支援—以潮汕鐵路的興築為例〉，《輔仁歷史學報》第二十八期（二〇一二），頁二三三—二六九。

供補助並追討款項，三五公司作為國策公司的角色也宣告結束。⑩此後三五公司仍繼續營運，並成為專屬愛久澤直哉個人的公司。

早在三五公司的華南事業逐漸受到限制時，愛久澤直哉也開始謀畫其他的出路，而南洋便是他的下一個目的地。愛久澤直哉與南洋的關係早在他受委為囑託下南洋考察以及在華南事業與閩粵華人往來時便已經奠下基礎，因此不難想像在台灣總督府華南政策告終之後，南洋會成為他人生下一個起跑點的原因了。

三五公司開創柔佛日資新天地

三五公司在華南屢屢受到總督府的壓制之際，愛久澤直哉便南下新加坡，尋找在南洋發展的可能性。當時的新加坡已經是區域的核心，商業薈萃之地，許多富商都是以此為基地，就連愛久澤直哉在潮汕鐵路的合作伙伴張煜南和謝

⑩ 鄭政誠，〈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對福建鐵路的規畫與布局（一八九八－一九一二）〉，《史匯》第十期（二〇〇六），頁一六。

榮光，他們雖然分別定居在棉蘭和檳城，但在新加坡的廟宇也可以找到他們的長生祿位。新加坡是這些富商投資馬來半島、婆羅洲以及荷屬東印度群島各地的前哨。

作為國際貿易港市，新加坡早在十九世紀末也開始有日本人在當地營商。在明治二十二年（一八八九），明治政府就已經在新加坡設立日本領事，統管本區僑務。明治三十八年（一九〇五），第一個日本人協會也在新加坡成立。⓫就在同一時間，愛久澤直哉也抵達了新加坡。

當時，緊鄰新加坡的柔佛正值橡膠產業發展的初始階段，已經有一些歐洲資本在當地開闢橡膠園，愛久澤直哉也在一九〇六年十月搭上了這班發展列車。有別於一般歐洲資本在柔佛內陸進行開發，他選擇從新加坡島東北方向的馬來半島南端、柔佛河口東岸的邊佳蘭開始開發橡膠園。他向比利時公司購買土地，成為其第一座橡膠園地，⓬當時，三五公司在台灣的源成農場和南隆農場都還未成立。

愛久澤直哉投資柔佛的三五公司與台灣總督府無關，其資金有部分是來

⓫ Mehmet Sami Denker (1988)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Japanese-Malaysian Relations Before and After Second War* (Unpublished master's dissertation)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p.19.

⓬ 華南銀行，《馬來半島柔仏国ニ於ケル本邦人護謨園現況》，東京：華南銀行，一九二〇。

自舊東家三菱財閥，因此也被認為是三菱系的公司。三五公司在柔佛邊佳蘭的園丘共有兩處，邊佳蘭第一護謨園面積為二千二百九十英畝，邊佳蘭第二護謨園面積為六千四百九十四英畝。⑬明治四十二年（一九〇九）三五公司又取得峇株巴轄森布隆（Sembrong）地區一萬五千四百八十六英畝的園地，成為柔佛河沿岸及峇株巴轄兩個地區首個日資橡膠園。一九一一年，三五公司又在邊佳蘭以北的雙池（Santi）地區以及峇株巴轄的四加亭（Sri Gading）分別取得了二千三百七十八英畝及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二英畝的土地。到了大正四年（一九一五），三五公司在柔佛園丘的總面積更達到四萬一千四百英畝（一萬六千七百五十四公頃），⑭相比之下，三五公司在台灣南隆農場和源成農場的總面積大約才六千八百公頃。一直到二戰之前，三五公司都是柔佛最大的橡膠業者之一。三五公司在柔佛的園丘都委由支配人（經理人）來打理，總部則設於新加坡（美芝律，Beach Road）。查一九一六年的報章告示，愛久澤直哉也以自己的英文名字的開頭N（Naoyah，直哉）A（Akuzawa，愛久澤）作為商標，用以銷售三五公司所生產的橡膠原產品。

⑬ Campbell D. G. (1915) *Johore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14*. Singapore: Kelly & Walsh.

⑭ 丹野勲，〈戦前日本企業の東南アジアへの事業進出の歴史と戦略：ゴム栽培、農業栽培、水産業の進出を中心として〉，《神奈川大學國際經營論集》第五十一期（二〇一六），頁二四。



2
3

圖2 三五公司在柔佛最早開發膠園的地區。
資料來源：白偉權描繪，底圖取自 War Office（1951）. *Tanjong Surat.*（Malaya 1:63,360）. London: War Office

圖3 愛久澤直哉在新加坡註冊的商標。
資料來源：白偉權描繪，底圖取自 *The Straits Times*, 6 September 1916, Page 6.

三五公司與其他的園丘一樣，引進了大量的勞動力進入園丘工作，其中管理階層還是由日本人擔任，像是他的支配人基本上都是日本人，而底層的勞動力主要以華人為主，其餘的還有淡米爾人以及爪哇人。除此之外，不少台灣籍漢人也被招募至柔佛三五公司任職，他們有的是專業人員，例如來自高雄林園的黃偉權醫師以及來自台北的黃玉成醫師。有的台籍人士職務雖然未有清楚記載，但由於台灣漢人同樣源自華南，且能掌握日語，因此成為日籍管理者與底層勞工溝通的橋樑，協助公司管理園丘。像是在三五公司位於古來以及峇株巴轄的園丘，便能找到台籍員工，例如屏東佳冬人林祿慶、屏東小川（今屏東市）的黃林禎、屏東恆春人楊七郎，以及竹南人鄧雲華。這些台灣人南來後，許多也會攜家帶眷前來馬來亞，或是影響其他族人也南來發展，像是林祿慶，與他同族的林世香自台北醫學專門學校畢業並在台短暫任職之後，也南來柔佛開設醫院。⑮

綜合上述有限的台灣人資料，除了黃林禎較難看出籍貫身分之外，查其他人的姓氏以及他們在台灣的家鄉，都可以確認他們是客籍人士。雖然資訊仍

⑮ 鍾淑敏，〈二戰時期台灣人印度集中營拘留記〉，《台灣史研究》第二十四卷第三期（二〇一七），頁八九—一四〇。

然不足，但是回看愛久澤直哉在台灣彰化和高雄開設源成農場以及南隆農場時，也都是由桃竹苗地區引進客家人，促成台灣的北客南遷。再看三五公司在柔佛設置膠園的地方，根據口述，在邊佳蘭和古來地區曾經在三五公司工作的華人，也有不少是客家人，⑯因此可以見到一九三〇年代柔佛三五公司所引進的台灣一般從業員，在其身分上似乎是有一定的規律的，礙於資料上的不足，他們之間背後的連結，留給我們許多想像的空間。

然而可以確定的是，愛久澤直哉不同地區的三五公司之間，是有著許多人員相互調度的。像是小泉哲一郎，他在一九二〇年代末於峇株巴轄的三五公司膠園擔任支配人（經理），而在此之後，他也代表三五公司擔任三菱財閥投資朝鮮東山農場的總支配人。到了昭和十五年（一九四〇）五月，又可以見到他代表三五公司的高雄南隆農場向勸業銀行台南支店申請融資六十萬元，並擔任連帶保證人。更有趣的是，愛久澤直哉也曾經試圖將柔佛的橡膠產業搬到台灣來，在台南州新化郡以及高雄州岡山郡的三五公司土地，便曾經作為栽培橡膠的預定地，只是後來並不成功。⑰由此可見，在柔佛、台灣甚至朝鮮的三五

⑯ 感謝南方大學學院研究生與研究學院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研究員駱家浩博士提供資料。

⑰ 林光任，〈日治以來彰南地區客家移民與竹塘醒靈宮之研究〉，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碩士論文，二〇一三，頁四五—四六。

公司，它的決策、經驗及管理知識，是相互流動且相互影響的。

三五公司的無心插柳

作為日資在柔佛橡膠業的先行者，三五公司的成功一定程度上也對其他日資的進駐起著正面的影響，其中比較直接的案例是南亞公司的社長井上雅二。井上氏在明治四十四年（一九一一）曾到南洋各地考察，後來在愛久澤直哉、森村市左衛門、法華津孝治、永井儀三郎、川田鷹等人的鼓舞下，看見了橡膠產業的前景，因此隨即在該年十月，與森村開作、法華津孝治、川崎榮助、大倉文二、藤井諸照、永井儀三郎合資五十萬日元，共同成立了南亞公司，⓲並在三五公司柔佛河園丘附近設立南亞護謨（橡膠）園。

南亞公司的股東當中也有不少人與愛久澤直哉一樣有台灣經驗，像是永井儀三郎，便是新竹赤柯山的開發者。川崎榮助則在大正元年（一九一二）有

⓲丹野勲，〈戦前日本企業の東南アジアへの事業進出の歴史と戦略：ゴム栽培、農業栽培、水産業の進出を中心として〉，《神奈川大学国際経営論集》第五十一期（二〇一六），頁一九。

份合資參與台東拓殖合資會社對於花蓮港廳的開發。⑲而南亞公司社長井上雅二在大正四年（一九一五）時，也在台灣發起成立南洋協會台灣支部。⑳此外，南亞公司的合資者川田鷹後來也在一九一五年成立熱帶產業株式会社，獨立投入柔佛的橡膠產業。

與南亞公司同一時期進駐柔佛的，還有古河虎之助的古河合名會社、藤田財閥的南興殖產株式會社、三井財閥、南洋護謨株式会社、台灣拓殖株式會社、旭護謨株式會社園、馬來護謨公司、南洋護謨拓殖株式會社園，以及一些獨立的日籍資本家，像是鈴木、秋田、小西、高橋、城野、福田、得村、山川、石橋等。㉑

除了一些受到三五公司鼓舞而開設橡膠園的會社之外，一些日本人在三五公司任職之後，也會因為習得相關經驗和累積了足夠的資金之後，而從三五公司獨立出來另外開設膠園。像是岡部常太郎，他早年在明治四十年（一九〇七）東京高等商業學校畢業後，便南來馬來亞柔佛的三五公司任職，擔任植林地主任，後來吸取經驗後離開三五公司，最終在大正七年（一九一八）擔任咨

⑲ 台東拓殖會社官有地無料貸付及予約賣渡許可（指令第三六九〇號）。

⑳ 鍾淑敏，〈台灣總督府的「南支南洋」政策：以事業輔助為中心〉，《台大歷史學報》第三十四期（二〇〇四），頁一五五。

㉑ 華南銀行，《馬來半島柔仏王国コタテンギ並ニ柔仏河沿岸邦人護謨園現況》，東京：華南銀行，一九二〇。

株巴轄柔佛（ジョホール）㉒護謨栽培株式會社取締役（董事），後也在同一地區開設海峽護謨產業株式會社。㉓

也有的案例是前來三五公司擔任醫生的，後來也自行開設橡膠園，目前所見到的是黃玉成，在昭和四年（一九二九）的《南洋各地邦人栽培企業要覽》當中，便見到他與另一名台籍人士徐永隆共同在峇株巴轄開設許得年護謨園。在昭和十年（一九三五），黃玉成則獨資在隔壁的麻坡縣建立石河護謨園。㉔

在三五公司任職後再「出師」的另一佳話是石原產業財閥。在明治四十四年（一九一一）時，石原廣一郎的弟弟信三郎由京都南來柔佛，任職於峇株巴轄的三五公司，後來他認識到橡膠業的發展前景之後，便在大正四年（一九一五）離開三五公司返回日本尋求石原廣一郎的合作，一同到柔佛投資橡膠園。後來，石原廣一郎說服父親變賣田產以籌募資金，於是連弟弟高田儀三郎也選擇中斷學業，兄弟三人一同來到柔佛峇株巴轄開設橡膠園。

無奈園丘經營失敗，但他們卻於大正八年（一九一九）在峇株巴轄的Batu Medan發現鐵礦，於是便返回日本募資，最終在台灣銀行、川崎造船所的幫

㉒ 柔佛的馬來文Johor的片假名。

㉓ ルーブル社出版部編，《大日本人物名鑑》，東京：ルーブル社出版部，一九二一，頁六七。

㉔ 台灣總督官房調查課，《南洋各地邦人栽培企業要覽》，台北：台灣總督府，一九二九；台灣總督官房調查課，《南洋各地邦人栽培企業要覽》，台北：台灣總督府，一九三五。另外根據東京南洋協會在一九四〇年所出版的《英領馬來社商名簿》，黃玉成在峇株巴轄也開有島壽樂房。

助下，在大阪成立合資會社南洋礦業公司，㉕著手峇株巴轄鐵礦的開發。石原在成立公司時也獲得八幡製鐵的訂單，將所產鐵鑛全數交付日本九州八幡製鐵所。在大正九年（一九二〇），峇株巴轄石原鐵礦的產量為五萬噸，隔年便上升至十萬噸，一九二二年更超過十萬噸。到了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全日本有百分之五十二點五的鐵礦都是出自石原之手，石原儼然成為日本最大的鐵礦供應商。㉖到了一九三三年底，也開始見到石原與舊東家三五公司合資建立石原三五公司，經營日本各大城市和南洋的海運生意。石原鐵礦的故事可說是三五公司蝴蝶效應的結果。

總體而言，柔佛作為馬來半島日本產業投資的重鎮，愛久澤直哉的三五公司扮演了關鍵的開拓角色，在他之後，許多日資企業也循著它的路徑進入柔佛，一些柔佛的日資大企業，也是出自三五公司。三五公司的重要性可以從大正九年（一九二〇）台灣總督府奧秋雅則事務官在南洋各地的視察報告中看出這一點：「……柔佛橡膠事業先是三五公司著手，而後有今日之盛況……」。此外，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六）台灣總督府殖產局特產課技師色部米作前往南

㉕ 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石原又在新加坡設立「石原產業公司」。

㉖ 除了峇株巴轄之外，他也在登嘉樓、菲律賓、海南島等地開發鐵礦，但規模仍以柔佛峇株巴轄鐵礦山的最大。Saya Shiraishi and Takashi Shiraishi (eds.) (1993) *The Japanese in Colonial Southeast As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 12-13

洋調查時，所列舉的仍然也只是愛久澤直哉的三五公司。[27] 日本著名詩人金子光晴記錄其在昭和三年（一九二八）至昭和七年（一九三二）的遊記《マレー蘭印紀行》，也花了很大的篇幅記錄他在三五公司和石原鐵礦的所見所聞。

三五公司固然對於日本在柔佛的發展扮演重要角色，但除了三五公司之外，台灣總督府的角色也不可忽視，特別是三五公司在柔佛發跡之後，日本政府也開始關注日本人在南洋的事業，台灣總督府於是便成為日本帝國推動南洋政策的旗手。

台灣總督府的南支南洋政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國內掀起了往南發展的熱潮，作為日本南進跳板的台灣，總督府也在大正年代開始再次加強實施「南支南洋政策」，唯這時亦將重點擴大至東南亞地區，台灣總督府以國家之力，推行各種輔導和補

[27] 鍾淑敏，〈台灣總督府的「南支南洋」政策：以事業輔助為中心〉，《台大歷史學報》第三十四期（二〇〇四），頁一六八。

助政策，以支援東南亞地區的日資企業。

因此，可以見到在大正初年（一九一二）開始，台灣總督府便增加南支南洋政策的預算，從大正首三年的每年七萬元，不斷增加，大正四年（一九一五）增加至十二萬，到了大正九年至十三年（一九二〇—一九二四）期間，每年甚至達到九十萬。到了昭和年間才出現些許的減少。[28]台灣總督府透過其內部的殖產局、警察本署、官房調查課、官房外事課，以及台灣銀行、華南銀行等機構，不斷前往東南亞地區進行考察，並出版報告書，作為後續的決策參考。在掌握資訊的同時，總督府也通過與台灣銀行、華南銀行資金合作的方式，提出了一攬子的補足方案，其中與橡膠栽培相關的便有「南護謨事業助成費」和「南洋栽培協會助成費」。

在柔佛，也有許多的膠園趕上了此次的補助，包含秋田護謨園、株式會社馬來護謨公司、竹本護謨園、岡部常太郎的柔佛（ジョホール）護謨株式會社、中央柔佛（ジョホール）護謨公司、南洋護謨株式會社、大和護謨栽培株式會社。一些柔佛的種植家協會也在台灣總督府的補助之列，例如峇株巴轄（バト

㉘ Adam Schneider (1998) "The Taiwan Government-General and Prewar Japanese Economic Expansion in South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1900-1936." In Harald Fuess (ed.) *The Japanese Empire in East Asia and Its Postwar Legacy*. Munich: Iudicium Verlag, p.178.

㉙ 鍾淑敏，〈台灣總督府的「南支南洋」政策——以事業輔助為中心〉，《台大歷史學報》第三十四期（二〇〇四），頁一六三。

パハ)火曜會以及南洋栽培協會。前者是柔佛的橡膠小栽培業者的互助組織，後者則是栽培業者同業公會。㉙

確實，若從大正和昭和時期台灣總督府官房外事課所出版的《南洋各地邦人栽培企業要覽》當中的資料來看，便能夠見到前來柔佛發展的日資橡膠園可分成兩波，首先是在一九一〇年和一九一一年初愛久澤直哉進入柔佛之後，先有一波的日資進入，到了大正年間，則有更多的日資進駐，特別是大正五年(一九一六)至大正七年(一九一八)之間。我們無法確認這是否全都是來自台灣總督府推動的結果，但是從台灣總督府在南洋地區的基礎調查、協調台灣銀行、華南銀行為投資南洋的

圖4 進入柔佛設立橡膠園的兩波日資投資潮。自偉權繪製。

資料來源：

1. 台灣總督官房調查課，《南洋各地邦人栽培企業要覽》，台北：台灣總督府，1926。
2. 台灣總督官房調查課，《南洋各地邦人栽培企業要覽》，台北：台灣總督府，1929。
3. 華南銀行，《馬來半島柔仏王国コタテンギ並ニ柔仏河沿岸邦人護謨園現況》，東京：華南銀行，1930。
4. 台灣總督官房調查課，《南洋各地邦人栽培企業要覽》，台北：台灣總督府，1935。

日本公司提供融資舉措來看，它所做的努力是毋庸置疑的。

若檢視這時期投資本地的日資橡膠園，其實有不少是以台灣為基地的資本，像是投資居鑾拉央拉央（Layang-layang）的台灣拓殖株式會社，便是台灣半官方的商業機構，它的股東還包含三井、三菱、臺灣銀行、明治製糖、三五公司等機構；㉚士乃護謨株式会社的松方正熊也是帝国製糖社長，該會社在一九一〇年在台中創立的製糖會社，在台中州和新竹州擁有多處製糖工場；㉛開設大倉護謨株式會社的大倉財閥則是最早前來台灣的實業家之一，曾在台北府開設大倉組支店，台灣的縱貫鐵路、嘉南大圳、日月潭發電所等的工程都是由它所承包。㉜除了一些大財閥之外，也有一些規模較小，且與台灣有關的投資者，像是上述所提及的黃玉成和徐永隆便是在這個時期開設橡膠園。

㉚ 鍾淑敏，〈國策會社與日本移民事業的開展：滿洲拓殖公社與台灣拓殖株式會社〉，《師大歷史學報》第[illegible]期（二〇〇九），頁[illegible]—一七[illegible]。

㉛ 丹野勲，〈戦前日本企業の東南アジアへの事業進出の歴史と戦略：ゴム栽培、農業栽培、水産業の進出を中心として〉，《神奈川大学国際経営論集》第五十一期（二〇一六），頁一七。

㉜ 曾憲嫻，〈大倉喜八郎〉，《台灣大百科全書》，台北：文化部，二〇〇九，二〇一三年四月十一日取自：http://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9088.

柔佛的日本人地景

柔佛可說是馬來半島海峽殖民地港市以外，最多日本產業的一邦，然而由於二戰時，日本與英屬馬來亞處於敵對的關係，因此在戰後，日本人紛紛撤出馬來亞，因此他們的產業以及所留下的蹤跡難以延續，從現有的田野當中，我們也很難想像柔佛曾經有一段時間有著許多的日本人。即使在三五公司最早成立的邊佳蘭膠園，現址已經成為石化工業區了，不過在這之前，當地其中一個名為三灣的華人聚落，有座修建於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大正十四年）的觀音寺，在它的修廟捐款碑當中，我們仍能見到「三五公司」的捐獻紀錄，這種社區參與的形式與三五公司同一年在高雄南隆農場捐建五穀宮的情況相似。如今，由於石化工業區的發展，整個聚落連同這座觀音寺已經遷往六灣。

除此之外，柔佛各地還是有許多能夠顯示日本人曾經存在的地景。這些地景當中，最顯著的便是日本人墓地了。現今馬來西亞共有二十九座日本人

墓地，在它們當中，便有七座位在柔佛，比起次多的雪蘭莪、登嘉樓和霹靂的各三座還超出一倍。柔佛的日本人墓地分別坐落昔加末、峇株巴轄、Bukit Kepong、新山、麻坡、Teluk Sengat以及Teluk Sungai。除了新山市郊的日本人墓地較為完整之外，其他地區的日本人墓地的保存情形則不甚理想。例如峇株巴轄的日本人墓地，如今就只剩下一塊「日本人共同墓地道標」的界碑孤獨地矗立在草叢之中。㉝此外，在Teluk Sungai的日本人也曾經在南洋護謨株式會社的園丘內建立了柔佛唯一的神社——「南洋神社」，該神社也已不復存在，現址後來留下一塊招魂碑、紀念碑，以及神社的水泥基座。而此招魂碑和紀念碑也已經在二〇〇一年被遷往新山的日本人墓地重新安置。㉞

除了墓地之外，日本人在柔佛的蹤跡也展現在地名當中，像是峇株巴轄的Sri Medan，在石原氏的鐵礦場設立後的隔年（一九二一），石原廣一郎舉辦了盛大的慶祝活動，也邀請了蘇丹與會，並為此地改名為Sri Medan。㉟此地名沿用至今，也因為Sri Medan曾經是最大鐵礦出口地，因此後來的華人也將此稱為「鐵山」，當地的華校也命名為「鐵山中華學校」。接下來就是哥打丁宜

㉝ 當地日本人的骨骸已經陸續被其後人移走。

㉞ 參石礦業株式會社，〈ジョホール州の日本人墓地（4）〉，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一日取自：https://www.yuuseki.co.jp/topics/2014/03/04/2003

㉟ Yasukichi Yasuba (1993) "Hirochirō Ishihara and the Stable Supply of Iron Ore." In Saya Shiraishi and Takashi Shiraishi (eds.). *The Japanese in Colonial Southeast As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1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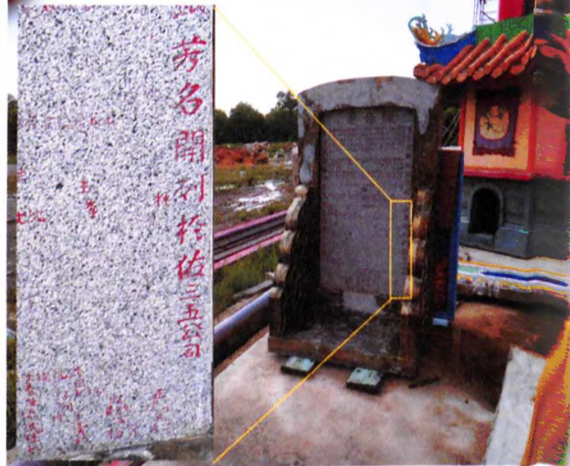


圖5 三五公司邊佳蘭第一橡膠園的現址。
說明：台灣國光石化曾計畫到此設廠，後因當地居民及環保人士的抵抗而未有成行。
資料來源：黃燕儀博士提供，攝於2019年5月19日。

圖6 邊佳蘭三灣觀音寺捐款碑名上的「三五公司」。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19年5月11日。

圖7 位在峇株巴轄華山亭的「日本人共同墓地道標」。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12年2月14日。

柔佛河沿岸的南亞公司了，雖然該公司已由其他種植業者接手，不復存在，但是卻留下了「南亞港」的地名，流傳至今。除了南亞港，柔佛河沿岸的南興園、南洋園的地名也都是來自日資的會社名。

作為日資橡膠園及其他實業最多的縣份，峇株巴轄擁有為數眾多的日本僑民，在二戰之前，峇株巴轄市內就能夠找到日本人開設的藥店、理髮店、照相館、和菓子店、旅館、洋服、雜貨、餐飲點、按摩店、撞球場、洗衣店等。當地還設有日本人的小學校以及峇株巴轄本願寺，是馬來西亞少數有日本僑民學校以及寺院的城市。在峇株巴轄市內一條僅一百五十多公尺伊斯邁路（Jalan Ismail），由於過去聚集了許多的日本商店，因此老一輩也將此稱為「日本街」。而從伊斯邁路口徒步五百公尺處，據說則是《マレー蘭印紀行》作者金子光晴當年下榻的東洋客棧。



圖8 據傳為著名詩人金子光晴所下榻的東洋客棧。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12年2月16日。

反思日本人在柔佛的歷史位置

柔佛長久以來是馬來(西)亞熱帶栽培業最為興盛的一邦，無論是十九世紀的華人港主還是二十世紀的歐資種植家，都曾為這個種植王國做出貢獻，日本人作為早期繼歐洲人以後，柔佛的第三大種植群體，他們在本地的活動亦不容忽視。只是許多人長久以來只注意到華人議題，日本人經常被忽略。

若換位思考，從日本人的角度來看，自明治維新至戰前這段期間，整個日本國內正處於不斷工業化的過程，國內汽車、鋼鐵、輪胎等的工業對於橡膠和鐵礦有著大量需求，促使許多的日商也深入這片資源腹地，柔佛因而成為日本國在橡膠和鐵礦原料上的最主要供應者，某種形式上參與了日本的工業化。

戰前日資企業在柔佛發展的歷程是在無意和有意之間促成的，愛久澤直哉及其由台灣總督府背後支持的三五公司便是「無意間」促成日本資本在柔佛發展的關鍵角色。早年在「南支」(華南)發展的他，南洋並非是他一開始的選

項，然而在各方因素影響下，他在南支的路愈來愈受限，因此便轉來柔佛發展，成為柔佛日資膠園的開拓者。他的成功也鼓舞了許多日本會社，開始了一波日本會社進駐潮。愛久澤直哉最先踏足的柔佛河沿岸和峇株巴轄，後來也成為後來柔佛日資膠園的主要聚集區。而一些三五公司的僱員在累積了足夠的經驗和資本之後，也繼續投入，成為柔佛膠園會社的建立者。

在愛久澤直哉無意間促成第一波日資種植潮之後，隨著日本對於南洋政策的重視，台灣總督府也開始有意識地扮演積極的角色。這時，可以見到許多以台灣為基礎的單位例如台灣銀行、華南銀行、南洋協會台灣支部配合總督府將日本及台灣的商人及資本不斷推向南洋，而柔佛當然也是其中的目的地。在國家力量的推動下，多少促進了日資在柔佛的發展。

由此看來，在戰前的柔佛，除了馬來人、華人、印度人、歐洲人之外，日本人也是人們日常生活中所會經常遇到的一群，甚至有些華人的南來路徑就是與日資橡膠園有關。因此我們在看待柔佛這片土地時，若把日本人、台籍人士加進去的話，將能拼湊出更完整的歷史圖像。雖然現今有關當時日本人在此

發展的蹤跡幾乎已經消失殆盡，但郊野中的 Parit Jepun 以及偶爾經過的日本人墓地卻可以不時提醒我們有關日本人曾經在本地築夢的事實。

延伸閱讀

Kassim Bin Thukiman.（1994）. "Penglibatan Orang-orang Jepun Dalam Sektor Ekonomi Di Negeri Johor Pada Awal Abad Ke-20." *Jebat* 20: 57-73.

Saya Shiraishi and Takashi Shiraishi（eds.）.（1993）. *The Japanese in Colonial Southeast As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白偉權、陳國川，〈從甘蜜園至橡膠園：十九世紀中至二十世紀初柔佛的地景變遷〉，《亞太研究論壇》第五十八期（二〇一三），頁六五—一〇二。

丹野勲，〈戦前日本企業の東南アジアへの事業進出の歴史と戦略：ゴム栽培、農業栽培、水産業の進出を中心として〉，《神奈川大学国際経営論集》第五十一期（二〇一六），頁一五—四一。

原不二夫，《英屬馬來亞的日本人》，廈門：廈門大學，二〇一三。

鄭良樹，《日本戰前的南洋移民》（南方學院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學術單刊第二種），新山：南方學院，二〇〇三。
鄭政誠，〈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對福建鐵路的規畫與布局（一八九一—一九一二）〉，《史匯》第十期（二〇〇六），頁六。
鍾淑敏，〈台灣總督府的「南支南洋」政策——以事業輔助爲中心〉，《台大歷史學報》第三十四期（二〇〇四），頁一四九—一九四。
鍾淑敏，〈二戰時期台灣人印度集中營拘留記〉，《台灣史研究》第二十四卷第三期（二〇一七），頁八九—一四〇。



與國父共建民國的馬來亞華僑們

在吉隆坡市郊蕉賴路四哩的基督教墳場內，放眼望去眾多的十字架墓碑叢中，矗立著一塊與眾不同的墓碑。該墓碑呈紀念碑的方柱狀，墓碑上方嵌有一個中國國民黨旗幟的彩色瓷磚。走近墓碑的另一面（正面），則看到墓主照片及其旁邊的相讚，該讚文寫著：「嶽，高哉為象崢嶸　光依日月一縱一橫；名遂身退孕育菁英　訏謨兄式吾黨先聲」，此相讚的題詞人，便是後來在台灣鼎鼎大名的白崇禧（時任國民政府軍委會委員長）。在相讚上方，則有一個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由國民政府所題頒的「澤溥僑群」。此外，在墓碑不同面向還能夠找到印有其他人所頒贈或題詞的照片瓷磚，像是民國元年孫中山任臨時大總統時所頒發的「旌義狀」；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所題的：「嶠南先進」；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海外部長吳鐵城❶所頒贈的褒揚令。此外，墓碑其中三面還刻有由國民黨中央黨史編纂委員會纂修陳肇琪所撰寫的長篇墓誌銘。這位墓碑的墓主便是杜南。

那麼杜南究竟是誰，何以能有諸多黨國大佬為他題詞？答案在其墓碑正面的英文敘述當中，他是「Co-Operator in 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即中華民國的共建者！我們從墓志銘當中也可以得知，他曾在夏威夷檀香山擔任過孫中山的中文老師，與國父有過一段師生緣。究竟杜南何以落腳吉隆坡？他與孫中山在本地又有何關係？除了杜南以外，本地還有哪些民國的共建者？

圖1 杜南先生墓。
資料來源：白偉權2016年12月20日攝於吉隆坡蕉賴基督教墳場。

❶ 吳鐵城在國共內戰之後，隨國民政府遷居台灣，曾任總統府資政，他後來在一九五三年病逝於台北。

從廣州到夏威夷

杜南出生於咸豐四年（一八五四年），比孫中山大十二歲，與孫中山一樣出身在華洋雜處的廣州一帶。杜南是順德縣落地秀才，❷但由於說得一口標準的廣東省城話，因此被美國人請至教會所辦的學校教授外國人粵語。不久之後，他更被廣州美國領事延攬至夏威夷檀香山，為當地美國官員開授粵語及華語課。❸在當地，他也受反清意識的影響，進而加入了當地的洪門會，與反清組織的志士往來甚密。

同時期，年僅十三歲的孫中山也於一八七九年隨母親來到檀香山，入讀英文學校，為了同時學好華語，孫中山進入了由杜南開設的夜學，兩人就此結識。孫中山推翻滿清的思想其實奠基於夏威夷，而杜南或許也是其中的貢獻者。之後杜南返回廣東從事反清事業，而孫中山也在一八八四年返回廣東，並開始從事革命事業。

杜南與孫中山在廣東也有相互往來，而孫中山的革命事業也更上一層樓，

❷ 杜志昌編：《杜南先生哀思錄》，吉隆坡：杜志昌，一九九三（初版為一九四一年陳占梅所編）。

❸ 由於廣義的中文包含粵語、福建話等語言，因此本文以「華語」作為當時官話的指稱。

到了一八九〇年，他已「晉升」為晚清「四大寇」，一八九五年更策動了第一次廣州起義。無奈起義失敗，孫中山於一八九六年逃離廣東，整個革命運動從此轉往海外。無獨有偶，杜南也恰好在同一時期因為反清事跡敗露而逃離廣東，他在一八九七年化名「南山」，首先逃到越南安南，再輾轉前往廣府人聚集的吉隆坡，繼續他的革命事業。雖然現有材料上並未表明杜南的逃離與孫中山的廣州起義有關，但是時間與因素的相近性，給人留下很大的想像空間。



圖2 前往夏威夷檀香山前的杜南（右）。
資料來源：白偉權翻拍自杜志昌編，《杜南先生哀思錄》，吉隆坡：杜志昌，1993。（初版為1941年陳占梅所編。）

落腳吉隆坡

一八九七年的吉隆坡是一個充滿朝氣的英殖民新興城市，在二、三十年前，這裡曾經發生大規模的礦區械鬥事件，但事件平息之後已於一八八〇年代重建，之後便不斷蓬勃發展，人口大量移入。就在杜南來到吉隆坡的前一年（一八九六），吉隆坡才被英殖民政府定為馬來聯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四州府的首都，底下管轄雪蘭莪、霹靂、森美蘭、彭亨四邦。杜南在此繼續以教授外國人中文為業。他也發現本地華人競相送孩子到英校唸書，恐怕本地學童忘祖，同時影響革命事業，故曾致函海峽殖民地府，獻議在英校開授中文課，但遭駁回。❹後來他便在古路律（Cross Road）❺自行開辦提供新式教育，兼收男女生的杜南學校，希望根植革命的種子。此後孫中山及其他的革命運動者來到吉隆坡後，都是以杜南學校為活動基地。

除了辦教育之外，由於吉隆坡錫礦產業的發展，也使杜南有機會投身錫礦業，他與友人合資開設「地球機器廠」從事錫礦產業的上游服務，為礦場提

❹ 根據陳占梅的〈杜南先生事略〉，海峽殖民地政府所提供的回復函日期是一八九八年二月十五日。由此可以推知杜南落腳吉隆坡的時間點，應該是一八九七年。

❺ 「律」為福建話發音的「lut」，音同英文的Road。

供採礦機具，這也為他的革命事業提供了經濟基礎。

杜南的革命事業

地處海外的吉隆坡遠離中國，相對自由的風氣也使杜南能夠積極向僑眾推廣革命思想。其中，身為基督徒的他，也巧妙地運用了他所屬的福音堂教會來組織「吉隆坡中國青年賽益會」，並由英國牧師擔任會長，自己則是副會長，該會成為有志進行革命者聚會商議的地方。聳立在廣州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紀念公園中的七十二塊海外組織獻石當中，就有一塊來自馬來亞的獻石，那便是「英屬雪蘭莪吉隆坡中國青年益賽會閱書報社」。❻杜南在吉隆坡另一個宣傳革命的組織是「中和講堂」。中和講堂屬於吉隆坡中和堂的組織，是海外眾多中和堂之一。杜南的中和講堂旨在向社會中下階層工人群體宣揚革命大義。每當中和講堂有講演活動時，杜南更高掛青天白日旗，據說這也是南洋各地最早公開懸掛此旗的地方。

❻ 最底層石塊碑記第二塊。

❖歷史小辭典

書報社

書報社是馬新地區革命志士用以宣揚革命思想，啟迪民智的機構，對於孫中山在南洋的革命運動扮演重要角色。據統計，在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一年間，馬新各地共有五十多家的書報社先後成立。

運作上，它主要透過辦報、印刷與流通雜誌書刊、辦理演說、演劇來宣傳三民主義革命思想，推動地方僑民的國族意識。革命成功後，書報社開始走向沒落，但也有許多的書報社領導人以書報社為基礎，興辦新式學校，繼續在本地區扮演教育國民的角色。

至今，仍有少部分書報社持續運作，像是麻坡啟智書報社、新加坡同德書報社、峇株巴轄群益書報社、檳城閱書報社、安順培智書報社等，它們已轉型為推動地方文化和教育事業的文教團體。

圖3 民國創立前的中和講堂。

資料來源：白偉權翻拍自杜志昌編，《杜南先生哀思錄》，吉隆坡：杜志昌，1993。（初版爲1941年陳占梅所編）



在一九〇六年孫中山與張永福、陳楚楠等人在新加坡晚晴園成立同盟會之後，同年八月便北上吉隆坡成立同盟會分會。孫中山在吉隆坡時，也由杜南接待。杜南及三個兒子也加入同盟會。經過在吉隆坡近十年的奮鬥，這時的杜南已是吉隆坡地區具有影響力的僑領了，因此孫中山在吉隆坡的演講行程也由杜南打點。為了號召大眾出席孫中山的演講大會同時防止保皇派攪局，杜南也邀請了自己的學生，時任華民護衛司的列志慈（Mr. Henry Charles Ridges）❼作為大會嘉賓。他也安排自己的兒子及其他志士擔任孫中山的保鏢。當時候的演講相當成功，吉隆坡革命派的聲勢大為提升。

當然，杜南的革命事業並不僅止於這裡，他也使用各種不同方式來傳播革命思想，像是他和兒子創辦吉隆坡報局，發行《吉隆日報》，作為宣傳喉舌。組織振武戒菸社並發起七州府戒菸運動。開設大中華巡迴流動電影院，到各地播放進步意識的電影（例如《拿破崙革命大戰記》），吸引觀眾前來，在播放電影之後，再進行宣傳講演。他也創辦振武慈善劇社演劇籌款，倡辦中華總商會、

❼ 列志慈也是杜南的學生，向杜南學習中文。他自一九〇三年起擔任霹靂及森美蘭華民護衛司。見 Wright, Arnold., & Cartwright, H. A. (Eds.) (1908).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British Malaya: Its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London: Lloyd's Greater Britain Publishing Company. p. 121

福音堂英文女書館、尊孔學校等，透過公益事業來宣傳革命的正面進步形象。

杜南多年來的投入並沒有白費，雖然間中許多次的革命都尚未成功，但是在同志的努力下，辛亥武昌起義終於將滿清推翻，民國建立，杜南自然也成為開國有功的建國元勛。然而民國成立之後，政治依然紛亂，杜南也繼續對於軍費進行輸捐，因此民國元年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時，便給他頒發旌義狀。不像南洋其他積極



圖4 老吉隆坡的杜南及孫中山史蹟。
說明：杜南學校、吉隆坡青年益賽會為大致點位。
資料來源：白偉權繪。

投入革命的華商，他們在民國建立之後多被政府邀請返回國內擔任政府要職，杜南始終留在吉隆坡生活，這也難怪資料檔案上少有對於他的紀錄。

吉隆坡是孫中山海外革命事業的其中一個據點，綜觀杜南和孫中山活動的地點大體上離不開現今吉隆坡的老市區。記錄上，杜南最早成立的杜南學校以及安置孫中山所在的古路律便是今天的敦陳修信路（Jalan Tun Tan Siew Sin），雖然確切位置不詳，但中和講堂的講演活動以及南洋地區最先掛起的青天白日旗，便是發生在這條街了。杜南依靠教會掩護而組織的吉隆坡中國青年益賽會，便位在今天的尊孔學校山腳下一帶的地區。一九〇六年孫中山吉隆坡大宣講所在的大中華映戲院，則在今天的蘇丹街（Jalan Sultan），該處後來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也是作為戲院用途，在幾經轉手後，目前則被重新活化，成為「麗士雜錦 REX KL」藝文中心。而杜南所屬的教會福音堂則是吉隆坡第一座華人教會，也位在蘇丹附近。每個點位之間距離都不超過六百公尺。二〇一六年接任中國國民黨主席的洪秀柱，在上任後也曾到訪這些地點，緬懷國父的足跡。

其他志士與地景地物

無可否認，杜南和吉隆坡只是孫中山民國大業的其中一個典型例子，馬新地區作為海外革命的策源地，還是有許多在革命事業中扮演要角的國父夥伴以及他們所留下的足跡。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新加坡的張永福和陳楚楠了。他們可說是本地區最早與孫中山接頭的華社領袖，早在孫中山還未踏足馬來半島之前，兩人便已經在一九〇四年出版《圖南日報》宣揚革命了。一九〇五年孫中山從越南抵達新加坡之後，便是由張、陳二人邀請至張永福的別墅——晚晴園開會，隨即便於當天成立了同盟會新加坡分會，這也是本區域第一個同盟會分會，由陳楚楠任會長，張永福任副會長。

張永福也將晚晴園讓給孫中山，晚晴園遂成為孫中山及革命黨在南洋從事革命事業的據點，其中有多個起義都是在這裡策畫的。雖然現在人事已非，但晚晴園已被新加坡政府列為國家古跡，作為展示孫中山與本地華人參與革命歷史的「孫中山南洋紀念館」(Sun Yat Sen Nanyang Memorial Hall)。對於晚晴

園，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也寫到：「南洋故本黨革命策源地而星洲晚晴園則當時之樞密所」❽足見其歷史地位。

不僅如此，馬來亞各地也不乏孫中山的忠實夥伴，像是森美蘭的鄧澤如，他可說是將一生奉獻給孫中山從事革命事業的華人。一九〇六年孫中山到吉隆坡、森美蘭鼓吹革命時，他便加入了同盟會，隨後兩人信件往來甚密，鄧澤如主要為孫中山在南洋富商中穿針引線以及籌募革命軍餉。在多次的募款計畫當中，他甚至被孫中山委任為馬來亞地區的總負責人，像是在一九一一年最關鍵的廣州黃花崗一役當中，他便為孫中山募得四萬七千餘元，使馬新地區成為資助革命軍餉的主力。民國成立以後，他也積極參與國民政府事務，曾任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監察委員、中央銀行董事、南洋籌餉局委員長、內政部礦務局長兼廣東礦務處長等職，甚至還於一九二五年官拜財政部長（後由宋子文接任）。❾他從政期間，也曾上書彈劾共產黨、蔣介石。他也著有《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蹟》、《孫中山先生二十年來手札》等書傳世，是研究孫中山和國民黨海外活動的重要材料。

❽ 張永福，《南洋與創立民國》，上海：中華書局，一九三三。

❾ 許[illegible]，〈南洋華僑與中國革命運動：以鄧澤如為例的討論〉，《史耘》第十七期（二〇一五），頁五三—九四。

除了新加坡、吉隆坡、森美蘭等地之外，檳城也是馬來亞另一個重要的革命基地。一九一〇年，孫中山將南洋同盟會的總部由新加坡遷至檳城，檳城隨即成為革命的海外指揮中心。當然，在這之前，檳城已是孫中山經常造訪的地方，當地也不乏積極參與革命的華社領袖，像是吳世榮、黃金慶、陳新政、丘明昶等人。孫中山在檳城期間主要的活動基地是在打銅仔街（Armenian Street）一二〇號，這裡除了是同盟會的新總部外，也是檳城閱報社的社址。革命喉舌報——《光華日報》也在此成立，該報仍延續至今，是北馬第一大報。這裡也是廣州黃花崗起義的策畫點之一（另一處則是柑仔園四〇四號的洋樓），此地現今已保留作「孫中山革命基地紀念館」。孫中山一九〇五年及一九〇六年到檳城曾經落腳的小蘭亭俱樂部，今天也成為了「檳城孫中山紀念館」。

馬來亞雖然遠在東南亞，但本地華僑卻是孫中山在革命事業上最堅實的後盾，為民國的創建立下汗馬功勞。因此在新生的中華民國，無論是在政治或是經濟上，也都能見到馬來亞乃至南洋各地華僑的影響力。因此若要尋找民國創建相關的歷史遺跡，馬來亞當然會是一個很好的巡禮之地，因為在這裡能夠





5
6

圖5 孫中山首度來檳城時所落腳的小蘭亭俱樂部現址。
資料來源：2016年7月31日白偉權攝於檳城喬治市。

圖6 師大林口校區的「華僑為革命之母」鐘樓。
資料來源：蔡怡玟博士提供，攝於2020年10月18日。

見到孫中山的老師、革命摯友，以及他們策畫起義的地方。當然，有關孫中山在馬來亞的革命史蹟其實多不勝數，上述所列僅是冰山的一角，本地仍有許多有趣且值得繼續深挖的事跡。⑩

看過了這段歷史，便不難理解為何「僑務」會成為中華民國憲法中的基本國策了。因此我們才會見到長久以來，台灣政府對於不具中華民國國籍身分的海外華裔，無論是就學或是健保計畫等方面，都提供與本國公民相同的待遇，而主管僑務的僑委會也是目前行政院現有八大會當中最早成立的部會。現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林口校區（以前的僑大）禮堂旁所矗立的「華僑為革命之母」鐘樓，所訴說的就是這麼一段故事。

延伸閱讀

安煥然、吳華、舒慶祥，《孫中山與柔佛》，新山：南方學院，二〇一二。

杜志昌編，《杜南先生哀思錄》，吉隆坡：杜志昌，一九九三。

⑩ 像是孫中山的革命伴侶陳粹芬，她在與孫中山分手後，便長居霹靂太平，並且在當地收養了養女蘇仲英（後改姓為孫仲英）。此外，隨孫中山一起奔走馬來亞的汪精衛也在本地宣揚革命的時候，結識了檳城富商陳耕全的千金陳璧君，陳氏受到汪精衛的感召，並以身相許。見李永球，《移國：太平華裔歷史人物集》，檳城：南洋民間文化，二〇〇三，頁四一—四二。

張少寬，《孫中山與庇能會議：策動廣州三、二九之役》，檳城：南洋田野研究室，二○○四。
張永福，《南洋與創立民國》，上海：中華書局，一九三三。
莫順宗編，《孫中山在海外》，雪蘭莪：馬來西亞華總東南亞華人研究中心，二○一七。
黃賢強、陳丁輝、潘宣輝編，《辛亥革命：孫中山和革命志士：歷史、記憶與反思》，新加坡：晚晴園——孫中山南洋紀念館，二○一二。
鄧澤如，《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蹟》，出版地不詳：正中書局，一九四八。
顏清湟著，李恩涵譯，《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八二。
蘇慶華，《中山先生與檳榔嶼》，台北：獨立作家，二○一五。

走在台灣民國時代以前的大馬華教

相信很多有接觸過馬來西亞華人的台灣人都會發覺，大馬華人對中文掌握得特別好，除了在講話方面夾雜了一些地方口音之外，跟大馬華人溝通基本上並不會有多大的問題。對此，許多人的第一反應就是：「你的中文怎麼說得這麼好?!」筆者所遇到的經驗大多是類似這種表示驚訝的。事實上，馬來西亞華人不僅普遍都能掌握中文，一些來自獨中的文科學生對於中國歷史與文化的認識甚至不亞於台灣學生。

台灣朋友會有這樣的感受，多少是源於無法想像在中、港、台這個大中華地區之外的那些「異域」，竟然會出現中華文化的生態孤島，因此有一種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覺。這種感受其實是可以理解的，畢竟在一九四九年之後，

遷台的國民黨政府為了維持本身對於中華文化的正統性及代表性，以便與中共分庭抗禮，因此在台灣下了不少苦工。這些工作由國家力量主導，在實踐上可說是鋪天蓋地，並且深入民間各個層面，它長久以來將台灣人浸泡在中華文化的大海之中。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中華民國台灣，華語是國語，學校教育中的國文課、歷史課也背負著傳承民族大義的重任。在思想情操方面，台灣各個角落都不乏與宣傳黨國及中華文化價值有關的景觀地物，像是各級學校，便有以中正、中山、光復、復興、興華、建國、自強、三民、中興等為名的國中、國小及大專院校。除了校名之外，許多學校的班級名稱也常以中國傳統價值觀當中的仁、義、禮、智、孝、溫、良、恭、儉、讓等命名。上述名字不僅出現在學校，就連街路名、聚落名、甚至一些行政區名都能夠見到中華國族的影子，像是中山路、中山村、中山區；復興路、復興村、復興區。

由此可見，一般人應該會這麼想：「除了我們會這樣之外，應該沒有別人了吧？」事實不然，早在日本治台時期，台灣人尚在學習日語、學唱〈君之代〉

之際，中華民國、中華民族意識早已深植馬來亞乃至整個東南亞地區華人的意識當中，而最能體現這一波中華思潮的，就是馬來西亞華文教育了。

華人社會的強國與興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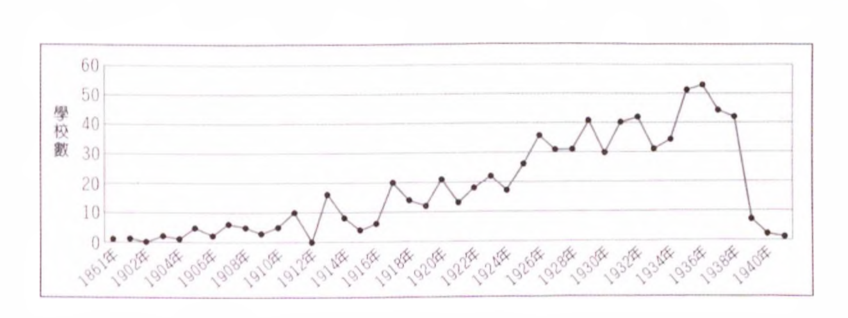
馬來（西）亞的華文教育❶始於二十世紀初，在這之前，本區的教育是以方言為媒介語的私塾為主，當時人們的原鄉地域觀念較重，也普遍沒有「中華一體」的意識，這點與移墾社會時期的台灣類似。然而，台灣在一八九五年割讓給日本之後，便與海外其他華人移民社會走上了不一樣的道路。

在馬來亞方面，打從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這段期間開始，面對中國的內憂外患，身在異鄉的華人永遠是最憂國憂民的一群。辛亥革命之後，大一統的中華意識逐漸成為影響本地華人的一股思潮，大家都認為，面對祖國的各種危難，唯有團結一心，興辦教育才能走出困境，達到強國的目標。因此，

❶這裡的「華文教育」指的是用華語教學，傳授民族主義思想的教學體系。

辦理新式教育的行動成為本地僑社宣洩救國情懷的重要出口。可以見到在一九一一年以後，各地僑社都在籌辦學校，以致華校如雨後春筍般在這片馬來土地上冒起。到了一九三〇至四〇年代隨著中國情勢日趨嚴峻，馬來亞地區新式學校成立的數量更達到了空前的高峰。

綜觀當時馬來亞地區華人所取的校名，也不外乎與大中華民族主義以及展現對於民族期待有關的名稱，例如中華、興華、培華、育華、光華、醒華、振華、三民、維新、興中等名字。而中華民國領袖像是孫中山和蔣中正的名字，也是人們普遍會選用的名稱。以中山為例，在現今馬來西亞尚有存在的「中山華小」就有七所，分別坐落於怡保、檳城、美里（Miri）、丰邊（Rompin）、、巴莪（Pagoh）、端洛（Tronoh），以及



2 | 1

圖1 1942年以前英屬馬來亞新式學校之成立時間表。
註1：1902年及1912年無資料。
註2：萃英學校在1861年設立初期為一私塾，並非現代化學校。
資料來源：
1. 白偉權繪。
2. 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マレーシア・ビルマにおける華僑》，東京：青史社，19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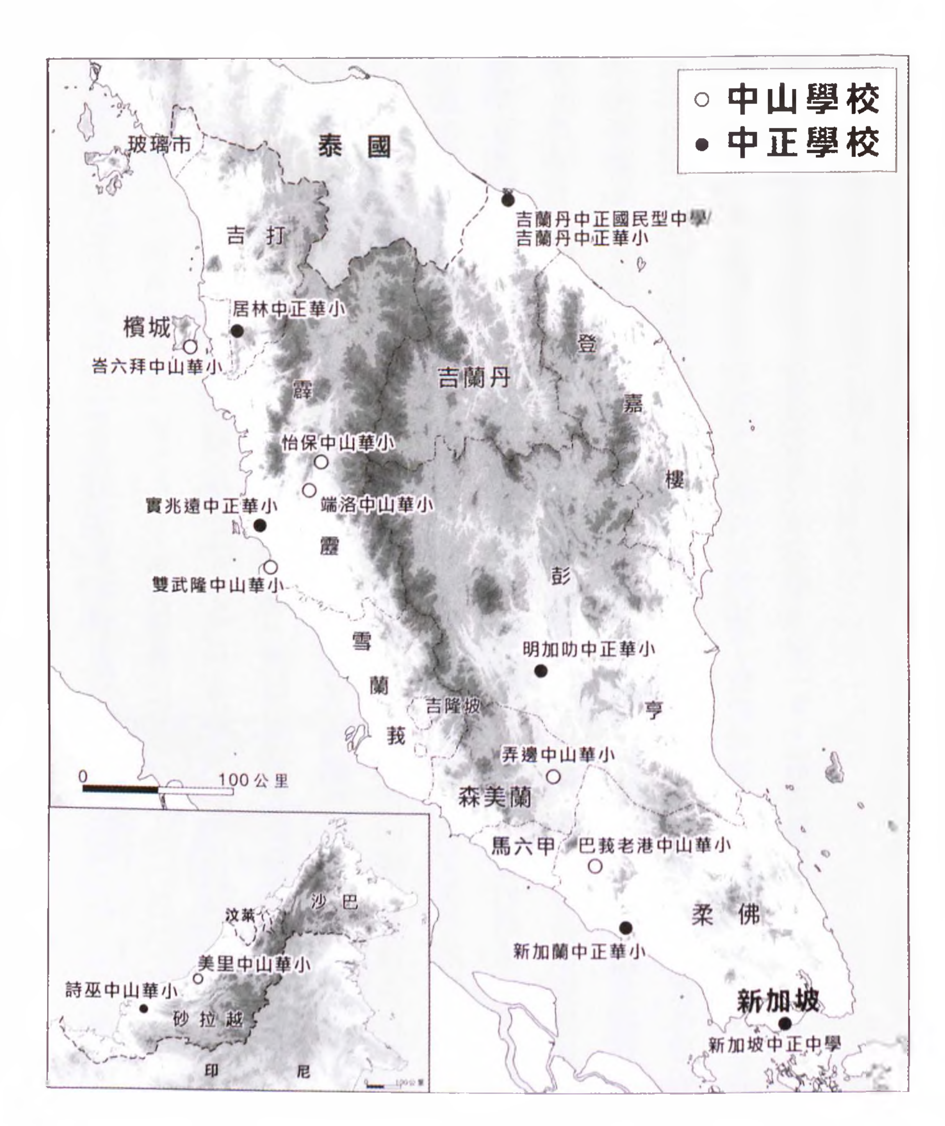


圖2 馬來西亞現有以孫中山和蔣中正命名的學校
資料來源：白偉權繪

峇眼拿督（Bagan Datuk）的雙武隆（Sungai Burung）。以中正為名的「中正華小」則有六所，分別為實兆遠（Stiawan）、哥打峇魯（Kota Bahru）、居林（Kulim）、明加叻（Mengkarak）、新加蘭（Senggarang）以及詩巫（Sibu）的中正華小。❷也有一些與中華傳統價值相關的學校名稱，例如寬柔學校。「寬柔」二字來自《禮記．中庸篇》的「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

由於當時華人所興辦的學校主要是以培養海外僑民的國族意識為目標，因此在學校的建築及設計上，也經常能夠見到國旗雕塑、國父像等的設置。學校有重大節日時，儀式的進行總是離不開唱國歌，向國旗敬禮的環節。❸像是在馬六甲，當地的培風學校在雙十國慶日時，校門口便貼著「發揚民族精神，共祝國慶紀念」以及寫著：「建國二十三年，困難頻仍，國仇未報，願我國民，忍辱負重，追懷先烈功勳，同祝國慶」的對聯。❹此外，像是在霹靂實兆遠的中正學校，當地華社於戰後一九四八年興建了新的磚牆校舍，為了祝賀蔣介石壽辰，因而將該棟新建築命名為「中正紀念堂」❺。這棟馬來亞的中正紀念堂足足比台北的早了三十二年。

❷ 在新加坡也有一間以蔣中正為名的中正中學。此外，柔佛昔加末的中正華小後來在戰後與當地其他學校合併，最終改以地方名作為校名。

❸ 培風學校（年代不詳），《馬六甲培風校刊第六期》，馬六甲：培風學校，頁四二。

❹ 培風學校，《培風期刊》，馬六甲：培風學校，一九三四，頁三三。

❺ 王芊蔚，《霹靂實兆遠華僑公立中正小學中正紀念堂新校舍落成紀念特刊》，實兆遠：中正小學建築校舍委員會，一九四八，頁九。

除了外顯性的校名之外，華校內部的「軟體」建設也是做得非常到位。這點從宣揚學校核心價值的校歌便能體現出來。像是霹靂和豐（Sungai Siput）的興中學校校歌，最後一句便是：「更祝文明日進，時和年豐，大家努力共興中！」❻；新山寬柔學校校歌，開頭便是「中華文化冠亞東，教化萬方通」。在校歌的其他文句：「有教無類孟與孔，朝夕勤弦誦；尚規律，崇實用，愛我寬柔五育重；願同學，勤儉正直服務社會揚校風」也體現出辦校者將中國傳統儒家價值結合新式教育（五育）作為對下一代的教育目標。

在校訓方面，台灣校園內常看到的校訓



圖3 柔佛昔加末中正學校禮堂中比黑板還要大的國父像。

資料來源：白偉權翻拍自昔加末中正學校校刊編輯委員會，《柔佛昔加末公立中正學校廿三週年紀念特刊》，昔加末：中正學校，1941。

基本上早已出現在馬來亞華校的大堂上，像是禮義廉恥、智誠勤勇、止於至善、敦品勤學、自強不息、誠勤儉毅、勤樸勇毅等。其中，「禮義廉恥」是最常被華人選為校訓的文字，若以馬來西亞現今的六十所華文獨中作為觀察，便有超過三分之一（二十四所）的學校都以「禮義廉恥」作為學校校訓。

在學校的教學方面，這些新式學校所使用的語言當然就是華語了，華語成為一種新時代、團結全體華人、重燃民族希望的標誌，因此當時全民開始了一股講華語熱潮。這股講華語的熱潮可以在一九二五年一位文人對



圖4 實兆遠中正華小的中正紀念堂。
資料來源：王永裕先生提供，攝於2010年前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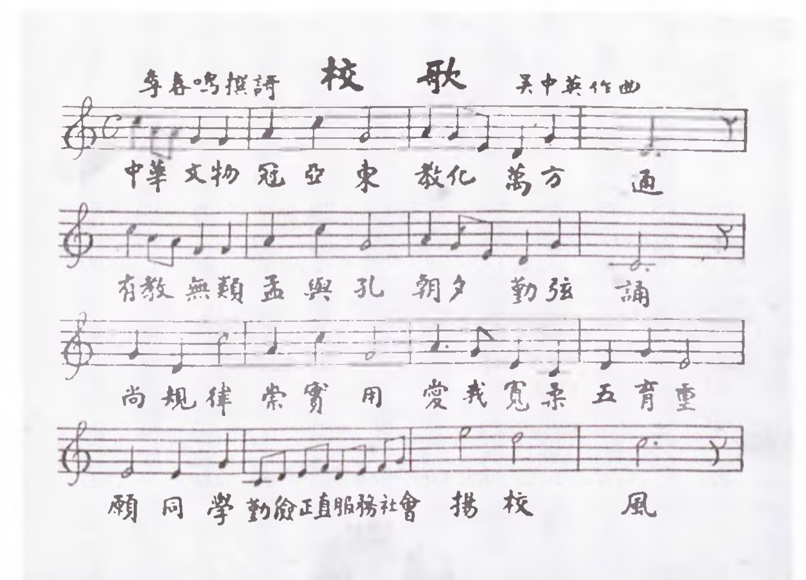
❻ 興中中學校刊編輯委員會，興中校刊，和豐：興中中學，一九四九。

於霹靂太平振華學校的記載中得到體現，他在當時到訪該校，對於該校的辦學讚譽有加，但最讓他欽慕的地方在於：「該校之國語學生無大小，皆操音純熟，居間無異處於國中，以故流連數日，竟忘置身於語言分歧之域也，至是始知該校前日之令聞為不虛，無怪乎其發達日有千里之勢也」❼。由此可見，在當時這個從方言轉型至華語的階段，人們會認為能把華語說好是一件非常可喜的事情，而華語的掌握也與學校發展的評價成正比。

在課程安排上，國語（華語）、算數、體育、音樂、公民、史地等科目當然是此新式教育的基本內容。有趣的是，在某些時期，本地教科書是可以由馬來亞教育部及中華民國教育部共同審定的。而這些教科書除了保有中華文化元素之外，也適時融入了南洋的元素，像是可以見到芭蕉樹、橡膠樹、馬來甘榜為封面設計的教科書。而在一九四八年的公民教科書中，也有這麼一個課文，寫到：「我敬重祖國國旗、居留地國旗」，顯示出華人心目中，對於中國和馬來亞的界定。

若翻開學校行事曆，我們會發現中華民國該有的假期也都出現在馬來亞地

❼〈振華學校之發達〉，《南洋商報》，一九二五年七月三日，第十二版。





5
6

圖5 寬柔學校校歌。
資料來源：白偉權翻拍自寬柔學校，《柔佛寬柔學校季刊》第一期，新山：寬柔學校，1926。

圖6 1948年的小學公民教科書課文。
資料來源：白偉權翻拍自南洋編譯所，《南洋公民教科書》初小第一冊，新加坡：南洋書局，1948。

區的華校。在一九二〇年代，一所華校的學生會期待的假期，就包含了孫中山紀念（三月二十日）、黃花崗紀念（四月二十七日）、國恥紀念（五月九日）、❽孔子誕日（十月三日）、國慶紀念（十月十日）、雲南起義紀念（十二月二十五日）等。屬於馬來亞在地的學校假期只在學校行事曆中占了兩項，分別是馬來蘇丹壽誕以及歐洲休戰紀念日。❾

此外，每當祖國蒙難，發生各種天災人禍時，無論是華人自發性的輸捐或者是中國官方前來征求的援助，南洋各地僑社往往成為祖國各種資源的最大來源地，對祖國的關切絕不落人後。而南洋僑領無論在投資或是建設祖國實業，都是主要的參與者，因此南洋許多市鎮學校的領導階層普遍也與祖國的黨政大員維持著緊密的關係，每當學校有重要慶典時，這些綿密的社會關係網總是會在這個時候浮現。

像是雪蘭莪加影華僑中小學校在民國二十五（一九三六）年慶祝建校二十五週年紀念時，便收到許多來自中國黨政要員的祝賀墨寶，像是時任國民政府主席的林森、立法院長孫科、曾任行政院長的汪精衛、❿監察院長于佑

❽ 指的是日本迫使中國簽訂〈二十一條〉的國恥。

❾ 寬柔學校，《寬柔學校季刊》第一期，新山：寬柔學校，一九二六。

任、陸軍上將傅作義、少帥張學良、名將楊虎城、一級上將李宗仁，以及福建省主席陳儀。[11]雖然這些墨寶不見得百分百出自本人手筆，但卻足以體現出馬來亞僑社與祖國之間的密切關係，而當時的台灣正值皇民化運動的前一年。除了加影華僑學校外，馬六甲培風學校在一九三四年慶祝二十週年紀念時，也收到許多黨政大員的題詞，該校還收到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所致贈的「親愛精誠」匾額。

總體而言，在二十世紀初的民族主義浪潮下，辦學救國是當時的一道風景，南洋各地華人市鎮已然成為內地社會的延長，而當時本地學生日常的學校生活，正好是此內地延長氛圍的最佳註腳。

獨立後的華教風景

[10] 汪精衛在一九三五年底辭任行政院長。

[11] 陳儀後來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七年任台灣行政長官，他因為任內發生二二八事件，而在台灣歷史上引起不小的爭議。

海隅聲教
馬來亞加影華僑中小學校廿五週年特刊紀念
林森

樹人愛國
馬來亞加影華僑中小學校廿五周年紀念刊
孫科題

長風萬里
于右任

嘉惠南僑
陳儀題



7
8

圖7　國內黨國大佬贈送給加影華僑學校的墨寶。
資料來源：白偉權翻拍自華僑中小學校特刊編輯處，《加影華僑中小學校25週年紀念特刊》，加影：華僑中小學校，1937。

圖8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贈送給馬六甲培風學校的匾額。
資料來源：白偉權翻拍自匡光照主編，《英屬馬六甲華僑公立培風學校20周年紀念刊》，馬六甲：馬六甲華僑公立培風學校，1935。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之後，馬來亞華僑迎來了短暫的歡樂時光，但等待著他們的卻是本地區走向獨立建國、民族自決的歷史大門。在這期間，由於祖國繼續陷入政治動蕩之秋，華人開始被迫放棄華僑身分，正式「落番」成為馬來（西）亞華人。這也意味著華文學校所傳播的意識形態、教育目標也需要進行改變，以迎接新時代的挑戰。

在新的時代中，馬來西亞華人對於新國家的忠誠度始終為土著政府所質疑，而殖民地時期華洋合作所造就的華人經濟優勢也在土著社群中形成「華人威脅論」的刻板印象。在此背景下，政府在獨立後頒布了許多對華人不利的政策，使得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舉步維艱。像是在一九五七年獨立前夕，政府便頒布《一九五六年拉薩報告書》（*Report of the Education Committee 1956*，簡稱 Razak Report），提出「一種語文、一種源流」，將馬來文作為國家教育的最終目標。政府也在一九六一年的《一九六一年教育法令》（*Education Act, 1961*）授權教育部長可以在適當的時候將華校改制為國民（馬來源流）學校。對此，許多中學也紛紛放棄政府津貼，轉為獨立中學，以延續母語的教育。

❖歷史小辭典

獨立中學

政府所頒布的〈一九六一年教育法令〉乃出自《達立報告書》(*Rahman Talib Report*)的建議，當中法令雖然確保了各種母語的小學教育，但到了中學教育部分，該法令則規定自一九六二年開始，全馬的中學只分兩類：

1. 全津貼中學：以英語和馬來語為教學媒介語，可獲政府全面補助，成為國民學校。
2. 獨立中學：不符合政府教學媒介語要求者，政府不予補助，由民間自負盈虧，成為國家體制外的學校。

在〈一九六一年教育法令〉下，不願接受改制、無國家津貼補助的華文中學便成為今天的「獨立中學」，簡稱「獨中」。獨中雖獲准在體制外繼續運作，繼續培育人才，但其文憑並不受國家所承認。因此，馬來西亞獨中的產生和現有的地位，是一系列法令實施下的結果。

在此情況下，獨中的發展較為艱辛，它的維持必須發動社會群體的力量，各地學校都是靠當地華人社會的支持來維護整個教育系統的運作。獨中也因而成為華人維繫族群認同和文化價值的重要機制。目前，馬來西亞共有六十所獨中。

這些對華教不利的政策也引發了社會的反彈，許多在戰前受教育的學童後來也成為了華教領袖，繼續為華社抗爭。當然，抗爭隨之而來的就是政府的打壓，這樣的互動也同時造就了許多的華教鬥士、民族英雄，例如，林連玉、林晃昇、沈慕羽、陸庭諭等人，他們都曾因為帶領華教抗爭運動而遭受牢獄之災，有者甚至被褫奪公民權。因此他們深受華人社會感念。像是極力倡導母語教育，抵抗政府政策而被褫奪公民權的林連玉，逝世後便被華社奉為「族魂」，他的祭日也被民間定為華教節。華人也在全國發起募捐運動，籌募以他為名的林連玉基金。這項運動獲得熱烈反響，組織者也將此款項在吉隆坡市區購置產業，設立「林連玉紀念館」，讓後嗣能了解馬來西亞華教運動

的歷史和民族鬥爭的過程。在現今的華文教育機構，不時也能見到社會領袖們在一些特別的日子舉辦對於華教先賢的紀念活動。因此在獨立之後，抗爭、悲情成為馬來西亞華文教育歷史論述的主旋律。

在新的時代裡，華校的辦學宗旨也在重重的外部挑戰之下，從原有的中華國族教育，轉變為培養傳承母語，發揚中華文化，認同本土的教育目標。因此具有政治認同意味的（中華民國）國旗、國父孫中山頭像、跟祖國同步的行事曆也早已消失於本地的華校之中，取而代之的是馬來西亞國旗、國父東姑阿都拉

圖9 各社團組織及學校領導們在華教先賢紀念日向名錄上華教先賢們鞠躬
註：該活動由董教總教育中心（非營利）有限公司、新紀元大學學院和馬來西亞維護華教聯合會聯辦。
資料來源：白偉權2019年12月7日攝於馬來西亞新紀元大學學院

曼、首相、馬來元首的頭像。

在教材內容方面，若我們以未接受政府改制的華文獨立中學為例子，華文還是獨中的核心課程，其他諸如歷史、地理、物理、化學、數學等的科目，也仍然以華語作為媒介語。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歷史科，獨中在高中三年的課程安排上，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仍維持著中國歷史（高一）、世界歷史（高二），以及馬來西亞及其東南亞鄰國史（高三），其對中國歷史的重視可以說是中、港、台以外最高的。直到二〇二〇年，華文獨中才正式將高一的中國歷史改為東亞史。

在校園地景方面，華文學校依然保有很濃厚的中華文化色彩，像是許多學校的分班因為要避免使用一二三四或ABCD等具有等級意味的名詞，因而採用具有中華傳統價值的名稱，例如柔佛的麻坡中化中學便以忠、孝、仁、愛、禮、義、信、和作為班級名稱。在許多學校的校園內，也能夠見到孔子像，以及校訓標語，這點與台灣現有的學校無異。唯一不同的是，現今馬來西亞華文教育始終不被政府承認為國家教育的一環，而在此充滿挑戰的環境之中，往往

更加激發出華人逆境求生的意志，因此出資延續華文教育至今依然是馬來西亞華社能積極動員的因素，學校的建設幾乎也是取自社會大眾的捐款。因此在華校校園內，經常能夠看到寫滿贊助人名字的大樓、教室，以及插上贊助人姓名牌子的樹木，形成「馬來西亞限定」的特殊地景。

整體而言，作為華人移民社會的馬來亞地區，本地華人社群早在二十世紀初便受到中華民族及黨國意識的洗禮，而當時的台灣仍處於日治時期，許多台灣人今天耳熟能詳，後來影響台灣歷史路徑的人物早已和南洋僑社有密切的互動，而馬來西亞華教的歷史，便成為能夠體現這段歷史及時人想法的最佳註腳。一九四五年過後，台、馬兩地的華人才開始因為中華民國而進入「同步」的歷史。然而在很短的時間內，東南亞華人有了新的國家身分，台灣則晉升成為中華民國的堡壘，乃至於接過復興中華文化正統的大旗。

令人玩味的是，馬新華人在後來的政治氛圍作用下，其原來在中華文化圈中的積極地位已黯然失色。馬來西亞不是孤立的案例，其他東南亞國家亦然，華文教育的消逝情形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也難怪大馬華人能掌握華





10
11

圖10 檳城孔聖廟中華小學禮堂內的「敬誠勤樸」校訓。
說明：在校訓下方為光緒皇帝御筆的「聲教南暨」匾額。該校是馬來亞最早的新式華文學校，也是當時唯一獲得清廷立案承認的海外學校。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19年7月11日。

圖11 雪蘭莪巴生興華中學寫滿贊助人名字的校舍大樓。
資料來源：白偉權攝於2014年11月4日。



語、實踐中華文化會令台灣人感到驚訝。無論如何，只要走進馬來西亞華校，看著現有地景回想過去，還是能夠讓人感受到不一樣的民國風情。

延伸閱讀

Tan Yao Sua.（2020）.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Malaysia: Issues and Challenges.* Petaling Jaya: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er.

王賡武，《中國與海外華人》，台北：台灣商務，一九九四。

白偉權，《柔佛新山華人社會的變遷與整合：一八五五—一九四二》，加影：新紀元學院，二〇一五。

匡光照主編，《英屬馬六甲華僑公立培風學校二十周年紀念刊》，馬六甲：馬六甲華僑公立培風學校，一九三五。

華僑中小學校特刊編輯處，《加影華僑中小學校二十五週年紀念特刊》，加影：華僑中小學校，一九三七。

寬柔學校，《柔佛寬柔學校季刊》第一期，新山：寬柔學校，一九二六。

鄭良樹，《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簡史》，新山：南方學院，二〇〇五。
興中中學校刊編輯委員會，《興中校刊》，和豐：興中中學，一九四九。



台灣@南洋 1

赤道線的南洋密碼

台灣@馬來半島的跨域文化田野踏查誌

作　　者　白偉權
主　　編　高嘉謙
責任編輯　林秀梅　陳淑怡

版　　權　吳玲緯
行　　銷　何維民　吳宇軒　陳欣岑　林欣平
業　　務　李再星　陳紫晴　陳美燕　葉晉源
副總編輯　林秀梅
編輯總監　劉麗真
總 經 理　陳逸瑛
發 行 人　涂玉雲

出　　版　麥田出版
104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5樓
電話：(886)2-2500-7696　傳真：(886)2-2500-1966、2500-1967
發　　行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104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11樓
書虫客服服務專線：(886)2-2500-7718、2500-7719
24小時傳真服務：(886)2-2500-1990、2500-1991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09:30-12:00．13:30-17:00
郵撥帳號：19863813　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E-mail：service@readingclub.com.tw
麥田部落格：http://blog.pixnet.net/ryefield
麥田出版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RyeField.Cite/

香港發行所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駱克道193號東超商業中心1樓
電話：(852) 2508-6231　傳真：(852) 2578-9337

馬新發行所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Cite(M)Sdn. Bhd.】
41-3, Jalan Radin Anum, Bandar Baru Sri Petaling,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 9056-3833　傳真：(603) 9057-6622
E-mail：cite@cite.com.my

設　　計　許晉維
排　　版　宸遠彩藝有限公司
印　　刷　前進彩藝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2022年05月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Printed in Taiwan）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定價／599元
ISBN：978-626-310-171-5
978-626-310-225-5（EPUB）

城邦讀書花園
www.cite.com.tw

讀者回函卡

cite城邦媒體

※為提供訂購、行銷、客戶管理或其他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章程所定業務需要之目的，家庭傳媒集團（即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書虫股份有限公司、墨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原創股份有限公司），於本集團之營運期間及地區內，將以e-mail、傳真、電話、簡訊、郵寄或其他公告方式利用您提供之資料（資料類別：C001、C002、C003、C011等）。利用對象除本集團外，亦可能包括相關服務的協力機構。如您有依個資法第三條或其他需服務之處，得致電本公司客服中心電話請求協助。相關資料如為非必填項目，不提供亦不影響您的權益。

□ 請勾選：本人已詳閱上述注意事項，並同意麥田出版使用所填資料於限定用途。

姓名：＿＿＿＿＿＿＿＿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電子信箱：＿＿＿＿＿＿＿＿

身分證字號：＿＿＿＿＿＿＿＿（此即您的讀者編號）

生日：　　年　　月　　日　性別：□男　□女　□其他

職業：□軍警　□公教　□學生　□傳播業　□製造業　□金融業　□資訊業　□銷售業

□其他＿＿＿＿＿＿＿＿

教育程度：□碩士及以上　□大學　□專科　□高中　□國中及以下

購買方式：□書店　□郵購　□其他＿＿＿＿＿＿＿＿

喜歡閱讀的種類：（可複選）

□文學　□商業　□軍事　□歷史　□旅遊　□藝術　□科學　□推理　□傳記　□生活、勵志

□教育、心理　□其他＿＿＿＿＿＿＿＿

您從何處得知本書的消息？（可複選）

□書店　□報章雜誌　□網路　□廣播　□電視　□書訊　□親友　□其他＿＿＿＿＿＿＿＿

本書優點：（可複選）

□內容符合期待　□文筆流暢　□具實用性　□版面、圖片、字體安排適當

□其他＿＿＿＿＿＿＿＿

本書缺點：（可複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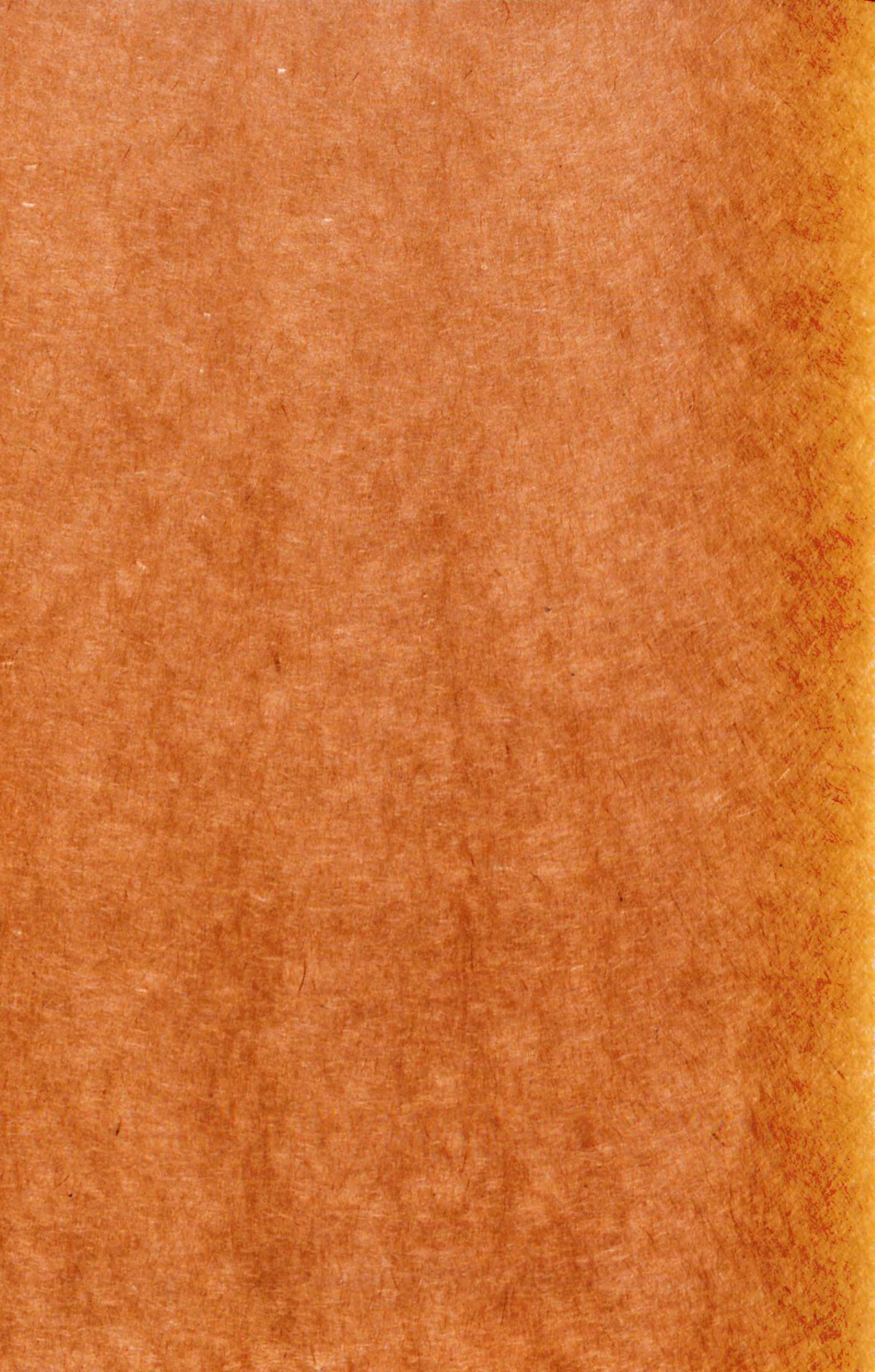
□內容不符合期待　□文筆欠佳　□內容保守　□版面、圖片、字體安排不易閱讀　□價格偏高

□其他＿＿＿＿＿＿＿＿

您對我們的建議：＿＿＿＿＿＿＿＿







那麼近又那麼遠的馬來半島，
台灣人真的都了解嗎？
從源頭梳理馬來西亞和台灣的雙向連結，
延伸觸角至全世界。

位於海上要塞的馬來西亞，夾在南中國海和馬六甲海峽之間，擁有絕佳的戰略位置，族群、文化和語言繁雜，幾種元素相互交融之下，構成精采豐富的歷史內涵。

本書分成三大部分，從歷史、人物、家族和地景入手。

「歷史的基因圖譜」以全覽式視角觀看馬來半島和新加坡。由族群經濟活動談起，從「農業南馬，礦業北馬」的甘蜜、胡椒、橡膠及錫礦經濟為框架，解讀半島多元族群的社會紋理。

「跨域的社會菁英」選擇十九世紀以降締造近代馬新印歷史的重要人物為主角，包括畢麒麟、康有為、廈門林家、棉蘭客家張氏兄弟、鄭景貴、陸佑等人，探討當時社會菁英的跨域、跨國經驗，且看這些人如何從台灣、中國或西方，千里迢迢來到馬來半島，對當地政經環境產生何種影響。

「橫向跨界的歷史」論述台灣人熟悉或似曾相識的事件，但它們發生的地點卻是在馬來半島，例如台灣有天地會，大馬也有；台灣有三五公司開發農場，在馬來亞則投資橡膠種植；台灣有國父孫中山，新馬也有國父以及他的革命夥伴蹤跡。此部分聚焦在人與人的互動，探討他們所造成的歷史現狀，或特殊的歷史結果。

全書以翔實的田野地景調查，探討跨「族群、國家、地域」的人文網絡和現象，這是關於馬來半島議題的書寫，最獨特的觀看視角。

《赤道線的南洋密碼》強調的是地理意義的「發現」，因此帶有一個值得思考的視角：人物與地方的關聯，如何置於大歷史的體系裡觀照？——高嘉謙

ISBN 978-626-310-171-5 00599

麥田出版 Rye Field Publications, a division of Cité Publishing Ltd.

RC8101 NT$599 HK$200 建議分類：人文史地・世界史

ISBN:978-626-310-171-5

ISBN:978-626-310-171-5